

延安《解放日报》史

王敬
主编

新华出版社



延安《解放日报》史

主编 王 敬 顾问 温济泽

王 敬 岳颂东 王凤超 著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延安《解放日报》史/王敬主编. —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8.4
ISBN 7-5011-3935-0

I. 延… II. 王… III. 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闻事业史-延安 IV. G21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4169 号

延安《解放日报》史

王敬 主编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75 印张 290,000 字

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3935-0/G·1446 定价: 20.00 元

序

DJ32.107 穆青

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革命根据地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1941年5月16日创刊，1947年3月27日停刊。它出版的年代，正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同国内外敌人浴血战斗的时期，是中国革命事业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延安精神大放光芒的时期。延安《解放日报》在这一历史阶段出色地完成了它的光荣使命，以卓越的宣传业绩和丰富的办报经验，在中国新闻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我们党的报刊宣传工作，自中共中央第一张机关报《向导》出版以来，具有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优良的革命传统。其中延安时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重要标志，就是《解放日报》的改版。这次改版，从1942年4月1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开始，至1944年2月16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历时1年又10个月，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它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的新闻事业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在改版期间，《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社论和文章，对党的新闻工作的重大方针和基本原则进行了阐述，对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一些根本问题进行了勇敢探索和科学论证，在新闻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基石。

凡是当年在延安参加过这次整风的同志，思想上无不受到深刻教育，记忆犹新。通过报纸的改版，使我国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带来了党的新闻事业的新发展，促进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前进，这次新闻改革中确立的一些重大原则，或者说主要经验，例如，党报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坚持和强调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贯彻全党办报的思想；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建立新的文风等，至今闪耀着光芒，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们不仅在过去对党报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仍具有强烈的现实的指导意义。

这本《解放日报史》的作者，以数年的时间和精力，走访了许多老同志，查阅了大量史料，写成此书。它通过丰富的史实，介绍了《解放日报》的发展历程和宣传成就，总结了《解放日报》在办报过程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对这张报纸实施改版的由来及经验，作了深入的论述和分析，阐述了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它的出版，有助于我们了解党报成长的历史，体会到在革命战争年代办党报的艰辛。从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为它付出的大量心血以及报社同仁的艰苦奋斗、大胆摸索的足印。这些，对于我们现在的青年同志，学习党报的历史，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党报工作的优良传统，以促进和繁荣今天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无疑是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的。

末了，作为当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过的一员，我对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取得的研究成果表示由衷的敬意。感谢他们写出了这样一本有价值的好书。我相信，每一位读者都会从中得到启示和教益。

1996年12月26日

目 录

序.....	穆青 (1)
--------	----------

上编 《解放日报》的战斗历程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大报——

《解放日报》的诞生	(3)
创办的背景与过程	(3)
编辑与发行	(16)
“还不是一张完全的党报”	(20)

第二章 党报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解放日报》的改版	(27)
党中央亲自领导改版工作	(28)
全党办报的兴起	(42)
废除党八股 建立新文风	(47)
办成了一张完全的党报	(51)
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	(58)
建设一支党的新闻队伍	(64)

第三章	报社内部的整风与大生产运动	(74)
	整风运动的始末	(74)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80)
第四章	适应新形势 改组原机构	(85)
	贯彻党中央“全党办社”的方针	(85)
	党中央批准两社的《暂行规则》	(88)
第五章	延安保卫战中的《解放日报》	(96)
	迅速反映保卫边区的胜利捷报	(96)
	《解放日报》社在保卫陕甘宁的战斗中	(98)

下编 《解放日报》的主要宣传内容

第六章	国内政治风云的纪实	(107)
	抗日战争时期	
	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07)
	抗击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传战	(108)
	宣传反对独裁 要求民主	(114)
	宣传贯彻党的“七大”	(119)
	解放战争时期	
	宣传和平民主团结建设	(123)
	彻底揭穿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	(132)
	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镇压	(140)
	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148)
第七章	人民战争胜利的纪录	(156)
	抗日战争时期	
	宣传抗日游击战	(156)

	两个战场的鲜明对照	(164)
	加强战地通讯 歌颂英雄人物	(166)
	将政治工作化为强大的战斗力	(173)
	关于原子弹与抗战胜利的宣传	(176)
	解放战争时期	
	围绕受降的尖锐斗争	(179)
	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	(184)
	蒋军必败 我军必胜的历史昭示	(189)
	人民解放军将军纵论战局	(194)
	保卫延安的宣传策略	(200)
	弃暗投明的典型宣传	(204)
第八章	宣传伟大的整风运动	(211)
	整风运动宣传的全过程	(212)
	整风宣传的重点	(216)
	宣传形式丰富多彩	(223)
	贯彻“内外有别”的宣传方针	(235)
第九章	促进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	(237)
	典型引路 全面开花	(238)
	宣传劳模运动 推动生产高潮	(254)
	干部要学会做经济工作	(264)
	从轰轰烈烈到扎扎实实	(269)
	几个有关政策的宣传	(279)
第十章	宣传边区民主政权建设	(286)
	宣传的主要内容	(286)
	宣传的特点	(291)

第十一章	对苏德战争宣传报道的重要贡献	(298)
	世界反法西斯舆论的先导	(298)
	对初期苏德战场的分析与报道	(303)
	评述苏德战争的转折点	(307)
第十二章	副刊的宣传	(312)
	改版前后的副刊	(314)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指引副刊	
	健康发展	(323)
	关于《野百合花》与批判王实味的斗争	(325)
	综合性副刊的发展与繁荣	(334)
	副刊的尾声	(361)
后记		(365)

上 编

《解放日报》的战斗历程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第一张大型日报

——《解放日报》的诞生

《解放日报》的初创期共计十个月。创业伊始，百端待举。报社全体人员在物资极为匮乏、办报人员严重不足的条件下，为办好这张报纸克服了许多困难，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关于苏德战争性质和战局的评论报道，走在了世界反法西斯舆论的前面，成为中共党报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由于多种原因，《解放日报》初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与党的中心工作和群众生活相脱离的缺陷，因此，该报的初期还不是一张完全的党报，或者说还存在党性不纯的问题。这些缺陷只有在全党整风中才能逐步得到根本解决。

创办的背景与过程

（一）创办的背景

《解放日报》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两年半后新形势下的必然产物。

1938年10月下旬，日军侵占广州和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抗战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敌后游击战的开展，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凶焰。同时，日本侵略者也深感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因而改变了过去对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而实施以政

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军事上放松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集中主要兵力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加紧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于是，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战的主战场。

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和日本侵华策略的转变，这时的蒋介石从片面抗战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并连续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国际上的法西斯势力也日益猖獗，德国侵吞了大半个欧洲后同意大利、日本进一步勾结起来，于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订了法西斯军事同盟条约。

到了1941年，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我敌后军民要在人力、物力、财力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与侵华日军60%以上的兵力和全部伪军作战，同时还要同国民党的军事围困、经济封锁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在政治上不断揭露其妥协投降阴谋。

1941年初发生的皖南事变^①，使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左”倾观念进一步抬头，个别根据地在宣传中发生过若干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情况，甚至公开提出“另立中央政府”的主张^②，违背了中共中央《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的指示精神，对我党领导的整个政治、军事斗争不利。因此，加强宣传工作的纪律性，统一全党的宣传思想，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以后，我党、我军的威望和影响迅速提高，我党的历史责任日益加重。此时，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已在斗争中壮大起来，抗敌斗争和政权建设都创造和积累了

^① 1941年1月7日，北移的新四军部队九千余人，在皖南泾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八万余人伏击。新四军皖南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② 见《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1941年5月25日）载《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册，第98页。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丰富的经验，需要加强宣传，扩大报道面，以便及时交流经验，推动解放区工作的开展，用具体事实回答国民党宣传工具对边区和抗日根据地的不实报道和诬蔑攻击，在国内外扩大我党、我军和解放区的影响。

总之，国内正在进行的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内部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摩擦，国际法西斯势力暂时取得上风，使我党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局面，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这都给党的新闻工作带来了繁重的任务，对党报的宣传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当时延安新闻事业的概况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进驻延安，开始了中共历史上称之为的“延安时期”，直至1947年3月19日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为止。在这个时期，延安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日的政治指导中心，与此相适应，延安的新闻事业也发展到了一定的规模。

中国共产党一直重视新闻事业在革命中的作用，在大革命时期创办了中共中央第一个正式机关报《向导》周报和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创办了《布尔塞维克》报，在苏区创办了中央级机关报《红色中华》。

《红色中华》是同党的最早的通讯社一起成长起来的。1931年11月7日，我们党在江西瑞金创建了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它是新华通讯社的前身。同年12月11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与红中社同属一个组织机构。1937年1月，红中社随中共中央由保安（志丹县）迁到延安后易名为新华通讯社，《红色中华》也改名为《新中华报》，成为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后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1939年2月7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同时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

1939年初，新华社从新中华报社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

的机构，并略具规模。1940年春，我党开始筹建广播电台，同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至此，我们党在延安开始建起了报刊、通讯社、电台三位一体的新闻事业。

除《新中华报》外，延安的报刊重要的还有：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解放》周刊，党内刊物《共产党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刊物《中国文化》，八路军总政治部的刊物《八路军军政杂志》以及《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边区群众报》、《今日新闻》等。

在40年代初，延安的报刊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中央一级的刊物都是刊期较长、以理论宣传为主的杂志。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也只是四开版的小型三日刊，这样的篇幅和刊期显然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当时，我党虽然在重庆有一张大型机关报《新华日报》，但它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有其特定的宣传内容、宣传策略和宣传对象，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该报处境险恶。在党中央指示下，为保存力量，报社不少人员已分批疏散撤离重庆，报纸由原来的对开四个版改出半张两个版，而且报社处在敌特警宪的严密监视之中，报纸不但不能直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连正常发行都遇到了困难。

这样，创办一张大型中央机关报的工作提上了日程。经过紧张的筹备，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将《新中华报》和新华社编的《今日新闻》合并，集中力量出版《解放日报》。

（三）创办的过程

（1）第一次编辑部会议

1941年5月14日参加创刊的同志齐集报社编辑部办公室，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出席者主要有博古、杨松、曹若茗、丁玲、张映吾、王揖、杨永直、方紫等同志。杨松在会上报告了办报计划并进行了讨论，与会者就创刊中的具体问题交换了意见。博古围绕《解放日报》的性质和任务、党报工作者的工作态度、编辑业

务和报社制度等作了长篇发言。

关于报纸的性质和任务，博古说：《解放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对内的主要任务是反映群众生活，加强与群众的联系，用报纸来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对外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事变的演进，明了世界的发展方向，随时注意我们的敌人和朋友对我们宣传报道的反应。博古在讲话中还强调报纸的立场，指出我们的报纸不是资产阶级的报纸，不管是社论、通讯和文艺栏，都要注意立场问题。

关于工作态度，博古说：报馆的工作是很艰苦的，做一名党报工作者，应该在工作和生活上起到模范作用，发扬自我批评精神，表扬好的，揭露坏的，要有朴实的作风，这样才能提高党报的威信。

关于编辑业务，博古要求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掌握充分的国际、国内知识，在工作中努力提高自己的技术，在技术上刻苦学习。他说，我们办报，就是要使报上刊载的文章能够引起读者的注意，使他们有兴趣看。为达到这个目的，文字上要生动活泼，使人读起来不感到枯燥乏味。无论是通讯或消息的写作都不要公式化。一篇东西可以写得没有一个人愿意看，但也可以写得人人非看不可。

最后，博古讲了报社各个部门的工作计划和发稿时间^①。

会议结束时，杨松宣布：明天正式开始工作，先出一天试报，后天正式出版。明天的试报刊有毛主席的发刊词和博古的通讯，其它已写好的社论、专论和战况将陆续刊出。

经过一天试报，5月16日，四开中张两版的《解放日报》正式诞生。

（2）毛泽东同志提出宣传指针

^① 博古这个讲话要点是概括延安《解放日报》编委会会议原始记录整理归纳的。原件存北京中央档案馆。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创办《解放日报》的通知。通知如下：

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重要文章除报纸、刊物上转载外，应作为党内、学校内、机关部队内的讨论与教育材料，并推广收报机，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广宣传，是为至要^①。

这个通知明确规定了《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确立了该报在宣传报道中的重要地位。《解放日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新闻纸，它担负着统一解放区军民的思想、指导工作、进行革命教育的重任。

毛泽东同志挥毫题写了报名，亲手为报纸创刊号撰写了《发刊词》，这也是《解放日报》的第一篇社论。

《发刊词》明确提出了《解放日报》的宣传指针，同时紧密结合当时的形势和党内的思想动态，对党内外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和扼要的阐明。其要点是：

第一，宣传党的总路线是《解放日报》的使命，也是该报的根本任务。《发刊词》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提出：“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

第二，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为抗日救国提出的一项基本政策。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保证。对正确贯彻执行这一政策，党内是有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4页，新华出版社，1983年出版。

过思想斗争的。抗战初期，曾出现过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自1939年冬季以来，党内又发生了——“左”的倾向，一些同志对中日矛盾还是不是基本矛盾这一点发生动摇。毛泽东同志写的《论政策》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两篇文章对此作了回答。文章指出：“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1927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发刊词》有针对性地又重申了这一基本政策：“现在是中国存亡绝续的关键，全国一切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这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是站在这一斗争的前线的，过去如此，现在还是如此，将来还是如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始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说，为了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不会改变的。

第三，必须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反革命的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蒋介石是被逼抗战的。他对在抗战中我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壮大极为恐惧，极为仇视，这已为国民党发动的两次反共高潮所证明。但他又不愿统一战线彻底破裂，这就决定我党必须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在斗争中求团结。《发刊词》严正指出：“我们主张是国共团结，是消灭摩擦，是一个战争。须知只有一个战争，一个专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才能打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背叛民族利益而又绝对坚决不愿改悔的民族叛徒，如不坚决打击，则民族抗战必然遭到失败。”

第二、三两点完整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政策和策略，既反对党内在这个基本政策上的右倾错误，也反对已经出现的“左”倾的偏向。这对统一全党认识，牢牢掌握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具有重大意义。在皖南事变发生不久的复杂形势下，也为《解放日报》的宣传指示了方向。

第四，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内政外交政策的根本主张。

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发刊词》指出：在十月革命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的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妄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是断然行不通的。因此，中国只能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道路，同时不放弃和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保持正常往来。关于中国的内政政策，《发刊词》说：“中国的内政政策，必须是民主政策，一切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政策，必须取消。”这也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攻击的回答。国民党的宣传工具鼓吹法西斯理论，说什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攻击陕甘宁边区是“封建割据”，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是“异军”、“叛军”，叫嚷取消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为了回答这些反动宣传，报道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情况和社会风貌的巨大变化，揭露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是《解放日报》的一项重要任务。

这篇《发刊词》言简意赅，有的放矢，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后的原则立场和根本主张，也是《解放日报》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宣传指针。

（3）万众瞩目清凉山

解放日报社址建在延安清凉山的半坡和岩底，在这里凿了十孔窑洞作为编辑部的办公室。新华社位于清凉山东边的半山坡上，这里还有中央印刷厂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科（后改为编辑科）。中共中央的声音，革命大本营的号令，一篇篇战斗的檄文，就是从清凉山传播到全中国、全世界的。陈毅同志在《七大开

幕》诗中，以铿锵有力的诗句，揭示出清凉山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和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年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清凉山位于延安城东北的延河之滨，与隔河相望的凤凰山，宝塔山成鼎立之势。清凉山气势雄伟，古迹荟萃，每一处胜景都有一番来历，都能讲出一个美妙动人的传说故事。山上还集中了大部分北宋年间完成的石窟雕刻艺术的珍品，在山正中的万佛洞就是最大的石窟。它宽 17 米，深 14 米，高 6.7 米。窟内周围和大屏石壁上刻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的浮雕佛像一万余尊，是宋代石刻艺术的精华。延安中央印刷厂的排字房就设在万佛洞里，《解放日报》等报纸、刊物、文件就在这里排版印刷。用万佛洞作排字房，真是一个巧夺天工的防空洞，任凭敌机狂轰烂炸，万佛洞岿然不动，排字工人照常工作。谢觉哉有诗赞曰：

马兰纸虽粗，印出马列篇。

清凉万佛洞，印刷很安全。

清凉山上的石雕和庙宇充满了佛教色彩。佛教主张“普渡众生”、“脱离苦海”，解脱“轮回之苦”，达到“清凉安住”的境地。据说，清凉山的名字就是由此而来的。它寄托了千百年来人们对美好境界的憧憬和追求。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①。佛家信徒想在天国里实现对清凉境界的追求，只能是虚无缥缈的幻想。中国共产党人为苦难的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真正理想境界的道路——进行革命斗争。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创建光明的新中国。《解放日报》所记载的，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经历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反攻阶段和解放战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 页。

初期阶段的历史。清凉山作为这个历史时期中共中央新闻机关所在地，成为万众瞩目的地方。它的古老名字从此焕发出光彩，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4) 机构设置和主要领导人

报社初建时，机构设置只是初步搭起了一个框架，有的部门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人员也不固定，经常根据编辑业务和出版情况的需要处于调整变动之中。报社人员大致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原在《新中华报》工作的人员大部分转到了解放日报社；二是原新华社通讯科及其所属人员并入了报社采访通讯科（简称采通科）；第三部分人员是中央组织部从文协、青委、鲁艺、马列学院等单位陆续抽调来的。各路人马为办好《解放日报》，相继登上了清凉山。

报社共分编辑部和经理部两个大部。编辑部是报社的业务部门，由杨松负责。经理部是报社的后勤供应和办理发行、广告的部门，由祝志澄负责。编辑部内又设采通科、材料室（后称资料室）、校对科和编辑部办公室。经理部内设总务科、会计科、发行科和广告科。

各个部门人员组成情况大致如下：

编辑部内实行各版主编制。从报纸创刊到9月15日，共出两个版，版面分为国际栏、国内栏、边区栏和文艺栏，每栏有一名主编。从9月16日开始，报纸扩充为四个版，上述四个栏也随之扩为国际版（第一、二版）、国内版（第三版）、边区版和副刊版（第四版），各版仍设一名主编。

第一版主编曹若茗，编辑为张映吾、王揖、邓垦、吴文焘（年底调往新华社）。第二版主编余光生，编辑为吴冷西、黄操良、杨永直。第三版主编吴敏（杨放之），编辑为李锐。第四版中的边区版主编暂缺，编辑为赵守一、杜绍西、邓友星。副刊版主编丁玲，编辑为陈企霞、马加、雪苇、黎辛。

采通科科长郁文，编辑记者有雷波（缪海稜）、莫艾、田海燕、田方、曾艾狄、韩生本、林朗、叶澜、秦芙、林间、李蕴辉、陈国华等。

材料室主任陈泉壁，主要工作人员有毛勤、彭露兮、朱凤熙、吴一铿、任颖、吴茵等。

校对科科长丁济沧，主要工作人员有陈振翟、丁冬、吴玉森、李飞天、林坚等。

经理部的主要工作人员有朱惠、金映光、蔡晓福等。

编辑部办公室秘书廖冰。

报社秘书长是赵毅敏，党总支部书记是赵希愚。

直接领导报社的是中央党报委员会，主持社务工作的是编委会。编委会成员由报社、新华社的领导和报纸各版主要负责人组成，其成员有博古、杨松、吴敏、曹若茗、向仲华、余光生。编委会一般每周举行一次会议，研究国内外形势，确定宣传报道重点，讨论报社存在的问题，部署下一周的工作。编委会还经常就某一版或某一部门的工作举行专门会议，吸收有关同志参加，共同研究改进报社和新华社的工作。

这里需要对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关系作一扼要说明。

当时，党的新闻事业是三位一体，即党中央机关报、通讯社和广播是一家，以党报为主。报纸上的重要文章，经改编后发新华社的文字广播，同时发口头广播。这是我党新闻事业在发展中形成的一个特点。因此，在《解放日报》的历史上，报和社的两家关系密不可分，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到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以前，基本上是报与社两家领导合一，由以博古为首的编委会统一领导，以报为主，业务各自独立又流水作业般地联在一起。两个单位同住清凉山上，生活供应同属一个建制。所以，当时的新华社社长向仲华代表新华社参加报社的编委会。

向仲华（1911—1981）湖南省溆浦县人。1927年初参加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7月参加红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师政治部秘书长、团政治处主任。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色中华》报、《新中华报》社长、新华社社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在办党报的同时，还参与创建延安广播电台的工作。1941年12月，向仲华调离新华社¹，由博古兼任新华社社长，同时调一版编辑吴文焘担任副社长，并接替向仲华参加报社编委会。

报社第一任社长是秦邦宪。秦邦宪（1907—1946）字则民，参加革命后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博古出生在一个衰落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自幼家境贫寒。在无锡读完小学后，于1924年就读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并参加了当时无锡的进步青年团体锡社，常在《无锡评论》上发表文章，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土豪劣绅。1925年秋就读于上海大学英文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²，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干事。1926年在苏联学习，1930年5月回国后任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干事，编辑过工人小报。同年12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31年4月任团中央书记，同年9月至1935年1月为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因犯“左”倾错误，在遵义会议上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离开了中央的主要领导岗位，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36年同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任中共中央驻南京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驻汉口）组织部部长和中共中央南方局（驻重庆）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作为《新华日报》董事会的董事，博古参与了武汉、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工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许

¹ 向仲华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后，一直在部队担任领导职务，指挥作战，并对军队建设和发展科学研究事业作出了贡献。在任广州部队政治委员期间，因病于1981年5月21日逝世。

² 见许世《秦邦宪的家世》，上海《文汇报》，1986年4月6日。

多文章。1940年10月，博古离开重庆到延安主持新闻出版工作。1941年初任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5月任解放日报社社长，11月兼任新华社社长，并兼任中央出版局局长。

报社第一任总编辑是杨松。杨松（1907—1942）原名吴绍镒，湖北黄安人，出身于一个小学教师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杨松很早就参加了新闻工作。1926年北伐军攻战武汉后，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工作，任“血光通讯社”编辑、记者。1927年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至1933年，任海参崴太平洋职工会中国部主任，并负责编辑《太平洋工人》杂志，后调到莫斯科职工国际东方部工作，主编《全民》杂志。1935年7月回国到东北地区做地方党的工作，任省委巡视员和吉东特委书记等职。在此期间，常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救国时报》撰稿，宣传报道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2月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兼宣传科科长，同时在马列学院讲授中国历史和联共党史等课程，并挤时间为《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文化》、《中国妇女》等刊物撰写时论和专论。

杨松参加了《解放日报》的筹建工作，担任总编辑后，除了和博古处理报纸草创阶段的日常事务外，还担起了撰写社论的重任，报纸创刊仅一个月，他就写了29篇社论。杨松非常重视资料工作，主张重大的新闻报道都应该配发背景材料，帮助读者读懂。在他的建议下，在报纸第二版、第三版开辟了“世界调查与统计”和“资料”两个专栏，专门登有关读报的参考资料，很受读者欢迎。杨松还把自己读过的材料加以圈点，分类作出标记，要材料室的同志整理，归档备用。报社同志们评价说：“杨松是最好的圈报员，是重视资料工作的模范”。1942年11月23日，杨松因工作劳累，积劳成疾，在延安病逝。

担任报社领导职务时间最长的是余光生。余光生（1906—

1978)原名余宰杨,曾用名余辛白,浙江镇海人,生于日本东京,六岁时随父母返回祖国。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中学、南洋大学附中、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29年进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学习铁路运输和公路建筑,次年获得硕士学位。在美国当过公路测量工、风扇制造厂的绘图员和火车站的货运员。1931年在波士顿参加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工作,1932年1月任该同盟的机关报《先锋报》的编辑,同年3月加入美国共产党,并任美洲华侨反帝大同盟的执委、书记。当时美国共产党设有一个秘密的中国支部局,余光生曾担任过中国局的委员、书记。1936年,《救国时报》从巴黎迁到纽约,余任编辑。1939年底,他返回祖国参加抗日战争,并把名字改为“光生”,以此来纪念自己生命旅途新阶段的开始。余光生到延安后先任张闻天秘书,并兼管延安华侨事务。《解放日报》创刊不久即任国际版主编。杨松病重入院治疗期间任代总编辑,后任总编辑和报社、新华社代理社长^①。

编辑与发行工作

(一) 社论的撰写

《解放日报》初期每天都发表一篇社论,写作社论的任务十分繁重。开始时绝大部分社论由编委会的成员和各版编辑执笔。为了落实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的指示精神,不久又在报社外成立了由党、政、军负责干部组成的社论委员会,成员有:谢觉哉、林哲^②、叶剑英、王稼祥、凯丰、任弼时、乔木、陆定一、贾拓夫、彭真^③。

^① 余光生于1947年初调离报社去东北担任铁道部门的领导工作。1956年以来一直担任铁道部副部长职务。1978年6月29日在北京病逝。

^② 林哲为冈野近的化名,即野坂参三。

^③ 据1942年3月13日在编委会上公布的社论委员会名单列出。

社论委员会每周六（以后改为每两周）召开一次会议，报社主要领导参加，讨论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确定社论的题目和内容，定出执笔人和交稿时间。开会地点在王家坪。王家坪位于延安城的西北方，是中共中央军事首脑机关所在地。中共中央军委、八路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部及其一局（作战局）、总政治部都设在这里。军委和总部常在这里举行会议，接待中外客人，所以，王家坪的消息很灵通。社论委员会选择这个地点开会，便于及时沟通对国内外时局动向的看法，掌握准确的军事情报，撰写精确的社论。

编委会和社论委员会开会时，由秘书廖冰作记录，第二天由她将会会议定下来的社论题目等事宜，拟文通知撰写者。

（二）新闻的来源与编辑

报纸刊登的国内外重要新闻，都是由新华社供给的。新华社电务科新闻台的报务员日夜轮流值班，利用简陋的电讯设备，细心寻找、监听、捕捉空中的讯号，把国民党中央社的文字广播、汪精卫伪政府中华社发布的新闻和外国通讯社的电讯抄收下来，将其中的外文电讯送翻译科翻译。这些外国通讯社主要有：日本同盟社、苏联塔斯社、英国路透社、美国合众社、美联社、法国哈瓦斯社（现名法新社）、德国海通社、意大利斯蒂芬尼社、马尼拉合众社等。

新华社翻译科共有二十几位同志，内分英、日文和明码三个组，分上半夜和下半夜两个班，将新闻台抄收的外电译成中文后交给广播科，广播科的同志每天下半夜一上班，即把翻译科送来的稿件分批分类整理出来，全部交给报社编辑部国际版的同志处理。此外，广播科还要把当天收到的国内外重要新闻经过摘编后，和同一天《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专文和有关陕甘宁边区动态等文章，编辑成一套广播稿，经吴文焘核定后，交明码组翻译。到清晨吃早饭时，原稿经博古审阅后，由一位通讯员骑马把译稿送

到二十多公里外的广播台播发。当时新华社每天能发三、四千字的中文稿¹。

不宜在报上刊登的电讯，则由编辑交给邓垦，由他和另一位同志编辑一份《参考消息》，刻蜡版油印（后改铅印），送中央领导同志和各部门负责人参阅。

采通科采访、编辑的稿件主要发边区版。该科最初以处理来稿的编辑工作为主，只有到了夏季洪水暴涨，延河水位上升，通讯站人员无法过河投递稿件；或严冬大雪封山，交通邮递受阻时，采通科几乎全部出动采访延安的机关、学校等单位的动态新闻，有时一个人要写五、六条新闻才能填满边区版。

编辑部其他部门是早六时上班，先用半小时把即将发排的稿件整理好，六时半开始发第一批稿件，以后每间隔半小时发一次稿，到八时发稿结束。八时至十时为校对时间，十时至十二时处理杂务，十二时下班。

（三）版面编排

报纸在初创的四个月内，每天出四开两个版，对开排版。版面编排为：一版基本上是国内新闻，间或有少量的国内要闻。每天在第一版的左半版显著位置刊登社论，内容以国际问题为主。第二版是国际和国内新闻混合编排，比重不定，一般情况是各占一半。国内新闻包括各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的新闻，有时还登载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也是混合编排。

扩充版面后，报纸改对开一大张四个版。第一版刊登国际新闻、国内要闻和社论。国际新闻占据主要版面，以苏德战场的消息和战况为主。第二版全部是国际新闻，刊登远东、太平洋的战讯和国际问题专论，并辟有“世界统计与调查”和“世界人物介

¹ 吴文焘《清凉山怀旧——纪念新华通讯社建社五十周年》，1981年11月5日《人民日报》。

绍”两个专栏，由资料室编辑，发表供读者阅读该版的统计数字和人物简历的小资料。第三版是国内新闻版，以发表大后方的消息为主，也经常发表有关边区的政治、经济、思想的理论文章、调查报告和国内问题专论，辟有“资料”专栏，介绍国内情况，以统计数字居多。第四版上半版是边区版，辟有“小言论”专栏，评论边区工作，主要是提出建议和批评。下半版是副刊。

这种版面编排表明，初期《解放日报》宣传报道的重点是国际问题，占报纸一半的篇幅，是报纸的主角。

三、广告、出版与发行

报纸刊登的广告分甲、乙两类。甲类为长期广告（刊登一个月以上者），乙类为短期广告（刊登一天以上者）。刊登广告的位置在一版报头两侧和第二版最末半栏。报头每侧收费30元，第二版末栏每10行每天收费4元。广告内容由刊户自拟，刊登日期由广告科决定。由于条件的限制，《解放日报》于每日下午四时才能出版。到出报的时候，各中央首长和中央机关的通讯员到清凉山下中央印刷厂的收发室领取。报纸送达延安各单位的时间在晚上七时左右。

报纸初创时，发行科的业务尚未开展，暂时委托延安北门外新华书店办理外埠邮购业务。《解放日报》用马兰草纸印刷，中张两版时每份零售国币一角，每月三元，全年三十元。扩充为一大张四个版后，价格相应提高一倍。报纸创刊时，为酬谢各单位的大力支持，赠阅三天；各批售户试销三天。

为方便往来商贾和过延旅客阅读报纸，报社在新市场口和文化沟两处特设“卖报员”，每日下午五时左右在这两个地方叫卖零售。

“还不是一张完全的党报”

（一）存在的主要缺点

初期的《解放日报》在苏德战争的宣传报道上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对敌后抗日游击战和敌占区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陕甘宁边区的成就都进行了报道，对敌伪的暴行和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报社全体人员，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办好报纸作了最大的努力。全面评价《解放日报》初期十个月的工作，毫无疑问，这是一张无产阶级的党报。

但是，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虽然担负了党报的任务，但尚未完全尽到党报的责任。它存在的主要缺点是党性不强，反映群众生活不够，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和许多读者对此都有过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讲，它还不是一张完全的党报，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这些缺点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是版面编排不适当。

报纸的版面编排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一张报纸对所发稿件的评价。《解放日报》初期在版面编排上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即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市（延安市）。国际报道占绝对优势，在一版唱主角。例如，从创刊至11月16日的半年统计，上一版头条的国际新闻共181条，国内新闻仅有4条。并不是说国际新闻不能上一版头条，而是有不少新闻价值不大，或不应该上头条的国际新闻被当成了报纸的精华。类似这样的头条：“墨索里尼发表演说”（6月12日）、“德军被阻各线无变化”（7月21日）、“莫斯科前线无变动”（10月24日）、“苏德全线阵地无变化”（11月1日），就是突出的例子。而有关边区军民活动的有价值新闻和涉及边区群众生活的重大决策，却受固

定版面编排的限制，不能上一版头条。这样的编排，就把党的重要活动和边区群众所关心的抗日战况、大生产运动挤到了次要的位置，使报纸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群众。

第二，对党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传不力。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最困难的年头。为了度过难关，巩固解放区，坚持抗战，中共中央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其中整风和大生产是整个链条上的中心环节。《解放日报》对此缺乏应有的敏感，宣传报道不够得力。

报纸创刊时，正值整风运动的准备阶段。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整风运动作思想准备。可是，报纸对此未作报道。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著名讲演，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普遍开始。中共中央的这一重大活动和决策，报纸第二天只在三版的右下角发了一个三栏题的简讯。

1942年，中共中央根据群众公粮负担过重的实际情况，决定减少本年征粮数，这是安定民心、消除谣言的重要决策，反映了党和群众利益的根本一致。像这样一条反映党的政策、牵动边区千家万户的重大新闻，却登在第四版。报纸也没有大力宣传、解释党中央这一决策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针对《解放日报》脱离实际、反映群众生活不够的弱点，亲自为《鲁忠才长征记》一文加了按语推荐报纸发表，以此来纠正报纸脱离群众的倾向。《鲁忠才长征记》是一篇讲运盐的调查报告，记述了鲁忠才带领运输队到陕甘宁边区所属的“三边”（盐边、靖边、定边）地区长途运盐的情况。食盐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资源之一，产盐、运盐是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关系到边区群众生计的大事。毛泽东对这篇解决实际问题的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并在按语中尖锐地批评了《解放日

报：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我们需要的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不是那些党八股。

从报纸发表的社论中，也可以看出脱离党的中心工作、脱离群众的倾向。从报纸创刊到12月31日，七个半月的时间，共发表217篇社论，按内容分类列表如下：

类 别	分 题	篇 数	小 计	占总数百分比
中国共产党	发刊词	1	4	1.8%
	党的活动	3		
国 内	中国政治形势	14	38	17.5%
	抗日战争	18		
	国统区	6		
解 放 区	政 治	21	36	16.6%
	经 济	6		
	文 化	9		
国 际	第二次世界大战	48	139	64.1%
	对外关系	17		
	各国动态	74		

从这个统计表可以看出，《解放日报》的社论和新闻报道一样，仍以国际问题为主，反映党的活动和群众生活的社论太少了。

第三，文风上沾染了党八股。

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历数的党八股罪状，在初期的《解放日报》文风中都有所反映。

在社论上，当时报社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每天必须有一篇

社论。报社负责人每天为写社论而绞尽脑汁，常常对着外国通讯社的电稿和地图冥思苦想。社论是报纸的旗帜，是编辑部的指导性言论。可是有些社论是提笔硬写的应急之作，有时为了赶任务，对没有把握的事，情况不明的事，还在发展中的事，匆忙发表评论，造成不应有的错误。1941年6月20日的社论《评德土友好协定》就是突出的例子。

德国在苏德战争前夕（6月18日）与土耳其签订了德土友好协定，这本是一个掩盖战争阴谋的骗局。德国的目的是为了在发动侵苏战争时，利用土耳其的中立国地位，保证自己侧翼的安全。可是社论却把这个协定当作和平力量挫败英国谋取土耳其主权的胜利而加以肯定。时隔仅几日，德国即大举进攻苏联，暴露了德国签订德土协定的真正用心。社论在对德土协定的评价上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8月30日，《解放日报》又发表题为《土耳其何去何从》的社论，纠正了这一错误。

在国际新闻的处理上，一般是在一个标题下列出各国通讯社发的消息，除了标题能显示出一定的倾向外，所载内容都是电讯稿的译稿或节录，没有经过编写，在客观上为外国通讯社做了义务宣传员。有相当多的电稿语言文白夹杂，晦涩难懂，群众反映“解不下”（即“不懂”的意思）。

在新闻报道上，公式化的倾向较严重，国际新闻、战况报道、会议新闻、气象新闻等，都分别有固定的格式，千篇一律。

第四，某些新闻不真实。

有的记者不是用唯物主义观点指导采访，而是单纯为了追求新闻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或夸大分寸，或添枝加叶，甚至赶形势，编造新闻，虽然是个别的例子，却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例如：1941年9月4日，第二版刊登了一条“郟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纱声”的新闻报道，写得有鼻子有眼，真实的情况是，家家户户都有“纺纱声”的郟县，竟然没有一辆纺车。

（二）问题出在哪里？

《解放日报》初期存在的弱点和缺点，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当时根据地文化战线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对此应作全面的分析。

在诸多原因中，其中最主要的，是党内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路线尚未从思想上彻底肃清，因而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报纸宣传上。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的思想方法作了科学的分析，指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报纸固定不变的版面编排，形式主义的每天一篇社论，机械地搬用某些中外大报，诸如苏联《真理报》、国内《大公报》的作法，追求形式上的“城市化”和“正规化”等，就是教条主义在办报思想上的集中反映。

从报社编辑部人员的构成来看，绝大多数同志是抗战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有的是从国外和国民党统治区奔赴延安参加抗日的中年知识分子。当时革命经历较长的总编辑杨松、社长博古才30多岁，主要业务骨干大都是二十刚出头的青年。他们虽然热爱党的新闻工作，有极高的革命热忱，但在思想方法上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主观主义的毛病，又没有能及时克服城市旧型报纸的许多传统和偏见，更缺乏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环境中办一张大型党报的经验。他们没有认真研究或很少注意到在延安办报和在国外、在国统区大城市办报的根本区别，这就是办报的社会环境和服务对象完全不同了，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报纸读者是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干部，其中文化比较落后的农民群众占有很大的比重。不明确这一点，就办不出党报的特点来。《解放日报》存在的脱离边区的实际、脱离群众的倾向，在延安、在战争和根据地的条件下，就显得突出了。

到延安时期，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已经有了大约 20 年的历史。在“五四”、大革命和苏维埃运动三个时期，我们党都办过一些报纸刊物，其中如《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和《红旗》、《红色中华》等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党报史上形成了独特的优良传统，也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但由于战争环境的限制，未能对此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全面的总结，而且过去新闻工作的规模和面临的形势，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巨大而复杂。我们党虽然就新闻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发布了一些文件，但还来不及在抗战一开始就及时提出一整套战时适合农村新民主主义新闻事业的建设方针和工作制度。

当时，党的若干领导机关对党报的作用没有足够的认识，还不善于利用报纸指导实际工作。许多地方党组织的领导者，还习惯于地下党时期的秘密手工业式的领导方式，常用油印传单和开小组会动员、组织群众，没有使党报工作成为整个党的工作，特别是基层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报社和各级党组织的联系没有成为一种制度，在交通不便、穷乡僻壤的广大农村没有建立通讯网，使党的中心工作和地方的实际运动情况反映不上来。这是导致《解放日报》党性不强、反映群众生活不够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同志对此极为重视，他曾实事求是地指出：我们报上不能反映党的活动的原因，不仅是报纸本身的缺点，而且延安各机关要负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提议让各机关的政治秘书来报道党的活动^①。直到《解放日报》改版半年以后，毛泽东同志仍对各地党的机关不重视新闻工作现象提出了批评：“查各地中央局、中央分局对当地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甚少，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尚不认识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这种伟大的作用，尚不懂得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

^① 据 1942 年 2 月 20 日解放日报社编委会记录。

通过报纸去做。”^① 由此可以看出，动员、组织全党来参加党报工作，使各级党组织把报纸看作指导、推动工作的重要武器，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彻底解决的。所以，《解放日报》的一些缺点的产生，也是在办报过程中难以避免的。

同时，还应注意到，《解放日报》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报社一个单位所独有，是和更大范围内的倾向相关联的。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宣传要点也多为国际问题。从1942年1月26日起，由毛泽东同志为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才开始改变这一重国外轻国内的状况。毛泽东同志写的这个“宣传要点”第一项即指出：“本部（指中宣部）宣传要点，以前偏重党外宣传，从本期起，决定加上党内宣传，希各地同志注意。”^②

又如，当时延安干部学校在教学中，也存在着理论脱离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毛病。文艺界在文艺创作思想上也存在许多糊涂观念，有些文艺工作者在观察延安生活方面有小资产阶级的偏激情绪，这些都不能不在《解放日报》上反映出来。

总之，《解放日报》的弱点在某种意义上说，并不是报社本身所能完全解决的，只有在全党整风中，依靠全党的力量，才能从根本上实现改造党报的任务。

（王凤超）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7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67页。

第二章 党报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解放日报》的改版

《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下进行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整风运动的一部分。从1942年4月1日发表改版社论《致读者》开始，到1944年2月16日发表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止，历时1年零10个月。经过改版确立了党报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发展了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在党的新闻事业中起着深远的导航性的影响，是党报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1942年至1943年，是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于最困难的年代，也是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军事上进行艰苦卓绝、战胜重重困难的伟大年代。当时，在党内，王明左倾错误，虽然经过遵义会议及其后一时期、在军事和组织上进行了纠正，但是在思想和政治上并没有来得及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如“防空洞里跑出来的”^①逆风和歪风，还经常袭击着党。在军事上，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侵华中心，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转移到我各个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国民党对抗日发生动摇，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并同敌人配合，对我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造成我党、政、军、民在经济生活上的极度困难。

^① 见《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三卷第812页。

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抓住了整风和大生产这两个环子，推动整个革命链条继续前进。

1942年的整风运动，是伟大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打破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整风运动促进了全党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为赢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中成功地进行了改版，由改版前“没有完成真正的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①“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武器”^②而逐步办成具有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的党的喉舌——一张真正的党报。在这一时期内，《解放日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反映群众生活，有力地推动了整风，大生产以及其它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在办报方针、办报制度和培养一支战斗的党的新闻队伍方面，都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在党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党中央亲自领导改版工作

（一）改版的准备阶段

（1）党中央对《解放日报》的意见与决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解放日报》的工作，对《解放日报》初期存在的问题，曾多次进行讨论。《解放日报》的改版，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1942年1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对如何

①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

②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致读者》。

加强并改进报纸工作，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意见，政治局并作出决议。决议说：“同意毛主席指出今后《解放日报》应从社会、专论、新闻及广播等方面，贯彻党的路线与党的政策、文字须坚决废除党八股。并决定由中央各部（中央同志在内）及西北局每月供给广播新闻消息一件，写社论或专论一篇”。^①

政治局开会后，博古在1月26日报社的编委会上，传达了中央对报纸的意见，主要是：新闻未能很好地贯彻党的策略、路线；报纸上很少反映党的活动和中央的决议；改写后的外国电讯仍然带“尾巴”；有些社论让人看不懂，语言不通俗，常常文白夹杂；国内栏枯燥；文艺栏内容应更广泛些；新华社以后要编自己的新闻。报社同志要研究新闻学。^②

编委会连续开会，讨论中央对报纸的意见，也作出一些关于改进报纸的决定：加强关于党的活动的报道，各版要加强研究报纸，研究文字学，要发自己写的和改写的新闻，派人出去听取各方面对报纸的意见；减少国际消息，从每版抽出一人，组成评论部等等。但对于如何“贯彻党的策略和路线”这一根本问题，却研究不够，尤其对整风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以至出现了2月3日和2月9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两次关于整风重要演说，先后都登在第三版右下角和左下角很不重要的位置，而且是很不显眼的三栏题的短消息。

2月11日中宣部发出关于进行反主观主义、反教条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给各级宣传部的指示，反复强调务必以极大的力量集中来宣传解释中央开展整风运动这一思想，特别提出“检查报纸刊物，务必达到在党的全部工作中贯彻中央的这一思想”。

① 引自《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第118页。

② 引自《解放日报》编委会记录。

2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要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生活的党报，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同志意见，并委托博古拟定改革方案，交中央讨论。3月14日，毛泽东同志给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电报中说：“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①

3月16日中宣部发出了《关于改进党报的通知》。《通知》更明确指出：“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系并影响他们。因此，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各地党委应当对自己的报纸加以极大的注意，尤应根据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通知》还明确提出党报的任务：“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作，才是名符其实的党报”。《通知》接着指出：“如果报纸只是以极大篇幅为国内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不过是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如果各地党报犯有这样毛病，就须立即加以改正。”《通知》特别强调：要根据毛泽东整顿三风的号召来检查和改造报纸。因此，《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全党整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改版也是博古自身整风的关键，他在1931—1934年犯过“左”倾错误，在遵义会议时，虽然他对在军事上给党带来的严重危害感到痛心，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努力完成党交给他的各项工作，但是对自己的思想，也同全党一样没有进行全面的清理。1942年1月26日毛泽东同志代中宣部起草的《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要点》中曾提出：“有些同志过去犯了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错误相当严重，一时尚没

^① 材料来源：中央档案馆。

有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注意作深刻的自我批评，不能迅速的改变自己的错误……”这当然也包括博古在内。结合中宣部关于改造党报的通知，博古清算自己头脑中存在的主观唯心主义，深刻反省自己，并以坚强的毅力，领导起《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当时总编辑杨松因肺病复发住院治疗。博古在《通知》下发的当天，就召开编委会，结合报纸存在的问题，认真进行讨论，并且主动把自己的缺点错误公诸于众。3月17日在编辑部全体大会上，他检查了10个月来报纸的主要缺点：贯彻党性和群众性不够，联系实际不够，缺乏党报应有的战斗性……从此，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动员起来，开始改版的准备工作。

（2）倾听群众对报纸的意见

在报社内部发动全体职工总结报纸工作缺点的同时，还广泛征求读者对报纸宣传的意见，并在报上公开发表。《信箱》是其中一个最好的形式，《信箱》中反映的问题主要是：

第一、报纸脱离边区实际，国际问题上的篇幅太大，对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联系很少。“一些国际大事情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这些内容过多，不能回答我每天碰到的困难问题。比如，中央有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究竟这个决定怎样实行？别的地方实行之中有什么经验可供我们参考……像小组会怎样才能开得好？怎样提高工作效率？这些问题我们希望报纸能够给我们帮助。”

第二、社论应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不须天天有社论，社论要值得读者深思精读。不要拼大题目，做空文章，不要滥调连篇，泛泛其谈，而要言之有物，深入论述，明快透底。

第三、对第二、三版及边区版的意见，几位读者都提出：二、三版的专论内容，应该多论国内、多论边区，把治党治国治军、文化教育、理论学习、建设边区等等各方面的工作经验，传播给全体干部，使之能得到可参考的宝贵材料。希望多多反映党政军民的下层生活，多派记者到下面探访消息，在读者中聘请义务记者，

建立通讯网。

第四、对副刊的意见：许多读者建议把《文艺》《中国妇女》、《中国工人》、《青年之页》、《军事》五大专刊合并成一个综合性副刊，使它成为一个反映实际生活、解决实际问题的刊物，成为一面褒贬建设的旗帜。

第五、对报纸文风的意见：报纸文字应尽量通俗，消息中有些词句太长。而焕南的文章^①和《鲁忠才长征记》^②、文字简明，受人欢迎。《解放日报》不仅有提倡反对党八股的责任，而且应该成为反对党八股的模范。

第六、对编辑部处理稿件的意见，应该发动更多人向党报投稿，编辑部不要只重视名人来稿，应眼睛向下。

记者莫艾写的长达七千多字的访问记《本报革新前夜访问各界意见》，更是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其中有无文化农民、识字农民、工人、店员、妇女工作者、女学生、青少年、区助理员、区长、科长、行政教育工作者、财经工作者、秘书、部队教员、外县干部、大学生、中学生、诗人、作家、剧作者、教授、教育厅长、《轻骑队》和《群众报》的编辑、小学教师等等共约五十人，把他们的意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35人写出具体姓名），不但表示广大读者对报纸的关怀和监督，而且说明编辑部对读者意见的重视。

读者的许多好意见，在改版中都尽量吸收，并加以改进。

（3）内部调整机构

在版面安排上，报纸将有一个根本变化，把过去以国际宣传为主改为以国内——特别是以我党我军及陕甘宁边区和其它边区

^① 焕南是谢觉哉同志笔名，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炉边闲话》、《一得书》等专栏杂文。

^② 《鲁忠才长征记》是1941年8月26日《解放日报》刊登的高克林写的调查报告，内容丰富具体，文字朴实生动，毛泽东同志在文前加了按语，以倡导新文风。

的报道为主，即宣传上“以我为主”。因此，编辑部的组织机构也随之进行调整，加强了国内宣传人员的力量。

第一版 张映吾 叶 澜等

第二版 邓友星 杨永直 李 锐等

第三版 吴冷西 王 揖 邓 垦 黄操良等

副 刊 舒群负责

采访科有雷波（缪海稜）、丁浩川、莫艾、田海燕、曾艾狄、廖冰（原编委会秘书）、姜克夫、刘漠冰等

通讯科有林朗、田方、李蕴辉、韩生本等

《党的生活》专栏有郁文、赵守一、李千峰等

改版后又调进一些编辑、记者，采访科与通讯科合并为采访通讯科，这个科人数最多，主要是为了加强对陕甘宁边区工作的报道，贯彻密切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办报思想。

（4）改版前夕毛泽东同志亲自召开座谈会

改版前夕——3月31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关于《解放日报》改版的座谈会。座谈会在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召开，延安各部门党内外负责同志及作家到会70多人。

博古首先将《解放日报》十个月来的工作，进行汇报并作了自我批评，他请求大家给予指教帮助。

大家发言十分热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李鼎铭说：报纸的责任，是按照边区的情形对症下药。报纸应该解释“三三制”、精兵简政等政策问题。对一些坏现象，应给予批评。教育厅长柳提提出：报纸应在一个阶段总结报道根据地的变化，记者要发掘下面丰富的材料。教育厅副厅长贺连诚认为报纸应该是人民的喉舌、政府的耳目，记者要使下情上达，上下关节打通。作家肖军指出报纸许多缺点，也提出改进办法。诗人柯仲平要求报纸要批判太平观念。徐特立主张党报要大胆说话，深入下层多反映老百姓的事，与各种错误倾向作斗争。谢觉哉则以厨师做菜作比喻，他说：不

要总是一碗肉又一碗肉，使人感到腻口，报纸不能总是篇篇大文章，板起面孔说话。朱总司令强调报纸要反映我军英勇抗战情况，反映日寇在敌后残酷的扫荡与人民反扫荡的斗争，注意帮助解决边区的军民关系问题。

最后，毛泽东同志讲话，他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的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在共同的目标上，一致前进。他提议：“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能推动其它部门的改进。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关于整顿三风问题，各部门已开始热烈讨论，这是很好的现象。但也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说到批评态度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这个座谈会，动员并号召大家重视和利用《解放日报》，更加有力地推动了《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也召开了座谈会，专门对《解放日报》关于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报道，提出意见和建议。报社编委会委员丁浩川，表示接受意见，并请各方面对《解放日报》的改版给予监督指导和帮助。

（二）改版的第一阶段

（1）改版社论《致读者》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以崭新的面貌同读者见面，在这改版第一天的报纸上，社论《致读者》，是改版的纲领，它回答了《解放日报》为什么要改版，并把自己的缺点，公诸于众，请群众批评和监督。

社论针对什么是党报、怎样才能使党报成为党的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提出了党报必备的四个品质：

第一、贯彻坚强的党性。要在所有篇幅上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见解、党的动向密切相联，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传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共患难的朋友。

第三、洋溢着战斗性。报纸必须根据当前的政治事变而进行热忱的鼓动，揭露一切黑暗和腐败，打击一切有害于抗日团结的阴谋和企图。在思想战线上，应反对一切反动、复古、黑暗、愚昧。党报是党手中有力的自我批评武器，对自己队伍中的错误和弱点，以实事求是的同志式的态度，加以批评。

第四、增强组织性，成为各种群众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倡导者。

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是党报必备的品质，这是在《解放日报》改版中第一次提出的，也是此后办好党报的依据。根据“四性”，特别是“四性”之首的党性原则，《解放日报》作了坦诚的自我批评，社论认为过去的报纸“没有能够完成真正战

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未能成为党中央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与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并检查说：“我们以最大的篇幅供给了国际新闻，而对于全国人民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生活、奋斗，缺乏系统的记载，对边区工作，没有全面反映，更说不上推动与倡导。尤其最大的弱点是：“我们在党报上未能对于整顿三风加以应有重视与地位，蔚成风气，形成潮流”。

社论既明确了党报的原则和办报的方向，又作了坦率而诚恳的自我批评，表明《解放日报》决心来一个“彻底的改革”。

（2）“四·一”改版的崭新面貌

4月1日的报纸，第一版最引人注目的是以特号黑体字标题的头条消息，《边参会减轻公粮公草决议》，这是陕甘宁边区广大人民最关心的事情。当时，敌人对边区采取经济封锁，国民党政府扣发八路军的经费，边区财政经济极度困难，群众（主要是农民）负担不断增加，1939年陕甘宁边区征粮5万石，1940年征粮9万石，1941年征粮增加到20万石，1942年到底征粮多少呢？这是关系广大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坏人乘机造谣说“1942年要征粮40万石”、群众惶惶不安，严重影响了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党政军学同农民群众的关系。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多次研究讨论，最后决定1942年征粮16万石，比1941年减少20%，征收公草1600万担，比1941年减少40%，边区政府还向人民保证，一不向人民借粮，二不抑价买粮。但是这样重大新闻，改版前只登在二版，消息写得也比较简单。而在改版的第一天，趁边区参议会常驻会通过减收公粮公草办法之机，在一版头条的显著位置登出，鲜明地表达了共产党对群众的关怀，也体现了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把贯彻党的政策，关心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一版的第二条新闻是中央党校确订新教育计划，内容是宣传整风学习的。此外，有三条消息是揭露日寇侵华暴行，有四条消息是报道有关国民党和国统区的政治活动和经济情况。这样，整个报纸既体现

“以我为主”的原则，又给人以全国抗战一盘棋之感。此外，还有一条国际消息。

第二版是边区版，既有关于整顿三风的消息，又有春耕、行情和儿童节等丰富多彩的内容，还有第一次出现的《党的生活》专栏，这一次是以《怎样办好党报》为主题，集中发表了几篇文章，动员和组织全党重视党报，关心并监督办好党报。

第三版是国际版，下面是徐特立《再论我们怎样学习》的文章。

第四版是综合副刊。

以后的版面安排，大体都按照4月1日的模式，即一版是国内外重大新闻，国内新闻以我党、我军和陕甘宁边区及其它根据地的重要新闻为主，第二版是边区版和国内版，有关党政军和其它根据地的新闻，也有少数国统区和敌占区的新闻；第三版是国际版，有时也发表一些有关国内政治、经济和学习的文章；第四版是副刊，接受读者意见，除保留《卫生》、《敌情》和《科学园地》外，停止了原来的一些专刊，改为综合副刊。

版面的显著变化，标志着办报思想的根本变化。改版前的国际新闻不但数量多，而且位置显著，从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创刊，到同年11月16日，半年时间，一版头条国际新闻占180次，而国内新闻仅有4次，其中还有两次是我党关于国际问题的评论和声明。连7月1日党的二十周年纪念日，一版头条还是苏德战场的一般消息，纪念党的20周年专页只放在二版。改版开始，就改变了这种状况，1942年4月，一版头条刊登国内新闻20条，占2/3，其中有整风宣传、陕甘宁边区生产、征粮活动，我军战报等；国际消息有10条，占1/3。国际新闻所占的版面，较前缩小，但国际上重大新闻的报道与安排，并未削弱。从报纸的总体来看，在宣传贯彻党的政策，反映边区人民生活，表扬我军浴血杀敌等方面，是大大加强了。

(3) 开创新闻史上新纪元

——劳动人民登上一版头条

4月30日的《解放日报》，引起了广大读者一片赞叹声：“庄稼汉登上了报纸一版头条！”这确实是《解放日报》的首创。

4月30日的一版头条，以大字标题《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影响群众积极春耕》，同版发表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同天二版上还发表了记者莫艾写的长篇通讯《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

消息以《本报特讯》为电头，写了这样一段简短评介：

“在春耕运动中，农村劳动英雄不断出现，他们本着热爱边区巩固边区和改善自己的生活，表现着高度的劳动精神，其中尤以延安县柳林区吴满有最为一般农民所钦佩。他每年的收获量，要超过其它农民的1/6。全家两个劳动力，种地40余垧。今年开荒35亩，现已为该乡农民公认为模范的劳动英雄。据昨夜最后获悉，边区政府建设厅已决定予以嘉奖”。

这样集中地、大张旗鼓地宣传表扬一个农民，在中国报纸上开创了新纪元，它说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才有这样破天荒之举；它也说明劳动人民是党报的主人；它更说明改版后的《解放日报》想方设法努力宣传贯彻党的政策，使党的政策生动地、具体地变为群众的物质力量，并发挥报纸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

吴满有登上一版头条，不仅是《解放日报》经济宣传上一个良好的开端，也为以后党报的经济宣传，开拓出一条新路。

(4) 成绩与问题

改版以后，编委会注意听取和研究各界人士对报纸改版后的反映，编辑部门定期召开业务会议，发动大家，认真讨论。这一时期的报纸，有了明显的进步，主要是注意联系实际，联系群众，反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群众生活。但是，仍然存在问题，那就

是同党中央的关系还不够紧密，没能做到息息相通，呼吸相关，因而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

（三）关键是增强党性

改版的第二阶段，进一步解决增强报纸的党性问题

1942年8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陆定一到《解放日报》工作，任总编辑，并参加政治局会议。8月21日，博古在编委会上宣布，陆定一代替杨松（杨松病逝），任总编辑、余光生任副总编辑。

陆定一、江苏无锡人，1906年生，1925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驻苏联莫斯科），1930年回国，曾先后主编《中国青年》（后改为《无产青年》）《列宁青年》、《青年实话报》等报刊。1936年在长征途中，接替邓小平主编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42年初夏，奉调回延安，中央指定他主编专为整风运动而编的专刊《学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8月，任命为《解放日报》总编辑。同陆定一同时调到报社的还有秘书长兼党总支部书记陈坦。

8月29日中央政治局对《解放日报》作出新的决定，全文是：

第一、同意毛主席指出的《解放日报》自4月改版以来，有较大的进步，但尚未做到完全成为中央的机关报。有些重大的新问题未能提出与中央商量，而报社所采取的立场有不妥当者，今后在这方面必须实行改善。报社的日常政策，须在中央会议上报告，其它事项须做明确规定者，委托博石、定一协同王稼祥、陈正人起草党报工作条例与报馆管理规则、交中央讨论。

第二、各机关、学校负责人，必须管理机关学校人员在报纸上发表的消息和稿件，不得任其随便乱发，以明责任。

第三、《解放日报》是中央机关报，同时在一定范围内又是西

北局的机关报。西北局应积极管理边区范围内的事项。并决定陈正人参加中央党报委员会”。^①

从这时起，《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进入了第二阶段。

9月5日编委会召开会议，博古传达了政治局对《解放日报》的新决定，陆定一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解放日报》的意见。陆定一说：“毛主席在会上指出：《解放日报》有很大进步，但尚未成为真正的党中央的机关报。日常政策必须经常报告中央。《读七七宣言》社论、印度问题、参议会、自卫军几篇社论、就有些错误。另外，有些消息如党校学生自杀，是不应该登的。报纸尚未与中央息息相关，虽然总路线是对的。以后凡是新的重要的问题，小至消息，大至社论，须与中央商量。报社内部亦须如此。中央与西北局要极力注意管理报纸。报纸不能有独立性，过去有一段是那样。应当在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能有一字一句的独立性。这就牵连到工作制度，权力问题。自由主义在报社内是不能存在的。为什么不允许闹独立性？不要以为某人写文章署名，就可以自己负责，这是关系到党的事情。为此，必须规定些条例”。^②

会上，博古和余光生都做了自我批评。经过讨论，编委们从思想上统一了认识：要牢固地树立党的观念，把《解放日报》置于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之下，并加强请示报告制度。

这次编委会以后，召开了《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工作人员大会，会上，博古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对《解放日报》新的决定，系统地检查报纸工作的错误，自己承担了责任，并且联系自己过去历史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态度恳切，也很沉痛。大家第一次听到博古亲口讲他历史上的错误，都很感动，更加深了对中央新决定的认识。“一个字也不能闹独立性”，深深刻印在每个人的

① 材料来源：中央档案馆。

② 摘自《解放日报》编委会记录。

头脑中。编采人员进一步认识到办好党报的关键，在于解决党报的党性原则。增强党的观念，绝非抽象的、概念化的，而是具体到每一篇稿子，每一条新闻，都是代表党的，都必须同党的政策相符合，从党的影响来考虑。结合整风，全编辑部工作人员党的观念提高一大步。

编委会制定了各项制度，使制度和措施保证办报思想的落实：1、建立审查稿件制度，陕甘宁边区政权方面的稿件，由林伯渠负责审查，军队稿件由贺龙负责审查；反映边区重要的新问题的稿件，由西北局审查，普通稿件，由报社负责人看过签字。2、建立内部检查报纸制度，公布检查结果，出现错误，发稿部门必须回答是怎么错的，谁错的，本人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3、拟定印刷厂与校对制度，工厂要实行看大样制度，有关主管人签字后，才能制版。一、二、三版头条新闻由曹若茗签字，其余稿件分别由张映吾、邓友星、吴冷西签字，四版由舒群签字，社论由陆定一签字，专论由余光生签字。大样由陆定一负责，各版版样由曹若茗同意后发。校对负责初校，复校清校由编辑部负责。主要稿件退稿由陆定一签字，一般稿件退稿由各部负责人签字。4、健全办公制度，设立签到簿等。

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报社内部工作，进一步走上正轨，有秩序地运转起来。

《解放日报》的工作有起色，中央感到满意。9月15日，毛泽东同志给何凯丰的信中谈到“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200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反映）、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①

9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党与党报》的社论，更加明

① 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83年版第99页。

确而详尽地阐述了党与党报的正确关系，党报的性质和任务，提出“党报是党的喉舌”，批判了“同人办报”、“无冕之王”等错误思想，“一切依照报馆同人或工作人员个人办事，不必顾及党的意志，一切依照自己的高兴不高兴办事，不必顾及党的影响。办报办到那样，就一定党性不强，一定闹独立性，出乱子……”明确指出：“一切依照党的意见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照顾到党的影响”。“党报不但要求忠实于党的总路线，总方向，而且要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要与整个党的集体呼吸相关，息息相通”。这里特别强调：“这是党报工作人员的责任。这是办好党报的必要条件之一”。

毛泽东同志根据整顿《解放日报》的经验，在1942年9至10月份为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指示，反复强调：“务使党刊宣传服从党的政策”^①，“经常注意掌握新闻政策和社会的方针”^②，在1942年10月8日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更明确指出：各级党委“要抓紧对通讯社和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和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章，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③

《解放日报》的经验，为全党各级报纸所学习推广。

全党办报的兴起

全党办报的兴起，是在《解放日报》改版的第二阶段，收效很好。全党办报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从中央起到各级党委、

① 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83年版第96、98、97页。

② 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83年版第96、98、97页。

③ 引自《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1983年版第96、98、97页。

党的领导机关，都高度重视对报纸的领导，充分利用报纸推动工作，并为报纸撰写稿件；二、动员全党办好党报，发动党员和基层群众为党报写稿。

党中央对《解放日报》的重视、利用与领导，早已是各级党委的表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代论、文章，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国内外、党内外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亲自动笔，撰写社论。为了解决《解放日报》第四版的稿源问题，他亲自给四版写征稿条例，并分配几位负责同志每月交稿的数字。对《解放日报》的整顿，既有方针性的领导，又有具体的措施。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是全党办报的带头人，倡导者。

中央政治局决定《解放日报》既是党中央的机关报，同时又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机关报，中央西北局在1942年9月作出了《关于〈解放日报〉工作问题的决定》，决定做出一系列具体规定，除西北局按月讨论《解放日报》关于边区问题的宣传计划、派人出席报馆编辑部会议以外，特别规定各分区党委及县委的宣传部长，均应担任《解放日报》通讯员，负责组织其所管地区内的通讯员工作，组织同级党政负责干部及党外人士写稿，发展通讯员，帮助通讯员搜集材料，反映党报在群众中的影响和意见，检查党报的发行情况等。还规定各机关学校负责同志，要经常给《解放日报》写稿，并建立健全通讯组织，等等。到1943年3月西北局又作出《关于〈解放日报〉几个问题的通知》，对各级党委如何帮助和利用《解放日报》进一步开展通讯工作，作了具体规定。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也发出了《关于为供给〈解放日报〉稿件的指示》，动员部队有写作能力的人写稿，反映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敌斗争中英勇作战的事迹、揭露敌伪的残酷暴行，以及敌后群众抗战与根据地的建设……。

与此同时，《解放日报》编委会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应规定，

为了及时了解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政策，做好党的耳目喉舌，除博古、陆定一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外，编委会的成员，分别联系党、政、军各领导机关。

陆定一联系军事领导机关；

余光生联系经济领导部门；

丁浩川联系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

吴敏（杨放之）联系西北局的组织部和党务室；

博古和陆定一还经常参加西北局会议，西北局的宣传部长李卓然参加《解放日报》的编委会。

党中央的号召，西北局的决定，有力地支持了通讯工作的开展。《解放日报》乘此东风，大力加强通讯员工作。在《开展通讯员工作》的社论中，从党报的性质上阐明了开展通讯员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的报纸，如果没有广泛的通讯员，如果没有参加工作的、生活在群众中间的党与非党的通讯员，是不可能办好的。因为我们的报纸是党的报纸、是群众的报纸，群众的利益、群众的情绪，是党决定政策的依据；群众的意见，群众的行动，是考验我们政策与工作的标尺。党教育群众，不是高高在上地用空洞的原则、死板的教条去照本宣读的说教，而应该是站在群众之中，通过群众耳闻目见的活生生的事实之分析与理解，使群众逐渐提高他们的认识”。社论特别指出：“我们的报纸，正是要负起这样的任务，这也正是我们的报纸所以异于一般资产阶级报纸的基本一点”。社论强调报纸不仅需要能干编辑与优秀的记者，而且尤其需要有生活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参加在各项实际工作里的群众通讯员。

为了加强通讯员工作，编委会决定新调到报社的编委会委员裴梦飞任通讯部部长。加强设在各个专区和延安市的《解放日报》通讯处，通讯处由各地委和报社双重领导，地委负责组织和审查通讯员，决定新闻报道计划，供给通讯处物质生活；报社负

责新闻业务领导。各通讯处派驻一名特派记者，由报社的骨干记者担任，有的还配上一、两名一般记者。特派记者的任务是个人采写与培养通讯员并重。当时的主要特派记者是：

陇东专区	缪海稜
三边专区	姜克夫
关中专区	普 金
绥德专区	田海燕
延属专区	林 朗
延 安 市	莫 艾

一批记者在派往分区通讯处之前，博古同他们进行了热情的谈话。他说：我们要以小学生的态度和虚心请教的精神去接近群众，丢掉旧新闻记者的架子。我们不是“无冕之王”，不是踞高临下的社会舆论的指导者。我们的新闻工作，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要尊重地方上的领导，在工作中求得人家的信任和帮助。博古还特别强调培养通讯员的工作，他说：我们不仅是带了笔自己去写、更需要培植当地的通讯员，只有依靠广大通讯员，报纸才能有群众基础。他们熟悉当地情况，了解本身业务，要向他们学习、组织、帮助他们写稿。党报记者到地方采访，千万不要像公鸡那样，跳到墙头上，喔喔喔地高啼几声、拍拍翅膀就跑掉了，而是要像母鸡那样，每到一个地方，就要下蛋孵小鸡。^①

经过一段时间，各分区的通讯处发展成通讯网，这时培养和提高通讯员的水平，就提到日程上来。除记者热心帮助以外，报纸采取的办法是：

《新闻通讯》由油印小册子改为在报纸第四版作为专刊公开发表，主办单位是《解放日报》采通部和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编者在第一期上说明专刊的任务：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联系、帮助

^① 参看田方《延安记者生涯》。

通讯员，“鼓励大家的写作勇气，提高写作技术，并能引起还未给报纸写稿的同志的写作兴趣”。专刊内容很丰富，陆定一的《我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观点》、乔木的《报纸是教科书》以及杨永直写的《漫谈新闻八股》、刘文怡写的《新闻导语》、丁济沧写的《漫谈报纸的错字》等，都是在这个专刊上发表的，还有一些稿件是解答通讯员采访写作中急待解决的问题。此外，还有评介好的和差的新闻，编辑部需要什么稿件……很受通讯员欢迎。

编辑给通讯员复信，是最直接而有效的提高通讯员写作水平的办法。编辑根据稿子的毛病，具体分析、指点，热情帮助。编辑甘当“理发员”和“国文教员”，经常用一、两千字给通讯员复信。通讯员反映说：没有选用的稿子，读了编辑的复信，比稿子见了报在写作上受益还大。

召开通讯员会，也是培养和提高通讯员的一种好形式。通讯员会的内容有：来稿分析、交流写稿经验，讲谈写稿心得，博古和报社编委会成员宣讲国际、国内和边区的形势，宣讲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心工作。通讯员普遍反映这种会很“解渴”，对提高思想、开拓思路大有好处。

评选优秀通讯员和模范通讯小组，是鼓励和调动通讯员积极性的方法之一。使通讯员感到他们也是报社的主人。

通过以上艰苦细致的工作，通讯员来稿，数量增加，质量提高，反映边区生产生活的新闻，新鲜生动。通讯员冯森令写的《闹“鬼”捉“鬼”——“出墓鬼”、“血腥鬼”、“红鞋女妖精”都抓定了》的通讯，以生动具体的事实，宣传破除迷信，社会效果很好。有些通讯员、水平提高得很快，后来调到《解放日报》当记者，如午人、冯森令等。《解放日报》由只是“清凉山人”办报、变成了全党办报，编辑部的严重缺稿问题，也得到解决。

到1944年2月，《解放日报》创刊一千期的时候，陕甘宁边区已经有了一个经常给报纸写稿的600多人的通讯网，正如《本

报创刊一千期》社论中所说：“改版之后，本报依照中央方针，实行改革，从那时起到现在，已经一年又十个月了。这一年又十个月中间，我们的重要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

在全党办报中，如何充分摆好编辑记者与通讯员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作用，《解放日报》是经过一段摸索与试验，才得到正确解决的。在大量发展通讯员、培养提高通讯员当中，稿件数量确实增加了，但又发生来稿千篇一律、质量不高的问题，许多编辑记者，以更多的时间，精心修改通讯员来稿，影响了个人的采访和写作，致使一度报纸上精品不多。1944年编委会专门开会研究解决这一问题。决定一方面整顿和提高通讯员业务水平，一方面确定记者是主力军，是打硬仗的，基于通讯员是民兵，一般通讯员是自卫队。此后，正确发挥了主力军、民兵、自卫军的不同作用，互相配合，共同作战，提高了报纸水平，锻炼了新闻队伍。

废除党八股 建立新文风

改进文风，是《解放日报》改版中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生动有趣的材料被格式束缚了，新鲜活泼的思想，被格式窒息死了。自己在地上画了圈子，让它限制了自己，跳不出它的圈外，所以打破固定格式是第一要事。”（社论《报纸和新的文风》）。

建立新的文风，首先从打破固定格式做起。关于社论的改革是其中之一。原来在报纸创刊以后，每天必有一篇社论，陆定一在1942年12月7日的编委会上提出：社论不必天天有，重在提高质量。理由是社论是报纸的灵魂，是打击敌人的重型炮弹，是组织、动员、教育人民的教材，《解放日报》发表过许多好社论，收到很好的效果，但也有些质量不高的社论，空泛议论，文风不

正，读者也有意见。问题的关键所在，是每天必有一篇社论的规定不合理，编委会每天为社论的题目犯愁，编委们轮流写社论，冥思苦想，有的就形成凑数。社论不要每天必有，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他还提议把社论和时评分开，社论是对党的重大政策、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国际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论述，时评是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述评。陆定一的意见、博古只同意社论与时评分开，仍坚持报纸每天必须有社论，说“这是报纸的论断”，不能例外。主要领导人意见达不到统一，最后提到毛泽东同志那里去解决。毛泽东同志很快答复了：《解放日报》的社论，必须精心写作，对党负责，对群众负责，最好是经常有社论，如果一时写不出来，宁可一天不登，也不要粗制滥造，勉强凑数。社论问题就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解决了。以1943年1、2、3月份为例，1月份发表社论和代论7篇，时评4篇；2月份发表社论9篇，时评3篇；3月份发表社论7篇，时评3篇。社论的针对性思想性和指导性都比较强，如《高干会与整风学习》、《生产大竞赛》、《改造二流子》等关于整风、大生产运动的社论，都是根据党的政策和群众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了方向性的切合实际的论述。时评则主要是关于国际问题的，如“五论”红军冬季攻势等等，文短贵新，没有“八股”腔。社论的改革，深受读者欢迎。

新闻要新，是建立新文风中解决的另一问题。原来的新闻、通讯，有不少是“千篇一律”、“有人开玩笑说：如果印好现成的文章，寄到各处，把人名地名填上去，岂不更省事么”？（社论《报纸和新的文风》）改版中强调了新闻通讯要内容新、文字新，提倡记者和通讯员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到丰富的生活中挖掘材料，寻找写作题材。于是，新鲜、生动而又具体的新闻，渐渐增多，使报纸充满了活力。整风学习，是严肃的思想革命，容易写成枯燥说教，可是深入下去，却能把党员新旧思想斗争，写得既深刻又生动。大生产运动中继吴满有以后，各行各业

涌现出许多英雄模范，申长林、杨朝臣、刘玉厚、赵占魁、张秋凤以及南泥湾、南区合作社……不断登上一、二版头条的“宝座”，各有特点，各领风骚。有的记者同英雄模范交上朋友，可以随时写出新鲜的新闻。1943年6月18日一版上发表的消息《赵占魁同志因公负伤 各机关代表纷纷慰问》，文字不多，却表达了人民对因公负伤的劳动英雄的崇敬。8月6日二版又发了一条消息《赵占魁同志函谢各界 以慰问金万元转赠八路军》，这消息更加感人。像这样新鲜动人的消息，改版前没有出现过。

用群众的语言来写新闻通讯，使人读后感到很亲切，1942年9月14日《党的生活》栏里，发表了《记子长南区三乡党员登记》的调查报告，可以看出改版中发扬了毛泽东同志表扬过的《鲁忠才长征记》的优良文风。这篇调查报告，写的是群众评议53名共产党员：第一类“主持公道，处处能起模范”有25名，第二类“年轻顽皮，幼稚无知，是毛小子”有4名，第三类“不说话，怕斗争，怕惹人，起不了作用，也坏不了大事”有8名，第四类“成天想发财，不愿做工作，不主持公道，对党是应付”有9名，第五类“革命前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有哥老会、二流子、烟鬼……这些人趁机混进了党，他们有的是有政治野心，有的是为着保护自己，有的为着发点洋财、痛快一下”，为人不正派，群众十分痛恨。有一次李善贺去吸收两名积极分子入党，那两个群众就说：“我还是做个好群众好”，又说：“你们党里，尽被那几个人弄坏了”。文章最后写道：“正是这类害群之马，阻碍着党和群众更好地团结，妨害着三乡支部的健康。登记党员，正是要清洗这类坏分子。这种人占7个……”稿子是点名道性的，全篇用事实说话，文字通俗易懂，使识字的人看的懂，不识字的人听的懂。

对抗日斗争人民战争的报道，也逐渐减少了那些干巴枯燥的新闻战报，而充实了那些英勇杀敌、可歌可泣的战地通讯，《棋盘陀上五个神兵》、《贺龙师长检阅他的部队》、《晋西北在反蚕食的

烈火中》等等，都是很好的战地通讯。

内容新，文字新、题材新，角度也新，从正面报道，还要从侧面报道，这是当时博古对新闻通讯的要求。报道敌占区人民的对敌斗争、揭露敌伪的残暴罪行，收效较为明显。如《北平发生抢米活动》、《日寇军马吃豆麦 北平居民吃马粪》、《大同坑儒之恨》等新闻，就是用敌占区新发生的事实，燃起人民对日寇的仇恨。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也有适当的报道，如《大后方公务人员生活困难》、《一样灾荒 两个世界》、《朱门酒肉臭 路有冻死骨》等等。与此同时，又发表了一些有关陕甘宁边区人民生活的新闻和通讯，如《人民政权解下了庄户人家的苦》、《丰衣足食话中秋》、《绥德、定边新春欢乐》等，反映共产党领导下边区人民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欢乐景象。以上这些新闻通讯，虽然不是在同天同版发表，但从整体来看，使人很自然地做出鲜明的对比。

国际新闻在文风上的改进，最为明显。改版前国际新闻主要用的是塔斯社、合众社、路透社等盟国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消息，同一个事件，有时各通讯社的立场观点还不完全一致，而《解放日报》全都照发，以致使读者莫名其妙。改版后，对外电加以改写，事实不改，但立场观点以我为主，彻底改变了作“各国通讯社的义务宣传员”的错误作法。国际新闻的综合编写，主要采取4种形式：1、将同一事件的各种报道，取其主要之处，综合成一条完整的报道，主要是电讯的摘要；2、把有关消息集中起来，加以分析，写成一个近乎通讯或述评之间的报道，附带引证电讯中的材料，较详尽地解答时事动态，对读者读报有所帮助；3、当国际事件比较纷繁的时候，国际版上发一篇综合报道，概括一日大事，并略带评论，使文化水平较低或没有时间看完全版的读者，能从简短报道中，知道当天国际事态；4、将各种不同的电讯稿综合研究后，编写成新稿，不受别国通讯社观点的影响。如1943年

2月17日《红军攻克卡尔科夫》一稿，就是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把外电重新改写，观点是自己的。

国际新闻经过改写，文字水平也大有提高，流畅易懂，改变了改版前令人费解的那些外电译稿。如1941年8月第一版上有这样一条消息：“每日邮报刊称：赫尔国务卿政躬违和，迄今未愈，虽已消假视事，但闻不久即将提出辞呈，遗缺或由陆长史汀生继任。缘史汀生推行总统政策不遗余力，而威尔基对总统亦复竭诚拥护，是以总统在现行环境下，极愿威尔基出任陆长云”。像这样文字陈腐的国际新闻稿，改版后已经一扫而光了。此外，改版后国际版增加一些小栏目，也是建立新文风的一个成果。如《国际拾零》、《国际简讯》、《苏联简讯》、《一周评论》、《欧洲拾零》、《国际评论》、《美洲零讯》、《战时英国》、《时人行踪》、《敌国新闻》、《敌国拾零》……都是一些精选的短小消息，引人爱看，活跃版面。

办成了一张完全的党报

1944年2月7日，陆定一在编辑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代表编委会做了改版的总结报告，大意是：《解放日报》创刊以后，改版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宣传上总的路线没有错误，但是与党中央不大合拍，没有站稳在群众之中。客观原因是，在草创阶段，难免出现这样那样问题；主观原因是思想上有点毛病。到1942年3月，党中央作了彻底改造党报的决定，《解放日报》进行改版。近两年来，经过全体工作人员的努力，提高了思想，提高了政策水平，报社与党中央的关系，做到了息息相通，休戚与共，改善了同边区党委的关系，反映了群众的活动和呼声，这一点，可以说达到了全国第一，当然还有应该改进的地方。内部制度健全了，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团结了，当然还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①

在这个总结报告的基础上，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刊出了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一张完全的党中央机关报，至此完成，《解放日报》的改版，也到此告一段落。

这一张完全的战斗的党中央机关报，成为党中央得心应手的工具，无论对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英勇斗争以及边区的政权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宣传上都有新的突破。既体现了报纸必备的品质（党性、群众性、战斗性、组织性），又把报纸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成为党报史上空前受到全党和广大群众所喜爱的报纸，也是当时在国内有影响的报纸，因为它发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的意愿，是鼓吹抗日、鼓吹民主、鼓吹进步的号角。

这里只举一例，说明《解放日报》如何积极贯彻党中央意图，发挥应有的作用，那就是制止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传战。

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3月，蒋介石署名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暗示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借机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6月，蒋介石密令重兵驻守在西北的胡宗南部队集结兵力，紧逼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一面在军事上准备反击，一面利用《解放日报》展开宣传反击战。7月开始进入宣传反击战的高潮，4个版的整个版面都集中针对国民党发动的反共高潮，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7月4日和6日，发表朱德总司令分别致胡宗南和蒋介石的电报，抗议胡宗南部的挑衅，呼吁团结。7月8日，博古开完中央政治局会议，立即召开报社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告诉大家：中央已在准备武装

^① 摘自《解放日报》编辑部会议记录。

反击，同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边区周围形势突然紧张，同国民党的宣传战已经开始，我们要立刻转入战时轨道。宣传战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正确、迅速、确实……”。7月9日，延安召开30000民众大会，群情激愤，誓死消灭日寇及其第五纵队。博古对记者写的大会新闻的稿子不满意，深夜他亲自重新改写，写好后，念给记者听，征求意见。记者们感到博古的改写稿，气势磅礴，情绪激昂，表达了延安军民同仇敌忾、誓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决心和力量。博古批评记者说：从你们写的稿子看，你们对边区人民热爱共产党的深厚感情理解还不深，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延安的危险还认识不够，对边区军民团结一心的威力还信心不足，因此没有把群众的激愤、决心和力量充分表达出来。最后他说：“你们似乎不懂政治，不懂政治就不懂新闻！”记者们被批评得心服口服。同天报上还发表社论《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11日又发表社论《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

在这次宣传反击战中，针锋相对又以“闪电”对“闪电”，新闻要快，要及时，“迅速”被提到应有的高度。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当时国民党重庆政府不准各报刊登中共中央的“七七”宣言，我党办的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国民党出动特务、警察设检查哨，不准《新华日报》发行。同时，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挑拨性的诬蔑共产党的声明。针对这一事件，毛泽东同志很快写了一条述评性的新闻和社论《质问国民党》，发表在7月12日的一版上，揭露国民党破坏团结的行径，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7月13日，博古发表了署名文章《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14日发表社论《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18日发表社论《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机》，21日发表社论《请重庆看罗马》……这些社论，有如重型炮弹，有力、及时地射向国民党的宣传阵地上。记者们也争先恐后地争取在报上出现“昨日”字样。博古在编辑会上提出：宣

传要有充实的内容，否则无力。不要简单的鼓动，巧言刻薄，我们要有理，有事实。不要打倒一切，骂得太广。这样，《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新闻、社论、文章，都能贯彻并体现党中央的政策。批判《中国之命运》的文章，有理有据，论点严明，令人折服。9月4日，周恩来同志来到清凉山，在新华社的篮球场上，向《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同志们作报告，讲国内斗争形势，他说：我们一定要拖住蒋介石、国民党，不让他投降，一直拖到把他的“积极性”全部发挥完。从1943年7月9日到10月5日，《解放日报》光是第一版发表的反击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社论，时评、文章，就达42篇之多，同时，还大量刊登了各民主党派、各界知名人士和全国人民呼吁制止内战、边区人民紧急动员制止内战，敌后各地声援边区反对内战以及国民党反共的种种罪行等等新闻和文章，副刊也紧紧配合这一内容。把国民党发动内战的阴谋，揭露得体无完肤，并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呼声。致使英、美、苏等驻华大使警告蒋介石不得发动内战，否则停止援助。到10月5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写的《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的社论后，党中央决定《解放日报》从10月6日起，暂时停止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言论，以示缓和。至此，《解放日报》才收兵停战。这场宣传战，《解放日报》打得十分出色，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对国民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也充分显示了一张完全的党报所发挥的威力。

“1944年10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博古陪同下，来到清凉山，看望《解放日报》、新华社、出版局和中央印刷厂的同志们，在《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讲话。毛泽东同志讲话中强调指出：党报和通讯社是组织一切工作的武器，反映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又是指挥军事、政治、经济、文教的武器，是组织和教育群众的武器。党中央对各地的领导和指示，除了一些日常性的指示外，一切大政方针都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

传达到各地、各阶层人民中去的。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但主要还是靠《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他还说，新闻工作者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勉励大家把《解放日报》新华社办好。大家听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振奋，意气风发。这时，《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整风运动已经结束，《解放日报》同党中央的关系，与三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时的《解放日报》，真正成为完全的党中央的机关报了。”^①

《解放日报》的改版，带动了各个抗日根据地、各级党报和军报的改版。为贯彻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以中央党报《解放日报》为榜样，各报社纷纷检查报纸，公开作自我批评，提出改版措施。《解放日报》对此做了如下报道。

《新华日报》华北版（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1942年4月22日改版，改版前，总编辑陈克寒检讨了报纸的主要问题：

评论有六大病症：1、身为群众喉舌，有时却患哑症；2、多数空头议论，有时不能照顾实际情况；3、大言吓人，不顾读者，不用讨论，而用灌输方式；4、感觉迟顿，漠视新生事物，多为论述性质，缺少时评气味；5、虚张声势，浪费笔墨，写不写在我，看不看在你；6、语言贫乏。

新闻存在的问题是：喜用主观的尺度，衡量客观事物，以致有些应该反映的新闻，未得反映，对群众生活反映较少。自己做下新闻的囚笼，在狭小的圈子里兜来兜去。2、新闻的批判性、战斗性不强，好的事例虽有充分的赞扬与鼓励，某些工作坏的倾向与个别违背政策的现象，却未能及时给以应有的揭发和批判；3、新闻缺乏应有的敏感，千篇一律，以致影响通讯员只知道跟着报社采访方针跑，不知道随时发掘自己身边发生的具有政治价值、社

① 引自《我们同党报一起成长》中吴冷西《增强党报的党性》。

会意义的新生事物。某种新闻有时根本没有，有时纷至沓来，使读者只能吃三种甚至一种菜。

版面编辑存在的问题是：版面轻重不分，凌乱散漫，标题老一套，不能启发读者兴趣。

该报在4月22日改版以后的主要变化：1、打破社论的旧形式，不一定天天有，地位不固定，内容大致是评论国内外时局动向、华北敌后抗日形势、对敌斗争等重大问题；2、版面采取混合编排，一、四版登载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包括晋冀鲁豫区）的政治、经济、地方武装、文化教育、对敌斗争及有意义的社会新闻；二、三版登载国内外大事、华北战况及全国性的敌伪动态。四版开辟《工作意见》专栏，专门讨论根据地各种实际工作问题；3、在二、三版登载时评或短评，及时解释国内外大事；4、开辟一定篇幅，登载不同观点的争论，及各党派人士对根据地各方面工作的批评和建议。

《抗战日报》（晋绥专区党委机关报）改版前检查报纸的缺点主要是：1、新闻有聋、盲、哑、软四病，聋、盲症具体表现为：常常听不见群众的呼声，看不见群众的活动及根据地各种问题的症结，提不出群众的要求，也不能向群众彻底地解释政策法令；软表现为没有与敌人作有力的斗争，对各种工作的缺点，也批评不够；2、事情未来，大吹大擂，事情正做，无声无息，事情完了，放马后炮；3、处理稿件，有时不问情由，把一件完整的事情、凌迟处死；4、满篇指示，不管群众能否接受；5、杂七杂八，零零碎碎，不能反映全面；语言乏味，未能划一，无异于“小党八股训练班”；论文是空喊政治口号，很少接触实际；写作时咬文嚼字，形容词叠罗汉，问题对不准把，医不对药，常常是一盒“万金油”；宣传政策法令，不能做深刻解释。

针对以上缺点，《抗战日报》在改版中逐一加以解决，变成一张受群众欢迎的报纸。

《关中报》是关中分区党委的报纸，改版前，编辑部也进行了报纸检查。专员习仲勋特为报纸写了一篇题为《关中报应成为关中的喉舌》的文章，提出：报纸的方针，应该是宣传好整风，反映民意，文字要通俗简练，新闻和评论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克服党八股夸夸其谈的毛病。

《解放日报》刊登兄弟报纸改版的情况，同时也是对自己深入改版的促进，而《解放日报》改版的进步，又是党领导下各报纸学习和遵循的榜样。总之，在这一时期内，抗日根据地的各报都以新的面貌出现。最主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增强报纸党性，贯彻党的政策，联系实际，联系群众。

《解放日报》在改版中发表了不少有关办好党报的社论和文章，摘其要列如下一些题目：

《致读者》（1942.4.1日）

《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1942.7.18日）

《报纸和新的文风》（1942.8.4日）

《开展通讯员工作》（1942.8.25日）

《纪念九一记者节》（1942.9.1日）

《党与党报》（1942.9.22日）

《给党报的记者和通讯员》（1942.11.17日）

《报纸是教科书》（1943.1.26日）

《政治与技术》（1943.6.10日）

《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9.1日）

《本报创刊一千期》（1944.2.16日）

《新闻必须完全真实》（1945.3.23日）

《提高一步——纪念本报创刊四周年》（1945.5.16日）

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

《解放日报》有一个坚强的、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在改版中能够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带领全体工作人员朝气蓬勃地前进，取得一步又一步的胜利。

（一）博古、陆定一通力合作

博古与陆定一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在革命征途中——主要是在王明“左”倾错误时期，政治上有过直接的斗争，陆定一曾被冠以“调和路线”的罪名，遭到批判、降职、甚至撤销职务，直到遵义会议后，才得到平反。当两人同在《解放日报》负责领导工作时，他们不计前嫌，同心同德地在整风中改造党报，改造自己、改造他人。

和陆定一同时调到《解放日报》任秘书长兼党总支部书记的陈坦，和陆定一一起找博古谈心。陈坦在到报社之前，陈云找他谈话，其中有这样几句：“到报社帮助博古同志抓好机关内部工作，要好好地尊重他，热情地支持他，帮助他。”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耐心教育帮助下，博古不但对过去的错误，较前认识更深，而且以实际行动，同陆定一团结合作，搞好报纸工作。他们朝夕相处，在一起研究工作，讨论稿子，工作之余，打打扑克，谈天说地，妙趣横生。

在工作中，博古与陆定一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每次编委会开会时，都是由博古先讲国际国内形势，他把中央的精神同自己阅读的大量材料融合在一起，讲得很精辟。报纸的宣传和新闻业务，则是陆定一发言的主要内容，他对报纸检查得很细，每次都要提出一些问题或建议，博古对陆定一的意见，一般都表示赞同或作些补充，如陆定一提出：编辑部要提高业务、精通业务时，博古则进一步说明应该如何提高写作水平。陆定一对博古的意见，一

般也都积极支持，有一次，在编委会上博古当面批评一位编委“责任心不强”，“不按规定办事”，说：“我们订的制度是为了实行，不是为了形式主义！”陆定一立即支持博古的意见，毫不客气地说：“不执行制度，就该处罚，讲妥协，讲客气，是对原则的让步！”像这种事例很多。社长和总编辑配合默契，相互支持，使《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推进很快。

（二）发挥编委会集体智慧

编委会定期开会，在改版第二阶段，每周召开一次编委会，遇有重大问题还要增加，以更好地发挥集体智慧和力量。

编委会对党中央的指示和精神，十分重视，博古与陆定一每次开完中央政治局会议，很快就向编委会传达，尽快贯彻。特别是在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的时刻，编委会更是紧紧按照中央部署，及时在报纸上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和态度。博古和陆定一对毛泽东同志撰写、改写和审阅的稿件，都认真研究，仔细琢磨，常常让编委们和编辑记者共同学习。边学习，边议论，陆定一曾激动地说：“中国没有毛泽东不得了，有了毛泽东可就了不得呀！”编委会是党中央的有力助手。当时延安的电台设备落后，精通外语的人才也不太多。1942年9、10月份斯大林格勒战役最紧张的时候，编委会密切注视和研究这一伟大战役的发展，一面及时发表战报，一面向党中央提供情况。博古精通英语和俄语，能够直接收听外国电台的新闻广播，他边听边记，及时向毛泽东同志汇报。10月11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德寇在斯大林格勒遭重创放弃正面攻击的消息后，第二天，11月12日，毛泽东同志撰写的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就见报了。这是一篇观察全球战略的预言书，在全世界最先提出这一战役“是世界第二次大战的转折点”，是希特勒“灭亡的决定点”。毛泽东同志如此神速写出，正是他素日积累大量材料，了解全局，从而作出了准确的预言。而《解放日报》编委会，准确及时地为他提供材料，也起到了有力的

助手作用。

报社干部的思想、生活以及内部工作等，都是编委会讨论的内容，研究最多的还是报纸的宣传，每周都提出新的问题或缺点，研究改进措施，对成绩，只是简单地肯定一下。如对大生产运动的宣传，虽然有吴满有、申长林、赵占魁、马杏儿等许多人物的成功的宣传，也博得广大读者的好评，但编委会着重讨论的则是有的读者提出：对劳动模范的宣传，形成了一套固定的模式，应该打破这种框框。经过充分讨论，对陕甘宁边区生产展览会和劳动英雄大会的报道，进行了具体指导，把报道提高了一步。其它如全党办报、新闻真实、政治与技术的关系、记者的思想方法和作风……都是经过编委会充分讨论，各抒己见，达到一致意见，最后由博古做结论式的发言，作为决定。

编委会上也并不都是你唱我和，有时候意见并不一致，甚至分歧很大，如社论是否天天有等，党报要不要发表社会新闻，也是当时争论的一个问题。1944年春，延安市白家坪巫神杨汉珠“捉鬼治病”，先后“治”死四人，还造谣说：“村里还有七个鬼”，闹得人心惶惶。地方法院将杨汉珠逮捕，举行公审大会。陆定一派记者穆青去采访，并将此稿发在一版头条位置，自己还写了一篇《开展反巫神斗争》的社论。博古提出：反巫神的稿子，属于社会新闻，而社会新闻是资产阶级报纸的特色，共产党的报纸不应该刊登社会新闻。陆定一不同意，他说：社会新闻主要看内容，那些低级、黄色、猎奇的社会新闻，当然是资产阶级报纸的一个特色，我们不能效法，但是有关移风易俗、稳定社会治安的社会新闻，我们的报纸应该刊登。”经过讨论，博古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他说：“一般社会新闻，照例不登，有教育意义的，如定一所说，应该登。”

（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严以教人，必须严以律己。编委会结合抓思想、抓工作，开

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首先是自我批评，博古总是以身作则地向编委们解剖自己，报纸出了问题，余光生也总是诚诚恳恳地进行自我批评。陆定一在报纸出现差错后，也曾自请处分。有这样一件事情：

1943年2月7日，《解放日报》一版上发表题为《敌渡沐河西退 滨海我追击败敌》的消息，是由两条消息组合的，一条是新华社7日电，内容是日寇由沂蒙地区转向滨海地区扫荡，我军在真武庙等地将敌击溃；另一条是新华社鲁中5日电，内容是滨海地区我军在黄沟峪等地粉碎日寇扫荡。时隔8天，16日的一版头条，竟又将这两条新闻登了出来，所不同的是在新华社的电头上加了“迟到”二字，文中除有两句被删掉外，其余完全相同。经查明，是新华社发重了消息。这个重大差错，是陆定一在检查报纸时发现的，他立即提出，编委会就此事开会讨论。会上，陆定一主动要求处分，他说：“头版头条的错误。我应该负责，请编委会给我处分。余光生同志看大样，也要负责；曹若茗的责任比光生大，也应该给予轻的处分，责任编辑要给处分。”他还建议编委会就此事做一决定，以儆效尤。博古同意陆定一的建议，认为编委会应该做一决定，对于个人处分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主要责任在责任编辑。其次是审查稿件的编委委员，看大样的副总编辑余光生也有责任，他说：“定一虽然是总编辑，但不负直接责任，不必牵连在内。”并且说：“要说领导有责，我也有责任，我们是领导无方之责。”对博古的分析和处理，其它编委委员都认为很恰当，陆定一却还是一再检查自己，认为这是《解放日报》出现的破天荒的大错，头版头条的差错，不可轻视。他说：“曹若茗固然是工作疏忽，审稿不慎，但是自己作为总编辑，也应负有责任。”博古则再次说明：“问题虽然严重，但定一没有直接责任。对上报告，是讲我们的责任。对外我们要负责，对内则应分清职责。”大家一致同意博古的意见。通过这次会议，分清了职责，制订了

惩处办法和改进措施，最后上报中央。

编委委员互相之间开展批评，开始的时候还不够经常，陆定一曾尖锐提出“编委会委员中有‘气’——一团和气，应该改变！”博古同意这个意见，改版、整风，都是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的。编委会内部开展批评，一般是针对工作中的原则问题。1942年9月以后，博古和陆定一对一、三版的工作曾多次提出过意见，但改进不大，11月2日的编委会上，对主管一、三版的编委委员开展了批评。批评他作风不严谨，执行制度不严格，没有坚持看大样和检查登记错字的制度，一、三版有些国际消息，应该合并重写的没有合并重写……大家发言没有一点分歧和含糊。被批评的编委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接受大家意见，认真改进工作。会后，他立即召开了一、三版的编辑开会，检查工作中的问题，研究改进办法。

（四）搞好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怎样搞好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在改版中提出并加以解决的。

在1942年11月的一次编委会上，余光生首先提出：编委会倾听下面意见、发扬民主作风不够，应当接近群众，了解同志们思想，使大家能随随便便地同我们谈心，不因我们是领导而疏远，要变隶属关系为朋友关系。这个问题一提出，立刻引起大家的重视。丁浩川认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在于知心。陈坦提出：让干部放手大胆去工作，有困难帮助解决，做错了要分析原因，鼓励他们改进，不要责备太厉害。编委会上讨论得十分热烈，都认为全报社上上下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干工作，是搞好报纸改版、推动党报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最后，博古说：“必须打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隔阂，使之成为融洽合作的关系。”他从历史和社会观念上分析了这个问题：“上下级之间有点隔阂，这并不奇怪，因为领导与被领导的社会地位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两者的经

历和经验不同，思想观点不完全一致，生活环境也有差别，这些都是现实的客观存在，我们不能不承认。问题在于主观上领导者往往有点臭架子，而被领导者又往往有仇视上司的历史残余。要消除上下之间的隔阂，就要在主观上——首先是领导者的主观上下功夫，注意自己不摆架子，深入到群众中间，和同志们一起聊天谈心，说古论今，帮助同志们解一解思想疙瘩，这会有利于思想建设。”编委们一致同意博古的意见。会后，纷纷找人谈心。

编辑曾艾狄，是生长在马来亚的华侨，离亲别家，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他在马来亚当过记者，分配到《解放日报》作编辑，情绪不高，工作不起劲。有人认为他是华侨，吃不了延安的苦。编委们找他一谈心，才知道他想当记者，愿意到群众中去采访。他说话带有浓厚的广东腔，领导上怕他讲话老百姓听不懂，他诚恳而坚决地表示：“我学说话，一定能学会！”后来，他果然克服了语言关，到下面去采访，积极性很高，写出一些很好的新闻和通讯。

在工作上，编委会成员以身作则，起到表率作用，他们不但看稿，改稿，而且亲自写稿，社论和时评，他们写的最多。博古知识丰富，思想敏锐，对国际问题很有研究，常常看完新华社收的国际电讯稿，就动笔写社论，一挥而就，次日见报。陆定一则是深思熟虑，笔锋犀利，写出来的社论和文章，理论色彩很浓。余光生勤勤恳恳，看大样，也写社论。吴敏（杨放之）思路敏捷，下笔很快，也是写社论的一把好手。编委会的工作作风，带动了全报社的工作人员，使全社形成一种艰苦奋斗，认真负责的革命风气。

编委会对工作人员的工作，奖惩分明，曾几次讨论奖惩制度，对优秀者给以奖励，对工作中犯有错误者给以批评甚至处分。1943年3月29日的编委会上，决定给以下人员以奖励：张映吾、吴冷西、王揖、金刚、黎辛、莫艾、李飞天。

在工作和生活上，编委会成员尽量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都住在清凉山的窑洞里，都尽量抽出时间参加集体活动。星期六或星期天，报社举行晚会、跳舞、打扑克、下象棋、唱京戏，清凉山上这个欢乐大家庭里，总少不了领导人们的身影。延安的物质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文娱生活却十分丰富，领导与被领导者同甘共苦，愈发使人感到精神生活的充实与愉快。

建设一支党的新闻队伍

中国共产党新闻队伍的建立和壮大，始自延安时期。《解放日报》从创刊到改版，这一时期，编辑部的工作人员，除来自《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解放周刊》，如张映吾、郁文、缪海陵、张潮、王揖、邓垦、余宗彦、田海燕、邓友星、陈泉璧、叶澜、廖冰……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及鲁迅艺术学院的毕业生，如吴冷西、裴梦飞、杨永直、莫艾、穆青、张铁夫、李千峰、张沛、郁文、韩生本、李蕴辉、陈企霞、舒群、黎辛、黄钢、林朗、田方、姜克夫、刘漠冰、李锐、黄操良、刘祖春、丁济沧、胡韦德、普金、赵守一、白朗、张謇、林照春、范元珍、刘卓云、林间……都先后参加过改版时期的工作。

编辑部这支队伍，年龄大的在30岁上下，小的只有18岁，年轻、有朝气，多数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虽然抗日救国的大方向、大目标是一致的，但每人的头脑里也都程度不同地有那么一点自己的小天地、小算盘；有人在国统区做过新闻工作，对新闻业务比较熟练，可是新闻观点却同党中央机关报的要求有距离；有人刚从鲁迅艺术学院毕业，爱好文艺，想当名作家，分到报社，不安心工作；还有人来自边区政府或部队等实际工作部门，总觉得“洋”领导，“洋”学生看不起“土包子”。

编委会分析编辑部队伍中各种各样思想，认为只有结合整风，

改造好办报人的思想，才能完成改造党报的任务。先从树立无产阶级新闻观的问题抓起，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复的教育。教育大家党报的编辑、记者，是党和人民的公仆，不是“无冕之王”，要增强党性；政治与技术的关系，首先解决政治立场问题，随之也要提高业务技术水平；新闻真实问题，必须树立唯物论的新闻观，反对唯心论的新闻观，提倡调查研究，反对“听了就写，写了就寄，寄来就登”，道听途说的主观主义作风；倡导深入探讨，多方核实的老老实实的态度……这一系列的教育，使编辑记者从根本上解决了新闻观点，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

（一）树立唯物主义新闻观

在整风学习中，记者检查了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报道作风，在青年工作者中间，存在一些模糊观点，其中带根本性的是对新闻本源的认识问题，新闻来源于客观事实，还是可以主观臆造？文艺可以虚构，新闻是否也可以虚构？为迎合读者的需要和趣味性，记者在新闻报道中，是否可以随意描写、渲染夸大？

由于这种模糊观点，报纸上曾出现了与事实不完全相符甚至完全不相符的新闻报道。如报道一位劳动英雄，凭着一把镢头，一天开荒几亩，还天天创惊人记录。一调查，不是那么回事；报道乌阳区首先完成粮食入仓任务，实际上这个区是延安征粮最落后的一个区。报上登的《郾县城内家家户户纺织声》一稿，更是完全虚构，整个郾县城，连一台纺织机都没有。前线发来的胜利战报统计数字，也有虚夸失实之处，对此，1944年3月21日，毛、朱、彭、刘曾联名发出电报，指出“此种办法，对群众为不忠实，对党内造成虚假作风，对敌人则引起轻视，对外界则引起怀疑。嗣后我军公布战绩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均发表实数，望转告所属，严格执行。”^①

^① 材料来源：中央档案馆。

针对新闻不真实的问题，陆定一在整风后期写了《我们对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的理论文章，明确提出新闻的本源是事实，新闻是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新闻是第二性的。“事实在先，新闻（报道）在后。”这就是唯物主义者的新闻观点。文章指出唯心主义者对新闻所下的定义是“新闻是某种‘性质’的本身，新闻的本质乃是某种渺渺茫茫的东西”是错误的。文章说：新闻的‘性质’，“是由新闻报道所报道的事实决定的”，“事实决定‘性质’，而不是‘性质’对于客观事实或新闻（事实的报道）有什么决定作用。”文章还批驳了唯心论者关于“新闻就是‘政治性’本身”的谬论，文章承认每条新闻归根结蒂具有政治性，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政治性，比起那包含这种政治性的事实来，乃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而第一性的东西，最先有的东西，乃是事实，而不是什么‘政治性’，说新闻就是政治本身，是把事实与‘政治性’的关系，头足倒置，颠倒过来。”文章进一步写道：既然要尊重事实，新闻就必须十分真实，而“只有为人民服务的报纸，与人民密切联系的报纸，才能得到真实的新闻。”文章最后归结起来说：“只有把尊重事实与革命立场结合起来，才能做到彻底唯物主义的新闻工作者。”

这篇文章对于解决新闻工作者树立唯物主义新闻观和反对唯心主义新闻观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以后又发表社论《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进一步阐明新闻真实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二）摆正技术与政治的关系

改版初期，有些年轻记者与通讯员，对党的方针政策，钻研不够，对写作技巧则热衷研究，过分夸大了写稿的技术作用，而忽视政治原则。编委会对此十分重视，1943年3月31日陆定一向大家讲政治同技术的关系，他说：我们办的是党报，要把政治贯穿一切，政治掌握稳了，技术才有进步。写通讯，不必从托尔斯泰作品里去找形容词，而是要按照党的政策，到基层去作调查研

究，自然会有新鲜题材。

同年6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政治与技术——党报工作中的一个主要问题》的社论。社论指出：“有些记者同志把技术神秘化，造出种种名词，如‘文艺性’、‘趣味性’之类，作为对新闻事业的最高要求，并且以这些要求来与政治内容对立起来，走到‘技术第一，政治第二’的错误结论。”

社论提出：记者要做“新型记者”，新型记者要对于抗日和民主事业，对于中国的解放事业抱有伟大的献身精神；要热爱工农兵，帮助工农兵掌握新闻技术；要把政治修养和技术修养结合起来。“有了他们，我国报学史上新的光荣的一页将被创造出来。”

这些论述，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在大多数记者和通讯员的头脑里，牢固树立起“政治第一”的观念，加强政治修养，钻研党的政策。

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当“技术第一，政治第二”的错误观念解决以后，有些记者和通讯员又出现忽视技术的不正确观念，对写作技巧毫不重视，博古在看稿的时候，常常摇头叹气：“语不惊人词不修哇！”如何提高记者和通讯员的新闻业务水平，加强文字修养，使正确的政治内容更好地表达出来，又成为一个新的重要课题。编委会开会研究，陆定一在编辑部号召“记者要精通新闻业务！”博古提出“可以吸收外国资产阶级报纸的经验，但有原则的区别；也不能机械地搬运苏联的东西，要自己创造，这是个长期的过程。”他认为在新闻写作上、官样文章太多、刻板化、概念化的东西太多，群众活动与具体行动少，表扬好的、批评坏的做得不够，八股气很浓，单调，枯燥无味。“怎样才能写好？”他提出：第一，熟悉了解事物的全面及其各个侧面，历史发展与现状；第二，取舍材料，写一个侧面，如何开始、结尾；第三，明确写给什么人看；第四，用自己的字和意思来写，不用别人说过和别人写过的；第五，要写得快，迅速反映，有新闻性。“记者要有丰

富的知识，对边区要熟悉，能懂得党的政策，掌握写作技巧，经常学习和研究新闻理论和别的通讯社的新闻稿。”（1943年6月21日在编委会上的发言）

在这样倡导下，全编辑部进一步树立了在“政治第一”的前提下提高业务水平的思想。一位记者自己写了这样一个座右铭“天不管，地不管，一心磨我的铁笔杆。”有人认为这有点单纯业务观点，那位记者解释说：“做记者就要安心做记者，要当兵，不要当官，要像练兵那样，天天练笔，只有专心致意地钻研业务，才能精益求精，下笔如神，做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到1944年2月16日，在《解放日报》创刊一千期的时候，对于政治与技术的关系，做了正确的总结：“过去新闻的毛病，在于没有内容或内容贫乏，那时不去讲究充实内容，而去讲技巧，去讲文艺性等等，是很错误的，有些政治上很坏的东西和很不真实的东西，就混进来了。现在的情形又不同了，现在我们报纸上充满了内容丰富的新闻，而且都是很真实可靠的，政治上也是很好的。因此，现在我们要来讲技巧，要来讲文艺性，要来讲求新闻的表现形式，以便把很丰富的内容，表现得更好些，更简洁明了些，更突出些，更引人注意些，更能影响别人些。慢慢地我们要学会把平铺直叙的形式提到更高些的形式上去。”^①

经过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艰苦的思想斗争，这支年轻的党的新闻队伍，思想日臻成熟。

（三）艰苦的锤炼

改版开始，正值党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规定》，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解放日报》编辑部结合本职工作，对文件进行深入讨论。经过“哪里有新闻？记者的工作地点在哪里？”的专题讨论，在“到群众中去，到实际中去！”的口号下，记者们打起背

^① 引自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

包，带上稿纸和墨水（当时墨水很珍贵，定量供应），纷纷下厂下乡下连队。在出发之前，记者聚集在编辑部窑洞外的空地上，博古给大家讲下去干什么，他说：要去发掘埋藏在群众生活中积极的东西，在平凡的生活里，去找群众正在创造的新事物。要把那种浮光掠影、走马看花的作风去掉，只有深入地了解事物，才能反映出事物的本质。

记者的工作方法，当时有人归纳为一句话“上天入地一线穿”。上天，即从党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取得方针政策和具体线索，入地，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掌握第一手材料；一线穿，是讲记者的工作，要如同一条线似的，把上和下，中央和基层，党的政策和群众活动、群众意见穿起来。记者下乡，住在农民家里，挑水、扫院、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都帮助农民干，减租减息，移民生产，同农民一起斗争和出主意。他们同群众打成一片，分担群众的疾苦，分享群众的快乐。记者缪海陵说：“我们不是新生活的旁观者，而是新生活的参与创造者。”他写的《农村夜话》、《问稼于农民》等通讯，都散发着浓厚的泥土香味。记者莫艾，最先发现了劳动英雄吴满有，后来又总结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的旗帜——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毛泽东同志特意邀请莫艾到家里做客，详细询问南区合作社的情况，赞许他深入实际的好作风。

记者穆青，在“鲁艺”学的是文学，当想作家，下连队的时候，写了一篇通讯，发表在《解放日报》上，这偶然的尝试，决定了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命运，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日报》，心里不大痛快。他和张铁夫一起，到工业劳动模范赵占魁那里，一同劳动生活了20多天，他把赵占魁当成良师益友，认真了解了赵占魁的思想感情和品格。从1942年9月7日开始，他陆续写了不少有关赵占魁的新闻和通讯，特别是长篇通讯《赵占魁同志》和《恭喜赵占魁同志》，生动深刻地写出了这位劳动英雄的崇高精神面貌和英雄事迹，对当时边区工业战线开展的赵占魁运动，起了

推动作用。从此，他热爱新闻工作，并不断发挥自己的创造性。1943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穆青接受任务，到安塞县采写劳动英雄杨朝臣领导组织群众做好抗击敌人的准备工作，报社领导要求他头天去，第二天回来交稿。一去60华里，中间还要蹚一条河，当他跑到杨朝臣家里时，已经是日落西山了。晚饭的时候，他和杨朝臣边吃边谈，谈完便写，近天亮时写完，启明星未落，他又踏上归途。稿子在次日见报，就是1943年7月1日的一版头条和二条。这两条新闻，受到表扬：一是消息写得好，短小精悍，生动形象，富有鼓动性和战斗性；二是跑得快，写得快，新闻发得及时，时效性强。记者在边区采访，全凭两条腿一双铁脚板走路。《党的生活》专栏记者李千峰，1943年春天，到富县采访，风和日暖，正值黄土高原冰雪化冻的季节，黄土路泥泞不堪，每向前走一步，都要吃力地把脚从泥里拔出来，一只鞋的鞋底在中途陷在黄土泥里，到目的地时，另一只鞋也张开了大嘴。地方干部看了，赞叹不止。艰苦的环境，培养出记者的艰苦作风和对工作的高度责任感。记者田方到郝家桥去采访，不但写了表扬劳动模范刘玉厚的通讯《劳动人民的旗帜》，《刘玉厚的光辉》，而且进行了移民问题的调查，对解决当地农民的生活问题，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编辑的工作作风也提倡深入实际，主动联系各有关部门，避免“闭门造车”。一版负责要闻的编辑张映吾，列席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的作战会议，面对着中国大地图，听作战参谋们向总参谋长叶剑英报告国内的最新战况，及时了解全国各个战场（包括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区战场）的抗日战争战况，通过与会者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讨论，他不仅了解各战场的战况，而且懂得了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知道一个战场上，不是只有一种战役和一种战斗，而是军事、政治、经济的总体战，从而进一步了解了党我军斗争的战略和策略。他还走访前线归来的将领，了解

实战的情况，使他增加了对前方战士浴血奋战的真实感和军事知识。这样，编起稿来，胸中有全局，笔下有感情。

美术编辑张谔，奉周恩来同志之命，从重庆带一套照相制版器材来到延安，经过千辛万苦，才把器材运到《解放日报》，延安没有电，他想办法靠太阳晒版，不能制锌版，他就用刻刀一刀一刀地在杜梨木上刻，既刻漫画、人头像、地图，也刻大标题字，报上的颜、柳、欧、苏以及各种美术字，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和刻刀。

夜班编辑工作和生活更为艰苦。一到冬天，延河水封冻，清凉山上用水十分困难，编辑夜里起来，只用水浸湿毛巾，擦一擦眼睛，是洗眼而不是洗脸。就是这一双双有神的眼睛，在微弱的油灯下，编出了充满了党的声音和群众声音的《解放日报》。

（四）不断提高

《解放日报》编委会在培养教育干部中，“严”字当头，使编辑记者的思想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促进报纸的水平不断提高。

博古平时平易近人，蔼然可亲，可是当记者的稿子发生差错时，立刻板起面孔，严厉批评。有一次延安市召开大会，记者事先采写了出席大会的领导人和社会名流名单，发表前没有核对，名单中有一位在会前得了暴病，突然逝去，他的名字却依然在与会者的名单中见了报。博古把那位记者叫到面前，批评他说：“你这支生花妙笔，可真神哪，竟能够起死回生！”记者一时难以接受，但过后他却认为批评得很有力，在采访和写稿时，总忘不了那次的教训，工作认真仔细，再不敢随随便便使用这支“生花妙笔”了。穆青在刚到报社时，采访苏联医生阿托夫在延安做报告的新闻。博古在看稿时问穆青：“阿托夫做报告了没有？”穆青回答：“做报告了”。又问：“大家认真听了没有？”“认真听了”。博古对着这18岁的年轻记者严肃起来：“你的稿子里写着‘会场上自始至终充满了掌声’，阿托夫还怎么做报告？大家还怎么能听报告？”博古抓住“自始至终”四个字，给穆青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写作课，使穆

青永志不忘，他还向别人称道这件事，更加扩大了良好的影响。

陆定一善于给别人改稿，改动较大的交给本人看，编辑记者们把这看作是学习和提高的好机会。1942年10月，陆定一让刚从“鲁艺”调来的黄钢写一篇社论，内容是纪念鲁迅逝世6周年。黄钢写好后交给陆定一，第二天，陆定一把修改过的社论稿交给黄钢，他看到很多段落都是陆定一改写后的新手稿，间或还有博古旁添改过的字句，他把改稿同自己的原稿逐段对照，从中找到了理论水平与思想水平的很大差距（即1942年10月19日见报的社论《纪念鲁迅先生》）。

自觉地钻研业务，不断改进和提高工作，在编辑部已蔚然成风。评论组在积累资料上狠下功夫，不但把解放区的战况和工作情况积累起来，而且翻阅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及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在大量材料积累的基础上，研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写出有独到见解的文章。例如1943年、1944年他们对抗战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研究，把零星的战役，在地图上面插小旗做出标记，经过一段时间，明显地看出了敌后抗战形势的变化：我军主动进攻的次数增多，敌后武工队在敌占区的活动加强，根据地逐步扩大，而敌人对根据地“扫荡”的次数和人数都在减少，一般是在边缘地区进行报复性的“扫荡”。根据这种情况，他们写了一些评论，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斗志。他们还从来稿和材料中研究带普遍性的问题，编写出指导性很强的文章。

国际组为了提高工作，也想了许多办法，光是搜集寻找地图一项，就能看出编辑们是如何煞费苦心。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风云变幻莫测，要想掌握战场情况和战争动向，地图是很重要的，编辑们就千方百计找地图。他们从总参谋部找来一本俄文的苏联地图，又在一个旧教堂里找到一张法文的世界地图，后来又找到一本英文世界地图。依照这三张（本）地图，凭借简单的工具，放大出一张张工作用图，贴在墙上，收到战报就细心地

用笔在地图上标出来。他们不但制做工作地图，还研究为报上新闻配地图，使读者一目了然，更好地了解战争形势。不能制锌版，便在木板上刻出铁路、河流和城市，再凿出一些小孔，把铅字嵌进去，印在报上，清晰可辨，效果很好，读者很欢迎，编辑们的工作量加大了，除编发文字稿以外，还要学着绘制简单的地图，发地图稿，凡是受读者欢迎的事，就是他们乐于干的工作。

编辑、记者思想业务水平的不断提高，除领导上的教导和以提高报纸为己任的责任心以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学习。早在1941年冬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嘱咐《解放日报》记者：“青年记者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又关切地对记者讲，要读5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主义概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同志还让宣传工作者读鲁迅晚年的杂文，他赞扬鲁迅的杂文，观察问题深刻，富于辩证法，始终贯彻着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更促进《解放日报》编辑部对学习的重视。编委会在学习上做出了榜样，博古和陆定一都酷爱读书，博览百家，钻研马列主义著作，他们是水平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博古当时还校译出版了多本马列主义精典著作。学习，使《解放日报》编辑部的队伍，得到进一步提高。

（王 敬）

第三章 报社内部的整风与大生产运动

1942年开始，党中央在全党开展了伟大的整风运动，使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领导革命胜利前进。接着，又在全党全军和根据地的全体人民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克服了经济上的极度困难，达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对这两个在精神和物质方面起决定作用的运动，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当时解决抗日战争相持阶段中困难的两个环子，“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①

解放日报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工人，在做好报纸宣传工作的同时，也大力投入这两大运动中。分别记述如下：

整风运动的始末

（一）《解放日报》内部的整风运动，也同全党一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首先通过改版，办成了一张完全的党报，这是整风运动的硕果。同时，提高了以编委会为首的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水平，在思想政治上，进一步肃清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组织上，进

^①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

一步坚定了党的观念，增强了报纸的党性；在作风上大兴全党办报之风，坚持群众路线；在新闻理论与新闻业务上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批判记者是“无冕之王”的错误观点与作风，坚持唯物主义新闻观，提高业务技术水平。

整风开始以后，报社内部思想十分活跃，广大党员和干部一方面投入紧张的改版工作，一方面认真学习文件，给领导提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人感到通过整风，思想收获很大。

（二）墙报《春风》反映了报社内部整风的进展情况和深度

《春风》是从1942年春创刊，到同年年底结束。由林宁、田方、丁明、邹肇基组成编委会。墙报开始，就发表记者走访博古的谈话，摘要如下：

问：“行政当局是否有使报纸根本改造的决心？”

答：“使党报成为完全的、战斗的党报，这是党的方针。党报工作者应以自己全部精力和热忱来执行这个方针。实现这一方针的决心，我想我们全体人员中都具有的，问题是在要对于什么是党报有一致的、深刻的认识，及怎样使报纸办得更好的具体办法，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心。”

问：“这次检查工作，预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答：“一、巩固和发扬工作中的成绩，揭露和克服工作中的弱点，达到把报纸办得更好。二、使学与用一致，理论与实践一致。”

问：“墙报应该怎样选稿？”

答：“应该使墙报成为同志们发表意见的园地，一切意见均可在墙报上发表。要容许各种不同意见的发表，要提倡批评（对领导、对别人）及自我批评。要发扬相互商讨，论争切磋，并在争论中得出正确的结论。”^①

^① 材料来源：中央档案馆。

《春风》强调来稿“事实要真确，态度要诚恳。”4月4日发表了余宗彦写的《墙报与批评》，就是论述批评的正确态度。墙报一开始就充满了批评稿件：《漫谈余光生同志的领导》、《工作和主观主义在哪里？》、《给光生同志的几点意见》……余光生也写了自己的感受并进行了自我批评：“投稿的同志们公开地提出了对某些负责同志意见，过去蕴藏在心里的话，坦白地吐露出来了，这是很好的事情。”他希望“同志们随时提出批评意见”。

墙报上对报纸宣传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引起了大家兴趣，形成了论争和研讨的高潮。吴冷西写的《和国与战斗性》，就是一篇政策性很强的批评稿件。吴冷西认为：党的政策是“和国”，但这政策并不意味着放松甚或放弃对国民党的批评，改版以来，对国民党的批评——战斗性的一面——做得不够。他写道：

“和国”并不就是与国民党“一团和气”或“和平共居”，因为这不是由我们自己的主观愿望来决定，而是因为国民党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在这样或那样程度内，不跟我们“和”。为了“和”，我们不是处处退让，事事讳言，不是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不是只要统一，而是还须要斗争，须要批评。党在统一战线时期，显然没有忽视和国民党不同和对立的地方，虽然这些不同和对立只是次要的。

……

“和国”政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团结（主要的），另一方面是斗争（次要的手段），我们放松了对国民党的批评，放松了斗争，就是我们报纸的战斗性不够，就是没有做到真正的“和国”。

最后，文章提出了7月8日的社论中，关于我党“七七”宣言与蒋介石的讲演，写得似乎两党完全一致，“这里不仅牵强附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丢失了立场。这个缺点，也是战斗性不够的表示，也是对‘和国’问题认识不足，也是只知‘团结’而忘记了独立

性的表现之一。”

关于报纸对“和国”问题宣传上的偏颇和“七七”宣言社论的错误，毛泽东主席在8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出了批评意见。吴冷西的文章，与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这篇文章在墙报上一发表，就引起比较强烈的反响，有的同意，有的反对，更多的是探讨，如李锐写的《今后怎样在报纸上执行“和国”政策》，余宗彦写的《我对“和国”方针与其执行的认识》等等。特别是编委吴敏（杨放之）写的《一个思想模糊的例子——论“和国”问题和我的自我批评》更为深刻。文章从“同”与“异”，“左”与“右”，分析对“和国”问题的理解及宣传，说明思想认识上有时模糊不清。最后文章总结说：“思想模糊的根源有二：（一）不善于用分析的方法，不会把一个东西分成两个侧面，结果往往是笼统说明问题，照顾了一面疏忽了一面；（二）不是从事实中得出原则，往往是先有概念，再找事实来说明它，所以，思想模糊不是修辞的问题，而是思想方法的问题。”^①

对这一重大政策问题，通过墙报的热烈讨论，特别是后来毛泽东同志对社论的批评，大家从思想上认清是非，渐趋一致。

另一个引起讨论的题目是关于报社组织机构的精简问题。这是由赵守一的墙报稿《精简政策和报纸报道——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引起的。文章提出，报纸是政策的宣传者，组织者，虽然登过《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和精兵简政的模范事例，但是宣传得很不够。特别是报社在执行这一政策时，仿佛“特殊”与“例外”，其实，部、科可以裁并，人员也能减少。这篇文章在墙报上一贴出，邓友星立即响应，他写了《精兵简政和报纸》，批评了几种不正确的思想，对如何精简和如何提高工作效率提出了具

^① 材料来源：中央档案馆。

体措施，给报社编委会研究机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意见。^①

墙报上谈自己思想反省的文章，比重更多些，王揖、黄操良等许多人都把自己的思想，对照学习文件，进行检查，写出了笔记或心得，张贴在墙报上。此外还有一些小品文，对人对事，进行交锋，有冷嘲，也有热讽，当时被视为不正。《春风》墙报，出到1942年底，从墙报可以看出：1942年报社内部的整风运动是健康的，每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都有很大提高。

（三）报社内部“抢救”运动的始末

1943年7月开始，报社内部也开展了“抢救”运动，破坏了团结和谐的气氛，伤害了一些同志。博古和陆定一都是经过党内斗争的风雨的，“抢救”运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很积极，没有抓出什么“特务”来。康生点名批评说：“你们清凉山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你们怎么就抓不出来？！”博古只好派陈坦到西北公学（康生的试点）去学习。正好西北公学召开抢救失足者大会，主持会议的人先报告胡宗南围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然后又说我们党内有一批特务——失足者，组织上已经掌握了他们的材料，这些人应该向党坦白交待，否则要严肃处理。接着当场拘捕了一个“证据确凿又不肯交待”的人。于是，有好几个人上台“坦白交待”，台下鼓掌欢迎。这时，前来参加大会的外单位的人，也敦促自己认为是“失足者”的对象上台主动交待。最后抓出十几个“特务”。陈坦开会回来，向编委会汇报，大家感到吃惊。紧跟着外单位已坦白的“特务”、“内奸”，到解放日报来现身说法，博古那天正患点小病，搭着一条毯子坐在椅子上，他听着听着，把毯子一掀，倏地站了起来，非常激动地号召“失足者”赶快坦白！从此报社内部也捕风捉影，大搞逼供信。有时博古和陆定一亲自审问骨干记者，有的记者任凭怎么逼，也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一位

^① 材料来源：中央档案馆。

记者因为爱人被错抓去而吃不下饭，有人说他是有意向党闹“绝食”，编委会专门给他开了一次会，这个记者在会上侃侃而谈，据理以争，他说“绝食”是故意不吃饭，是一种抗议行为，而肚子不饿吃不下饭，是生理现象，不是“绝食”。他说自己是后者。把编委们说得再也“批”不下去了。就这样，按照康生假设的公式，清凉山上解放日报和新华社的编辑人员大都是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很多人都受到“抢救”，有的被社会部抓走了，多数是在清凉山上被看管。后来又扩大到校对、工人和行政工作人员。连本来是领导整风运动的编委员吴敏，都感到“怀疑到自己了”。副刊部主任艾思奇坚持实事求是，不搞逼供信，副刊部没有搞出“特务”，因此而被撤销了整风学习委员会委员的领导职务。总编辑陆定一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动摇了，在一次编委会上他曾提出疑问：“抢救运动本身是不是‘左’啦？”

党中央发现了“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从1944年1月开始，发出一系列指示：坚持少捉不杀的方针、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纠正过左及逼供信、防止扩大化……特别提出：“要保护好人”，“不要将所有或多数新知识分子都认为是特务分子或嫌疑分子。”解放日报的领导对中央的指示，领会很快，落实迅速。博古在大会上代表党组织公开向受伤害者赔礼道歉；博古和陆定一对错抓而释放归来的同志，抚慰备至。同时还召开各种不同会议，请被伤害的好同志提意见，出气，对他们在生活上尽量给予照顾。甄别平反工作做得很快，在1944年上半年就全部结束了。

被错整的同志，从大局出发，以党的利益为重，绝大多数都是胸襟开阔，解开疙瘩，丢掉包袱，又意气风发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党的新闻事业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整风后期，报社内部的文娱活动较前加强，副刊部温济泽，是1943年才从中央研究院调到报社的，反省和思想总结都在中央研

究院进行完了，“抢救”运动中既不是重点审查对象，也没有对别人搞逼供信，因此，他当选为编辑部党支部书记，他常帮助俱乐部组织活动，俱乐部有文娱组、歌咏组、墙报组等等。周末和节日，组织晚会，跳舞、猜谜、歌咏……博古、陆定一有时也同大家一起打扑克、下象棋，猜谜语……王揖和李锐是篮球场上的活跃分子，运动会上少不了他们。内部生活活跃了，大家的心情也舒畅了。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解放日报》内部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很热火，编委会多次研究讨论有关生产方面的问题。1943年2月1日成立生产委员会，由博古、陈坦、苏爱吾、吴文焘、赵丕哲、丁明组成，日常工作由陈坦负责。报社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方针、任务和方法是：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大家动手，各尽所能，反对平均主义。要农业工业并重，生产多样化，发挥一技之长，互助合作，变工代耕。这个原则一定，就保证了既能办好报纸，又可开展大生产运动。

在农业生产上，组织一部分人到桥儿沟、南泥湾去开荒，种玉米、谷子、养猪、养鸡、种菜等，在手工业生产上，利用印报的边角余料装订本册出售，还开办了一个香烟厂，生产清凉山牌香烟。这样，多方面的生产增加了收入，生活也随之改善。1944年，每人每月能吃到3斤肉，蔬菜很丰富，再不喝“飞机汤”了（1942年没菜吃，只是一锅白开水上面飘着几片菜叶，人们称之为“飞机汤”），每人还发了新军衣、衬衫、毛袜、单鞋、棉鞋、草鞋等，肥皂、火柴、牙刷、毛巾等生活日用品也发下来了。有时还分给老人和小孩一些猪肉、鸡蛋。上山烧的木炭，也给体弱多病和有小孩的女同志多分一些。

至于个人生产，更是多种多样，各尽所能，1944年4月7日，

报纸刊登穆青写的《本报编辑部的个人生产》，写得生动具体，详尽细致，现作详细摘要如下：

本报编辑部的个人生产 穆青

(1) 重新组织

1月尾，个人生产使报馆热闹起来了。所有的编辑记者和校对同志，都做了计划，而且想尽方法到处找寻生产门径。但是，在一次统一领导、重新组织的会议上，暴露了一些隐藏着他们种植西班牙花生的计划，怕别人也种；打麻绳的同志怕别人经营同样的生产，欺骗别人说打麻绳无利益。个别同志在做春节玩具时，深恐别人走进他的工作重地，学去了秘诀，不欢迎参观。大会暴露了这些，发扬了集体精神，识别了个人特长，确定了和业务结合、和群众结合的方针。从此，编辑部40几个男女同志都组织起来，按照不同的工作时间和特长，有计划地经营着农业、纺织、文化供应，以及麻绳、骨粉、装订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因为生产的多种多样，我们报馆1、2月份个人生产成绩，超出了中直所有机关，创造了平均每人生产折合小米2斗5升的记录，而编辑部的平均数则为2斗9升4合。

(2) 我们的手满是水泡

农业劳动是我们生产的中心，也是改造知识分子最好的方法。我们20个劳动力，要耕种200亩荒地，要把2400斤粪送到地里去。起初，个别同志对于拾粪不太热心，……不管怎样，拾粪热潮掀起来了，由骡马粪的拾运到跳进人家的茅坑，由每人每次担30斤到每人能挑60斤的重量，逐渐地提高了大家的劳动观念和积极性，这中间很多人的肩膀压肿了，浑身积满了粪斑，很多人在黄昏和清晨都背着粪篓。

现在，我们的农业变工队已经上山了，100亩荒地的任务已经完成，每天除去编报和必要的采访外，平均有12个全工

在早出晚归的劳动。在开荒中，苏远同志创造了1亩7分的记录。这种成绩的获得，除经过思想改造外，主要是赵守一同志试用了以下几种劳动力的调剂形式：一、强弱劳动力分开，各成一组……；二、两强夹一弱……；三、实行小包工制……

这期间，山上的劳动生活，使人们感到莫大的愉快，歌声和笑语整天传遍山头，即令在最紧张的无形竞赛中，人们也会高叫着第一乌克兰前线部队的胜利，而一直冲到山顶。劳动改变了知识分子的面貌，我们的手满是水泡，脚底刺满了荆棘，或者是腰酸背痛，但没有一个人退后一步。现在开荒热潮仍在继续高涨中，很多负责同志亲自荷锄上山，大的生产竞赛正在酝酿着……

(3) 在纺车声中改造

纺织小组是以女同志为核心组织起来的，但是当合作社经过很多困难把一架纺车摆在她们面前的时候，她们并不喜爱这原始工具，认为这是农村妇女使用的东西，而自己即令生产，也应该管理机器。脱离工作专门生产的女同志，认为这是行政上对她的轻视……在开始一周内，纺纱间的纺车声总是断续的，而且常夹杂着叹息……她们感到“车子是别人的好，线子是自己的好”。当她们技术进步不大时，有人便发愁，想去打毛衣，缝衣服，或者刺绣。以后她们参观了陈敏同志的纺纱，听了王震同志在家属会议上的讲话，回来便互相帮助修理纺车，而且不停地摇起来……开“三八”节纪念会时，请东关纺纱老手赵秀兰表演了纺纱技术，她们学到了好多东西，而且提高了信心，增加了耐心，生产热情也都增加了，她们决心在纺织声中把自己改造。

现在我们的纺织组扩大了，成为农业以外的一个核心。30几个男女同志除纺纱外，还利用零碎时间从事打毛衣、缝纫

等工作。

(4) 文化供应

文化供应部在个人生产和文化教育事业上都起着很大的作用。我们做出了棉花打卡图，欧洲战场详图和美术信封。棉花打卡图都填上颜色。为了印1万个信封，我们创造了4块木板和几个洋钉所制成的“印刷机”……我们又以同样的热情和态度，制造着1万册布面精装的笔记本，和解放活页歌选，科学挂图，连环图画、首长挂像、写仿字贴、写仿木牌……文化供应部是以最少数同志为骨干，全编辑部的同志作为临时工作者，来完成它的种类繁多的生产。这些生产，我们希望对文化普及做一点贡献。

(5) 废物利用

在路旁或田野里，丢弃的兽骨很多，可惜没人利用这些废物，我们的骨粉小组想把它做成肥田的骨粉。

……

不断的试验，不断遭受困难，但还是一次一次地接近了佳境。最后得到生产委员会的帮助，作了一次比较大规模的试验，大体上成功了。5个人的骨粉生产合作社也宣告成立。

(6) 和群众合作

从卖一只皮箱而获得资本的麻绳小组，是由三个毫无技术的同志所组成的。他们对打麻绳的兴趣很大，开始幻想它的丰厚利润。当他们知道麻价贵，而且麻与绳之间的价格相差无几时，他们失望得想散伙。但摆在他们面前的工具和原料，使他们不能灰心。经过3、4晚的3人会议，细心地检讨和研究，于是他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那就是和群众结合，开始向群众的打绳者请教，并进一步和群众变工，由群众出技术指导 and 工具，他们每天出3个工，各人原料自备，数量为2与1之比。事实证明他们这样作是完全正确的。正因为

如此，技术和信心都很快提高了，产量也由每天合绳3斤增至30斤，且能打出12股至16股的粗绳，供给了整个报馆从纺车上的绳索到拉犁的粗耕绳，大大地便利了公家的生产，个人生产上也获得丰富的收入。同样也是一种公私兼顾的精神，也表现在他们这样事实中：有一次他们偶尔买到一批便宜的麻，起初他们想把这事实隐瞒着生产委员会，以市价卖给公家，以便从中取利。但一路上的交谈，使他们改变了这一想法，他们说：我们这叫什么生产呢？我们为什么要在公家最需要麻绳的时候赚自己报馆的钱呢？于是他们将自己思想告诉了生产委员会，结果得到奖励。

.....

报社在大生产运动中，也涌现了一些成绩卓越的工作人员。1944年评选出劳动英雄或模范工作者，1944年12月16日的第二版上，刊登了他们的事迹。他们是：李成武，领导菜园工作出色，使报社蔬菜自给有余，是1943年的劳动英雄，1944年再度当选；运输队长白玉贵，搞好运输工作，使历年亏损的运输队变成盈利队；伙食班长安国云，在让大家吃好的前提下，节约粮食50石；编辑部吴冷西，工作埋头苦干，对编写国际新闻、研究国际问题，尽了很大努力；工人曹发荣，由挑饭的雇工成长为工务队长，努力做好报社的修建工作。

以上就是《解放日报》内部大生产的梗概。

（王 敬）

第四章 适应新形势 改组原机构

贯彻党中央“全党办社”的方针

抗战胜利后，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整个解放区、广大国统区的人民时时关切着时局的发展，天天注意倾听中共的声音。要向全国范围内及时传播党中央的声音，只靠发行报纸传递信息显然不能适应形势急剧发展的要求。迅速扩充力量，加强通讯社（包括文字、口语广播）的工作，主要要靠无线电广播，已经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于是1946年初夏，解放日报、新华社进行了机构大改组，它反映了历史的发展和形势的需求。在这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强调了全党努力办好通讯社的问题。

在党中央的指示下，1946年4月30日至5月初，《解放日报》编委会连续召开会议。胡乔木同志代表中央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关于全党办好通讯社的问题。

陈克寒同志首先系统地回顾了通讯社的历史。他说，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是先有报纸，后有通讯社。通讯社至今已有18年的历史。最初是《红色中华社》，当时发布的主要内容是国际国内新闻摘要，每天一千字左右。1937年1月，改为《新华社》。抗战爆发后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华报》时期。通讯社主要任务是抄收电

文。其机构有电台、译电和通讯部分，中心工作是译电。那时广播的主要内容是文件和评论，新闻很少，通讯社主要任务是供给《新中华报》电讯，广播文件及评论。这一时期通讯网还没有建立起来。

第二个时期是在皖南事变之后，由于党中央感到各地的政治言论不一致，于是开始办《解放日报》，新华社开始搞广播。新华社大量收电讯，剪辑《解放日报》的稿子，向外广播。这个时期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相比，是以《解放日报》为中心。

第三个时期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条战线时，由于形势变化很快，对广播和通讯社提出了新的要求。到大进军时新华社与国民党的中央社斗争更加尖锐。形势要求通讯社要独立作战，所以完成全党办通讯社的任务势在必行。

陈克寒接着叙述了新华社的目前概况。他说，新华社的任务有如下几点：一是搜集电讯，二是向《解放日报》供应电讯稿，三是联络各解放区的通讯，四是组织口语广播。通过新华社的工作，应达到如下几项效果：一是能够供给重大的新闻电讯。二是可以收解放区8个分社的通讯稿，其中还包括国统区北平和重庆的两个分社。三是为党报提供初步可用的稿件。四是对外口语广播能到达上海和菲律宾。西安、重庆、昆明、成都都有报社抄收延安的广播稿，在政治形势好的时候，重庆有12家报纸抄收延安的广播稿。同时，旧金山、菲律宾、莫斯科都抄收我们的广播，美国也很注意研究它。五是在宣传效果方面可以与中央社抗衡，现在重庆中间派的新闻纸都承认我们的通讯社。

陈克寒还指出了目前通讯社存在一些困难：动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动力主要是手摇马达，困难的程度是发一万字的电文需要4个小时。由于动力太弱，与重庆、西满不能联络，现在除了与晋绥、晋冀鲁豫白天可作联络外，其余只能夜间联络。器材太差，物资供应不足，人力不足。中文译电组每天译60000字的明

码电文，5000 字的密电。中央社和美国新闻处的电文 23000 字，只有 4 个人。各解放区电文 20000 字，7 个新手。广播稿 12000 字，2 个老人，4 个新人，普遍感到人力不足，新手太多，工作人员文化程度太低。

会议分析新华社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新华社的方针任务还不甚明确，对通讯社的工作尚未完全重视起来，无论是机构，还是人员配备，都是以报纸为主。通讯社的机构不合理，虽然是独立作业，但在机构上附属于报社。例如，新华社内部没有编辑会议，没有资料室，没有独立的通讯网，另外编辑部门与行政部门并列，与总务处的关系也不明确，出现问题相互扯皮。

会议讨论了改进新华社工作的措施和办法；

总的方针就是要把新华社办成一个强有力的通讯社。组织好通讯网，积极办好广播。对各分社规定两项任务。其一为报纸提供稿件，其二为总社提供稿件，在业务上受总社领导。新华社与报社分工，新华社负责新闻，报社负责评论，报社的采通部人员与新华社的分社联合起来，这个分社应有一人专门供给新华社稿件。

制定一系列制度，加强分社的建设，加强编辑业务工作，中心是加强研究，使研究与编辑结合起来。

胡乔木在听取陈克寒系统的汇报之后说，要把《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合在一起为原则，但重心要以新华社为主，新华社、《解放日报》都要以全国为工作对象，其主要广播稿都要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可以使中央便于审查我们的广播，另外也可以使一般读者看到一些简明的材料。《解放日报》的第一版和第三版主要登新华社的稿件，使以报纸为中心自然转到以广播为中心，而报纸仍不失为报纸。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解决人力不足困难，亦可以解决全党办社的问题。

关于指导分社的问题，由编委会来指导，不以某个部来指导。

因为我们的通讯社是与中央社作斗争的，因此需要用更大的力量办好通讯社。会议决定《解放日报社》与新华社合并，以新华社为主。

关于新华社的机构，在正副总编辑之下设一个编辑室，下有五个部：国际部、国民党区新闻编辑部、解放区新闻编辑部、口头广播部、英文广播部，此外还设有材料室和翻译科等，电务机构人员相应增加，所有的消息均由新华社统一编发。《解放日报》只保留要闻编辑室（负责第一版），副刊部（负责第四版）。会议重申要完善干部制度，加强行政干部的管理，对编辑部干部设立编辑制，评定编辑职称，干部由新华社统一管理。

党中央批准两社的《暂行规则》

胡乔木传达了党中央的意见，两社分工协作，以新华社为主的方针确定了。在余光生的主持下，制定了《新华社、解放日报暂行管理规则》（以下简称《规则》）5月13日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收到余光生的报告后复函余光生：“管理规则简单明了，甚好，我同意。报社的组织应该是首长负责制，而不是委员制。”此件转到中央书记处，刘少奇同志5月27日报毛主席：“此件书记处会议已批准，请你审阅并修改。如你同意，请送给余光生同志。”5月28日毛主席指示：“照办。”同日，新华社、解放日报社召开了扩大社务会议。会议公布了中央批准的《规则》。《规则》对组织机构、干部配备、会议规模、津贴制度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规则》规定了新华社与解放日报的性质与隶属关系。《规则》规定如下：

（一）新华通讯社及《解放日报》为中央之机关通讯社与机关报。《解放日报》为中央所在地最高党委（现为西北局）之机关报。

（二）新华通讯社及《解放日报》隶属于中央宣传部，并在重

大问题上受中央书记处之直接指挥。

(三) 为加强领导党的通讯社及机关报工作，中央特设党报委员会讨论与确定每一时期新华社及解放日报宣传方针并检查其执行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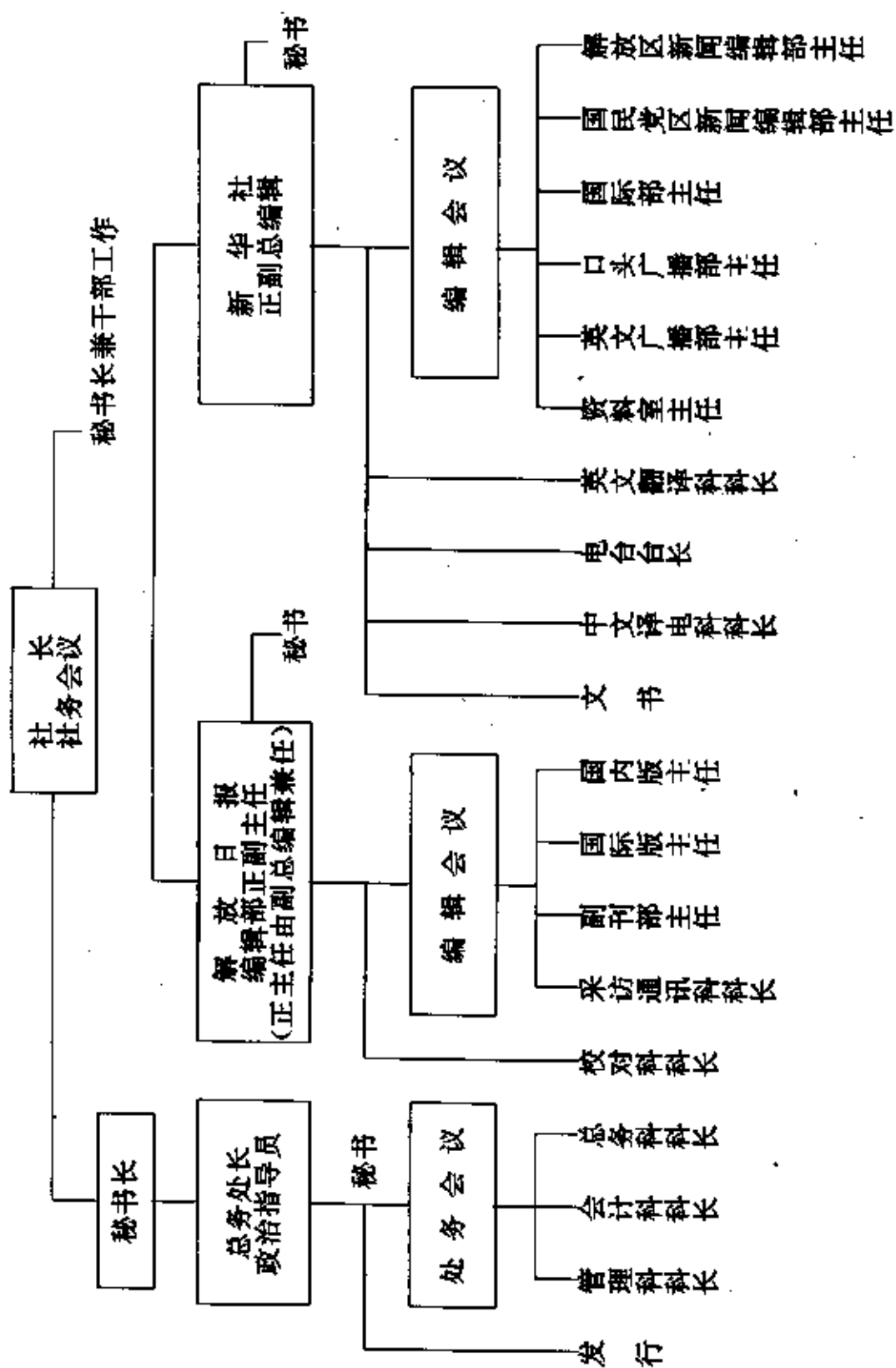
关于内部组织机构，《规则》做了如下规定：

(一) 新华通讯社与解放日报社合设社长一人，总编辑一人，副总编辑二人。社长在中央指导下，负责领导全社事务。正副总编辑负责领导全社编辑事务，其分工另定之。

(二) 新华通讯社及解放日报合设秘书长一人，负责全社经理及行政工作。

(三) 为筹划及讨论全社社务，应按期举行社务会议。社务会议由社长、正副总编辑、秘书长、解放日报编辑室正副主任组成，该会议由社长主持之。

关于全社组织系统，特列表如下：



主要干部配备如下：

余先生 代理社长，兼总编辑
艾思奇 副总编辑，兼报纸编辑室主任
陈克寒 副总编辑
徐健生 秘书长
韩进 报纸编辑室副主任
曹若茗 现在养病，参加社务会议，病好后再分配工作
杨述 新华社秘书
李伍 新华社秘书

新华社中层干部分工如下：

解放区新闻编辑部主任 高扬文 副主任 林朗
国民党区新闻编辑部主任 高戈 副主任 廖盖隆 邵红叶
国际部主任 吴冷西 副主任 黄操良
口语广播部主任 温济泽
英文广播部主任 沈建国 副主任 陈龙
资料室主任 黎伟 副主任 丁树奇
英文翻译科科长 陈适吾 副科长 王飞
电台台长 曹银怀 副台长 冯月潭
中文译电科科长 李宏烈
文书 乔树艺 王京平

解放日报社主要干部分工如下：

国内版主任 张映吾 编辑 马沛文 丁济沧
助理编辑 何力夫 叶滨
国际版主任 杨永直 编辑 夏英喆
副刊主任 杨思仲 编辑 冯牧 庄林
陈铁耕、黎辛
采访通讯科科长 胡绩伟 副科长 雷波
记者 张潮 刘漠冰 田方

李千峰 林 间

实 习 记 者 延国民 艾仙芝 马永和

冯森令 乔 迁

校 对 科 科 长 李飞天 科 员 黄 吉 徐 功

余 坚 杨若时 齐寿军 刘光辉

全社行政部门骨干人员分工如下：

总务处处长 裴味浓 政治指导员 芦积仓

总务科科长 戴昌明 副科长 邢兆南

会计科科长 李应海 副科长 张瑞书

管理科科长 李生甫

发行 张松林

教员 张 智

秘书 勤 学

收发 杨朝金

关于全社各种会议及其成员做了如下规定：

(一) 社务会议由社长主持，社务秘书召集，参加人有：余光生 艾思奇 陈克寒 徐健生 韩进 曹若茗。

(二) 社务扩大会议由社长主持，社务秘书召集之。参加人除社务会议者之外，还有孙宏志、丁松、杨述、李伍、高扬文、林朗、高戈、邵红叶、吴冷西、黄操良、裴伟、沈建图、陈龙、胡绩伟、雷波（缪海陵）、温济泽、陈适吾、张映吾、廖盖隆、杨永直、杨思仲、裴味浓、芦积仓。

(三) 新华社编辑会议由各部各级正副主任、普通科正副科长与资料室主任组成，由正副总编辑主持，秘书召集之。

(四) 新华社行政会议由各组正副主编及各科科长，电台正副台长组成，由正副总编辑主持，秘书召集之。

(五) 新华社编辑人员大会由正副总编辑主持，全体编辑人员参加。

(六)《解放日报》编辑会议由各版主编组成，正副主任主持，秘书召集之。参加人员有艾思奇、韩进、张映吾、廖盖隆、杨永直、林坚、温济泽。

(七)《解放日报》行政会议由各级主编及校对科长组成，正副主任主持，秘书召集之。参加人员有艾思奇、韩进、张映吾、廖盖隆、杨永直、杨思仲、温济泽、林坚、李飞天。

(八)《解放日报》编辑人员大会由正副主任主持，全体编辑人员参加。

(九)总务处处务会议由指导员及各科正副科长组成，处长主持，秘书召集之。

(十)各部门全体人员大会由各部门负责人主持，各该部门全体人员参加。

(十一)全社大会由全社人员参加。

(十二)有关部门之联席会议，由参加会议之各方面负责人主持之。

(十三)各种会议制度(如时间内容等)由各该会议主持人自行决定之。

关于发文件，听报告规定如下。

发文件、听报告有如下级别：

(一)社务会议

(二)社务扩大会议

(三)编辑及各科科长

(四)助理编辑及各科科员

(五)文件及听报告票数应发该级，而因数量不够分配时，由各该部负责人调剂处理之。

(六)有关各部门业务的文件及报告，则按各有关部门之需要，分别处理之。

关于津贴制度，做如下规定：

(一) 全社工作人员津贴(稿费或生活补助费)分为三等。

(二) 参加社务会议及社务扩大会议者小米八升。

(三) 编辑、英文翻译及各行政部门科长小米七升。

(四) 助理编辑及各科科员及工作相等者小米六升。

(五) 电台津贴按三局规定发给之。

(六) 总务处干部有分红费不另发津贴(生活补助费)，其分红少于应领津贴标准者酌量补助之。

关于伙食分配规定如下：

(一) 编辑及各行政部门正科长以上者为中灶。

(二) 助理编辑及各科科员为大灶。

(三) 电台按三局规定执行。

在5月28日扩大社务会上，余光生向全体与会者论述了机构改组的原因。他回顾了我党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他说，日本投降之后，我们与中央社的斗争更尖锐了，时间性更强了，因此我们的广播显得更加重要。在这种形势下，我们集中精力办报显然不妥当了。因为虽然它是中央机关报，但它的发行总是有限的，现在只有6000份。因此迫切需要以全党办报的精神来办通讯社。我们要做到与中央社抗衡，在组织机构上就必须进行一个转变。余光生对全社主要工作做了初步分工。他说，他受中央指示，负责审查副总编辑未决之稿件，《解放日报》由艾思奇负责，韩进协助之。陈克寒负责采访通讯部、电台、文书。艾思奇与陈克寒共管国际新闻编辑部、解放区新闻编辑部、国民党区新闻编辑部和口头广播编辑部。资料室由杨述负责领导，英文翻译科由余光生负责。

5月30日社务会又对行政工作的组织机构进行了商讨和确定。会上大家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即李伍同志提出的把党务、行政和电务三者统一管理。下设党务、行政和电务三个办公室，由秘书长统一领导。

总之，全社由4月30日至5月30日，经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中央关于“全党办通讯社”的战略部署，1946年7月中共中央任命廖承志同志为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社长。廖承志，1908年生，广东惠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到延安创办《解放》周刊，同年10月被派往国统区工作，1941年在香港领导创办《华商报》，1946年7月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兼新华社、《解放日报》社长。在廖承志同志的领导下，两社为迎接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可靠的基础，对以后新华社的发展乃至解放后新华社的组织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解放日报》在艰苦的环境下，仍坚持继续出报^①。

（岳颂东）

① 材料来源：中央档案馆。

第五章 延安保卫战中的《解放日报》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全面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在从1946年6月至1947年6月一年多的时间里，人民军队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其中前八个月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后四个月努力打破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到1946年10月以后，军事形势已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蒋军士气低落，我军在几个战场上夺取了主动，并开始了局部反攻。蒋介石在全面进攻遭到失败后，为了挽救自己垂死统治，采取了召开伪国民大会，驱逐中共代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疯狂步骤。在敌人以优势兵力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形势下，党中央做出了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决定。从1946年11月起，《解放日报》社开始疏散工作。该报于1946年11月20日开始由每期四版改为两版，星期日增刊仍为四版。在中央撤离延安后，曾于史家畔一带坚持出版了暂短时间，由于军情紧急，环境恶化，于1947年3月27日终刊。以后新华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继续完成《解放日报》未竟的事业，为党中央指导解放战争，推动全国革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迅速反映保卫边区的胜利捷报

1946年11月1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昨日召集干部大会，动员保卫边区和延安”的消息，拉开了陕甘宁边区保

卫战的序幕。11月13日发表社论《紧急动员起来保卫边区》。14日发表综合报道“一切为着消灭进犯者，全边区沸腾着自卫斗争”。16日以醒目大字标题刊登“晋冀鲁豫、晋察冀七千万人民同声怒吼，保卫陕甘宁，保卫毛主席！”18日刊登消息“边区周围发生前哨战”，至此，边区保卫战打响了。《解放日报》在保卫陕甘宁边区的自卫战中采取了多种宣传方式，反映军事战场两种命运较量的重大主题。

一是把军事报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除了每天以大量篇幅迅速反映自卫战争的胜利捷报之外，还把最重要的战况和关于军事斗争的社论放在头版头条。据统计，从1946年11月20日到12月20日30天内，在头版头条位置上刊登我军战况和有关战局的社论达18篇。

二是尽量采用各种新闻体裁搞好军事报道。这个时期，报纸采用了消息、快讯、评论、特写、长篇通讯、诗歌、故事等各种体裁。全面报道战争的形势，起到了鼓舞士气挫败敌军气焰的效果。

三是利用典型宣传，搞好军事报道。如1946年12月6日刊登了冀鲁豫前线我军开展王克勤运动。26岁的王克勤是冀鲁豫前线某部副排长，由于他技术熟练，在部队里开展互助友爱，互相学习军事技术，把发扬勇敢精神与提高军事技术相结合，这个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12月11日，又发表社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社论说：“开展王克勤运动的首要任务，是在全体人民解放军中普遍热烈的提倡互助互学，提高技术与提高战斗力，强调部队中新老战士的团结，强调翻身农民出身与旧军队出身战士的团结。另外是加强瓦解敌军的工作。”为了配合这一典型宣传，12月19日还报道了专访《王克勤在火线上》，12月20日刊登了消息王克勤秧歌剧将在晋冀鲁豫前线上演。

四是提出响亮口号，反复宣传，深入人心。在党中央毛主席

撤离延安之后，报纸反复宣传“保卫陕甘宁，保卫毛主席”的战斗口号，在这个口号精神的指导下，选择各种角度配合宣传，如民兵积极参战，解放区军民积极土改支援前线，敌人暴行激起军民的义愤等，并报道陕甘宁自卫解放战争的辉煌胜利。

《解放日报》在保卫陕甘宁的战斗中

国民党反动派在强迫南京、上海、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人员撤退之后，立即发动了对延安的进攻。1946年11月17日国民党胡宗南的马鸿逵骑兵团已进犯三边地区，边区周围发生前哨战。1947年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轰炸延安。14日国民党16个旅即大举进犯。他们叫嚣“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

蒋介石下令进攻陕甘宁边区，妄图首先解决西北问题。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当时敌人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总兵力24万左右，而这个地区我军只有2.5万人。面对严重的斗争局势，党中央毛主席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陕甘宁地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有保障，因此确定了“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这一英明决策。做出了暂时放弃延安，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采取“蘑菇战术，消耗敌人，聚而歼之”的作战方针。同时，为了工作上的便利，组织中央工作委员会，由刘少奇、朱德和其他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工作。毛泽东同志坚定地指出：“将来人们会看到，蒋介石占领延安，决不是他们的胜利，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就要倒霉了”。“少则一年，多则两年，延安仍要归回到人民手中的”。

革命圣地延安，只是在抗战初期遭到过日本飞机轰炸，此后

十个年头一直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之中。现在战火燃起，硝烟弥漫，打破了正常的工作秩序。但是中央要求报社既要坚持正常工作，又要应付战争的来临，这是非常繁重的任务。党中央曾明确指示，在战争情况下，新华社文字宣传、口头广播不能中断。对于这一规定，毛主席、周恩来同志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3月，曾经关照检查过多次。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制定了“狡兔三窟”的应变方针，确定了延安、陕北瓦窑堡和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涉县为三个点，依次接替。这样，使报社、通讯社的工作完成了由平时状态向战时状态体制的转变。

1946年11月下旬，《解放日报》将老弱妇孺进行了第一次疏散，撤退时队伍的代号为“文化供应社”。疏散地点是延安东北子长县的史家畔一带。后来情况略有缓和，春节之后有一部分人又调回延安。同时，在这次疏散时，中央印刷厂已把一部分印刷器材从延安移到冯家岔，为后来出版报纸奠定了基础。

入冬，寂静的清凉山之夜，显得严肃而又紧张，窑洞中闪耀着点点灯火。文字电讯照常发布，口语广播按时播音，留在清凉山的同志们依然有条不紊地工作着。

1947年元旦到了，《解放日报》刊登了新年献词《艰苦奋斗迎接光明》，献词说：“一九四七年，即民国三十六年，毫无疑问的，将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光明的日子愈益临近的年份。我们的困难，乃是胜利中的困难，乃是新中国诞生中的困难，因而是可以克服的困难……反动派所遇到的困难，乃是没落中的困难，死亡中的困难，是绝对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全体共产党员，要与全国人民一起，在今年一年中克服困难，迎接光明。我们的艰苦奋斗将要换得新中国的实现。我们的胜利信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我们的胜利是一定要来到的”。1947年元旦这一天，报纸还刊登了毛泽东同志的《新年祝词》，祝词说：“在一九四六年，战后世界的光明面和黑暗面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中国的光明面

和黑暗面也进行了胜利的斗争。战后的世界和中国都发展了争取和平与争取民主自由的规模极大的人民运动。这个运动必然走向胜利。这个运动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住的”。“只要全体人民团结一致，坚持不屈不挠的奋斗，那么，在不久的将来，自由的阳光一定要照遍祖国的大地，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一定要在今后数年内奠定稳固的基础。”

春节到了，报社照例会餐，这是一段工作紧张而又在激战前夕静寂的日子。春节之后，报社大部分工作人员向史家畔转移，只留下少数同志在延安坚持出版。

1947年1月11日和13日敌机两次袭击延安。13日敌机轰炸延安，蒋机B24、B25、B46等各型轰炸机、战斗机共25架，自上午8时半起，先后分批侵入延安上空轮番轰炸扫射，共历8小时之久。清凉山中文译电科的门窗被窑顶上塌下来的土封闭了一大半。窑洞内的电讯稿被气浪震得四处乱飞，旁边的一孔英文广播科的窑洞门窗被摧毁，办公桌打字机上面铺满了厚厚的泥土。轰炸过后，报社工作人员细心地收拾整理电讯稿，清理了场地，又继续工作。3月13日，《解放日报》照常按时出版了，这是《解放日报》在延安出版的最后一期。党中央已作出主动撤离延安的决定，出版、广播任务由子长县的工作点负责接替。

3月14日，是报社工作人员永远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工作人员整队编组，清理文稿资料，收拾办公用具，拆卸机器，打包装箱，各有分工，紧张而不忙乱。能够带走的在工作上必需的东西，交给报社运输队，负责组织驮运；笨重而不急需的东西，组织年轻力壮的工作人员，在附近的山沟里埋藏起来。从上午忙到傍晚，全部完成了撤离的准备工作。有的窑洞里还残留了一些床板木凳之类的东西，电务处的几个小伙子说：“这也不能留给胡宗南，烧！”清凉山的山坡上烧起了熊熊的愤怒之火，映照对面嘉陵山上的宝塔。从延安撤离，报社的工作人员都憋着一股闷气，心

里沉甸甸的。社长廖承志在山坡上召集工作人员讲话，宣告在清凉山坚持工作的任务已经完成。他说现在撤离延安这座空城，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我们不但要收复它，还要蒋介石用西安、用整个西北加倍来偿还。工作人员听了廖承志的话，都觉得十分解气，很受鼓舞。

14日夜晚延安一片漆黑，空气阴冷潮湿，不时还夹杂着点蒙蒙细雨。清凉山下，人影憧憧，急促的脚步声，物体的碰撞声，整理队伍的口令声，找人的呼喊声，交织错杂，一片紧张忙碌的气氛。编辑部人员集中在食堂里待命出发，屋里没有灯，人们闷声不语，非常寂静。忽然，一个女同志说话了：“我出个谜语大家猜，好不好？”她说的谜语是两句诗：“月在林间照，水从石上流”。打一词。沉寂的空气被打破了，不过，也许那时人们没有猜谜的心情，一时没人猜出。最后还是请她说出谜底：“影响”。猜谜，一个小小的轻松的插曲，给撤退的工作人员留下难忘的回忆。

在延安清凉山坚持出报的时候，3月10日副总编辑范长江在瓦窑堡附近的工作点召集编辑、电务、印刷部门的工作人员开会，宣布用三天时间作准备。电务、编辑部门没有什么困难，只有印刷厂的工作人员提出转运、安装印刷机械，三天时间恐怕没有把握。范长江说：“这我不管，三天后出报，这是党中央的决定，执行吧！”说完宣布散会，没有丝毫通融的余地。范长江是1946年随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时上了清凉山的，报社的工作人员对他的为人、性格还不大了解，只知道他是一位名记者，是著名的《中国西北角》一书的作者。经过这次会议，他那坚决执行党中央指示，办事果断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瓦窑堡附近这个工作点，对外名称叫“文化供应社”，编辑部驻史家畔，行政处驻丹头村，电务处驻任家畔，印刷厂分为两处，报纸印刷厂在冯家岔，书籍印刷厂在魏家村。

报社在这里设点是延安清凉山扎营十年后的第一次大迁移。

人靠两条腿走，物资靠牲口驮，印刷厂的机器和铅板最沉重，是用骆驼队运来的。当地的老百姓给报社以极大的支持。他们腾房让窑，借助柴草炊具，出牲口，派向导，一直到3月15日新的工作点开始接替延安继续出版报纸。在史家畔编辑的第一张报纸（2118号）与延安编辑的不同之处是由对开两个版变为八开两个版的小报。

这一期报纸头版刊登消息“周恩来将军3月12日在延安发表声明，美国政府援蒋破坏了莫斯科三国协议，如有蒋方代表参加中共亦应有同等权利”。头版还刊登了长篇通讯：“我在渝联络站工作人员被拘禁及被迫撤退的经过。”通讯中叙述了吴玉章等同志在中共驻重庆联络处坚持斗争的事迹，十分感人。

撤离延安的报社工作人员在史家畔一带重新工作后，由范长江率领少数人员坚持编辑报纸，坚持文字和口语广播。3月19日蒋军侵占延安，并向延安西北方向的安塞、东北方向的瓦窑堡继续进犯。能在史家畔一带坚持工作的时间已屈指可数。为了继续工作，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大部分人员由廖承志、钱俊瑞、石西民等同志率领，东渡黄河，经晋绥、晋察冀等解放区，最后到达河北省涉县西戌村，在那里安营扎寨，继续完成党中央赋予的神圣使命。

廖承志率领的队伍要长途行军，为了保证文字、口头广播不中断，党中央作了紧急安排。3月中旬晋冀鲁豫中央局已根据党中央指示，调集朱穆之、安岗等一批同志在涉县组成新华社临时总社，并用缴获蒋军的美造导航设备进行了改装，在一个土窑洞里迅速建立了广播电台。涉县的工作点及时建成了，他们同范长江带领的陕北史家畔一带坚持工作的队伍建立了无线电直通联系，为解决“不中断”这一难题提供了保障。

在史家畔、冯家岔开始编辑出版的小报，由于稿源减少，人力不足，取消了副刊。国际消息只保留了一个专栏“国际一周”。

版面上集中报道自卫战争的战况，揭露蒋介石、胡宗南反动派的罪行。从3月15日到27日，共出版了13期，其中有12期头版头条都是反映战况和我军的捷报。西北野战军的青化砭大捷是西北战场响起的第一声春雷，极大地鼓舞了陕北及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

3月25日，周恩来，朱德同志先后视察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这对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就是在这一天，我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歼蒋军31旅，狠狠打击侵占延安蒋军的气焰，取得了西北战场上的伟大胜利。

青化砭战役结束后，敌人向北进犯，到达子长县的史家畔附近。3月27日，进犯的蒋军距离报社电台驻地不到20公里。军情紧急，报纸已无继续出版的条件。这一天的报纸为出版近6年的延安解放日报的尾声划上了一个休止符。

3月27日上午10时左右，在印完当天也是最后一期报纸后，印刷厂干部工人100多人，立即在事先准备好的地点埋藏了机器设备和其他物资，然后组成游击队，全副武装向西转移，不久被编为西北野战军后勤司令部警卫连。另一部分有30余人由范长江率领，以“四大队”的番号编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率领的党中央所属的队伍，范长江任“四大队”的队长，开始了转战陕北的战斗。

“四大队”的任务有两项，一是继续抄收外国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出版油印的《参考消息》，供党中央及时了解国内外重大事件和动态，为党中央指导国内外政治斗争、军事斗争服务。这一工作，无论是行军、宿营、不分昼夜，风雨无阻，从未间断。

二是与转移到涉县的新华社总社保持无线电联系。负责把党中央公开发布的文告、为新华社写的社论、评论、重要军事消息等及时传到总社，同时负责接收并向党中央转报新华社总社有关

宣传报道工作的请示报告或送审的文稿。

《解放日报》虽然被迫停刊了，但是党中央的声音继续从陕北传向全国。《解放日报》的队伍，分布到全国各地，其中一部分，以“四大队”的番号，编进党中央的行列中，按照预定的计划，向瓦窑堡东北方向转移，跟随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踏上转战陕北的征程。

（岳颂东）

下 编

《解放日报》的主要宣传内容

第六章 国内政治风云的纪实

抗日战争时期

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抗战，对蒋介石集团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爱国力量，促使国民党留在抗日战线内；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针锋相对，毫不退让，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解放日报》根据党的政策，在各种不同的政治情况下，宣传贯彻又联合又斗争策略，收到很好的效果。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蒋介石不但没有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反而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感，教育了许多原来对他们抱有幻想的人，国民党顽固派处于极其孤立的狼狈处境，反共活动曾有所收敛，国内时局一度趋于好转。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日报》反复宣传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如1942年7月4日《迎接“七·七”》的社论中，强调五年的血战，基本教训是团结为胜利之本，民族统一是战胜日寇最锐利的武器。社论说：“芦沟桥的炮火，促进了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之迅速结成，唤起了我全民族人无分男女老幼，地无分东西南北，一致奋起，团结杀

敌，这种团结的精神，乃是我们抵御暴寇的新的民族的长城。”社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团结一有间隙，即给敌人可乘之机，而日寇又千方百计以挑拨和破坏我民族团结为急务。社论进一步提出：调整目前很不正常的国共关系，使各党派对于目前抗战及对战后新中国的建设取得一致的意见，以巩固团结，增进团结，坚持抗战，获得胜利，是当前最重要的课题。接着，7月7日一版发表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宣言提出了时间和团结两大问题，即如何争取时间，克服困难，以达到抗日最后胜利；如何对目前的抗战及对战后中国的建设取得各党派的一致意见，以便更好地团结抗战、团结建国。同版还发表了《抗战五周年纪念日蒋委员长对全国人民广播词》。7月8日第一版发表了延安市万人空巷纪念“七七”的新闻，并发表纪念大会发出的《致蒋委员长及全国将士电》。8月5日，又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忠实于自己的诺言》的社论，这是针对一些污蔑“共产党不遵守自己诺言”的谣言而写的，社论再度重申中共中央委员会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中提出的政治方针，表明中国共产党凭藉爱国热忱，同全国各阶级各党派团结合作，保证中国的抗战胜利，保证战后中国的光明。

总之，《解放日报》在这一时期，反复宣传团结抗日，“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使广大人民进一步认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而不是只顾一党一派的私利。大敌当前，国民党的反共排共输理。

抗击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宣传战

1943年国内战场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军民度过了最困难时期，开始进入再发展的时期，华北军民开始向敌寇进攻，随后华中和华南各根据地也向日伪发动局部进攻，扩大原有的根

根据地，并开辟了新的根据地，而国民党当局仍然基本上采取避战、观战的政策，他们一方面想藉国际力量坐等胜利，另方面仍企图削弱并消灭共产党，以便战后继续独裁统治。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暗示两年之内消灭共产党。5月，又藉共产国际宣布解散之机，公开叫嚣“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以抗战大局为重，7月2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六周年宣言》，宣言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反法西斯战场的胜利形势，对国内政策向政府提出四条建议：1、加强作战；2、加强团结；3、改良政治；4、发展生产。国民党政府害怕这一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宣言，不准重庆《新华日报》刊登。紧接着就是调动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开进，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

面对国民党一系列的反共行动，《解放日报》开展了强有力的反击宣传战。社长博古在编辑部大会上号召大家：要坚决回击国民党一切反动宣传和行动，揭露国民党当局企图发动内战的阴谋。整个报社立即行动起来，每个人都以战斗姿态投入工作。《解放日报》各个版面，集中力量，如万炮齐发，给国民党的反动派以有力的回击。下面就是《解放日报》回击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中的部分内容：

7月8日，一版发表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电蒋委员长、胡宗南副司令长官，呼吁团结，要求制止内战。消息报道：连日来西安军事当局尽撤河防之兵，向边区周围开进，准备进攻边区，连日兵车运输，络绎不绝，并在若干邻近边区建筑机场，储备油弹，反共宣传，日益肆无忌惮，西安特务分子张涤非竟敢伪造民意，要取消共产党。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抗战前途，千钧一发……”

7月9日发表社论《起来！制止内战，挽救危亡！》社论一方面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投降倒退政策，53个将级军官叛变降寇，

未予追究，另方面戳穿国民党的反共行径，阴谋发动新的内战。“这批敌人的第五纵队极端小心准备的内战，这个历史上的滔天罪行，现在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候，中华民族处在危急的关头，处在最紧急的日子里。如果内战发动，兵连祸结，全国必致糜烂，日寇必然坐收渔利，长驱直入，达到其灭亡中国之企图。”“我们希望蒋介石和胡宗南先生，体恤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生灵，追念中华民族五千年长久的历史，顾及后世子孙永远无穷的福利，珍重我国在反法西斯盟国中崇高的国际地位，当机立断，命令集中边区南线的大军，归返抗日岗位。”社论最后义正词严地提出：“我们希望国民政府，重整抗战阵容，对此次破坏团结、挑动内战的祸首、日寇第五纵队分子，处以严刑；对于‘取消共产党’、‘取消边区’的汉奸言论，明令禁绝；对于53个投敌将领，明令讨伐，使抗战军民，人人自奋，国内团结藉以巩固，粉碎日寇的‘对华新政策’，使抗战大业树立在必胜不败的基础上。”

7月10日，一版全版发表了延安民众纪念抗战六周年大会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二版是《全边区紧急动员 制止内战保卫边区 延安三万民众大会》的消息，还发表了与会者的讲话，朱德总司令主要是呼吁团结，制止内战；贺龙讲话的主要精神是人如犯我，坚决自卫；高岗号召保卫边区；刘少奇讲皖南事变的教训；李鼎铭讲反共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进攻边区就是破坏团结抗战。

7月11日一版发表社论《全体人民动员起来 把敢于向边区进攻的反动派打出去！》二版报道了延安各界紧急动员，进入了战斗岗哨，农民提出“快收快打快藏”，抢收地里的粮食。

7月12日，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写的消息和社论，消息的标题是《中共“七七”宣言在重庆被扣 张道藩发出挑拨性声明》，社论的题目是《质问国民党》。毛泽东同志以犀利的笔锋，充足的根据，透彻的说理，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诡计。

同日,《解放日报》编辑部开会,讨论在新的内战危机形势下,报纸要唤起民众,认清时局,并揭露法西斯的阴谋。博古指出:目前宣传中心,是揭露敌人与动员民众,保卫边区保卫党。^①

7月13日,一版头条消息《中国政治黑暗 抗战不力 英美盟邦大不满意》,也是毛泽东同志写的。消息列举了宋美龄、熊式辉等在华盛顿、纽约和伦敦等地,受到英美人士的诘问,主要是中国国内的不民主、不团结,英美援助的武器,不用到前线打日本,而武装了后方,以致宋、熊无以回答。消息最后写道:“近日国民党发动‘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之叛卖性的运动,同时撤出河防兵力,准备进攻边区,此等消息,传至英美,不知英美人士又当作何感想。”

同日,一版还发表了博古署名的长文章,题目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

7月14日,发表社论《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

7月16日,报道延安各界热烈劳军,市民踊跃献金及捐献慰劳品。

7月18日,发表社论《再接再厉消灭内战危机》。同日发表太行分区召开干部动员大会,为保卫党而牺牲一切,邓小平痛斥国民党反动派阴谋发动内战。

除此之外,第一、二版还集中突出发表以下内容的稿件:

①揭露国民党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的骚扰,报道陕甘宁边区人民紧急动员,制止内战。国民党军队炮击边区,偷袭户县边境,炮击陇东,窜扰关中、米脂边境,洗劫新正边境村庄、抢驴盗马、绑架勒索、杀烧淫掠等等罪恶活动,都给以彻底揭露。同时大量报道陕甘宁边区人民紧急动员、制止内战的实际行动:延安市府成立运输队;紧张进行战时运输,铁匠皮匠赶制军需品;被

^① 材料来源:《解放日报》编辑部会议记录。

服厂工人加紧生产，准备战斗；各分区扩大自卫队，加紧训练自卫队，枕戈待命，随时准备打击来犯者；劳动英雄杨朝臣、吴满有、申长林、刘玉厚等领导本村、开展备战竞赛，扩大自卫军、准备武器担架，严防奸细，优待抗属；南泥湾垦荒部队把劳动小组改成战斗班排，全体人员一律武装起来，加紧军事训练，进行实战演习；南泥湾民众木匠做担架，铁匠打大刀，自卫军、担架队都在紧张训练；关中等地自卫军组织起来，夜间巡逻，储粮劳军，加紧生产，誓死保卫丰衣足食的生活；各区县青年练兵习武，站岗放哨，妇女多做军鞋……还报道许多感人的真实故事，清凉山医务所主任阮雪华捐献珍贵首饰就是一例。阮雪华捐出了珍珠镯子，翠玉夹子，手表、戒指等，其中有母亲临终时留给她的首饰，有同丈夫结婚时的戒指。她附了一封信，说明自己是封建家庭出身的女子，长大在教会学校读书，“直到边区，在这五年中，才算真正看到了光明，找到了求解放的路。现在我献出自己所有最钟爱的物品，交给党买枪炮打退胆敢进犯边区的反动派。”

以上报道，充分反映了陕甘宁边区广大人民保卫边区的决心。8月3日，一版发表了李卓然写的文章《从一个真凭实据的调查来看保卫边区的源泉》。文章对共产党领导下与原国民党统治时边区人民生活的收入和负担，作了详细具体的数字比较，文章写道：“上面材料清楚地告诉我们：边区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翻了身，共产党不仅领导他们推翻了封建压榨，获得土地和自由，而且帮助他们组织自己的政权与民众武装（自卫队、少先队、锄奸组等），他们再不是为生活所迫去当兵，而是为着自己与抗战的利益，甘心情愿当‘八路’。”文章最后总结：共产党与广大边区人民从实际斗争中所产生的这种亲密的联系与坚固的团结，是任何反动派、任何特务机关的造谣污蔑与攻击所不能破坏的。这就是保卫边区的伟大力量，这就是这个力量的深厚源泉。

②报道敌后各根据地及一些国民党元老声援陕甘宁边区，反

对发动内战的行动。如晋察冀举行万人大会、太行二万军民大示威，要求严惩特务分子，紧急动员支援陕甘宁边区、淮南民众痛斥特务分子祸国罪行、晋西北各界坚持团结，制止内战，同时，还刊登一些国民党元老反对内战的通电、座谈及文章。如续范亭先生通电全国，制止内战，反对进攻边区，以免遭亡国惨祸。李鼎铭先生发表《驳斥关于我被“撤职”的谣言》，痛斥国民党特务分子伪造“书”和“信”，造谣说“李鼎铭被撤职”，李鼎铭严正申明：“我郑重回答你们并向全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负责声明如下：我还是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我依然受陕甘宁边区 200 万人民的重托而正在兴奋地继续工作着。”文中历数国民党的罪过：国民党拥有 300 万大军，居然由抗战变为观战，国民党中央委员投敌者 20 余人，高级将领降敌者 50 余人，未闻国民党当局有声讨致罪的命令。月来敌人连续发播 3 次诱降，未闻国民党有一言驳斥。共产党则切实实行三民主义，忠心耿耿，坚持抗战，坚持整个华北、华中及华南一部分的敌后游击战，国府不发给八路军、新四军一枪一弹，他们依然抗战到底。共产党的中央委员未见一人投敌，八路军、新四军未见一个降将。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未感受到歧视与排斥……”文章写得有理有据，把国民党顽固派驳斥得体无完肤。

③评蒋介石所写的《中国之命运》。蒋介石在 1943 年 3 月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是一本反共反人民的书，它宣扬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污蔑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暗示要以武力解决共产党。它的出版，是蒋介石分裂民族统一战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所做的舆论准备。《解放日报》从 7 月 21 日起在一版和四版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批判蒋介石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反共面目，在思想战线上给第三次反共高潮予以迎头痛击。其中陈伯达的《评中国之命运》、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

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齐燕铭的《驳蒋介石的文化观》、何思敬的《驳蒋介石的法律观》、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都是从理论上对《中国之命运》的反动荒谬观点给予批判；续范亭的《感言》、焕南的《新〈圣论广训〉》、默涵的《永不兑现的支票》和姚仲明的《事实胜于雄辩》等文，则是从一个观点、一种事实加以评论和回击。

此外，在这一阶段，《解放日报》还以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反共投敌的罪行，国民党特务在敌后通敌反共的罪行。

3个月的宣传反击战，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真面目，动员了全国各界人民，“团结抗战，反对内战”，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终于迫使国民党这次反共高潮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进攻。10月5日以后，《解放日报》对国民党针锋相对的宣传战，暂时停止，以示缓和。

宣传反对独裁 要求民主

（一）报道国统区的民主运动

国民党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军事上的溃退，经济的崩溃，激起了国民党统治区广大人民的不满。从1944年上半年开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纷纷集会、座谈、发表文章，要求国民党政府结束党治，实行宪制，实践民主，保障自由。《解放日报》对此进行了较多的报道。仅2月份就报道11篇之多。《重庆各党派举行宪政问题座谈》、《参议员张澜著文，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王芸生要求废止暗刑》等等。到1944年下半年，民主运动更加高涨，《解放日报》在8月6日转载了重庆《新华日报》的消息：成都民主宪政促进会发表“对于国事10项主张”，认为非立即实现民主，不足以团结各方，争取胜利。这10项主张在《新华日报》发表时，

尽管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当局删削多处，但仍然得到全国各界人士响应。《解放日报》还陆续发表了黄炎培、章乃器、孙起孟、陈北鸥、王云五等地方企业家及各界人士联名发表的《民主与胜利献言》等。

对国民党统治区民主活动日趋炽热的大中学师生，《解放日报》也进行多次报道：昆明学术界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实行民主；昆明 3000 学生集会，要求民主；大后方学生大声疾呼：“民主，救国，打敌人！”复旦等大学师生集会，张志让、周谷城等教授抨击当局的溃败局面及黑暗统治，要求刷新政治，实行民主。特别是 12 月 31 日国民党特务制造的成都市立中学惨案，激起了大后方各学校的愤怒抗议活动，《解放日报》进行了连续性的报道。有消息，有通讯，还有专文：《抗议国民党特务暴行，成都万余学生游行》、《市中惨案及成都学潮》、《为本校 12·31 惨案向全国同学和同胞控诉》，还有来自广大人民的抗议、慰问和策励，也发表了延安大学声援成都市中学、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摧残教育的通电，同时还发表了两篇综合的评述性文章：廖盖隆写的《一年来大后方学生的爱国运动》，杨蓝写的《大后方官办学校教育现状一斑》。

悼念文化界爱国战士邹韬奋，是国民党统治区民主活动的一部分，也是《解放日报》比较集中宣传的一个内容。《解放日报》介绍了邹韬奋一生经历：他屡受国民党迫害，在流亡生活中病逝，根据他的要求，中国共产党追认他为中共党员。《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的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的所以感动人的地方。”朱德总司令的题词：“韬奋同志，爱国志士，民主先锋。”还刊登了陈毅、徐特立、吴玉章、续范亭等多人的题词。刊登了各大边区对邹韬奋的悼念活动，还有艾思奇，胡绳、范长江等多人写的悼念文章，并发表社论《悼韬奋先生》和韬奋的遗作《对国是的呼吁》。同时，也报道了在重庆由宋庆龄、郭沫若、

张澜等 12 人发起的数千人的追悼大会，参加大会的人，一致谴责国民党践踏民主、迫害爱国人士的罪行，提出要向法西斯统治展开斗争。同版还刊出了郭沫若的《韬奋先生哀词——在追悼会上讲演稿》。此外，还发表一些对韬奋生前为民主而战的回忆文章，如钱俊瑞写的《我就是这样，看你怎样办！》茅盾写的《始终保持天真》、沙千里写的《与检查官抗争》、艾寒松写的《严拒利诱》等等近 30 篇文章，从各个方面把邹韬奋同志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前进的精神，大公无私为国为民的精神，充分地反映出来。

（二）宣传全国人民要求成立联合政府

《解放日报》从 1944 年 9 月开始，比较集中地宣传了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成立联合政府。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

为了将全民族的抗战坚持到底，中国共产党从 1944 年 5 月开始，同国民党当局重新谈判。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即林伯渠）与国民党当局王世杰、张治中等先后在西安、重庆举行多次会谈。1944 年 8 月 13 日，《解放日报》发表周恩来同志对记者的谈话：国共谈判迄今无结果，根本障碍在于国民党固执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9 月 20 日，《解放日报》全文公开了双方谈判的来往信件：《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之意见书》（6 月 5 日）《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致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的信》以及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致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将谈判的主要内容，公诸于众，并发表《延安权威人士评国共谈判》，提出：欲挽救目前时局的危机，必须改组国民党政府及统帅部。9 月 22 日又全文发表了《关于国共谈判林祖涵同志在国民参议会上的报告》，正式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林祖涵提出：“希望国民党迅速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

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才，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

10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周恩来同志著名的“双十演说”《如何解决》。周恩来同志分析了国民党战场的溃败形势，并对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作了对比：今年截至9月底，中国正面战场沦陷了10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从敌人手中收复了5万多平方公里，正面战场丢弃了4000多万人口，而敌后战场却又解放了400多万人口，正面战场丢掉了102个城市，而敌后战场又夺回了8个城市。“单拿这几项来比较，已经能够说明我们敌后抗战部队——八路军、新四路和一切人民抗日的部队，是多么有功于国家和民族，而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是多么有负于国家和民族。”周恩来同志指出：“依照国民政府最近交给我们的揭示案，还要我们取消数十万的部队，取消敌后解放区的一切民选政府，这真是没有道理之至……。直到现在，国民党军队，还不断在各地封锁进攻，企图消灭这些敌后抗日军队和民主政府。”周恩来同志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废除失败主义的“军令”和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承认敌后全部抗日部队和各级民选政府，国共继续谈判，但必须在不违背抗战、民主、团结的大原则下来解决。

同版还发表了延安观察家评论：《蒋介石演说具有危险性》。在这一阶段中，关于国内时局和国共关系的评论，《解放日报》一般不发社论，而以延安观察家、延安权威人士评论的形式出现。

中国共产党关于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国民党统治区的各个民主党派，纷纷响应。《解放日报》充分报道了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强烈愿望与行动。《重庆500人集合，各党派各阶层代表一致要求改组政府》的长新闻，写得生动热烈，

反映了民心所向。这 500 多名为民主中国而呼号奋斗的战士有：国民党元老冯玉祥、邵力子、王昆仑、屈武、邓初民等，有各党各派负责人及社会名流张澜、沈钧儒、章伯钧、左舜生、黄炎培、董必武、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等。新闻写道：“大家有一颗热的心——爱国家爱民族的热心，一个期望——立即实现民主的期望。”张澜大声疾呼：“民国已经 33 年多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新闻充分报道了大会讨论如何提早实行民主和具体办法，冯玉祥、沈钧儒、邓初民等多人慷慨陈词，一致要求改组政府，要求言论、身体、集会结社自由，要求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此外《解放日报》还发表了全国各地、各党派人士、学术界、新闻界、大学师生等关于成立联合政府而召开的各种座谈会，讲话和文章，如民主同盟发表的《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华北联大座谈时事，人民起来管国事》，《成都 2000 余人国事座谈会，主张取消一党专政，赶快成立联合政府》等。

1945 年《解放日报》发表的新年献词，题目是《争取胜利早日实现》，在分析国内外的形势以后，提出了我党的任务：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组织沦陷区人民，援助大后方人民，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1 月 25 日刊登周恩来同志飞往重庆，提议召开党派会议。国民党政府毫无诚意，2 月 17 日《解放日报》发表消息，向国人公布：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周恩来同志返延安；国民党当局依然坚持一党专政，反对民主的联合政府。以后陆续发表了各地区人民和各党派的呼吁：民主同盟宣言，要求尽早成立联合政府；鲁南各界通电全国，要求建立联合政府；重庆文化界巴金、陶行知、曹禺、冯雪峰等 312 人发表《对时局进言》；昆明文化界闻一多、吴晗、楚图南等 342 人发表《关于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昆明四万学生大示威，反对独裁，要求成立联合政府。

宣传贯彻党的“七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解放日报》报道了大会的开幕、闭幕盛况，发表了社论，以及会后广大干部学习、贯彻“七大”文件的情况。这次会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24年的历史经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制定了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领导人民胜利前进。

大会开幕新闻（5月1日）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举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结全党，团结全民族，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新闻导语说明了大会的任务：“中国共产党4月下旬在延安举行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最重要事件之一。这次大会的任务是：在中国反攻的前夜，团结全国人民，挽救由于国民党政府错误政策所造成的时局危机，彻底打败和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并摘要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开幕词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林伯渠等同志的演说。5月2日以6个版的篇幅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同志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接着发表社论《中国人民胜利的指南——读毛泽东同志的〈论联合政府〉》。社论论述了中国建立一个“真正适合中国人口最广大成分的要求的国家制度”，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也就是1924年以后为孙中山先生所主张的、1927年以后为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所抛弃的新民主主义即新三民主义的道路，它是抗战胜利、建国成功的唯一道路。社论着重说明：毛泽东同志报告中解决了政权的具体形式，是“联合政府”，并说明中国共产党为促进联合政府的实现所采取的立场、态度和诚心。社论最后号召：“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给了全国人民以胜利的指南，我们要细心研究这个报告，遵循他所指出的方向，向胜利前进！”

5月9日以四个整版的版面全文刊登了朱德同志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

6月14日发表了大会胜利闭幕的消息，消息综合概括了50天的会议和收获，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作的政治报告、朱德同志的军事报告，刘少奇同志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以及政治决议案，军事问题的决议和新的共产党章程。选出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同志在闭幕词中要求代表们把大会的民主精神与团结精神，带到全党的各个工作部门中去，向全党与全国人民宣传大会的路线，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战斗的彻底胜利，坚持民族的独立自由，坚持联合政府，坚持制止内战。毛泽东同志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加上团结一致的奋斗，就一定会胜利！”同日，发表社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社论提出了“七大”的4个历史标志。第一个历史标志，是通过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报告，社论说：“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就是人民的路线。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详细规定了中国人民的战斗纲领，这是新民主主义的宪章，其重要性不待指出就可明白。”实行人民的路线，实现宪章，主要决定两个问题：即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态度和对农民的态度，社论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对这两个问题的正确态度：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错误路线进行必要的斗争，在对其劝说无效时，坚决给以反击；对于占人口80%的农民，“大革命以来三次革命战争的经验证明：如果革命运动没有与农民结合起来，那么，哪怕有其它人民群众的参加，革命队伍是没有力量的，是可以轰轰烈烈一时而不能持久的，是在敌人一个或几个严重打击之下就要垮台的。反之，如果革命运动与农民结合起来了，那就成了任何反动派所不能摧毁的力量，就有了粮食，有了军队，有了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再三再四地强调农民的重要性，指出农民是工人的前身，

工业的市场，军队的来源，现阶段民主政治的主要基础和现阶段文化运动的主要基础。”社论也论及要发展工人运动与城市运动，团结知识分子。社论提出“七大”的第二个历史标志是：制定了人民军事路线的完整体系，即朱德同志军事报告中的主要部分。八路军和新四军，没有城市作依靠而依靠乡村，没有政权作依靠而依靠自己所创造出来的农村根据地，经常以弱敌强，以寡敌众，而能取得胜利，就是因为他是彻头彻尾的人民的军队，彻头彻尾与人民结合在一起。今后遵循大会方针，与人民更加亲密结合，成为更完善的常胜的军队。“七大”的第三个历史标志，是新的党章的制定，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是我党组织路线的总结与发挥。社论着重论述了做一个共产党员，对于人民只有特殊的义务，没有特殊的权利。“共产党员，首先是人民的勤务员，然后才是人民的领导者，首先是人民的学生，然后才是人民的先生，人民是自己解放自己。”社论对党内生活中个人与集体、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也进行了阐述，强调批评自我批评，特别是领导机关要时常听取党员的批评意见。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相结合，对党的进一步团结与进步，将有极其重要作用。社论提出的第四个历史标志是毛泽东思想被全党一致承认为党的指导思想，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这次大会，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正确纲领和策略。指出在抗战即将胜利的形势下，党的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提出全党在争取建立联合政府的同时，还必须警惕内战。大会批评了党内的错误思想，系统地阐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提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

我批评的作风。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内生活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大会选举产生的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

《解放日报》以“七大”精神为指针，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从各个方面组织了宣传报道。

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15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刊登了《美苏英中四国宣布日寇接受无条件投降》的重大新闻，经过八年艰苦抗战的中国，在这历史的转折点，全国人民渴望实现和平民主建设，中国共产党为能够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奔走呼号，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千方百计地维持其独裁统治，阴谋发动内战，妄图消灭共产党。于是，国共之间、人民与统治者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和平与反和平、民主与反民主、团结与分裂、建设与破坏的殊死斗争。在这场极其复杂尖锐的斗争中，《解放日报》在停刊前（1947年3月27日停刊），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机关报的光荣使命。

《解放日报》在这一时期有关国内政治方面宣传的特点，主要是：新闻力求迅速及时，比较快地反映出复杂尖锐的斗争现实，使广大读者了解国内政治形势，辨别革命与反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社论及时有力，每一重大事件，无不立即发表社论，社论内容充实，不讲空话，是非分明，说理透彻，有很强的战斗力和鼓动性。

宣传和平民主团结建设

（一）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

1945年8月27日，《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宣言说：抗战结束后，全国和平建设的时期已经来临，中国共产党认为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美苏英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宣言提出了六条紧急措施：

①承认中国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

②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他们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

③严惩汉奸，解散伪军。

④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

⑤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

⑥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的无拘束的普遍的国民大会。

《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新时期的路标——论中共中央关于时局的宣言》。社论论述了宣言是当前过渡时期的最迫切的行动纲领，只有实现这一纲领，才能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基础。社论并指出宣言提出了行将到来的和平建国时期的总方针，那就是和平、民主、团结，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和平建设时期的基

本口号。

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得到全国各界的拥护，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迅速实现六条主张，《解放日报》陆续发表有关消息。

（二）报道毛泽东同志赴渝谈判签订双十协定

1945年8月29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为商讨团结建国大计 毛主席飞抵重庆》的新闻，这是一条牵动千万人心的新闻。无论是解放区还是国统区，人们都关心国家事态的发展，《解放日报》及时地发表毛主席在重庆的活动：毛主席在机场上发表谈话的原文：“本人此次来渝，系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之邀请，商讨团结建国大计。现在抗日战争已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望爱国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本人对于蒋先生之邀请，表示感谢。”蒋介石宴请毛主席；毛主席在重庆发表谈话，希望谈判有良好结果；毛主席答路透社记者，中国需要和平建国；毛主席日内返延安，重庆各界举行欢送会，席间毛主席致词，大意是：此次国共会谈，为全国人士所关注，所谈问题，不是一、二党派问题，而是与全国利害相关。今日情势，“和为贵”，双方除和平商谈外，则无其它途径。中国需要和平建设，过去双方会谈，有若干困难，将来恐亦难免不无困难发生，但我们既已立定和平、民主、团结为原则，则一切困难必可逐渐解决。到10月12日，一版发表了毛主席返回延安，延安各界热烈欢迎毛主席的消息，同时在一版上全文公布了国共双方在10月10日签订的《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反映了谈判的实际，对于双方商谈的问题，意见一致的，明确写出取得一致意见，意见不一致的，则将双方分歧意见如实

写入。如第一条关于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第二条关于政治民主化、第四条关于人民自由问题，都取得一致意见。第三条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第五条关于党派合法问题、第六条关于特务机关问题、第七条关于释放政治犯问题、第八条关于地方自治问题、第九条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第十条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第十一条关于奸伪问题、第十二条关于受降问题，均未达成一致意见。有的问题，留待政治协商会议继续商谈，有的问题，中共提出解决的意见，政府未予接受，有的虽表面接受，但无实施办法。

经过商谈而签订的双十协定，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一方面认为取得了“重大收获”，一方面指出必须继续奋斗，方能争取最后胜利。《解放日报》在国共商谈期间，针对问题的实质，充分发挥社论的作用，先后发表的社论有：《前进或是后退》、《要求国民党当局履行“还政于民”的诺言》、《为了国内和平和远东和平，起来奋斗啊！》、《国共谈判的成果与今后的任务》。双十协定公布后，又发表了题为《必须实现双十协定》的社论，社论在充分肯定双十协定的成果后指出：“国共会谈虽已确定了和平建国总方针，但就今天的情况来看，要由纸上的协定，变为现实的东西，中间还横着许多严重的障碍。解放区在抗战初期，就实行民主政治，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坚持八年敌后抗战，解放区民主政府应得到承认。但直到今天，仍未解决。更令人痛心的是国民党对各解放区（河南、山西、山东、浙东等地）的进攻，仍在继续；就大后方而言，还没有符合人民要求的民主措施；在国民党当局已“收复”的地区，卖国汉奸依然横行，广大人民没有自由。国共协议中所规定的无一条成为现实。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和各党派人士，以坚定的信心和百折不挠的毅力，把国共会谈中已获协议的条文，付诸实施，并争取未获得协议的问题，达到完满解决。特别是关于政府承认解放区的问题，是保证实现和平建国方针的重要环节。

在毛主席赴渝期间,《解放日报》还发表了重庆人民热烈欢迎毛主席的消息和通讯,表达了重庆人民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真挚情感。各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和毛主席的故交,先后欢宴毛主席,其中有民盟常委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黄炎培、冷御秋、张申府以及监察院长于右任、中国保卫同盟孙夫人宋庆龄等等。并发表了柳亚子写的诗《赠毛润之老友》:“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堪格,遍地劳民遍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还摘要发表许多群众给重庆《新华日报》的来信,一群女工的信上说:“我们多年来一直过的不是人过的生活,老是被别人当牛马看待,我们想,总有一天会遇到救星的,从报纸上,从许多朋友口中,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救星,就是您……”一位作家在信中回忆他在粤北一个小村里为一群心情黯淡的青年讲《论持久战》时的情景:“假如20世纪还有奇迹的话,这本书对人们的鼓舞正是名符其实的奇迹。青年人的眼睛发出光来,疲惫的振奋了,消极的积极了,怀疑的坚定了……在我们时代有一个毛泽东是幸福的……”一个署名“小康家庭”的人,给《新华日报》送去法币1万元,说是给毛主席买鱼肝油的,他说:“我们既非共产党员,又非无产者,可真是小康之家。也就因为这一点,才足以证明爱戴他的人,除上述人外,还有我们这一类的人。我们认为,只要他活着,中国就总有完成人民愿望的一天。”

(三) 宣传政协会议的斗争与成果

政治协商会议是国共两党继双十协定之后围绕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又一场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和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的大力支持下,政协会议取得一定成果。《解放日报》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和会议前后(1946年1月10日开幕,1月31日闭幕)作了较为详细的报道。

中共代表团成员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吴玉章、王若

飞、邓颖超、陆定一，1945年12月16日飞往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抵达重庆后，即刻提出希望在政协会议开幕以前，国民党军队立即停止向解放区进攻，并且向政府代表提交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书面建议。1946年1月3日，《解放日报》刊登国共双方交换关于停止内战文件的新闻，国民党政府提出三点要求，其中之一是国共双方各派代表一人，会同马歇尔将军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新闻援引延安权威人士称：“现在全中国与全世界的迫切要求，是中国首先立即停止内战，实现民主团结，凡在此原则下的一切办法，吾人无不乐于商讨，对于马歇尔将军与其它公正方面之参与商讨，我们表示欢迎。”同天并刊登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访问马歇尔的消息。

1月6日《解放日报》以1又1/3的版面发表长篇社论《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社论论述了政协会议的重要性和中外各方对政协会议的重视，而国民党却不打算在这个会议上解决问题，这在蒋介石元旦演说中，已被完全证实。社论说，人们都希望从他的演说中，听到他对决定今后历史方向的政协会议的意见，但蒋的演说，虽然涂着很厚的和平民主词令的脂粉，却一字不提政协会议，他实际上是拒绝了杜鲁门总统和三国外长关于中国问题的建议，拒绝了付与政治协商会议以任何权力，连讨论召开国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也被剥夺了，因为国民党未经任何协商就在去年11月宣布今年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蒋氏演说也再三肯定了这一点。蒋氏坚称：“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不是和平民主，而是他的“军令必须统一”。他也说内战可以停止，但不是无条件停止，而是“必须首先恢复交通”，就是说，首先恢复他扩大内战的便利条件。社论指出：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以前，人们不得不首先正视、审查与解决根本分歧：“一方面，是中国一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与中国全体人民的要求，是美国、苏联、英国三国人民与政府经过杜鲁门总统与三国外长声明的愿望，这就

是经过政治协商会议来无条件地停止内战，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由此而实现中国的统一；在另一方面，则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内的少数军阀、党阀、财阀的企图，这就是不让政治协商会议解决任何问题，继续保持独裁，并以继续内战为继续独裁的后盾。前一种意见得到全中国与全世界人民的支持，直到蒋氏演说发表以前，也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口头支持，但是现在蒋氏已经起而攻击这种见解了，分歧是已经表面化了。社论戳穿了蒋介石的根本意图：“只要把中国的一切事情交给蒋氏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去独裁，只要人民放弃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对于这个独裁集团的一切军令政令都无条件服从，那么中国就可以统一，而中国在这个独裁集团统一以后，自然就可以赏赐人民以和平建设，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等等。如果不接受他的独裁计划，则中国就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就永远要内战，要独裁，要穷困，要被侵略等等。”社论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经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中国究竟能否达到民主呢？第二，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中国能否达到统一呢？社论引证大量事实，对两个问题都给予否定的答复，有力地驳斥了蒋介石的根本论点。社论最后指出：蒋氏的“统一”，既不能使中国得到民主，也不能使中国得到统一，“相反地，只有经过全权的政治协商会议，无条件停止内战，结束蒋氏一党专政，军事专政与个人专政，改组国民政府为一切民主分子享有广泛公平和有效的代表权之民主联合政府，中国既能够得到民主，也能够得到统一”。

1月11日，《解放日报》公布了国共双方颁发停战令，命令各军种立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停止中国境内一切军事调动，由政府、中共、美方代表参加，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美方代表马歇尔。

同天，《解放日报》还刊登了政治协商会议开幕的消息。刊登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开幕词，蒋介石宣布了政府的四项决定：实施人民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推行地方自治；释放政治犯。

中共代表周恩来致词，表示中共代表愿以极大诚意和容忍，与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共商国事，努力合作。各民主党派代表沈钧儒等致词希望实现持久和平，完成建国大业。次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和平实现》，评述了国共两党停战命令的颁布，受到全国人民热烈的庆祝，并指出：和平已经开始了，但和平还不巩固，还会有很多波折，必须在国共两党与其它民主党派的通力合作下，继续前进，以赢得和平民主。

经过 20 天充满斗争的商讨，政协会议在 1 月 31 日闭幕。会议一致通过了政府组织、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修改宪法草案原则等五项决议。在会议期间，重庆万余学生大游行，向政协会议提出 7 点要求：严格执行停战命令，永远停止内战；实现蒋主席 4 项“诺言”；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国大代表必须合理产生；党派一律退出学校，实行讲学自由；政协会议没成功以前不许闭会；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放弃党派私见。会议闭幕后，延安市召开庆祝大会，两万余人集会，庆祝和平民主新阶段，会上朱德总司令发表讲话，指出会议的胜利，是全中国人民和一切民主力量奋斗的结果。并号召解放区人民在政治、军事和经济建设上，都要力求成为全国模范。《解放日报》还刊登了重庆各界评论政协会议成就的消息，黄炎培说：政协会的各种协议，只是一个精美的图样，要想把房屋造好，尚待今后努力。沈钧儒认为应重视地方自治，他说：从中央集权来谈民主，等于天女散花，高度的地方自治，才是生根开花。此外，《解放日报》还刊登了来自各地的通讯：子冈写的《和平颂——北平通讯》、何微写的《勇敢地走向明天——太岳区各界庆祝停战大会特写》、则奇写的《下了停战令后的重庆——重庆通讯》等等。

（四）悼念为和平而牺牲的“四八”烈士

1946 年 4 月 8 日，参加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政协宪法草案审议小组委员会的中共委员秦邦宪（博古）因飞机失事，不

幸殉难。《解放日报》以大量篇幅刊登了中央举行的悼念活动和悼念文章。

当时，政协会议已经闭幕，在宪法审议会上，蒋介石政府顽固地维持他们那独裁的宪法，王若飞与秦邦宪坚持为人民争和平、民主，一个多月过去了，宪法草案还不能达成协议，王、秦决定回延安向中央请示。一架 C47 运输机由美军上尉兰奇等 4 人驾驶，从重庆起飞，飞过西安后，天空阴雨，在海拔 2000 多公尺的山西兴县黑茶山上触山失事，机毁人亡。同机回延安的还有刚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的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著名老教育家黄齐生、青年参谋李少华及叶挺夫人李秀文、子女叶扬眉、叶阿九等人。中共中央当即成立了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 26 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解放日报》发表了《痛悼死者》的社论，指出王若飞、秦邦宪等是为和平民主事业而死的，为坚持政协全部决定——特别是宪草原则协定、坚持停战协定、坚持整军协定而死的！这三大协定，是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其彻底实现的。中国法西斯派为把中国重新引向内战，引向独裁，用一切方法破坏这三大协定，而王若飞、秦邦宪等同志为保护这三大协定而奋斗，鞠躬尽瘁，为此奔走而死。社论说，他们虽然死了，更有无数的人在继续他们的事业，这就足以证明中国人民必将战胜一切！

烈士遗体 18 日运回延安，第二天延安 3 万人隆重追悼并公葬诸烈士。《解放日报》当天以 7 个整版（以后连续一个多月发表悼念与回忆文章）刊登了大会新闻、特写和悼念文章，规模之大，是《解放日报》从创刊到停刊仅有的一次。延安万人广场周围，挂满孝幛和挽联，毛泽东同志的挽联是“为人民而死 虽死犹荣”，并写了悼文《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朱德同志的挽联是“为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而牺牲”，也写了题为《完成死难者所留下的事业》的悼文；刘少奇同志的挽联是“把给予我们伟大死者的悲

痛变为积极的力量，来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悼文的题目是《痛悼我们的伟大的死者》。远在重庆的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陆定一等都写了悼念文章。林伯渠、陈毅、刘伯承、蔡畅、徐特立、李鼎铭、贺龙、张云逸等多人写了悼文。来自国统区的悼文、悼诗和唁电很多，其中有郭沫若、沈钧儒等人，此外，《解放日报》还刊载了全国各地举行追悼“四八”烈士活动的报道，充分显示了“万众哀悼，誓承遗志”的悲壮气概。

《解放日报》的总编辑、副总编辑余光生、艾思奇、陈克寒联名写了题为《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的文章，缅怀博古在领导《解放日报》中的光辉业绩，其中有这样两段：

“他常对我们说：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在我们党领导下，已经建立了很好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我们还必须有很好的人民的新闻事业。为了这终身事业，他竟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然疾病之时，亦倔强地拒绝休息。”

“几年来博古同志日益熟练地把毛主席的思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例如报纸与群众结合，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职业记者和广大通讯员结合的思想，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用事实和说理进行宣传，使我们的宣传有驳不倒的论据的思想，进行宣传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思想……”

文章还写了博古办报既注意政治方针，又讲究写作技巧。文章最后总结性地概括了博古的思想和作风：“他的忠心耿耿，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他的认真负责，坚决机敏，勇于进取，精通业务，好学不倦的作风，以及指挥若定，谈笑风生的风姿，将永远留在我们记忆里。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且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的同志们的最杰出的导师，我们要永远向他看齐，向他学习。”

彻底揭穿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

（一）戳穿蒋伪合流进行内战

《解放日报》在公布日寇投降的同一天，在头条前发表了《新华社记者揭破蒋伪合流反对中国人民的大阴谋》的述评性新闻。记者在戳穿南京伪政权与国民党政权过去在对待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以后，并列举事实，说明现在伪蒋合流的罪恶勾当：8月11日，蒋介石给所谓“地下军”及各色伪军下令，要他们“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记者尖锐地指出：“试问要伪军维持的那种‘治安’，不就是伪军在日寇指挥下维持了八年的那种‘治安’吗？要伪军‘保护’的那些‘人民’，不就是日寇和伪军一向‘保护’的那些奴事日寇，鱼肉人民，为非作恶，发财致富的那些汉奸卖国贼吗？总之，日本人倒了，但是封建、买办、法西斯政权的‘治安’必须维持，汉奸们的权益必须‘保护’——这就是蒋介石命令各色伪军‘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真正意义，而这就是给各色伪军‘趁机赎罪——努力自效’的具体任务。”记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证明蒋介石命令所在，是在鼓励各色伪军继续其过去在敌之统治下的那种反对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滔天罪行，以便于他的大军能够从峨嵋山源源东下，及时赶到目的地，然后协同伪军向解放区人民及其军队举行一致的进攻。

接着，记者又举出同一天蒋介石给八路军发出的所谓“命令”，进一步揭破蒋介石的阴谋：蒋介石给八路军各部队的“命令”，是“就原地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记者痛斥道：“照他的意思，伪军比八路军还好些，八路军比伪军还不如些，所以他把‘维持治安，保护人民’的责任交付伪军，却叫八路军‘驻防待命’，就是说：不许八路军打日寇，打伪军，只许在那里等着，

现在被敌伪打，将来被蒋介石打。”最后，记者明确指出：蒋介石这种认贼作父，视民如仇的想法，中国人民已经认识清楚了。蒋介石在同一天里给八路军和伪军下的两个命令，就是他背叛祖国，发动内战的动员令。但是中国已经喊出了响亮的口号：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坚持制止内战，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在这些口号下，蒋介石的阴谋将注定失败，中国人民一定胜利！

《解放日报》披露蒋介石庇护并重用汉奸头子，利用他们进行内战的种种事实。1945年8月19日《解放日报》采用了一条美国合众社的消息，消息这样写道：“八年内日本豢养训练与装备的中国伪军，其中有许多已决定与重庆合流。国民政府委任华北绥靖督办门致中为‘北平绥靖司令’，吴逆化文为‘济南绥靖司令’，许多较小的伪军头子为‘挺进司令’。”合众社继称：政府任命他们，是因为第一，在那些地区中，如像北平、天津、青岛、徐州等地，几乎没有一个中央政府的军队；第二，他们仇恨共产党的态度，为重庆所欢迎，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可以在中央政府军队到来之前，防止共产党夺取这些城市。而伪军的态度，是由下述理由决定的：一、其中大多数头子为投机分子，当今天他们的主子投降时，最理想的主子就是蒋介石；二、许多伪军原来就是中央军队投降日本的；三、他们仇视共产党军队，因为后者经常进攻他们；四、他们归返国民党政府，可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获得更多的金钱。

《解放日报》还援引合众社另一报道：伪蒙傀儡政府的八个首领德王等巨奸在渝逍遥自由，穿着长绸衫，吸着美国烟，几乎每天看电影，吃重庆能找到的最好食品。

国民党政府不仅包庇重用敌伪军队，而且公然联合敌伪军队向解放区进攻，屠杀抗日军民和共产党干部。对此《解放日报》不断在报纸上进行揭露：太原日寇叫嚣“协助晋绥军剿共”；济南敌

伪军成立“剿共司令部”，声称“奉命进攻八路军”。济南的敌特务机关竟挂上国民党宪兵队的招牌；新乡敌军以坦克大炮进犯解放区封丘县城；蚌埠敌寇被邀“共同维持秩序”，杀人投尸淮河；唐山敌寇侵陷开平；正太线敌伪军不断出犯，并称“奉命剿匪”；津浦胶济沿线敌军连续出扰，到处烧杀；青岛敌伪残杀市民。到1946年上半年，国民党军队伙同敌伪军队向解放区进攻，更为变本加厉。《解放日报》揭露：胡宗南与敌寇订“剿共协定”，收编豫皖3万敌寇；国民党军联合伪军“清剿”浙东余姚等地；大同闫日伪合一，血洗左云及花园屯等地，屠杀当地干部群众300余人等等。

全国人民对蒋介石这种假借敌伪之手进行内战的恶行，十分愤慨，《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汉奸国贼必须严惩》、《严惩战争罪犯》、《立即收缴在华日军全部武装》、《反对利用敌伪残害同胞的悖谬行为》，社论义正辞严地指出：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为挽救危亡，同敌寇汉奸进行生死搏斗，牺牲无数生命，才获得今日的胜利，岂能容许背叛祖国、出卖民族的大汉奸们超脱法外？更岂能容许敌寇伪军屠杀人民、充当内战先锋？

《解放日报》上还不断发表各地人民愤怒抗议国民党政府庇护敌伪的消息。1945年10月24日发表的《大后方人民反对庇护汉奸向国民党当局抗议呼吁》，就是其中一则，其中援引成都文化界600余人发表《对时局的呼吁》中的论点：“今当日寇投降才吐一口气，大部分国土还被敌伪军全副武装占领着的时候，我们耳边听到的是：公然请敌寇“维持治安”，请伪军“收复失地”，反之在敌寇投降后，我们却没有听到过一字一语关于惩处战犯、惩办汉奸的命令和声明……我们坚决反对内战，制造分裂，尤其反对借敌伪之手来进行内战。”成都民主期成会在《对时局紧急宣言》中说：“汉奸卖国求荣，伪军为虎作伥，倘使对他们容忍，何以对得起已死的英灵？”对于“曲线救国”的谬论，各方也加以揭露和

驳斥：早在日寇投降前7月间，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就为大汉奸庞炳勋、孙殿英等辩护，说他们是“不得已而投降”；负责接收京沪区司令官汤恩伯宣称：“汉奸有不少协助中央者”。昆明各界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的通电中指出：“汉奸国贼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膺惩，反而正在计划伪装自己，想摇身一变为“曲线救国英雄”，藉以保存其法西斯余力，企图再起，扰乱和平。”著名史学教授吴晗在所写的文章《惩办汉奸国贼私议》中，引据历史资料，说明中国历朝对汉奸国贼都极端严厉，从不宽容姑息，只在“当局本身也犯了被惩者的同样过错时，才有例外。”

（二）报道蒋介石加紧内战部署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便加紧内战部署。随着政府军队的调遣，内战部署，逐步升级；对此，《解放日报》注意及时揭露。1945年日寇刚刚投降时，蒋介石主要是利用支使敌伪军队，防制共产党，进攻解放区，到1946年，形势有所改变，蒋介石、陈诚等国民党军方头子分赴各地，频繁奔波，所到之处，战云密布。例如：蒋介石2月11日飞上海，15日去南京，16日召开军事会议，21日军事会议闭幕，22日飞杭州，25日返重庆，然后飞贵阳，赴成都，飞陕西，抵汉口，赴沈阳、长春，返回北平……亲自指挥部署内战。为加强反共反人民的欺骗宣传，蒋介石在牯岭亲自主持召开宣传会议。白崇禧在汴郑“训话”后，飞抵济南，检阅军队；然后飞东北，返北平，召开作战会议，再赴徐州检阅军队。陈诚在苏北“鼓舞士气”，到苏州检阅“攻击演习”，然后视察徐州、郑州、北平，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此外，好战分子何应钦以及谷正纲、李品仙等人，也在各地频繁往来。就在这紧锣密鼓的筹划中，把大批政府军队运送到东北、华北等地，以扩大对解放区的进攻。1月10日停战命令发布后，到5月初，蒋方调动军队逾百万。空运军队到东北，西安至洛阳的兵车、坦克频开不绝，北宁路上兵车辚辚，关内关外蒋军调动频繁，美式卡车巡逻在唐山市

郊，川江轮船改为军运，水陆空载运军火急促纷忙……对蒋介石等人的行踪和活动，《解放日报》及时报道，供人民思考。

《解放日报》还不断报道全国各地蒋军加紧备战的实际行动，以提醒国人内战将要爆发。同蒲线胡宗南军及闫锡山军强迫 50 万人修筑碉堡；国民党军伙同伪军在胶县与即墨之间，修碉堡挖战壕架设电网；平泉蒋军赶筑内战工事；晋豫陕三角地区蒋方进行内战部署，安邑等地进行野战实弹演习。与此同时，蒋军还大举“征兵”，准备内战。济南实行强迫军训，用兵工厂等名义招工，骗人当兵；平津保及东北各地一次各抽丁 8 万人，《解放日报》对此发表短评《屠夫的命令》，短评指出：蒋介石在双十节公布了全国征兵的命令，这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鼓励支持下，对于整军方案的公开撕毁，对全国人民肆无忌惮的挑衅，是决心大打，决心全面分裂的又一明证。一句话，是一条屠夫的命令。但是蒋管区人民，决不愿当蒋介石扩大内战、残杀同胞的工具，北平壮丁 10 天之内有 10 万人逃役，天津蒋方实行“亦征亦募”，也仍然无人上当。短评号召蒋管区同胞，行动起来，反对屠夫命令，反对蒋介石长期全面的内战政策，配合解放区军民的坚强自卫，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三）揭穿蒋介石全面破坏政协决议

国民党政府在政治协商会上签定了五项决议，蒋介石在开幕式上许下了“四项诺言”，然而他们的实际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解放日报》对蒋介石的骗人把戏，给予无情的揭露，使全国人民认清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的真面目。

政协闭幕后，国民党在 3 月 1 日至 17 日召开了二中全会，《解放日报》报道了这个旨在推翻政协决议、维持其一党专政的会议，会前报道对这个会冯玉祥拒不参加，各民主党派纷纷谴责。会后报道中共代表周恩来发表重要谈话，指责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违反了政协协定，对违反人权事件（指较场口特务殴打民主人士

事件)一字未提;对结束训政,走向宪政,全无明确态度,妄想利用各党派承认国大,动摇民主宪法的产生,国大组织法迟迟不修改;军事决议违反整军方案,国民党军队不遵守停战命令……,他号召全国人民、盟邦朋友、各党派朋友一致起来,监督政协决议的实现。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发表谈话,表示国民党破坏政协决议,民盟不愿贸然参加政府,他说:实现民主,是不容易的事,前途困难。要注意两个字,一个字是“打”,较场口一类是小打,对解放区则是大打;另一个字是“骗”,政协会四项诺言尚未实现就是骗,骗也有大骗小骗。我们要求民主实现,就要看到将来有更多的大打小打和大骗小骗。只有不怕大打小打,拆穿大骗小骗,民主才有光明大道。民盟张东荪在北平发表谈话,反对国民党内法西斯派推翻全部政协决议的阴谋。闻一多、吴晗等四教授发表文章,要求立即释放政治犯。

3月1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评国民党二中全会》,社论说:在法西斯分子的操纵下,国民党二中全会的最突出的结果是通过了准备推翻政协会议关于宪法原则决议的决议。政协会议所决定的修改宪法原则,乃是今后中国将继续是一个独裁国家或改革为一个民主国家的根本关键,因此是中国民主派与法西斯派政治斗争的焦点。如果这些原则被推翻,则政协会议的其它决议,政府的改组,国大的召集,乃至停战整军等等协定,都将为法西斯派在独裁政府中撕得粉碎。社论指出:二中全会通过的五项决议,其目的就是推翻政协所决定而为全国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的民主原则,而继续坚持五五宪草中的独裁原则。法西斯派为了坚持独裁,不能不首先反对中国民主力量的中坚中国共产党,因此,国民党二中全会通过了许多向共产党挑战的决议。二中全会全部文件中,竟没有一个字说到国民党要执行整军方案,事实上至今也没有迹象表明国民党要执行这个方案,反而藉口共产党“障碍”了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法西斯分

子在国民党内关系上，利用二中全会对一切非法法西斯分子实行横暴的打击与排斥，借此便于实现法西斯的独裁和准备内战的阴谋。历史纵然可能因为法西斯分子的暂时猖獗而引起严重曲折，但是在人民的团结奋斗之下，历史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判决法西斯分子的不幸命运，证明国民党二中全会无论从国民党的历史上说或从中国历史上说，都将是一个可耻的失败。

二中全会以后，国民党又利用国民参政会进一步破坏政协决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长篇政治报告，《解放日报》指出：报告真正的“要点”只有两个，一是撕毁东北停战协定，从新向全国宣布进行大规模的内战，一是撕毁政协决议，从新向全国宣布独裁。《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著名社论《驳蒋介石》，社论以犀利的笔锋，痛快淋漓地驳斥了蒋介石报告中的两个“要点”，戳穿其法西斯的本质。社论最后写道：

“国民党内法西斯一开始就反对停战协定，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反对整军方案，而这些成就也无一不是战胜法西斯反动派的抵抗而获得的，所以法西斯反动派在事后力图推翻这些协定，是丝毫不足为奇的。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过去一个时期在表面上曾经表示支持这些协定，而现在却亲自站到法西斯反动派的立场上来攻击和撕毁这些决定了。法西斯反动派觉得这种反动可以得到某种国际的援助，因而在东北则大量增兵，放肆地扩大战争，在全国其它地方，例如冀中、苏北、山西、豫北等地，也正在进行着重大挑战，不但不恢复交通，而且公然增修碉堡，不但不解散伪军，而且公然继续收编伪军，在山西还继续使用武装的敌军，不但不进行任何复员，而且还公然宣称复员就是动员的开始，宣称几个月以后就要进行全国的内战，完全不把北平执行部和三人委员会放在眼里。在政治上，则放肆地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继续在全国各地实行恐怖，阴谋秘密处死重要的政治犯，公开表扬万恶的特务机关的“丰功伟业”，特别是公开要求在国民大

会通过独裁的宪法，使中国的局面恢复到今年1月以前的状态。这个局面，不能不唤起全国人民的重大警觉。中国人民不能不在此严重时期警告蒋介石与法西斯反动派：你们过去被迫接受停战协定、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和整军方案，以为主要的是由于国际的压力，只要这个压力暂时减轻了，你们就又可以故态复萌。你们这想法是错了，不但是因为你们没有真正认识国际的大势，而且是因为你们没有足够的估计人民的力量。中国人民已经决心为反对增兵东北，为制止东北的内战和其它地方的内战，为坚持东北人民与全国人民的民主权利，为坚持结束独裁训政即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为坚持政协决议的百分之百的实现；为坚持民主的宪法，为坚持国民党军队的彻底缩编与彻底国家化，而准备作不屈不挠的奋斗。凡此一切，都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关，人民绝对不能让步。中国的和平与民主，根本上是中国人民奋斗得来的，不是也不能是任何中国人或任何外国人所恩赐的。而奋斗得来的东西，只有经过他一定能够经过继续的奋斗来加以保持和巩固。如果法西斯反动派非要反动到底决不甘心，那么中国人民已经知道应该怎样正确应付的了。”

这篇社论，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响，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纷纷表示拥护。

1946年11月15日，蒋介石不顾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反对，擅自召开伪国民大会，对于这种违反政协决定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会议，民盟等许多民主党派也拒绝参加，邵力子辞掉国大筹委会的职务，郭沫若否认自己是“国大代表”。《解放日报》以《蒋记国大拾零》为题，连续报道伪国大开会的实况，有的标题是《乌烟瘴气》，有的则为《乱七八糟》，真实记录了伪国大开会时发生的丑剧和闹剧。

至于蒋介石导演的“改组政府”，则更是一手包办的骗人把戏。《解放日报》早在1946年4月1日，就登载了王若飞代表中共代

代表团发表的声明：“鉴于政府四项诺言迄未切实履行，国民党二中全会造成违反政协决议之混乱情形尚未澄清，宪草修改原则之争端未解，国民代表名额总数政府又提修改之议，而中共应有之国府委员及行政院政务委员之名额，政府亦未作最后之肯定，在此种情况下，中共目前实无提出国府委员之可能。中共代表团声明：只有在上述各项问题确定议决后，中共方能考虑参加国民政府及行政院之人选。”同时，《解放日报》也刊登了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发表的声明：国民党如不遵守政协决议，拒绝参加政府。

至此，政协决议为蒋介石全面撕毁的事实，大白于天下。

抗议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镇压

（一）反映沦陷区人民对“劫收”的仇恨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派大员到沦陷区接收，结果接收变成劫收，特务横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解放日报》刊登并转载了其它报刊有关这方面的消息、特写，如《秀丽的江南竟成特务世界》、《江南天黑了，国民党贪官酷吏勒索钱粮，与敌伪合流鱼肉乡民，捕杀抗日分子。》等等，其中《北平情况非常混乱》一文，比较深刻地写出了人民的沉重心情，下面摘录一段：

“平津市民，当日本投降之初，对于国民党中央大员之来临，抱着渴望，及至此等大员来后，渴望变为希望，及国民党军队到达后，希望就变为失望，到国民党的接收工作开始后，就由失望变为怨望，又由怨望变为仇恨。国民党大员到了平津，第一件事是抢汽车汽油，第二件事是拉拢私人，抢抓机关，强占地盘。因此，平津的每一个伪机关、工厂，由国民党各系统派去的接收代表，均有四、五个之多，这四、五个人像强盗一样，互相争夺，抢着把机器物件等搬走的搬走，变卖的变卖，以至互相打架。及至搬卖一空，就将大门一封，无人过问。所以国民党所接收的工厂，

大部都已停工。至于伪机关，被国民党接收后，换了新贵新官，但是这些新贵新官，却是原来另一伪机关任职的汉奸，互相调来调去，而新贵的行为，比被撤换的人来得更糟，因为他们与中央大员相识，所以敢于耀武扬威……”

（二）历数蒋介石血腥镇压人民的罪恶

中国人民要和平，要自由，要民主，要团结建设，蒋介石则要内战，要独裁专制，要分裂破坏，人民怨声四起，蒋介石进行血腥镇压。《解放日报》对此，给予揭露、斥责、抗议。有的采用综合系列的报道形式如《政协以来蒋介石蹂躏人权血债录》，连续发表了5篇，即《蒋介石给人民的人身“自由”——殴打、逮捕、监禁、屠杀》、《蒋介石给人民的思想、信仰、言论、出版“自由”——统制、查禁、捣毁、焚书》、《蒋介石给人民的集会、结社“自由”——捣乱、解散、打杀、篡夺》、《蒋介石给人民的教育、学术“自由”——党化、奴化、监视、打杀》、《蒋介石给人民的居住、通讯、迁徙的“自由”——检查、封锁、连坐、警管》等等。对于重大的血腥镇压事件，《解放日报》采用重点报道、连续报道的方式，把整个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告诉读者。现将一些重大事件的连续报道，按见报时间顺序，综合摘录如下：

①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震惊中外的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的大惨案。《解放日报》对此事件从11月29日到12月26日连续发表了24条消息、通讯还有社论。昆明学生的反对内战活动，始于11月25日，当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和英专等4校同学和部分市民6000余人，在校内广场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军警包围了联大。在钱端升教授讲演时，特务鸣枪恫吓，与会者镇静如常；伍启元教授讲演时，墙外步枪、机关枪、手榴弹交响四起，电线也被切断，大会点起汽灯，仍然进行。费孝通教授讲演时，墙外机关枪、冲锋枪的枪声大作，子弹从与会者头上掠过。同学们在枪声中通过了《制止内战反对美军参加中国内战》的通电。为

抗议国民党武装包围镇压学生的暴行，联大等9校宣布罢课，28日罢课扩大到31个大中学校，罢课的学生联合发表了《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告全国同胞书》要求：第一，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第二，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第三，组织民主的联合政府；第四，切实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游行、人身等自由。宣言中还对云南当局提出追究射击联大事件的责任。29日，昆明大中学校的学生举行游行示威，有些市民也加入行列，到美国新闻处前，高呼“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国民党宪兵警察又鸣枪镇压，枪伤学生数人。对于学生的正义要求，国民党当局不但毫不考虑，而且在中等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无理宣称“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学生有在校开会之自由，我也有在墙外放枪之自由。”11月30日，十数成群的特务，在马路上围打学生，装满石块的卡车，停在联大校外，用以对付学生。到12月1日，爆发了大规模的昆明惨案。国民党“军官总队”军人和武装特务，分别向各校进攻。在师范学院，特务捣毁校门，投掷手榴弹，3位学生当场被炸死，20多学生被炸成轻、重伤。一位女同学站起来救他身边受伤同学，特务以大石块将她击倒，又向她腹部砍三刀。在云南大学，400多国民党军人操着木棍、扁担冲入校门，撕墙报、捣桌椅，用石块、锄头、扁担、铁槌等追打学生。一个军人在墙外向校内扔手榴弹，教师于再上前劝阻，该军人当即用手榴弹将于炸死。联大附中、南英中学等一些学校和职工宿舍，也遭暴徒们的捣毁，学生职工遭毒打。据不完全统计，12月1日那一天，学生被打伤者60人以上，炸死者3人，教职员被打伤者4人，被炸死者1人。这就是“一二·一”惨案始末。《解放日报》发表了《昆明惨案》的社论。

重庆各界掀起了声援反内战运动。追悼昆明死难师生，举行3天沉痛而又激昂的群众大会，主祭人沈钧儒，主祭团柳亚子、郭沫若、何公敢、邓初民、张东荪、罗隆基、史良、章乃器。第一天有3000

多人参加,第二、三天各界人士纷纷往祭,董必武、王若飞也亲往祭奠。三天募捐 150 万元以上,抚恤死难者家属,给被打伤者治疗。《解放日报》还登载了传诵一时的挽联,其中如:“凶手审凶手,凶手自问自答:无耻!同胞哭同胞,同胞流血流泪:伤心!”“胜他人之利,民没得主!杀自家之人,和啥子平?”“以学生为仇,以人民作匪,屠杀不遗余力;与敌寇为朋,与汉奸为友,宽容唯恐不周”解放区和国统区许多学校纷纷集会,通电支援昆明学生运动。

②1946 年 1 月 28 日,黄炎培住所遭搜查。1 月中旬重庆《新华日报》信差屡遭“奉命检查”。

③2 月 1 日公布名记者羊枣冤死狱中。杨枣名杨潮,著名政论家,1945 年 7 月 13 日被捕入狱,受尽折磨,1946 年 1 月 11 日死于狱中。上海记者为羊枣之死向蒋政府提出抗议,美新闻界华慈、史坦因、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等 24 人,从美国纽约致电国民党政府,表示严重抗议,并称“自从 1945 年 10 月以来,三次宣称释放政治犯,废除秘密警察,美国信仰民主的人们,非常关怀现在监狱中成千政治犯的命运,希望释放一切政治犯,并给予中国人民以公民权利的诺言,能确切实施。”

④2 月 11 日报载,较场口事件。重庆文化界、工业界、农业界 20 余团体主持庆祝政协成功大会,在较场口广场举行,与会者 7000 余人。会议公推郭沫若、李公朴、李德全、章乃器、施复亮等为主席团。会议开始后,一自称“市农会代表”的刘野樵,在特务怪叫声中,强行充当主席,李公朴当即阻止,特务蜂拥上台,挥动棍棒,投掷石子,一时秩序大乱,60 余人受伤。郭沫若、李公朴头部受伤,施复亮脚部受伤,当即送往医院治疗。马寅初被打,身上的外衣被抢走。2 月 15 日,政协代表紧急集会,决定推选周恩来、张君勱、陈启天、李烛尘四代表晋见蒋介石,面陈惨案经过。沈钧儒等立主追究此案,认为堂堂陪都,竟发生这样惨案,政府应该负责。庆祝大会主席团李德全、章乃器等举行记者招待会,到会记者百余人,郭沫

若带伤出席,郭认为此次事件是破坏和平建国,破坏人民的政治权利。李公朴、施复亮因伤重不能到会,请人代为发表意见,李表示:为了民主,死而无怨,希望大家更加努力,力争保障人权,保障自由与民主。王葆真举着重庆卫戍区司令部主使特务扰乱会场的证件及发给特务的5000元奖金收据,说明这是从当场抓到的特务身上查出来的。劳协会代表讲述了工人以及新民报记者、大公报记者被打的情况。

⑤2月16日,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接到一封附有一颗手枪子弹的信件,内称:如果你向蒋主席报告星期日晨群众大会被捣毁事件,请先看看这颗子弹。措辞极尽恫吓之能事。下署名关英。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法西斯派实行恐怖的自由》。

⑥2月21日报载,北平特务捣乱军事调处部执行部办公处。20日下午1时,千余特务分子包围军调部办公处协和医院,闯入办公室,扰乱叫嚣,美方代表罗伯逊及政府代表郑介民制止无效。特务分子散发传单,污蔑共产党及中共委员叶剑英。军调部工作停顿数小时,北平市当局对此视若无睹。

⑦3月16日报载,反动派暗杀北满人民领袖李兆麟。李兆麟在东北坚持抗日游击战,14年如一日,曾任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军长赵尚志牺牲后,李统率全军,转战在冰天雪地之中。日本投降后,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3月9日,国民党松江省政府来人,诡称请李到中道里水道街9号商讨国大代表问题。李去后,当日未归,次日中苏友好协会派人到水道街9号寻找,见门窗上锁,毫无生息,将门打开,四处寻找,在楼上一小屋的床下发现李兆麟的尸体,胸口背部共有刀伤7处。《解放日报》以《抗日功臣惨遭毒手,全国同胞同声痛悼》为题,报道全国各地要求严惩主犯,抗议反动派的罪行,并转发《东北日报》社论《悼李兆麟(张寿笺)同志》。

⑧4月5日报载,《北平解放报》工作人员无端被捕。4月3日天尚未明,军警、宪兵、特务、便衣突至《北平解放报》与新华分社编

辑部,在门口架起机关枪,军警荷枪实弹,安上刺刀,闯入屋内,捕去钱俊瑞、姜君辰等22人。该报发行处,也同样遭军警宪特等搜查,捕去马健民、李庄等11人。被捕人员,均被绳索捆绑,双手锁上手铐,沿途遭受殴打辱骂。同日,滕代远(军事调处执行部叶剑英委员之军事顾问)的住宅,也遭军警宪搜查,并非法逮捕5人。《北平解放报》和新华分社据理力争,叶剑英、滕代远往访北平市长熊斌,当面提出抗议,警方理屈词穷,由警察局长陈焯向全体被捕者道歉后释放。钱俊瑞等返回报社时,北平市人民放鞭炮、游行、高呼:“保障人身与言论自由!”庆祝他们恢复自由,并成群结队地到解放报社慰问。《北平解放报》销路激增,每日突破4万份,为全市之冠。

《解放日报》对国民党当局如此蹂躏人身言论自由,发表社论《论北平解放报事件并警告反动派》,发表全国各地声援北平解放报、抗议政府当局的消息、通讯达40余篇,其中钱俊瑞写的《我们被捕了》和仓夷写的《正义的胜利》,正气凛然,义愤填膺,感人至深。

④4月24日报载南通大惨案,3月18日淮阴军调部执行小组到达南通时,南通中学、南通文协等学校团体,为要求和平民主举行游行示威并向执行小组请愿,城内民众参加者两万余人。他们冒着大雨,穿过军警设置的三道铁丝网,见到三人小组代表,提出:“取消苛捐和摊派”、“取消思想言论统制”、“反对伪选民意,取消特务组织”“实现四项诺言”。22日晚,参与请愿的学生顾迅逸、孙日新、郑英年和记者孙平天即告失踪,执行组离开南通后,国民党当局先后架走、逮捕教师及男女学生40余人。28日,人们看见孙平天、顾迅逸等4人被黑布蒙头,用轮船载入江心,4日晨在天生港江面发现被挖去眼鼻的孙平天尸体。事发后,各界悲愤异常,各学校团体派代表逃奔上海,发出《为南通惨案告各界人士书》向全国人民控告国民党法西斯罪行。上海正义人士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章乃器等以及华中解放区人民,都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

议。《解放日报》在24日发表了《国民党特务恐怖在南通——“3·28”惨案前前后后》，25日又继续报道：南通中学教师钱素凡被特务活埋，桃港江面上又发现三具女尸、一具男尸，身上都用电线紧缚，被剥得只剩一件单衣，南通城内特务密布，极端恐怖。《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南通惨案》。

⑩4月25日报载，北平中山公园血案，陈瑾昆教授、美新闻处长福斯特遭殴打。《解放日报》的标题是“北平重演较场口事件”。事情原由是：北平市国大代表选举协进会19日在中山公园举行国大代表选举问题演讲会，由该会顾问名教授陈瑾昆、江绍原主讲，各界人士、中外记者纷往听讲。正当陈瑾昆登台讲演时，预伏在会场的特务暴徒，向台上及听众猛掷砖瓦，陈教授的头部被击伤，血流满面，仍继续讲演，并大声斥责特务：“你们这种行为，是给国家丢脸，我决不是一块石头所能吓倒的！”听众中多人被击伤，一女生当场昏倒。江绍原及北平美新闻处长福斯特都被打。场中警宪，始终袖手旁观。群众愤起捉特务，当场扭获一名凶手，将其送往六区警局，福斯特也亲往警局证明特务行凶情况。平市各界纷纷慰问陈瑾昆等，并向当局提出抗议。9月、10月《解放日报》先后刊登消息：《石头吓不倒，地狱不愿住，陈瑾昆先生合家抵张垣》、《名法学教授陈瑾昆氏抵延安》、《中共中央欢迎陈瑾昆教授》等消息，引用陈的两句切合实际的话：“解放区虽尚非天堂，非解放区则确为地狱”，并发表陈瑾昆写的文章、演讲等。

⑪6月25日报载南京发生流血惨案：上海各界人民团体为反对内战，晋京请愿，请愿代表有马叙伦、闫宝航、林汉达、雷洁琼、陈震中等10余人，6月23日由沪乘火车赴南京。到南京下关车站，中共代表团和民盟代表等在车站迎接，马叙伦等正出站时，预伏的国民党特务暴徒，蜂拥而上，叫嚣谩骂，百般侮辱，一声喊打，站外的特务也闯进站来，扭住马叙伦、闫宝航毒打，雷洁琼、陈震中以及在场采访的大公报、新民报记者等多人，均遭凶殴，站上的国民党

军警在一旁袖手旁观。《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南京惨案》。

⑫5月8日报载，西安教育、法律名流李敷仁、王任遇刺，《秦风日报》被迫停刊。《解放日报》发表来自民盟及全国各地的抗议与通电。

⑬7月13日报载：《反动派恐怖行动变本加厉，李公朴先生在昆遇害》。抗日救国运动7君子之一的李公朴，7月11日晚在昆明，偕夫人儿子在学院坡步行，突遇预伏的特务开枪射击，李猝不及防，弹中腹部，血流如注，不省人事，特务从容逃逸，李公朴不治身死。死前说：“这种手段太卑鄙了，我已准备好为民主而死！”《解放日报》当天发表社论《人民的运动是挡不住的——论李公朴先生殉难》。毛主席、朱总司令电唁李公朴先生家属。

⑭7月17日报载，《法西斯恐怖分子日益猖狂，闻一多教授又遭毒手》。15日下午5时30分，闻一多与儿子立鹤在路上行走，突被预伏的数名特务包围，特务连发数枪。第一弹中立鹤头部，他伏在父亲身上说：“不要打他，打我吧！”特务连放5枪，两枪中立鹤腿部，3枪中胸部，弹丸从儿子肺部进入父亲肚子里。闻一多当即身亡，闻立鹤送医院后身亡。毛主席、朱总司令电唁闻氏家属。《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杀人犯的统治——论闻一多先生被害》。

李、闻先后被刺身亡，震惊国内外。《解放日报》从多方面报道人民的义愤。中共代表团提出抗议，周恩来将军发表声明：内战正向全面发展，国民党在昆明相继制造政治暗杀，使其与民主派合作发生根本动摇。民盟招待记者，要求立即取消特务，彻查审判祸首，并为李、闻案发表宣言。民盟要求会同调查李、闻案，国民党当局悍然拒绝。《解放日报》在《听千万人的愤怒声》的标题下，报道全国各地各界的唁电。星岛举行追悼李、闻大会，陈嘉庚号召争取民主。在重庆追悼李、闻会上，张澜又遭特务殴打，民盟四川省委员也被打伤，民盟致书蒋政府当局，提出严重抗议。通讯《凄风苦雨吊英灵，沪各界公祭李、闻》、《人可杀，民主不可杀——沪万人追悼李、闻

记》，这些通讯，表达了各界人民悲愤愤怒的情感。还发表了为李、闻被刺惨案，美国 36 名教授致电杜鲁门总统，要求立即撤退驻华美军，停止一切对蒋援助。英国报刊对中国时局表示忧虑。

⑮8 月 1 日报载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陶行知含悲抑愤逝世。下关惨案，李、闻遭政治暗杀、陶行知深受刺激，死前数日特务到他家调查其行踪，他被迫寄居友人处，由于过度疲劳与刺激，于 7 月 25 日突发脑溢血逝世。《解放日报》发表了大量悼文。

《解放日报》一方面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一方面报道广大人民的愤怒抗议，反映出反迫害的怒潮一浪高过一浪。

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一）反对美国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

日本投降以后，美国调运了庞大的海军和陆空军驻在中国各地，不但帮助国民党政府运兵，帮助看守和修筑港口、铁路和矿山，而且训练国民党军队作战和使用美国供给的轰炸机、军舰、坦克、大炮及其他各种杀人武器，直到进行特务活动。美国还给国民党军队装备了个美械师，组织了海军和空军，供给他们飞机、舰船、火箭炮、大炮、坦克、汽油以及其它一切战争物资。这一切，大大助长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实力和气焰，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解放日报》对此给予及时揭露和抗议。

1946 年 6 月，蒋介石已利用美国的军事援助，发动内战，全国各地烽烟四起，而美国国务院、海军部、陆军部又在 14 日要求美国国会通过继续军事援蒋的法案，此事引起全中国有自尊心的人民强烈反对。6 月 23 日《解放日报》全文刊登了毛泽东主席发表的声明，反对美军援蒋法案，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一切军事援助，并立即撤回驻华美军。23 日上海市 5 万群众大游行，沿途

高呼：“反对内战”、“要求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驻华美军立即撤退，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军事援助”。示威群众并派遣代表团，赴南京向当局及马歇尔三人委员会请愿。27日上海青年及市民又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者手持写有口号和图画牌子，有一幅画上面画着国民党兵正枪杀一农民，枪上标着“美国造”字样。在上海的社会名流郭沫若等发起签名致美国人民书运动。提出：中国内战停止或继续扩大决定于美国当局是否继续援华。宋庆龄等56人致电美国人民，反对美国援蒋，要求美政府勿再摧毁中国民主。解放区发起了“美军退出中国”运动。

《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社论指出：几个月来的事态表明，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竭力扩大中国内战，加强中国的独裁，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决不能忍受在一百年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特别是八年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流血斗争以后，重新接受另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并在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要求下，继续接受独裁统治，继续自相残杀的内战，或作某种国际战争的牺牲品。社论质问美国政府：“中国要求和平，要求建设，美国为什么不帮助中国和平民主，而帮助中国的独裁内战呢？美国为什么不给中国的生产机器和工程师，而给中国枪炮、坦克、轰炸机、军舰和军事顾问呢？美国军队在中国抗日的时候，不在中国登陆，不积极援助全中国的一切抗日力量，为什么在日本投降以后和中国内战爆发以后，反而在中国到处登陆，长驻不退，拼命装备和训练国民党的军队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还有什么权利要求中国人民相信他们是公正的、中立的、善意的，并给他们以关于中国内战的最后决定权或‘仲裁权’或‘公断权’等等呢？”

美政府派特使马歇尔来华，为调解国共两党的分歧，组成了国共双方和美方代表的军事调处执行部，然而在美国军屡屡侵犯解放区的情况下，马歇尔的“公正”面纱被揭开，军调处无法调处。《解放日报》以1946年7月29日发生的安平镇事件为典型事例进行报

道：天津东北香河县安平镇属于八路军防地，7月29日突然受到美军60余人、蒋军80余人的袭击，八路军被迫自卫。美空军也出动配合，交战中双方都有伤亡。国民党高级军事长官，对于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屠杀中国人民，竟表示“感激”，对于中国人民向外国军队侵略行为的正当自卫，却说是“无论此事系中共自行计划或由他人授意，同系野蛮之行动。”八路军当即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调查真相。蒋方代表阻挠调查，直到8月8日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调查组才出发。调查过程中，蒋方找寻借口，一拖再拖，但美贝尔查中校曾承认美军早有作战准备。在证据确凿面前，蒋方的阴谋破产，而美国的“中立”、“公正”，也暴露无遗。《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安平事件》。

1946年8月14日，《解放日报》针对马歇尔和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联合声明（8月10日）发表社论。马、司联合声明表示国共双方在若干基本问题上距离甚远，中国内战正在“日益扩大”、甚至有“席卷全国之势”。《解放日报》社论从马歇尔来华后的所作所为及其失败原因进行分析，社论的题目是《七个月总结——评马、司联合声明》。社论说：从去年12月下旬马歇尔到了中国，他亲手帮助中国订立了四大协议，即停战协议、政协五项协议、整军方案、东北停战协议，现在，他在华7个半月之后，却自己亲口宣布国共争论的根本问题，似已不可能获得解决了。实际上马歇尔的努力，在今天不但失败而已，而且今天之内战比之7个半月以前规模更大了，性质更残酷了。在马歇尔未来以前，蒋介石用于打内战的兵力是一百万人，约占其总兵力45%，现在此项兵力增加到两百个师约两百万人，约占蒋介石总兵力的85%。在马歇尔未来以前，蒋介石的军队用美械装备的为39个师，现在则为57个师，而且全部用在前线，此外还有由美机编成的空军，美舰编成的海军。当前的内战，对于所谓“调处”与“援华”，简直是惨酷的讽刺。针对马、司联合声明所强调获得协议之难，社论指出：所以越来越难，原因不是

别的，第一、正是因为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给了中国反动派日益增多的各种实际的帮助。这种帮助越多，蒋介石就越来越蛮横，马歇尔的地位在蒋介石面前就越来越低，尽管中共方面仁至义尽地让步，获得协议和保持协议也就越来越难。社论分析了马歇尔失败的直接原因，当然是马歇尔所称的“顽固分子”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反动派的头子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在1月至3月被迫勉强接受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很快立即反悔，用各种手段反对并破坏协议。蒋介石自己出面，在国民参政会上作了内战演说，完全推翻1月至3月的一切协议。政治谈判事实上已被破坏，代替的是东北大规模的内战爆发，蒋介石上庐山亲自指挥内战，8月5日提出侮辱马歇尔、司徒雷登人格的五项荒谬条件。社论紧接着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切遵从美国意旨的蒋介石，为什么敢于破坏马歇尔的和平努力呢？回答说“事实上并不是蒋介石敢于如此，而是美国政府自己破坏马歇尔的工作。1月至6月，美国帮助国民党经海路及空中运到华北的军队共达8个军，供给国民党的物资达3万美元之多。美海军陆战队多方向八路军挑衅，竟至不顾美政府全权代表马歇尔，而擅自行动。中美两国人民和公正人士都曾预先警告：美政府当局与美驻华海军的这种政策，是与马歇尔的和平行动不相容的，是必然要造成马歇尔的失败的。社论认为马歇尔个人也不是没有错误，在其3月回国以前，他对和平民主原则还是坚持的，对顽固分子曾予以斥责，他当时的行为一般是公正的，因而声誉很高。社论以大量事实进一步说明：马歇尔对国民党反动派仅限于一、二声斥责，对美反动派及美海军则连公开的斥责也没有，相反，他坐视美对蒋的接济不去制止，他任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已成的协议，而不为协议的实现而奋斗，至使马歇尔的活动完全失败。就这样，3个半月的“调处”和“援华”，就“调处”“援华”出一个更大的内战。

(二)反对美军在华暴行

驻华美军不但直接、间接地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而且在蒋管

区内飞扬跋扈，为所欲为，随意奸淫掳掠，杀人打人，武装走私，强买强卖。

《解放日报》不断揭露美军在华暴行，《北平美军车横行无忌，王振华律师被碾殒命》《戈宝权与夏衍被美军吉普车撞伤》、《北宁路上美军任意捕人、调戏妇女》、《天津美军又杀一农民》、《塘沽美军殴死工人》、《天津美军枪杀中国小学生》、《上海美轮撞沉驳船》……《“红毛强盗”的血债——记驻华美军两月暴行》，是一篇长通讯，写的是美军暴行的实例，下面摘录几段：

穿裤子也无自由 北平美军枪杀学生

9月5日，曹柱明在南池子看人下棋，一美兵跨过，见曹穿一条美军用的黄卡叽布裤，不问情由，向曹猛踢一脚，曹被迫走避，该美军竟连开4枪，将曹击伤，并把他的卡叽布裤剥下拿走。

近闻曹已不治身死。我们要问：中国人连“穿裤子的自由”都没有吗？

掷小孩入河溺死 津美军藉以取乐

9月23日。一11岁小女孩在津市曲阜道海河边游玩，突为行经该处之美兵抱起，猛力掷入河中，活活淹死。当时有一中国脚夫入水抢救，美兵在岸边袖手旁观，怡然自得。

车夫索资竟遭打死 颠覆乘客纵情狂笑

人力车夫张志诚，9月22日拉一西班牙人赖令纳至汉口路华都舞厅，赖不付工资，昂然入内。张在舞厅门口等候，赖与一美国水兵出来，张向前索车费，赖与美兵竟施以老拳，将张活活打死。美军甚至把中国人的性命当作开玩笑的工具。8月7日黄昏，一辆三轮车拉两个“红毛兵”，驶经成都路，其中一个突将并行的一辆人力车的后蓬，猛地一拉，人力车被拉翻倒地，坐客也跌了出来，并被车梗击中头部，鲜血直流。而这两个红毛兵竟手舞足蹈，纵情狂笑。

吉普杀人司空见惯 闯祸之后一走了之

8月16日虹口里虹桥外，一美军吉普，急驰转弯，冲入鹤升茶楼，撞死站在人行道上的一个6岁孩子，闯祸后，美军立刻开车逃走。当时有一中国青年，愤然跳上美军吉普车，责令美兵停驶，美兵不但不停驶，竟一拳将青年从飞快的车上打下来。

奸侮妇女层出不穷 蒋记政府助纣为虐

两个月中，上海美军侮辱强奸中国妇女的罪行，层出不穷。9月12日，虹口大连路福寿坊2号常熟少女陈招娣，因天热露宿街头，被两个酗酒美兵唤醒，强行非礼，陈氏力拒，美兵便以皮鞋猛踢乱踏，陈被打得遍体鳞伤，被踢落4颗门牙，血流满面。

美军凌辱中国妇女，每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感到无比愤慨，可是国民党当局竟然专门物色800个中国妇女，放在重庆近郊的“安乐乡”让美军使用。

1946年12月24日晚，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事件。引起全国人民极大愤慨、愤怒的火焰，燃遍全国。《解放日报》连续报道这一事件的始末，从1946年12月29日至1947年2月15日，先后达45天。连续报道北大、清华、燕京、北洋大学北平部等大学学生游行示威，平津学生组成抗议兽行联合会，上海成立抗议美军暴行委员会，重庆、昆明、武汉、湖南、杭州……等各大院校的抗议示威行动，解放区青联、妇联等声援各地学生的爱国运动，教授、知名人士、文艺工作者以及广大市民多方声援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时，揭露蒋政府以“有污友邦”的罪名压制学生爱国运动，逼令沈崇承认“和奸”，拒绝北大法律顾问费清出庭控诉。报道沈崇不畏强权，写控诉书，出庭申诉经过的事实。1947年1月9日社论《号角响了，奋勇前进！》对爱国抗暴运动给予高度评价。社论指出：在美帝国主义者眼里我们的同胞本来就不是人。他们在我国

的各大都市打人、骂人、抢人、杀人，这次他们公然在露天强奸一个青年女学生，竟然还要威胁受害人的家属，美军当局还竟然以轻佻侮辱的口吻，说什么美军家属将继续来，以后中国人可以放心。这真是令人发指毗裂的最大污辱！社论接着愤怒地指责蒋政府当局：“最可耻的，蒋介石这一伙，在事情发生之后，一方面百般为美军的罪行辩护开脱，根本否认奸污的事实，或者说是‘未遂犯’；另一方面却造谣污蔑，压制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的公愤，禁止报纸披露这项消息，秘密逮捕报道这个消息的记者，唆使特务破坏各学校同学的声援行动，最后则拿出十多年的谄媚日本帝国主义的老手法，严申“敦睦邦交”令，禁止和镇压各地同胞的爱国游行示威。而对于美军，则就在出事的当天晚上，大送其圣诞礼物，灯红酒绿地款待他们，慰劳他们，无微不至地保护他们，宣传他们是“中国最好的朋友”。社论接着说：我们在此，谨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向在北平横受凌辱的女同学及其家属，遥致亲切的慰问，并且告诉他们：你们的耻辱，就是解放区人民的耻辱，就是民族的耻辱，此仇不报，决不罢休！同时，我们以无比的愤怒向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表示我们最严重的抗议：你们必须立即严惩凶犯！必须立即赔偿损失！美军必须立即滚出中国！”社论以极大的热情颂扬了中国的年青一代，“从这一事件发生到现在，中国年青一代又以坚强英勇的气概写下了光芒万丈的史诗：平、津、京、沪、香港、武汉、广州、重庆、苏州、杭州、镇江的爱国学生为了抗议这一暴行，为了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接连不断地举行了罢课游行。”“看，多么悲壮英烈的场面啊！在北平，3、4万爱国学生粉碎了一切欺骗捣乱，冲破了卖国当局的重重禁令，迈步走上在那满印着烈士血迹的街头，响亮地喊出“为受辱女同学复仇！”“中国不需要美军！”“美军赶快滚出去！”的口号。他们甚至自备担架，准备为了他们的姐妹，为了洗涤祖国的耻辱而流血。在上海，4万爱国学生在黄浦江畔代表我们伟大的祖国发出雄壮的怒吼，并直冲进蒋记市政府，把一群正在举杯相庆的美国

“贵宾”和蒋家汉奸吓得作鸟兽散。南京的同学们更挣脱了蒋介石直接的箝制,从各路集合起来,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在大街上展开示威的行列,最后并将蒋记独裁的国民政府铁桶似的包围了两个钟头,高呼“美军一日不撤,运动一日不止!”和“争取自由胜利万岁”。其它各地青年学生的英勇行动,同样可歌可泣。雄伟的群众行动,有如解冻的黄河,后浪推着前浪,汹涌澎湃而来,美制的机关枪,蒋介石军警特务,乃至美军的装甲巡逻,在悲愤填膺的群众行列面前,显得多么卑怯和渺小!这象征着当中华民族像巨人一样站起来的时候,一切反动派只能如虫豸和尘埃一样垮掉了。”社论号召全国青年:“让我们像一支铁流似的汇合在一起,更加顽强地战斗,迎接光明灿烂的新中国的诞生吧!”

(王 敬)

第七章 人民战争胜利的纪录

抗日战争时期

宣传抗日游击战

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与共产党在如何抗日的问题上，存在着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国民党为维持其一党专政的目的，主张单纯由政府与军队抗战，反对人民群众的抗战。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主张动员和组织群众，发动人民战争，进行全面抗战。《解放日报》的军事宣传，坚决贯彻党的全面抗战与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大力宣传人民战争，宣传抗日游击战。

《打击敌人在敌后》，是1942年3月1日的《解放日报》社论，社论论述了八路军、新四军与敌后抗日人民，建立起血肉联系，屹立在敌人占领的领域上，不断给敌寇以武力打击，政治打击，经济打击，与敌人在血泊中相持了4、5年，使敌人不能如意地达到“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目的。社论指出：敌后斗争，将随着整个战争形势的发展而更加残酷，敌后军民必须从精神和实力上，准备与敌寇作持久而艰苦的战争，社论还引用《普法战争》中的格言：“使用自己所能发现的每种武器，以扰乱敌人的运动，截断敌人的给养和通讯，毫不选择地采取可以用惊扰侵略军的每一种手段，这种手

段,愈有效愈好,并且不要穿任何军服,在任何时候都能和其他公民一样,使敌人捉摸不清。”接着,又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通讯:《迎接‘七七’坚持敌后斗争》、《保卫冀中坚持平原游击战》、《今天的敌后战斗》、《我们始终同老百姓在一起》等等,从战略战术上论证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从实践经验中总结打击敌人在敌后的正确性,进一步提高八路军、新四军、民兵、自卫队等全体指战员和战斗员,深刻认识并自觉运用这一战略战术,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扩大自己实力。

(一)及时报道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战况

及时报道八路军、新四军、民兵、自卫军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在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中英勇斗争的战绩。从1941年开始,日寇集中日、伪军,反复“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在华北,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到万人的,达132次,万人以上到7万人的达到27次,有时在同一个地区反复“扫荡”3、4个月,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在华中,日伪军有兵力29万人,以苏中、苏南为重点,反复进行“清乡”。在敌人的残酷进攻中,1941—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以及民兵共与敌人作战42,000余次,虽然我军民也遭受很大损失,但却给敌人以重创,毙、伤、俘日伪军33万余人。中国共产党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实行统一领导,建立健全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即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后两者是强大的后备力量,在敌情严重时,实行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地方化、群众化,达到有利的分散;情况好转时,地方兵团和民兵,又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集合起来,配合或转化为主力兵团,完成作战任务,坚决打击“清剿”之敌,挫败日军的“治安强化运动”。《解放日报》对于我军取得的大小胜利的战役,作了大量的报道。特别是对取得胜利的大战役,更是采取集中、连续报道的方法,既鼓舞人心,又推广经验。如1942年5月的田家会大捷,日伪军1400人进犯兴县,主力兵团八路军和民兵配合作战,诱敌深入,趁敌不备,发起反攻,

敌人仓惶逃窜，陷入我军的伏击圈。敌人逃到田家会，修筑工事，企图固守，我军反复冲锋，全部占领了敌人的各个阵地，1400余人只有二、三十人漏网逃跑，其余全部杀、伤、俘虏，包括在春季“扫荡”中凶暴残忍的刽子手日军大佐和中队长。《解放日报》对这次战役，先后发表了十数篇新闻、通讯，充分反映了此战役灵活的战术，辉煌的战果，军队和民兵的机智勇敢，广大人民群众の旺盛斗志，以及战后广大军民的祝捷盛况：《万众欢腾 加紧准备 迎接更大胜利》、《田家会大捷声威远扬 敌占区人民异常兴奋 岚县敌伪日夜惶恐》。1943年5月太行大捷，战绩更为显赫，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茨亲自率领并指挥日伪军三万余人，“扫荡”太行抗日根据地，分东南西北各线，分数十路同时扑向我黎城、左权、涉县等地区，以梳篦队形，经大道、山径、兼程并进，这是岗村叫喊的“釜底抽薪”的战术，并且宣称“扫荡”一个半月，就能“扑灭”八路军。结果，我主力兵团、地方兵团、民兵和广大人民密切配合，英勇善战，仅仅10天，就把这杀人魔王带领的大队打了回去，粉碎了敌人这次大规模的“扫荡”。《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欣闻太行大捷》，社论说：“敌后有广大的中国人民在，有与人民结合得血肉不可分的八路军在，敌寇虽能在一时一地侥幸取得些胜利，却永远不能‘釜底抽薪’。”“太行之捷关键所在，乃是军队与人民的结合。”在5月24日一版发表的新闻中，把太行军民大打地雷战的战况，写得详尽生动，下面节录一段：

“敌寇窜入我根据地后，似踏入地雷世界……。凡敌伪足迹所至，地雷爆炸声即随之震撼山谷。据不完全统计，敌伪军及汉奸中地雷伤亡者，为数在300人以上……。民兵设计地雷，花样繁多，如左权县一村民兵，在当街一白石头下埋地雷，把火线挂在一个水筒上，首先被炸死的，是一个在该水筒内取水喝的领路汉奸。上武村民兵把守寨门口，先用枪诱敌人入沟，然后拉响沟内地雷，上下夹攻，使敌走投无路，有一个民

兵,在敌人到村外搜山的时刻,闪进村中设雷,敌人回来就踩响了,如此5次,弄得敌人不敢再进村驻扎,只得露宿在麦地里,望村兴叹。在白家庄村,敌人踏响的地雷,多在一条窄巷内,敌伪死尸狼藉,鲜血染红巷内。敌人在惶乱间,不得不在可疑之处遍插木板,上面写着‘下有地雷’四个字。四周用石灰划一个圈子,并互相传告:‘地气弹的有。’我民兵之机智,应之而生,在各地遍设伪装或掘些断土,或露出火线之绳头,使敌到处可疑,寸步难行。敌人回窜时,我民兵更在其归途中到处设雷,敌惶恐无已,不敢在大路走,攀岩披棘而逃,但又中我埋伏,焦头烂额,狼狈万分。”

《解放日报》编委会对军事报道,及时进行总结,认为太行大捷的报道是成功的,其中不少新闻通讯是“反映战争的好新闻作品。”^①

(二)宣传灵活多样的战术

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在对付强大敌人的“扫荡”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战术,如地雷战、地道战、围困敌人碉堡、土坦克、麻雀战、巷战、破击战等等。《解放日报》如实反映了这些打击敌人、保存自己的各种战术,用活生生的事实,说明人民战争的威力。下面这则《冀中已不是平原 地道地沟纵横错综》的新闻,反映了冀中军民对敌斗争的智慧:

“几年来由于全体军民的努力,冀中平原的地形,已经完全改变村与村间的平路,完全挖成了深广的道沟,它成为人们行路、防空和作战的掩避体。我们的车马可以畅行无阻,而敌寇的装甲车、坦克车、汽车却寸步难行。其它平路,则分别挖成交通沟、纵横错综,把所有的村庄,用道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在冀中作战,敌人很少看见八路军,然而枪弹却碰到不少。那

^① 材料来源:《解放日报》编委会记录。

些枪弹、手榴弹都是从地里面飞出来的。敌人听到繁密的枪声，便看到自己的人翻马仰。老百姓也学会这种打法，有人把这种战斗，比作猴子耍狗熊。一个是笨拙异常，一个是矫捷灵活，一个是凶暴地东奔西跑，到处扑空，到处挨打，一个则机动顽强，随时找机会踢打敌人屁股。

空舍清野，已成了冀中人民的生活习惯，用不着再去动员。战斗来时，老百姓随时都可以转移，人们一走，村庄立刻成了空壳子，敌人不但看不见人，也搜不到东西，庄里的耕牛，敌人也很难捉到，因为牛也学会了跳沟，一摆尾巴，7、8尺的低道沟，一跳就过去，便钻进地道，影儿都没有了。敌人每次出现，车上满载了转去的不是粮食、衣物，而是‘皇军’自己的一次比一次多的死尸。”（1942年6月14日）

1942年6月12日发表的另一条消息，标题是《神出鬼没敌寇震惊》，写的是敌寇包围冀中的一个村庄，集中炮火猛攻，竟然接近不了村庄，到第三天，集中几个据点的兵力，拼命向小村压缩，夕阳西下的时候，村里不再还击，敌人冲进村。“意外的事情又来了，村庄上一个人也没有，牲口杂物猫狗什么都没有，街上，屋里只有光秃秃的土墙。敌人迷惘了，惊慌地退了出来，刚出村不远，突然繁密的枪弹从屁股后又打来了。敌人又回到村里，还是光秃秃的墙。这样反复了两三次，敌人才发现家家都有地道，敌人不敢进，站在洞口，用枪向里射击。日寇逼着伪军去搜剿，一下去，地雷响了，敌人用火烧，烟往外冒；用水灌，水往外流，因为老百姓早就防备了这一着。敌人守着洞口转圈子。天渐渐黑下来，我们的老百姓和游击队，早从地道的另一端退了出去。黄昏时分，敌人退走。我们又打了一次满意的埋伏。”

（三）总结敌后辉煌战果

1943年抗日战争六周年前后，《解放日报》集中发表了宣传敌后游击战辉煌成果的文章，这些总结性的文章，是遵照中共中央书

记处发出的《关于抗战六周年宣传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负责同志撰写纪念文章,这些文章,充分反映了八路军、新四军的伟大功绩,显示了人民战争的胜利。

朱德文章的题目是:《我们有办法坚持到胜利——为抗战六周年纪念而作》。文章回顾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六周年:同敌人进行大小战斗 66 万 6 千次以上,杀伤俘虏日伪军 30 万人,钳制了在华日军的 50%。我军也付出了极大的血的代价,伤亡总数达 38 万人。抗敌中遇到很多困难:敌寇战术变化愈来愈残酷,由碉堡政策进而为囚笼政策,加筑据点、护沟、护墙,把我根据地分割破碎,限制我军活动;由回攻到“扫荡”,实行奔袭战术、“蚕食”政策;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此外,我军的枪弹、被服、医药、粮饷等 4 年来得不到任何方面的补充,数十万大军,在困难中苦战数年,全世界前所未有。文章总结了我军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的几项原则措施:坚持敌后抗战,精兵简政,分散游击,对付敌人的“囚笼”政策;密切联系群众,灵活地打击敌人,对付敌人的“蚕食”政策;军民密切配合,广泛组织民兵与武装工作队,用更彻底的坚壁清野,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加强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与生产运动,自立更生,克服无饷无弹无衣无药等困难。这样,更好地保存并建设了自己的根据地,锻炼了一支坚不可摧的抗日军队,给敌人以更多的打击!最后,文章充满信心地表明: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下定决心,宁死不屈,坚持进步,坚持艰苦奋斗,以最大的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1943.7.5日)

彭德怀写的《我们怎样坚持了华北六年的抗战》,以详实的材料,说明了华北我主力军和民兵如何在强大凶残的敌寇面前,坚持斗争,保存自己,并不断取得胜利。文章追述 6 年来敌寇在屡遭我军打击下,4 易其主:1938 年日本军部企图消灭八路军,镇压民众,命寺内为华北方面军总司令,代替原来的香月清司,但抗日军队不但未消灭,反而大增,于是寺内换上了杉山元。抗日根据地仍屹立

在敌后，杉山元又让位于多田骏。多田到任后，提出“囚笼”政策，铁路两侧挖沟高垒，隔绝我平原与山地交通，形势很紧张，敌自以为得计。我乃乘敌不意，隐蔽集结百数十个团兵力，突然指向平汉、津浦、北宁、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同时进攻，破其堡垒，毁其沟墙，烧毁其车站仓库，炸毁铁路桥梁，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粉碎了敌寇“肃清华北、掌握华北”的迷梦。多田又实行所谓“牛刀子”政策，集结其优势兵力，突击一点，结果，又被我神出鬼没分散的游击战所粉碎。1941年7月，多田只好告退，取代他的是号称日军“三杰”之一的岗村宁茨。这个杀人魔王，一到任就提出“交通建设”高筑封墙，强化堡垒，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被我人民子弟兵打得他人滚马翻，不得已退了回去。接着，又在1942年5月以所谓“铁筒合围阵”，用之于太行，以“铁环封锁阵”用之于冀中及山东，都先后被我军及老百姓所粉碎。岗村又提出更加毒辣的“治安强化运动”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文章写道：“我们虽有不少美丽的村庄被烧毁而成为废墟瓦砾了，虽有不少男女同胞被屠杀了，然而我们华北并未被‘征服’，而是更加英勇善战了。”（1943.7.3日）

陈毅在《新四军在华中》一文中，详细叙述了新四军与人民群众坚持反“扫荡”，反“清乡”的英勇斗争，然后总结道：“分散游击，以削弱敌集中之优势，集中兵力以突击敌之薄弱部门，此我军反‘扫荡’之战法也！‘扫荡’初期，避免正面作战，而必予前进之敌以阻滞；‘扫荡’中期，相机击敌，而必予敌新建之据点封锁以适当平毁；‘扫荡’末期，则必予敌以有力反击，并痛击伪部，以剪除敌寇之羽翼，歼灭敌寇，以动摇伪部之心胆。我军抗敌有方，则伪部人人思汉，此乃事理之必然。我主力为反‘扫荡’之骨干，灵活转移，在适当时机予敌以致命打击，地方军之时隐时现，零整互化，民兵就地游击，就地坚持，神出鬼没，及于敌伪卧榻居室，构成敌伪之日常恐怖。三者相互配合、互相转化，使敌伪难于捉摸。”（1943.7.5日）

聂荣臻写的文章题目是《敌后六年之一得》，他评估了晋察冀

边区抗敌斗争：“斗争之残酷，为历史上空前所未有。”“其尖锐复杂而剧烈斗争之形势，实有想象所不及者。统观6年来，敌人遭到很大失败，我亦付出相当代价。一点一滴之胜利，是从一点一滴之流血斗争中得来的。”文章指出，六年敌后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争是无情的，不战不能存，不战更不能胜，我所进行之战争，基本上为游击战争，但此游击战，决非等闲之所谓“游击论”，更非一般战术教条所可比，亦非恃过去之游击战争之老套经验。今日我之游击战，乃在已有经验之基础上，从6年抗日战争中不断获取新经验而高度发展之结果。（1943.7.4日）

徐向前写的《克服困难 迎接胜利》，是从国际反法西斯胜利形势联系到日寇的危机，从而论到敌军必败，我军必胜。（1943.7.7日）

刘伯承的《敌后抗战的战术问题》，是一篇军事理论文章，他概述了抗战以来三个时期的斗争经验，提出了6点战术原则问题：1、战术社会性的扩大；2、“敌进我进”；3、“群众性游击战争”演变中的威力；4、“交通斗争”；5、对现代技术兵器的斗争；6、侦察与防谍。（1943.7.7日）

此外，贺龙写的《加强团结 准备反攻》、薄一波写的《太岳区抗日根据地是怎样坚持抗战的》、肖华写的《山东反“蚕食”斗争的胜利》和林枫写的《坚持敌后抗战的晋西北根据地》，都是根据自己所领导的实际斗争，总结出坚持抗战的经验和对抗战胜利的信心。而吕正操写的《穿插在沟线中的游击战争》，更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冀中平原游击战的特点——敌人反复“扫荡”，根据地被分割，由大块变成小块，军队由集中到分散，战争越来越紧张，敌人越来越残酷，而英雄的冀中军民，6年如一日地坚持着祖国前线的反攻阵地，一次又一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并且正在时刻准备着大反攻的到来。

这些文章，既介绍了各根据地对敌斗争的历史和现状，又总结

了敌后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情况尽管不同,战术也各有巧妙,但文章的共同之点,都是说明人民战争威力无穷,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与广大人民群众坚如盘石的团结,紧密配合,英勇战斗,是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两个战场的鲜明对照

《解放日报》的军事宣传,是对敌后游击战场与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同时进行的。虽然以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主,但对国民党军战场的战况,也有相当数量的报道,除一般新闻报道外,还有综合栏目,如《一周战报》、《战场实况》等,对重要战役,还配有地图。使读者不局限于了解根据地的抗战情况,而是关心全局,对全国战场有整体的了解。

对国民党军战场的战况报道,多采用中央社的电讯稿。国民党军在对日战斗中取得胜利,或收复失地,或阻截日寇,都据实以报。如1942年8月的《赣东克玉山》,9月的《浙南克四城》、11月的《浙赣线战役毙敌联队长》、《闽海敌舰中雷沉没》,1943年上半年有《阻敌强渡怒江 百里州畔追敌》、《滇边克孟台 怒江西岸敌后退》、《收复渔洋关 宜昌西岸激战》等等,都是报道战斗胜利或败中有胜的消息,只是这类鼓舞人心的战役不多,而失守溃退的消息则纷至沓来。从《解放日报》的报道看,1942年日军进攻浙赣两省,国民党军失利,1943年两湖战役中,国民党军受创,特别是1944年,中原、湖南等地战役,国民党军全部溃败,大片土地失守,河南战役,44天失掉45个城;湘桂战役,失掉了长沙、衡阳、宝庆、肇庆、梧州等许多大城市;日寇逼近桂林、威胁柳州,连昆明、贵阳也成为敌人窥伺的目标。沿海战役,温州、福州相继失陷,等等。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大溃退,引起举国人民惊呼。《解放日报》对此除发表战报消息外,也发表综合性的分析文章,如《中原战事血的教

训》、《湘战的真相》、《西南风暴》、《五个月滇西战斗》等等。到1944年大溃退以后，则义正词严地发表社论：《长沙失陷后的危机》、《豫湘战役为什么失败？》、《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同时，也反映国内外人士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国内爱国人士对形势发展担忧，对国民党政府的愤懑，《解放日报》据实以报，如河南各界人士要求严惩失职将领；昆明教授座谈，对失败主义战略深表愤慨等许多条新闻。国际反法西斯舆论，对中国战局也普遍表示不满和忧心，《解放日报》有的转载文章，有的刊登新闻，如《英美盟国忧虑中国正面战场》、《美国军界人士论中国战局：必须立即阻敌前进。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使美国对日反攻遭到几十倍的困难》，《邱吉尔指责中国正面战场溃败》，英《工人日报》载文《论豫湘战事失利的原因》、苏联《外交政策公报》载文《论中国军队的实情》等等。

正当国民党正面战场节节溃败的时候，敌后的解放区战场却连连得胜，《解放日报》上捷报频传。1944年下半年以后报纸反映了敌后各战场上“收复”、“克敌”、“歼灭”、“击退”的全面情况，这里只举几例说明：在华北，《晋东北我军毁敌第一线据点 晋东北与冀西已连成一片》，《三千寇军全部败退、完县山地已无敌踪》、《冀鲁豫我军大胜利 光复濮阳县城 收复国土1万平方华里，解放同胞30余万》、《鲁中我军展开冬季攻势 直逼胶济津浦铁路》；在华中，《苏浙边区新四军攻克敌伪据点25处，长兴大部地区已获解放》，《皖南新四军解放贵池以西地区，猛袭巢南盛家湾》；在华南，《东江纵队出击广九路，攻入平湖等车站》。在解放区大片土地胜利的形势下，海上也传来好消息，1944年11月30日发表的《刘公岛伪海军反正经过》，就是一例。敌华北威海卫要港司令部驻刘公岛，直接指挥华北各地伪海军。胶东八路军直逼威海近郊的时候，队长郑道济率部600多人起义，杀掉大部敌寇及伪军军官，携带300吨的航船一艘，炮舰两艘，还有钢炮、机枪、长短枪及其它军用物资。继刘公岛之后，龙须岛伪海军67人，也起义反正。到1945年上半

年,我军胜利的消息,发表更多,有时第一版上一日达7—8条之多。7月7日,第一版上刊登了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抗战第8周年主要战果:(1944年6月至1945年5月)总计毙俘日伪军33万余人,缴获武器长短枪14万余支,机枪2500挺、各种炮548门等,攻克县城50座,攻克敌据点3700个,解放国土8.7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380万。同日,第二版刊登了《抗战第8周年中国两个战场的作战概况》,用大量详实而具体的资料,对两个战场进行了鲜明对比——解放区战场的攻势作战与伟大胜利,国民党战场消极抗战与积极反共。解放区战场是收复旧敌占区,创造新根据地,解放国土,解放同胞,而国民党战场则是从河南一直败到广西,丧失国土,沦亡同胞。这些材料的发表,广大读者一目了然:共产党抗日救亡,国民党丧权辱国。

对于中国的两个战场,国际舆论有许多评述,《解放日报》也摘要给予发表。如美国国务院政府通讯社严斥国民党军阀,说“中国人与中国军阀不是一个类型”;美国纽约邮报评中国局势称:“美国对华军事援助,应给坚决抗日部队”;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爱金生撰文:《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等等。

加强战地通讯 歌颂英雄人物

中国人民在英勇的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涌现出无数顶天立地的英雄人物,对此,《解放日报》以大量篇幅发表了许多动人心弦的新闻特别是通讯。

战地通讯的稿源,一般来自战斗第一线,或是随军记者,或是部队和地方的通讯员,材料来源,多数是第一手的,因此,真实、形象、内容丰富,它们是中华大地——以革命根据地为主——烽火硝烟中各种战斗类型的纪实,是不屈的英雄儿女的灵魂雕塑,许多篇

章成为传世之作。

（一）生动丰富的战地通讯

战地通讯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较多的是写战役，通过战役写我军的战略策略，写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气概。《冀中宋庄之战》，就是其中的一篇。撰稿人是记者周游。报纸特意加了《编者按语》。这是一篇连登两天的长通讯，一开头就告诉读者这场战斗的惊险、残酷和最后取得的光辉胜利：

“宋庄战斗，我们以两个连少数的兵力，在平原上依据一座被孤立的村落，对抗着 2500 拥有精良装备的绝对优势的敌人。就在这种兵力众寡相悬和设备优劣殊异的对比情况下，我们无比英勇、坚决、顽强、果敢的冀中子弟兵部队，杀伤敌寇坂本旅团长以下官兵至 1100 人之多，而自己只伤了 73 人。战斗从白天到黑夜，整整坚持了 14 个钟头，最后突围而出。这是 1942 年冀中空前激烈反‘扫荡’中一个惊天动地的模范战斗，这是人类的智慧和勇敢在残酷战争中一种奇迹的创造。在平原游击战争的历史上，在整个革命战争的阶梯上，它都将居于特殊崇高的地位，而永远闪耀其不灭的光辉。”

通讯用纪实的写法，写出 14 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两个连凌晨到宋庄。立刻遭到以敌旅团长坂本率领的日伪大军的包围。通讯写了我军战士精湛准确的射击，英勇顽强的精神，政治工作的强大战斗力，打得敌人失魂丧魄。“坂本的脑壳炸碎了，”“一个日寇小队长，失掉了再冲锋的勇气，迟疑不前，被他的上级指挥官在阵前枪毙。”“天黑以前，敌人举行的冲锋，不下 30 次，可是冲进街打出街，冲进村打出村，我们的战士，在指导员机动灵妙的指挥下，发挥了充分的火力，粉碎了敌人一切攻击的计划。”这里写了英雄连队的各种英雄人物，从指挥员到战士。夜幕降临，9 时我军巧妙地突出敌人包围圈，而敌人竟然以为八路军还在村内。第二天早 9 时，敌人又发动冲锋，冲进去，才发现原来已经是空村子了。

《解放日报》发表了不少连续性的系列通讯，随军记者华山，在《碉堡线上》的总题下，写了8篇不同的人物和战斗，歌颂了在敌人碉堡线上的游击队、民兵，还有打击敌人、掩护八路军的广大群众。甄林风连续写了5篇《冀南的战斗故事》。记者仓夷，从1942年起，就作随军记者，发表战地通讯较多，主要是反映晋察冀人民反“扫荡”的动人战迹。有《在反‘扫荡’中》、《子弟兵扼守神仙山》、《反‘扫荡’中的李勇》等等。

战地通讯不仅反映与敌寇正面激战，更多地反映了我军灵活多样的战术：夜袭、水战、巷战、伏击、肉搏战、麻雀战……。如《一个人缴了一个连》、《夺炮》、《没有枪声的战斗——记横泉据点的毁灭》，都写得有声有色，引人入胜。而《抬棺杀敌》，更反映出群众的智慧：大路上有十几个壮小伙抬着新漆的朱红棺材走来，忽然对面开来了敌人的汽车队，正巧抬棺材的扛绳断了，挡住汽车的去路，抬棺材的小伙子们撒腿就跑。敌人还没清醒过来，“轰隆”一声，棺材里的地雷爆炸了。我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烧毁敌8辆汽车，击毙日伪军20人，俘虏日军4人，还解救了被敌人押送的40名青年学生。像这种文字简洁，生动活泼的短通讯，发表很多。如《20个换200个》，写的是冀中我军某部在威县堂史村突围的肉搏战，其中有这样一段散文式的写法：“惊心动魄的杀声，震撼了昏沉的黑夜。一阵猛烈的手榴弹掷过去，即刻便进入了肉搏战。愤怒的喊声，粗暴的咒骂，刀枪的碰击，响成一片。在爆炸的火花中，闪烁着殷红的火花和雪亮的刀锋。随着突围部队的风扫残叶的威势，我主力踏着泥泞的血路冲出去。轻伤者按了按伤口，继续战斗，重伤者不叫不吭，贴伏在同志的肩上。在反复冲杀中，南北两股，会成一路，冒着浓烈的烟火，向前急流。天亮的时候，我们冲出了敌人的‘铁筒包围’”。在这次突围的血战中，我军牺牲20人，伤80多人，而敌人留下的尸体，就达200多具，通讯以简洁的文字写出我军在与敌人面对面的肉搏战中，那压倒敌人的勇猛坚毅气势和视死如

归的拼杀精神。

战地通讯写战役，写拼杀，也写不动刀枪同样扣人心弦的战斗。幼民写的《大天白日敌区突围记》，就是一篇代表作。从简短的前言里，就可以想象出这次突围是何等艰难：“灵活地跳出敌人扫荡的合击圈，这在八路军说来，本是很拿手的玩艺儿，也是很平常的事情。不过，我们这部分此次突围，却和平常有些不同，这次是大脑袋、小身子的机关部队，在冀中这次大扫荡的第二期开始前，敌人的‘铁壁合围’形势已成，我们唯一可能的出路只有一条：通过40里地的敌区，到津沱河北面去，而且必须在白天，经过三道封锁线，6个据点，这在敌后残酷的战争形势下，还是不多见的，但我们终于胜利地完成这个行军任务。”

通讯写出了在暴残敌人面前，我军的沉着机智，也写出了人民群众同子弟兵的血肉深情。

有的战地通讯，取材比较新颖，从侧面写，达到了长人民志气，灭敌人威风的效果。郁文写的《村川大佐之死》便是一篇。这是在田家会大战中发生的事，不是正面写激战，而是写那个参加过日俄战争的老迈骄横的日本军官之死。这个被敌军称为“晋西北通”，“袭击战专家”，自炫为“常胜将军”的村川大佐，希冀通过屠杀中国人民，晋升为将军，通讯写他如何带着“将军梦”中弹而亡。他的尸体“装进他准备盛胜利品的口袋里，绑在他高大的战马上，驼回原防去。”

《海上游击队》，是一篇别开生面的通讯。这是八路军、新四军对付敌人军舰和水上飞机，打击海上敌人的真实纪录。下面是对海上游击队战斗状况的描述：

“船只轻便而飞快，有的是装甲的，有的把从敌人那儿夺来的橡皮船，做成各种掩体。战斗生活多半是袭击埋伏，能巧妙地化装渔船，乘敌检查，突然开火，勾住敌汽艇，向舱里扔手榴弹，用短刀歼灭日本强盗。蒿草地带的村庄，稠密的河叉港口，成群结队的渔

船,都是转移和反‘扫荡’的好地方。游击队不但坚持在海岸上,还能开展麻雀战,袭击敌灯塔,布置水雷,暗里掩护主力登岛。原始的土制大炮——‘大将军’,曾打下过飞机,打沉过军舰”。

通讯写海上游击队的英勇战斗,也反映出八路军、新四军同广大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因为这个游击队的成员,多数是老水手和渔盐工会的会员。

(二)歌颂战斗英雄人物

歌颂战斗中的英雄人物,是《解放日报》通讯特写的一个重点。1943年3月1日军委政治部发出《关于宣传八路军、新四军各种英雄人物的指示》,朱德总司令又发表了题为《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的文章,《解放日报》从此更加强了这方面的宣传。

歌颂英雄人物的面很广,有神枪手,机枪手、投弹英雄、神炮手;有工兵,骑兵,铁道兵、侦察兵,炊食兵,锄奸队;有连长、指导员、班长、老战士、新战士、民兵、民兵队长、游击战士;还有青年、妇女、儿童团、老妈妈等。肖三还为朱德总司令的警卫班长写了一篇《警卫英雄李树槐》。

在人物宣传的写法上,也是不拘一格,有详述,有简写,有新闻,有通讯。有的是通过战役写人物,多数是群英谱,如《大盘营战斗的勇士》、《郟城歼灭战的英雄》、《民兵和地雷》等等;有的只写一个人,如《神枪手王德兴》、《投弹英雄田德银》等等;有的写一人一事,如《神枪手民兵小队长交西崔三娃受奖》;有的写一人多事,如《女英雄张吉兰》;还有的连续发表一个人的战斗英雄事迹,如1943年9月发表了《模范青年战斗英雄吴士正》,到1944年又先后发表了吴士正在战斗中的系列英雄事迹:《夜摸向阳店》、《夜袭下马城》、《吴士正暗袭窑下村》等。对于普通一兵和普通老百姓在抗战中的英雄事迹,歌颂得更多。《汾河妇女火烧战船》,写的就是汾河边上的妇女,为了阻止敌人坐船在河上巡逻放哨,用巧计烧掉敌人20多条船。《两个机智的小战士》,写的是一个16岁、一个12

岁的小战士，战斗中被敌人俘虏，他俩表面装作“老实”干活，心里却时刻想逃跑归队。一天夜里趁日本队长喝得烂醉，他们摸到敌队长的公文包，巧妙逃出，白天躲在沟沟里，夜里急忙赶路，两天两夜，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队伍。负责同志打开公文包一看，里面装的竟是敌人对晋西北“扫荡”的计划。歌颂人民群众英勇抗敌的通讯，经常在报纸上出现。《掷弹筒英雄徐力强》，是写铁路工人徐力强看见主力部队的掷弹筒威力大，便自己琢磨试验仿制，经过几次失败，终于成功。敌人来抢粮，他们瞄准放了一弹，正中敌人阵地，“八路军大大的有，开路的！”敌人知道游击小组没有掷弹筒，立刻逃跑了。《从民族灾难中锻炼出来的鲁南人民》，写出了鲁南人民在血和火的战斗中，锻炼出英勇不屈的精神，灵活多变的战术。鲁南人民善于打麻雀战，占山头，打埋伏，配合主力打伏击，是他们的家常便饭，“老百姓把打仗看成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订了个公约：敌人来了咱就裂（裂，干的意思），裂不过，咱就跑，跑不了，装‘好’人。再逼紧了，全村搬家。”他们就在这个公约号召下，创造出许多英雄事迹。

1944年各根据地先后召开了表彰奖励战斗英雄大会，《解放日报》紧密配合宣传。中共晋察冀分局、军区政治部及晋察冀北岳区最先召开战斗英雄大会，奖励104人，《解放日报》对授予晋察冀边区子弟兵战斗英雄的邓世军、爆炸大王李勇、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等英雄事迹，都不止一次地宣传报道。特别是战士们亲热地称呼“妈妈”的戎冠秀，更是比较详细地写她救护伤员，为过往军队解决困难等许多动人事迹。

（三）烈士英灵不朽

在残酷的战斗中，有无数中华儿女英勇不屈，壮烈殉国，《解放日报》上经常发表歌颂烈士、歌颂他们那动天地、泣鬼神英烈事迹的通讯特写，他们的事迹传颂人间，他们的精神永存世上。《英勇不屈的战士》、《清西血战》、《在反“扫荡”中》等等许多这样的篇章。其

中沈重写的《棋盘陀上的五个神兵》最为感人，事迹神奇，写得精采。虽然发表时间迟了（事情发生在1941年9月25日，通讯发表在1942年5月26日。迟发的原因，一是战争环境通讯条件差，二是事情发生两个月后曾发过一条短新闻《狼牙山三勇士忠烈千古》），但是在敌人疯狂“扫荡”时期，勇士的精神仍然强烈地感召着抗战健儿，重新发表内容详实的通讯，很有必要。通讯写5名青年战士（马宝驹、胡福才、马振林、宋学义、葛振林）英勇战斗，直至跳崖的事迹，歌颂中国人民在强敌面前，宁死不屈的精神。5个人，抵挡3000名敌寇，掩护主力撤退，任务完成了，他们却无法冲出敌围。在狼牙山的制高点棋盘陀上，三面是绝崖峭壁，一面是哇哇叫的鬼子兵，他们毫无惧色，一次次打退敌人的冲锋，使敌寇100多人丧命。到敌人又狼嚎般发起第四次冲锋时，5勇士的子弹打光了，手榴弹都甩出去了，5个人一条心，“咱们跳崖！”他们不把武器留给敌人，砸毁了枪，一齐往下跳。葛振林和宋学义给山腰的树枝挂在半空，绝崖的沟底出现三堆血肉。通讯写道：

“敌人占领了那小块凹地和棋盘陀。风在吼，哀草萋萋。

岸边的日军都惊呆失色了：‘5个的！5个的5个的！’翻译官向清乡队叫喊起来：‘八路军真坚决呵！摔死不投降！’

后来日军进入老君堂，向那个曾经在甲午战争时参加过战争的80多岁的老道，谈起这5个勇士。‘我当过几十年的兵，’老道说：‘还没有见到过像八路军这样的队伍，真是神兵呵！’

‘神兵的？’日本小队长问。老道点点头。日本小队长为神兵所惊服了，他向空礼拜……。”

这篇扣人心弦的通讯，在中华大地有着深远的影响。

对于以身殉国、光荣牺牲的影响较大的我军军事将领，《解放日报》都发表悼念性的文章，其中规模最大、文章最多的是悼念八

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和新四军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司令员彭雪枫。左权是1942年5月25日在麻城反“扫荡”中壮烈殉职的,《解放日报》在6月15日发表左权将军以身殉国的消息,所以迟见报,是基于战争策略问题,有意推迟发表。当天在一版上发表朱德总司令的挽诗:“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还有朱德的文章《悼左权同志》。以后陆续发表了周恩来、聂荣臻、陈毅等多人的挽诗、挽联和文章,并发表了左权的遗作《论军事思想的原理》、《坚决执行精兵政策》等,悼念文章一直到10月15日公葬后才停发。彭雪枫是1944年9月在战场上殉国,同样原因,在1945年1月28日《解放日报》才报道,同天一版发表了陈毅的文章《追忆彭雪枫同志》。以后又发表了延安各界追悼彭雪枫同志的新闻及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悼词,陆续发表了张震、吴芝圃等人的悼念文章。

将政治工作化为强大的战斗力

(一)内部的政治工作

军队内部政治工作内容很多,有爱国主义教育、阶级友爱、热爱群众、尊干爱民教育,和拥政爱民的活动等。《解放日报》对此都进行了宣传,特别是1944年以后,这方面宣传更有所加强。

1944年4月15日报纸以 $2\frac{1}{3}$ 的版面,发表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总结了军队的政治工作,进一步明确今后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方向。他指出: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基本纲领和人民革命精神教育军队,使革命队伍内部一致,使军队与人民、政府趋于一致,军队服从党的领导,提高战斗力,并进行瓦解敌人,协和友军,达到团结自

己，战胜敌人，解放民族和人民的目。这种革命的政治工作和革命的军事工作相配合，就成了革命军队的全部工作。报告批评了不把政治工作看作是群众工作、不从群众观点出发的错误作风。强调实行真正的军党、军政、军民、官兵、上下级、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各部分军队之间一致等基本思想。

《解放日报》贯彻这一精神，展开一系列宣传。鲁中军区开展陈双太运动。陈双太是模范班长，群众观点强，作风民主，关心爱护战士，在鲁中军区被誉为“初级干部学习的榜样”。报道战斗英雄吴士正连队订立官兵友爱公约。发了一些生动有趣的通讯特写，如《一个连队的转变》、《指导员变了》等。在1945年开展的尊干爱兵运动中，这方面的宣传，起到很好效果。

（二）对敌斗争的政治攻势

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是瓦解和涣散敌寇——特别是伪军的有力措施。《解放日报》发表了多篇在我军政治攻势下伪军反正起义的胜利战况。

政治攻势，内容丰富，除散发传单、小册子、唱本、画片等一些宣传爱国、打倒汉奸的文字印刷品以外，报上还介绍了鲁中军区发动群众性的叫子索夫运动，通过这种政治喊话，伪军被争取投诚者1080人。盐阜区利用家属喊话，新四军迫近敌据点，未发一弹，伪军自动缴枪。章邱县敌伪军抢掠民财，从村子里拉走136头驴，老百姓围住据点，家属向伪军喊话，指出抢夺牲口，是自绝后路。伪军动摇了，老百姓在武工队暗中保护下，到敌占区认驴，用低价赎回，家属动员伪军反正。最后，日寇被迫撤掉这个据点。

八路军和新四军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使敌寇心惊肉跳。日伪军编写的《剿共战术》（内容是对新四军战术的研究，1945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开头便说：“赤色烽火，弥漫了整个华北、华中等地区，在淮河境内日益增多，近来更变本加厉，夺地攻城，时有所闻。这是事变以来最严重的问题……。极其可怕。”说我军“善

于远袭、猛攻、缠困”，“牛刀战术”，“掏心战术”。特别对火线喊话和优待俘虏感到畏惧，“新四军每与我对战时，即宣传交枪不杀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优待士兵，深得人心。”“党政军三种力量，为共产党领导群众最强有力的机构，因此军民可以打成一片，好像鱼和水一样密切。”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胜利攻势，促使敌伪军队不断投降起义。新形势下的新问题，是怎样对起义过来的官兵进行政治工作。1945年4月《解放日报》适时地发表社论《旧军队的改造》，一方面讲旧军队改造之必要，另方面打通我军干部思想，提倡发扬民主，不要歧视起义人员。有的起义过来的军官说，原来对八路军的认识是“夏日可畏”，目前已感到“冬日可爱”，而且悔悟自己过来太迟了。

对日军战俘组织他们学习，他们认识提高以后，即可加入“日本人反战同盟”、“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等反战组织。《解放日报》对他们的反战活动，进行各种形式的报道。1944年在《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这样斗争着》的总标题下，先后发表了6篇文章：《用电话和日本兵谈话》（2篇）、《谢谢你的慰问袋》、《宣传工作座谈会》和日本士兵信件的来往、喊话等。

（三）对盟军的友好宣传

盟国军队在华协助国民党军队作战，《解放日报》作了极其友好的宣传，对美军飞机空袭日伪军和轰炸日寇占领城市的报道，数量很多，几乎每行动一次就报一次，多数是简讯，有时也发表社论和文章。如1942年社论《在华美空军战绩》、1944年社论《半年来美军在敌后活动》等等，都给予肯定和赞扬。

《解放日报》还多次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的广大民兵、群众营救国民党军队官兵、营救美国飞行员和美军飞机师的新闻。1944年发表的最多。晋南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军官兵被日寇俘虏。八路军营救并帮助他们返回原队。《解放日报》发表了他们给八路军的联名感谢信。皖中新四军在江中救起了中美混合队第二

大队中国飞机师辛仲连，为他治伤护理，辛仲连在欢送他归队的会上说：“以前在大后方听说你们是‘匪军’，在贵军住了两个多月，所见所闻，才知以前听的全是谣言，你们在敌后艰苦奋斗，正是抗战最坚强的部队。”《解放日报》还多次报道我根据地军民营救美空军人员的事迹，发表美空军飞机师、飞行员联名写给东江游击队的感谢信，信中说：曾经援救我们生命的英勇的游击队员们，我们5个美国航空员，衷心感谢你们。“与我们及我们的朋友们所负欠你们的比较起来，单说句感谢的话是太少了。”“我们美国人曾阅读了和研究了全部历史中的一切强大的军队，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从没有看见有像你们游击队这样勇敢的任何军队。”在敌后军民屡次救护被迫降落的美空军人员的情况下，美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将军致函朱德总司令，感谢中国游击队的营救，《解放日报》也全文刊载。

《解放日报》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宣传，对待敌我友态度鲜明，既反映了国内抗日战争的统一战线，也反映了国际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

关于原子弹与抗战胜利的宣传

1945年下半年在解放区战场我军捷报频传声中，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也进入最后阶段。8月9日，《解放日报》刊登苏联对日宣战，同日一版上发表了美国新闻处、合众社、路透社等8条有关原子弹的消息，标题是《战争技术上的革命 原子弹首袭敌广岛》，下面在副题处作了摘要：“东京承认广岛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十万英尺。敌内阁当日举行会议。”同版还另发合众社3条消息，标题是《传盟国将发出新公告，促使日寇迅速投降，否则即将以原子弹摧毁日本》；同日第三版对原子弹威力的宣传更为集中：《杜鲁门宣布使用原子弹攻日，此种炸弹较2万吨的TNT的

威力还大，较英国顶大的巨弹爆炸力大 2000 倍》、《英报评原子弹》、《阿特里及史汀生谈原子弹的发明经过》、《美报评原子弹的发明是科学与战争的革命》都是宣传原子弹的威力。8 月 10 日，第三版上刊登《原子炸弹又炸长崎》及《一个原子炸弹威力的估计》等多条消息，除一条短新闻引用《基督教箴言报》说：“原子弹能不能赢得和平，对它作过高估计是荒谬的。”其余都是宣传原子弹的杀伤威力，广岛、长崎遭受毁灭性的灾难等。给读者的印象是：原子弹解决了战争。

毛泽东同志看到报纸以后，找乔木、余光生（总编辑）和陈克寒（副总编辑）谈话，指出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样过分宣传原子弹的威力，是政治上的错误，批评得很尖锐。批评的精神正如他后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所写的那段话：

“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同志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经常拿在手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却经常丢在脑后。”

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比写出来的这段话，还要尖锐严厉。毛泽东同志要他们改造思想，像打扫灰尘一样，把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扫除掉，办好党的报纸。在批评的同时，毛泽东同志对新华社和《解放日报》宣传报道中好的方面，也给予了肯定，主要是对国

民党宣传斗争中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和内容,表示满意。

8月15日,《解放日报》刊登了《美苏英中四国宣布 日寇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16日一版发表了延安市庆祝日寇无条件投降举行火炬游行的消息,消息把火炬游行的欢腾景象,写得情景交融,十分动人,结束语是这样写的:“全市灯光、彻夜未灭,中国人民在极度狂欢中,没有忘记摆在面前的紧急任务,把在华敌伪军全部解除伪装,把8年来人民艰苦抗战果实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

解放战争时期

日本投降以后,国民党当局完成战争准备,从1946年6月起,向解放区发动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战争初期的形势相当严重,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的对比,国民党占优势。当时国民党的正规军约有200万人,相当一部分是美式装备,而人民军队的总兵力为127万人,装备基本上是缴自日伪军的步兵武器,仅有少数火炮。在这种形势下,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经过分析判断,坚信蒋介石的进攻,不但必须打败,而且能够打败。确定的政治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军事方面强调必须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作战方法,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

《解放日报》在停刊前(1947年3月27日)遵照党的军事政策,积极宣传自卫反击。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及时提出宣传策略,有时还亲自撰写新闻和通讯,使《解放日报》的军事宣传,既具有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威力,又富有鼓舞士气、教育人民

的作用。

围绕受降的尖锐斗争

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中国大地各个战场上,围绕接受日寇及伪军投降、收缴其武器的问题,展开了极其严重而尖锐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理所当然地在日军投降后有权接受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然而在8月11日(日本尚未投降)蒋介石便命令18集团军“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不许向敌人收缴枪械”。而给国民党所属各战区将士的命令则是:“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解放日报》对蒋介石这种错误的、不公正的命令及其军事行动,展开了一系列的揭发与斗争。

8月14日,《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刊登了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蒋介石电,坚决拒绝蒋介石错误的、不公道的、违背民族利益的命令,指出:“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侵略者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呢?”并告知蒋介石:朱德总司令在8月10日已下了一个命令给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叫他们在加紧作战时,必须命令侵略者投降过来,将敌伪军的武装等件收缴过来,这样作是完全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对蒋介石“驻防待命”的命令,朱、彭两司令认为:“这个命令是你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蒋介石为什么发出这样极其错误的命令呢?8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德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中讲得清清楚楚。说帖中请三国政府注意中国战场这样的事实:在敌

伪侵占而为国民党政府所放弃的广大沦陷区中，经过我们八年的苦战，夺回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一万万以上的人民，组织了一百万以上的正规部队和二百二十多万的民兵，在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宁夏、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十九个省建立了十九个大块的解放区，除少数地区外，大部包围了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来敌伪所侵占的中国城镇、交通要道及沿海口岸。此外，我们还在中国沦陷区（在这里有一万六千万人口）组织了广大的地下军，打击敌人。在作战中，我们至今犹抗击和包围着侵华日军69%（东北四省不在内）和伪军的95%。而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敌伪，主要的是采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的方针，其军队的大部不打敌伪，退至大后方，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中国国民党政府对于中国解放区及其军队，不仅不予承认，不予接济，而且更以九十四万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包围和进攻解放区。说帖提出：中国国民党政府及其统帅部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沦陷区的人民和抗日武装；中国解放区、沦陷区人民武装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之日伪军投降；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同盟军接受日本投降及将来的和会与联合国会议；请美军立即停止对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不能援助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

8月17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朱总司令发出的通电，要求蒋介石制止内战。通电除揭露蒋介石不准中国解放区抗日军队接受日伪军投降及收缴其武器的阴谋诡计外，并提出对国事的六项具体要求。主要原则是：凡被解放区军队所包围的敌伪军，应由解放区军队受降，蒋军则接受被蒋军包围的敌伪军的投降。同时警告蒋介石：这不但为一切战争的通例，尤其是为避免内战必须如此，如果你不这样作，势将引起不良后果。

就在这条消息的前面，有一则加了框的新闻，那是毛泽东同志代新华社写的一条新闻，内容是：“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主席蒋介石，

14日发了一个电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请他去重庆讨论国事,没有提出讨论的范围与内容。16日毛主席答复蒋氏一电,要蒋氏对朱总司令给蒋氏电中所提关于国事的具体意见表示他的意见,然后考虑会见问题。毛主席电文如下:重庆蒋委员长,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毛泽东未跳。”

同一天版面上,在社论的位置还发表了一篇题为《人民公敌蒋介石发出了内战信号》的评论,也是毛泽东同志写的。评论是针对蒋方发言人1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委员长的命令必须服从,忽视委员长者将被认为是人民公敌,并应以军事纪律处置。”评论尖锐地指出:“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全面内战的信号。”评论从历史上分析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一贯行径:1927—1937年发动十年内战;日寇入侵后,中国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则坚持“先安内后攘外”。直至西安事变,才被迫停止内战,实现抗日。就是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在1940、1941、1942年还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将其发展为全国范围的内战,只由于全国人民及盟邦人士的反对,才未实现。他不得不把全国性内战改期到抗战结束时,这就来了本月11日的命令和15日的谈话。蒋介石为了爆发内战,已经发明了种种词令,如所谓“异党”、“奸党”、“奸军”、“叛军”、“奸区”、“匪区”、“不服从军令政令”、“封建割据”、“破坏抗日,危害国家”……这一次又增加一个新词令,叫做“人民公敌”。其实,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指的是谁。评论接着剥开了这个人民公敌的画皮:“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1927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

蒋介石……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评论义正严词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一事所取的方针，是明确的与一贯的，这就是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认为新的内战将是一个灾难。”评论说：共产党认为，内战是可以制止与应该制止的。共产党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就为制止内战。现在蒋介石拒绝了 this 主张，致使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对付蒋介石这一手，是完全有办法的。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力量，由人民解放军占大城市与解除敌伪武装，如有敢于进攻人民的独夫民贼，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使内战挑拨者无所逞其技。这就是办法，也只有这个唯一的办法。

《解放日报》一方面申明共产党的主张，驳斥蒋介石的谬论，一方面以较多的版面，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解放沦陷区，接受日伪投降，收缴敌伪武器。到9月13日，一版刊登新闻“一个月来我军收复城市560座，俘敌伪军10余万人，缴步枪10万支，各种口径炮200余门，山东大部已告解放，冀鲁豫地区解放半数以上界份，江淮区解放27座城市，苏皖江北地区连成一片……”每天版面上都有解放或光复某地、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振奋人心的消息。

就在人民欢呼解放的时刻，蒋介石一面玩弄假和平手段，以拖延时间，调动兵力，一面积极备战，利用一切力量——甚至利用敌伪力量，企图阻止并消灭中国共产党及人民的武装队伍，《解放日报》对此给予坚决揭露并回击。揭露何应钦致岗村的所谓“受降补充事项”中所规定的：日军要用武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以及人民武装所占领的地区，要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收部队”。在蒋介石怂恿和指使下，日寇大规模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经过英勇血战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地区。山东博山、淄川，河南封邱、延津、安徽裕溪口等已解放的许多城市，再度为日寇铁蹄所践踏。蚌埠在被劫收以后，敌伪天天杀人，淮河水中漂浮着无辜人民的尸体。在平

汉、正太、津浦、胶济、陇海、同蒲、平绥等地铁路沿线，日寇四处骚扰，进犯解放区。对这些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解放日报》不断揭发，并发表社论，使蒋介石勾结日伪、残杀人民的罪恶大白于天下。同时还转载国际舆论对中国战区这种现象的谴责，如《纽约论坛报》史蒂尔写道：“日本的投降，对中国沦陷区的千百万人民是不真实的，理由是：日本仍在控制着。”该报9月14日的社论中称中国战区内“要做的第一件工作，依然是实际的解除投降日军的武装并遣返日军。”

《解放日报》对蒋介石利用在华美军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日伪军投降，也进行了揭发和抗议。美国军队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动用陆海空军的力量，大量运送国民党军队，参加进攻解放区，扩大中国内战。《解放日报》除刊登朱德总司令致中国战区美军司令魏特梅耶抗议书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求美军撤出中国的活动和函电外，更多的是报道美军在华的非法军事行动。据统计，1945年10月至同年年底，仅仅4个月的时间，《解放日报》报道在华美军的各种非法军事行动，就近40条，其中有：美军先后在塘沽、烟台、青岛、秦皇岛登陆，在其保护下，国民党军队也在各港口陆续登陆；美军舰运送飞机、汽车、野炮、坦克等各种武器至青岛，支援国民党军队；国民党5个军由美械装备、美军训练，又由美舰运至山海关一线，由美军人员帮助指挥，进攻解放区。更有甚者，美军帮助国民党军队进犯冀东解放区，侵犯辽西，陷我豫北漳城；美军布防北宁线；帮助国民党军队完成长城沿线进犯张垣、承德的准备……美军飞机进而对解放区肆意侦察骚扰，飞临沂等地扫射和平居民，在平绥路上扫射我火车头，侦察察南、喜峰口等地，并成群结队连续侦察玉田、丰润等地。

针对在华美军的各种非法军事活动，《解放日报》不断发表社论和评论，《抗议美军炮轰卢龙乡村惨案》，就是其中的一篇。社论指出：美军炮轰卢龙，没有任何可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第一，卢龙

乡村没有日军,美军没有“协助受降”的借口;第二,卢龙乡村不在铁路线上,美军没有“护路”的借口;第三,卢龙没有美国人的生命财产,美军没有“保护生命财产”的借口。社论一针见血的戳穿:“这种无法无天的手段,只有帝国主义侵略者对付殖民地才采用!美国竟用来对付同盟国的中国,不能不唤起一切爱国的中国人、一切主张人道的美国人和全人类的共同愤怒与严正抗议。”

戳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民主、团结、建设的主张而奔走呼吁,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亲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先后签订了《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停战协定》……中国共产党曾履行自己所允诺的让步,命令江南新四军北撤,《解放日报》如实报道了新四军北移时群众依依相送的动人场面:《苏南人民泣别新四军》、《谁好,谁坏?人民是最公正的判断者》等等纪实通讯,写得十分感人。然而蒋介石却利用“和平”和“停战”之机,积极准备并实际发动内战,蒋军对解放区的包围进攻,日益扩大。对此,《解放日报》以大量事实,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假停战真内战的阴谋诡计。这里只举一例。

1945年11月6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刊登了《中共发言人驳斥吴国桢撒谎 历举国民党军进犯铁证》的新闻,就是用铁的事实把蒋介石的谎言批得体无完肤。这条新闻是毛泽东同志写的。原文如下:

(新华社延安5日电)合众社4日重庆电报道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国桢称:‘政府战斗中均居守势及恢复交通问题。’本社记者特此询问中共方面发言人。中共发言人告记者称:吴氏所说“守势”云云,全系撒谎。除浙东、苏南、皖东、皖南、湖南五个

解放区我军撤退，全被国民党军队进占，大肆蹂躏人民外，其它大多数解放区，例如广东、湖北、河南、苏北、皖北、山东、河北等省，共有正规军70余师，已经开到我解放区及其附近，压迫人民，进攻我军，或准备进攻。正在开进者，尚有数十师。这难道是取守势吗？其中由彰德北进一路，攻至邯郸地区之8个师，2个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6个师（其中有3个美械师）在我解放军举行军民自卫的反攻之后，始被迫放下武器，其中有副长官、军长、师长多人，他们均可证明他们系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之全部真情。这难道也是取守势吗？我豫鄂两省解放区军民，现被第一、第五、第六等三个战区的军队共20几个师四面包围，刘峙任该区剿共总指挥。我豫西、豫中、鄂南、鄂东、鄂中等处解放区，均被国民党军队侵占烧杀，迫得我李先念、王树声等部无处存身，不得不向豫鄂交界地区觅一驻地，以求生存，但又被国民党军队紧紧追击，这难道也是处守势吗？晋绥两省，阎锡山、傅作义一贯勾结敌伪，攻入我上党解放区襄垣、屯留区域，被当地军民在自卫战中全部缴枪，被俘人员中亦有军长、师长多人，他们现在我太行解放区，一个个活着，足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奉命进攻之全部真情。此次阎氏在重庆报道他们如何被攻，而他们仅取“守势”，种种说话，他大概忘记了他们的19军军长史泽波，暂46师师长郭溶，暂49师师长张宏，66师师长李佩膺，68师师长郭天兴，暂37师师长杨文采等位将军，现在正住在我解放区，足以驳斥吴国桢氏、阎锡山氏及一切挑拨内战的反动派的任何说话。傅作义奉命进攻我绥远、察哈尔、热河三省解放区，已两个多月，曾打到张家口的门口，占领我整个绥远解放区及察哈尔西部，难道这也是取“守势”和未放“第一枪”吗？我绥、察两省军民起而自卫，在反攻战斗中，亦俘掳大批官兵，他们都可以证明他们是从何处开来、如何进攻等等。在各次自卫战争中，

我方剿获大批“剿匪”与反共文件，其中有某当局所颁发而为吴国桢氏所称为不过是“笑话”的《剿匪手册》，“剿匪”命令及其它反共文件，正在向延安解送中。记者又问中共发言人，吴国桢氏所提恢复交通办法，你的意见如何？该发言人率直答道：这不过是缓兵之计而已。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欲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9、10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伪军及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先解决交通问题，后解决三项问题呢？还是先解决三项问题，后解决交通问题呢？解放区军队艰苦抗日八年，为什么没有受降资格而劳其它军队从远远的地方开去受降呢？伪军人人得而诛之，为什么一律编为“国军”，并且指挥他们进攻解放区呢？地方自治，《双十协定》上已有明文规定，孙中山先生早主张省长民选，为什么还要政府派遣官吏呢？交通问题应该迅速解决，这三大问题尤其应该迅速解决。三大问题不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之目的。为着迅速制止已经普及全国的反人民反民主的内战，我们主张：一、已经进入华北、苏北、皖北、华中各解放区及其附近的政府受降军队及进攻军队，立即撤退原防，由解放区军队去接受敌人投降及驻防各城市与交通线，恢复被侵占之解放区；二、全部伪军，立即缴械解散，在华北、苏北、皖北者，由解放区负责缴械遣散；三、承认一切解放区之人民民主自治，中央政府不得委派官吏，实现双十协定之规定。发言人说：“只有如此，才能制止内战，否则是完全没有保障的。绥远、上党、邯郸三次自卫战斗中所剿获之文件及大举调兵与大举进攻之实际行动，已充分证明国民党当局所谓“恢复交通是为着人民，不是为着

内战”，乃是毫不足信的。中国人民被欺骗的已经够了，现在再不能受欺骗。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1946年1月11日，国共双方颁发了停战令，蒋介石趁此机会，进一步调动军队，企图挑起全面内战。《解放日报》5月9日揭露：国民党调动军队达35个军、99个师，兵力在10万人以上，非正规军及伪军的调动尚不计算在内。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这些违背停战协定的非法调动，曾多次提出抗议，要求执行部予以制止和制裁，迫令调动的军队退回原防，并且要求美军方面停止对于这种调动的援助，但是都未获得应有的结果。《解放日报》在《内战危机从何而来》一文中写道：“现在国民党军队正继续进行着和准备着更多的调动，把这个事实与蒋介石坚持东北内战，并在西安、新乡、汉口各地作内战部署，白崇禧在徐州、开封、郑州、新乡、西安、济南各地作内战布置，鄂东、豫北、苏北、山东等地形势日趋紧张等事实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知道新的全国的大内战，实已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内战战火愈烧愈烈，战场形势发生变化的时刻，6月30日，毛泽东同志及时地写信给当时《解放日报》总编辑余光生，就揭露蒋军向我进攻的问题，作如下指示：“从现在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之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因为蒋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我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①从此，《解放日报》更加加强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进攻的新闻报道，以唤醒人民，认清蒋介石假停战真内战的反革命两手。报道是多种形式的，有综合战报，有各地区的战报，有国民党军队联合敌伪军和美军进攻解放区的消息，也有美蒋飞机轰炸解放区城乡的消息，还有蒋介石以“治黄”为名，水淹解放

^① 材料来源：中央档案馆。

区,使冀鲁豫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

在发表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解放区消息的同时,《解放日报》还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号召解放区军民奋起展开自卫战争,以及如何开展自卫战争。《坚持被侵占区游击战争》、《到进犯蒋军的后方去》、《普遍开展民兵游击战》等等,反复论述今天的自卫战争,是以运动战为主,辅之以游击战。游击战不但在配合主力军作战时起着重大的作用,而且一定时期在某些被蒋军侵占的地区,甚至是主要的作战方法。评论还一再讲清这个道理:有八年抗战锻炼的民兵和游击队,有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地方干部,有强大的主力军与之配合,特别是实行土地改革后的农民要保住自己的土地,这就使解放区人民开展自卫的游击战有更广大和更坚固的社会基础。自卫游击战的威力,将远远超过抗日战争时期。

《解放日报》对各地区开展自卫战,详加报道,《晋冀鲁豫群情激愤誓予侵犯者以回击,濮阳人民说,华北是老百姓从敌人手中用血换来的,决不能让国民党军队强占!》、《高楼上、大门旁到处摆下地雷阵,平介群众展开爆炸运动》、《千万人结成一支强的力量——中原解放军苦斗记》、《群众游击怒火遍及苏皖敌后》、《冀东游击战火愈烧愈旺》、《制止蒋军内战凶焰——陇海中段我举行反攻》……许多战地通讯,写得生动感人,如《铁弹遍地开花——中阳民兵地雷战》、《涟水保卫战胜利纪实》、《把痛苦变成斗志——苦难重重的中原人民怒吼了!》、《最后五分钟与一颗手榴弹——博山西坡地自卫战斗一角》……都写出了人民自卫反攻的英勇顽强气概。而《“天下第一军”的毁灭——浮山地区蒋军第一军第一师被歼记》,则更写出了两支不同的军队,进行两种不同的战争,得到不同的结果。一支是全部美械装备,号称“天下第一军”的蒋介石嫡系第一军第一师(后改称旅),有的是火箭炮、美式重机枪、“斯登”手提式,还有傲慢松散的士兵;另一支是神速的八路军,使用着缴获的炸弹、机枪、小炮,战士个个机智勇敢,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前者军队是向解放

区进攻,替蒋介石打内战;后者军队是自卫反攻,英勇不屈。结果,前者由傲慢、惊慌、破口叫骂到被迫投降,跪着求命,混杂在士兵中间的还有中将旅长黄正成。通讯最后写道:“‘天下第一军’的称号该放进历史博物馆里去了。让反动派伤心的去痛哭一场吧,可是这样的遭遇以后还多着呢!”本文的作者是金沙·朗朴。

蒋军必败 我军必胜的历史昭示

1946年7月以后,蒋介石肆无忌惮地公开发动全面内战,战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在美军协助下,猛烈进攻解放区,解放区军队英勇反攻,虽然也取得胜利,但是在一些地方,敌我力量悬殊,我军也采取暂时撤退,做战略转移,战争形势扑朔迷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从宣传的战略思想到宣传的具体内容,随时给以明确指示,使《解放日报》军事宣传战役,组织得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

1946年的9月份,毛泽东同志先后写了两封信给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9月9日,陆定一写了一篇题为《蒋军必败》的社论,送请毛泽东同志审阅,并附一信:

主席:

写了一篇社论,乔、漱、弼三同志都看了,弼石同志说还请你看看。待刘、邓第二捷讯来后,再发表。特送上。请斧正。

在战争过程中,宣传上主要目标,为揭露美国,澄清同志中对美的各种幻想,已告先生同志,组织大批文章,从各方面和根本问题上(如民主主义等)来加以揭露,准备它六、八个月,对否?

敬礼

陆定一

9月9日

毛泽东同志看了这篇社论，在陆定一信的前面批“可用”二字，在信的后面又写道：

不但澄清对美幻想，主要澄清悲观思想，指出必胜前途，这是目前的中心问题。

毛泽东

9月10日

这篇《蒋军必败》的社论，是在刘、邓第二次告捷的9月12日发表的。当时，国民党军队猛烈进攻察哈尔，陆定一又写了一篇社论，内容是揭露蒋介石假停战、真进攻的阴谋，这篇社论送毛泽东同志审阅，毛泽东同志没有通过，并给陆定一又写了一封比较长的信，原文如下：

定一同志：

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7月以前是必要的，7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而且有负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够胜利与如何能够取得胜利，尤其是在失了一些地方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在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200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必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以上方针，请加考虑。并与乔木、光生商酌实行。至于为揭破欺骗，仍应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此文可作此项目的之用，但须加以改造。

毛泽东

9月27日

毛泽东同志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和全国军民的思想状况，在关键时刻确定了宣传方针。陆定一接信后，一面迅速下达，与《解放日报》有关人员研究讨论，立即贯彻实行，一面又重新写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毛泽东同志顺利通过，只改了一个题目和几处文字，这就是1946年10月3日《解放日报》上刊登的社论《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社论从蒋军进攻张家口一事，说明美蒋破坏1月停战协定，揭穿美蒋关于和平的种种谎言，然后指出敌方不利和我方有利的条件：蒋介石有军心厌战、民心背逆、经济危机、兵力不足等致命弱点，而我方则是士气高涨、兵员补充增多、作战方法进步、广大解放区解决了土地改革问题，因而蒋介石无法占领。社论明确告诉人民也向敌人宣布：“我们目前是消灭进犯军的有生力量，到一定时机则转入反攻。社论最后敦促蒋介石，如果真想和平，就应该自动恢复1月停战协定的神圣位置。

《解放日报》对毛泽东同志在关键时候所作的指示，贯彻起来抓得紧，行得快，整个版面迅速显示出指示的精神。“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仅在10月一个月內，就发表了9篇有关我军胜利的社论和时评。《平汉北线之捷》、《平绥前线初胜》、《蒋介石“凯旋”好梦的破灭》、《南北两捷》、《半月三捷》、《好战派必将自食其果》等等，都是从具体战役的胜利进行分析，得出蒋军必败的结论。冀鲁豫刘邓大军的五次告捷，《解放日报》有的是自己撰文祝捷，有的转载冀鲁豫《人民日报》的社论，都能振奋人心，鼓舞士气。“每失一重要地方，必写一短文解释之”，《解放日报》上也体现了这一精神。《我军撤离张家口》、《我们还要回来的——承德撤退记》等等报道和通讯，都是写的我军在撤退时，军民懂得战略转移的道理，对未来胜利充满信心。记者华山写的《我们还要回来的——承德撤退记》，是受新华总社通报表扬的稿子。通报说：通讯“以简洁生动的文字，写出承德人

民‘眼前的难受和对未来胜利的信念’。内容均系典型生动事件，说明该记者采访之深入社会，最可贵的是作者的感情与人民的感情完全融合。”对于我军突破蒋军的包围和追击，《解放日报》也作如实报道，有的还大张旗鼓地连续报道。如王震率所部359旅突围回到延安，《解放日报》不但发表消息，而且连续发表通讯《正义的大旗——贺王震将军胜利往还》、《会师垅东》、《夹道欢迎王震将军》，在《欢迎359旅胜利归来》的社论中，叙述1944年国民党军队在豫、鄂、湘、桂节节败退，359旅奉命南下，挽救危局，转战豫、鄂、湘、赣、粤等省，给日寇以重大打击。日寇投降后，359旅遵照双十协定，从湘、赣等省撤出，和新四军第5师会和，参加中原军区的和平民主建设工作。对于这一支优秀的人民军队，蒋介石却要彻底消灭，今年6月以后，发动了对5师和359旅的全面围歼，蒋介石还狂称要在48小时内把他们全部消灭。但是，社论说：“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军队是消灭不了的。他们来自人民、依托人民，而人民是永生的，无敌的。因此尽管蒋介石用了几十万大军去包围、封锁、追剿、堵袭，我们的5师和359旅都冲破了重重阻难，胜利地突围了。”“拖垮和溃散的，不是我们5师和359旅，恰恰是‘内战内行’的国民党军队。蒋介石和程潜曾经忍着隐痛宣布：‘李先念部已全部消灭。让这些阿Q们作得意的谎言吧！中原部队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锻炼得更坚强了。’”

以上这些宣传报道，据实以告，据理以陈，使读者不是只看到眼前，看到表面，而是充满信心地看到将来，看到本质。在一时战场上出现“乌云压城城欲摧”的形势下，这样宣传起到了良好效果。

《解放日报》这一时期的军事宣传，不仅限于一时一地、一役一战的报道，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作一次系统的总结，告诉人们战争的总体形势。例如1946年11月4日发表的《论战局》，就

是这样的文章。这是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第4个月。文章先用4个重要数字，来观察战局：第一，10月份蒋介石进犯军被歼8个旅，加上以前的25个旅，共为33个旅，占蒋介石进犯军的1/6；第二，整个形势还是蒋攻我守的时候，由于蒋军兵力不足，已经出现了我军在局部地区的反攻；第三，解放区自7月以来，被蒋军侵占县市117个，解放区现有县市378个，而县城被占的地方，广大的乡村，大部仍在解放区军民手中；第四，蒋管区农民起义的民变武装，已达13万人。文章接着分析敌我双方的战斗形势：蒋介石为补充其兵力不足，采取三种办法，一是战术上更加谨慎小心，不敢分散冒进，往往在正面集中4至7个旅，齐头并进，然而这办法不但没有什么效果，而且产生新困难，即兵力集中一处，其他地方又空虚了；二是抽调南方军队，增强前线，这样做后方空虚，农民起义就容易；三是抓兵，给遭歼灭性打击的蒋军部队，补充新兵，但缓不济急，较长时间不能恢复原有战斗力，而且抓兵引起各阶层强烈反对，促成民变的爆发。在这种情形下，蒋军占地愈多，兵力愈分散，被歼者愈多，兵力愈不足，这是无法挽救的。解放区方面，4个月来失去一些城市，但未削弱我们力量，相反，由于失掉了和平幻想，我军却是愈战愈强。冀东的例子说明，失去县城，不能使我们消灭，也不能减低我们的战斗力。当然，在失去地方的时候，也会引起震动，但那是暂时的。主要是消除太平观念与和平幻想，立下同敌人坚持苦斗的决心。文章最后写道：四个月的总结就是：蒋军必败，我军必胜。4个月的战斗，已使战局达到这样一个境地，即是只要继续过去的努力，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蒋军占领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我们就可以在短期内由战略守势转到战略反攻。

1947年《解放日报》发表了《艰苦奋斗，迎接光明》的新年献词，实事求是地指出：1947年将是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日益临近光明的年份，也是一个十分困难的时期。文章在提出主要困难

和克服困难的方法之后，客观而中肯地分析：“我们的困难，乃是胜利中的困难，是新中国诞生中的困难”，“反动派遇到的困难，乃是没落中的困难，死亡中的困难，是绝对无法克服的困难。”文章帮助人们看清形势，正视困难，增加克服困难、迎接光明的信心。

以上这些宣传，都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宣传方针。

人民解放军将军纵论战局

《解放日报》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事宣传，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宣传内容，那就是解放军将军纵谈战局，这主要集中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当时，蒋介石出动大军，对我军进行包围堵击，我军机动灵活，采取各种战略战术，一方面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一方面保存实力，不惜一城一地的得失，不看一时表面的胜败，而是该打则打该退就退，伺机反攻，以夺取最后的胜利。前线将军们以实战经验分析战局的发展，指出敌人的弱点和我军的优势，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广大军民更加增强我军必胜的信心。将军们的谈话，生动具体，各有特色，有的从具体战役分析战局，有的从军事理论纵论胜负，都令人折服。下面按时间顺序选录一部分。

1946年8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滕代远将军的谈话。谈话认为根据实战的经验，大量消灭对方有生力量，才是决定最后胜负的重要因素，一城一地暂时的进退，无关重要。此次苏中自卫战争中，不但消灭进犯军5000之众，而且缴获武器之多，是华中空前未有。这充分证明我有力量保卫解放区、战胜反动派的进攻。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依靠群众，不骄不馁，胜利完全有保证。滕代远将军最后表示：反动派一日不停止进攻，解放区军民便一日不停止自卫抵抗，反动派力量日益分散，深入解放区，必遭我军更有力的打击。在进攻解放区同时，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残

酷镇压民主运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这种倒行逆施，正说明他们腐朽衰弱。我们不希望战争，我们被迫坚决自卫，也是为了保卫和平民主，只要反动派停止进攻行动，退出侵占区，则和平随时可实现。

9月26日曾经指挥苏中新四军自卫战七战七捷的新四军华中野战军司令粟裕将军，就新四军主动撤离淮阴、淮安（简称两淮）两城后的华中战局发表谈话说：蒋介石在美帝直接支持下，以4个军（现改成师）的兵力，侵入我淮阴、淮安两城，对于华中的自卫战，并没有决定意义，我军撤出两淮，决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的开始。人所周知，我们所进行的运动战，胜负不决定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决定于有生力量的消长。如果我们的有生力量没有损失，则某些城市的暂时放弃，正可以分散敌人的兵力，而造成有利于消灭敌人的条件。如在苏中，我们虽然暂时放弃了如皋、海安两地，但我们歼灭了蒋军7个师。6万余蒋军侵入两淮，也必然造成苏中同样的结果。可以告诉大家：在两个多月的苏中自卫战中，我们的主力军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格外壮大了。人数增多了，武器加强了，技术提高了，我军是有足够力量保卫华中的，主力军只会愈战愈大，愈打愈强。当然我们并不喜欢打仗，但是蒋介石既然打来了，我们为了自卫，不得不还手。我们曾说过：“淮阴郊外将成为蒋介石进犯军的坟墓”，这句话并不因为淮阴的暂时放弃而改变。入侵淮阴、淮安的蒋军，终必歼灭在这些土地上。但必须弄清楚，华中的自卫战是相当长期的，就是歼灭了反动派这次进攻的半数以上部队以后，蒋介石还可能再组织第二次、第三次的进攻，所以我们的主力兵团，应加倍心细胆大，勇敢谨慎，坚决执行命令，彻底完成任务，一次接一次地歼灭进犯蒋军。我们所进行的自卫战争，是人民战争，为保卫人民而战，为促进全国和平民主而战，军民互助如手足，融洽如一家，这是战胜反动派的基本条件。蒋军必败，胜利一定属

于人民。

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针对蒋介石进攻华北解放区，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发表谈话，登在《解放日报》10月21日的第一版上。聂将军说：“蒋介石依靠外援，违抗民意，不顾他自己人格，撕毁他亲手签定的一切决议，悍然进攻我解放区。最近又冒天下之大不韪，甘负全面破裂的责任，调动9个军的兵力，东西夹攻我张家口。我晋察冀军民处在蒋军美械部队、飞机大炮猛烈攻击之下，从9月29日至本月13日，坚持半个月，屹然不动，而各处进犯者反被我军歼灭万余人。现虽撤出张垣、怀来，但我军实力却毫未受损，相反的，今后我解放区军民更加自由主动地实行全面抵抗，继续大量歼灭蒋介石进犯军。蒋介石为推卸他的内战罪责，保持他非法侵占地区，又于本月16日提出所谓“和平解决”的8项要求，但是蒋介石在过去14个月无数次地破坏和平，拒绝和平，而到了侵占张家口以后，才一面进攻一面提出所谓“和平条件”，他还想再欺骗人民。我代表晋察冀军民宣布：除非蒋介石撤出张家口、承德、集宁和今年1月停战协定后非法侵占的一切地方，忠实执行他自己签订的停战命令与政协全部决议，才有和平谈判可言。否则，我们全区军民，一定和全国各解放区军民一起，坚决奋斗到底。蒋介石不退出每一处非法侵占的土地，我们一定用血肉夺回来！蒋介石发言人夸口说3个月到5个月就可以消灭解放区，我可以告诉他：不要说3个月5个月，就是30年50年也休想实现这个梦！相反的，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张牙舞爪的侵犯者，如不悔过，一定要像努连堡的法西斯罪犯一样，带着自己的梦想走入坟墓！他们的坟墓之一，就是在伟大的8年抗战最前线的晋察冀边区！”

11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刘伯承将军畅谈冀鲁豫战局。这是记者朱穆之在鄆城大捷之后，赴前线某地访晤刘伯承将军的谈话。原文如下：刘将军精神焕发，为记者纵谈目前战争之形势：

“三个月来，我们以冀鲁豫 17 座空城换得蒋介石 6 万多人。据说蒋介石认为这是一宗好买卖，还要坚持做下去。好罢！就让他做下去吧！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算出总帐来的。”

刘将军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主力的保存或丧失，存人失地，地终可得，存地失人，必将人地皆失。钜野战役，即为一例，我歼灭蒋军西线主力整 3 师及 37 师共 4 个旅，使蒋军西线全线崩溃，其占领我东明之左翼，也不得不撤退，东明重归我手。因此，蒋军主力为我消灭到一定程度时，蒋军将不仅无力进攻，也将无力可守。在我保存的优势兵力攻击之下，也终须将所占城镇吐出来。刘将军认为目前的此种形势已日益接近，再消灭相当数目蒋军主力，我军大举反攻局面即将出现。接着，刘将军用冀鲁豫前线的变化，来说明了这个道理。冀鲁豫前线国民党王敬久集团 9 个旅，刘汝明集团 6 个旅，孙震集团 7 个旅，共 22 个旅，其中被我歼灭者，有刘汝明集团 3 个半旅，孙震集团 4 个旅，王敬久集团亦被我消灭 1 万人。现存国民党军 15 个旅，而其中 8 个旅也已被我重创。刘将军说，看蒋介石能有多少 8 个旅？能有多少 6 万人？如果他愿意，我一定还可再拿几个空城，换得他的第二个 8 个旅，第三个 8 个旅，第二个 6 万人，第三个 6 万人。

刘将军更精辟地指出：死守一城一地，无异自背包袱，如果我们在不必要时，毅然放弃某些城市，那么我们就将被迫分散兵力，处处防守，而处处挨打。刘将军笑着说：“可是我们把这些包袱，一个个给蒋介石加起来背上了，他背得越多就越重，就越走不动，蒋军在冀鲁豫仅残存的 15 个旅中，有 10 个旅被迫困守着 17 个空城，仅余 5 个旅可做机动部队，如果蒋军减少守备兵力，增强机动兵力，那么守备兵力被我一个个歼灭的危险就更大，如果减少机动兵力，增强守备兵力，那么就无法进行作战。相反，我军因无守城镇之累，部队集中机动，随时可以优势兵力攻击与歼灭其任何一点。这个矛盾蒋军是极难解决的。这种形势最好地说

明了：蒋军的兵力，已极度分散，其攻势已达顶点，其在战略上的主动，已开始转为被动。刘将军极其深刻而又诙谐地说：“蒋军暂时占领的那些城市与碉堡，都是我们最好的箝制部队，他们替代我们把蒋军紧紧地围困在那里，等待我们一个个去消灭呢！”

记者谈及蒋军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术时，刘将军认为只有兵力十分充足，方能收其效果。但今日蒋军兵力，已极空虚，一个月前蒋军主力第5军及整11师，遭受挫败后，东拼西凑，只调来整75师两个旅的疲惫之师，以后即再无补充，蒋军以现有兵力既要集中进攻，又要集中防守占领之城镇及保护漫长的供给线，是“熊掌与鱼不可兼得”，其结果必为顾此失彼，这正是蒋介石不可克服的致命的弱点，此次郅城战役，正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刘将军承认蒋军火力颇强，但认为由于我军夜间作战及突然迫近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全凭刺刀肉搏，蒋军的重兵器，几陷于无用之地，尤其蒋军士气很低，这次战斗很多人放下武器，因此，纵有美式装备，也无法改变其失败的命运：

至此，刘将军特别指出，我军胜利的主要因素，在于我军士气日盛，这是因为我们是正义自卫的战争，士兵都是翻了身的人民，他们为保卫自己的翻身果实而战，因此，他们在战斗中莫不奋勇向前，以一当十。刘将军特别赞扬守卫龙垌集战士，他们以寡敌众，敌人进攻的火力，虽有如一片火海，而他们坚守阵地达11昼夜，始终未后退一步，完成了上级的任务。刘将军认为这也说明了：如果我军必要坚守那一点时，我们是不可攻破的。

12月7日，《解放日报》一版又发表《刘伯承将军再论蒋军致命弱点》。在濮（阳）、滑（县）战役之后，记者朱穆之再访刘伯承将军，请他以权威军事家的资格，谈谈蒋介石的战略战术。刘将军说：“蒋这次使用的是乌龟战术，即步步为营。他另外还有一套是并进长追。从今年8月10日的100天内，在冀鲁豫我跟他打了5仗，消灭他11个旅。第一次陇海之战，他是步步为营，我消

灭他两个旅；第二次是定曹之战，他改成并进长追，送掉他十个旅；第三次龙垵集战役，又是并进长追，送掉一个半旅；这一次又换成步步为营，采取所谓战略的进攻，战术的防御了。总而言之，这一套吃了亏，换那一套，那一套吃了亏又换这一套，有时候两套都带一点。刘将军说，蒋介石致命的弱点，在于他所进行的是出卖祖国压迫人民的战争，而现在乃是人民的时代，无论哪一国军事学说，守备兵力必须大大的小于机动兵力。但他要卖国独裁，就要压迫人民，就一定加强守备兵力，他现在用于守备的兵力太大，第5军11师这样完全的美械部队，都不得不拿来守备，并且他现在规定一营人都不打仗，每个地方守备兵力都在一营以上。他们对我们有三怕：一怕夜战，二怕野战，三怕白刃战，而且他把部队集中到前线来之后，后方空虚，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

在蒋介石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时候，11月17日《解放日报》刊登彭德怀副总司令到边境视察归来，纵谈保卫边区必胜的新闻。彭副总司令说：1935年红军长征到陕北，那时根据地只有30万人口，红军只有1万人，而且刚经过长征，疲劳不堪，每个战士只有子弹两颗到5颗，而蒋介石的“围剿”军队，则有东北军5个师，阎锡山、马鸿逵、高双成、高桂滋等各部共计50多个团，10万人以上，四面八方向我进攻，我军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在户县直罗镇一战，就消灭了109师。现在我们的情形大不相同，根据地比以前大了7、8倍，人口多了5倍，东面靠黄河没有敌人，南面还有陕南等5师互相呼应，胡宗南的攻击力量只能有8个旅，马鸿逵3个旅，榆林方面胡宗南空运了一些部队去，但是没有多大力量进攻，故至多不会超过1935年“围剿”的进攻兵力。胡宗南是败将，1936年边区军队在山城堡消灭过他一个师，最近在晋南被我陈赓将军所部消灭3个旅（原亦师），连他最精锐的第一旅也被消灭了。边区经过10年建设，军民团结，兵

强马壮，物资丰富，并且有整个华北各根据地的帮助，这样还能不打胜仗么？彭副总司令说：只要大家努力，大家坚决地打，保卫边区和延安，可以取得惊人的胜利，可以使胡宗南进犯军一败涂地。彭副总司令着重说到坚壁清野的工作，他号召大家把这件事做好，不给胡宗南抢到一颗粮，这就会大大增加胜利的把握和缩短胜利到来的时间。他指出：边区这几年丰衣足食，大家存粮甚多，必须每户动员起来，把粮食分开多处埋藏，邻村组织互相检查，做到敌人找不到埋藏所在，才算成功。他对于前线军队的斗志昂扬，各地民兵创造和学习使用地雷的热潮，极其赞扬。

保卫延安的宣传策略

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所在地，也是蒋介石蓄谋已久“围剿”的目标。1946年7月中旬以后，在蒋介石指使下，胡宗南曾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计划。由于八路军在其它解放区特别是在陇海前线及晋南的自卫反攻胜利，中原部队的胜利突围与一部分部队抵达陕南，蒋介石的计划暂告破产。到8月2日，蒋介石派美制飞机8架，轰炸扫射延安总部，投弹11枚，机枪扫射子弹约一万发，并调动南线胡宗南，宁夏马鸿逵等进迫陕甘宁边区。在这种情况下，《解放日报》连续发表新闻、社论、文章、《提高警惕 保卫边区》、《紧急动员起来保卫边区！》，告诉边区人民：蒋介石进攻边区的布置，已经大体完成，一定要认清：过去蒋介石几次要打边区，不敢下手，这次一定下手，千万不要以为他这次还不敢下手，对他们存有任何幻想都是错误的。号召全边区人民，坚定胜利信心，增强自己力量，坚决打到底！报纸上充分反映边区军民保卫边区的战斗行动，不少新闻通讯写得生动感人，鼓舞斗志。有的写边区军民紧张备战的各种活动：熬硝造地雷，民兵赶学爆炸，赶筑工事，加

紧练武；“只待伞兵来，战士显身手”……有的写群众支援军队的热情行动：赶做军鞋、踊跃交粮，保证自己的队伍吃饱穿暖……那些写坚壁清野的消息和通讯，更反映出边区人民对敌人的深切仇恨：不给胡军一颗粮、一寸布，饿死他们，冻死他们……报纸上不仅反映出万众一心打蒋匪的轰轰烈烈的行动，还反映出人民和领导的心连着心：杨步浩代表老百姓拜望毛主席，畅谈村民自卫动员情形；林伯渠号召军民奋起歼敌，叶剑英函慰陕甘宁边区前线战士……从报纸的宣传中，看到陕甘宁边区军民铜墙铁壁的力量。

从3月15日已缩小版面的《解放日报》（每日4开2版，报纸上写着“今日一小张”）更加增强了战斗力，更加牵动读者的心。这里只介绍两篇文章和一篇总部发言人的谈话。3月18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一周综合战报》，题目是《绝望的军事冒险开始了》，文章一开头便说“蒋介石对延安的进攻战于13日正式开始了。这是蒋介石绝望的军事冒险，也是蒋介石加速其自取灭亡的步骤。执行蒋介石进攻延安任务的是他的走狗胡宗南，这位常败将军，凭藉蒋介石的信任，曾肆无忌惮地蹂躏西北人民，他这次进攻延安，正给西北人民以向胡宗南彻底清算的最好机会。”接下来便是战报：胡宗南主力在洛河以东，约10个旅，洛河以西为侧翼，约5个旅，13日其主攻部队先行发动，分两路进攻延安，同时出动飞机对延安进行大轰炸，13日轰炸8小时，14日轰炸7小时，并对所有边区各县，每日普遍轰炸与扫射。

3月24日，《解放日报》在《一周综合战报》中又发了一篇文章，题为《李仙州的命运正等待着胡宗南》。文章宣告：西北人民解放军在一切都安排好之后，19日早晨撤出了延安这座空城，胡宗南的军队，同日下午侵入延安。蒋占区各城市的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号外”，又开“庆祝会”，国民党军方头子陈诚狂叫“三个月内可以击溃中共主力”，美帝国主义分子也认为“可以缩短戡乱

的时间了……”。文章虽短，却既有战报，又有评论，既是总结，又是预言，它像一柄锋利的匕首，掷向蒋介石。文章写道：“让这些该死的反动派去高兴吧！蒋介石、陈诚、胡宗南之流这样的‘高兴’不止一次了。远的不讲，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去年10月侵占张家口，他们‘高兴’过，结果是各个战场的惨败。郝鹏举叛变，他们又‘高兴’过，说是‘改变了鲁南战局’，结果11天之后，郝鹏举即被我生擒。2月我军撤出临沂，他们又‘高兴’过，说已经击溃‘山东共军有组织的抵抗’，结果是李仙州7个师的全军复没。现在他们又以到了延安而叫嚣而自得。很好，让他们再‘高兴’些吧！李仙州命运正在等待胡宗南。”接着，文章以亦庄亦谐之笔，点出了蒋介石胡宗南是怎样中了共产党的新空城计而侵进了延安的。“蒋介石及其走狗们正在夸耀占延安的‘赫赫战果’，说‘共军已经溃不成军’，请问蒋介石胡宗南能把所谓‘赫赫战果’的内容公布么？你们能象我们一样对俘虏说得出姓名来么？枪炮说得出号码么？你们所得的是延安一座空城，几架大山和成千上万的空窑洞。此外还有什么呢？反过来我们倒要请问：胡宗南先生的贵部下第48旅旅长何奇将军现在到哪里去了呢？你们能请他发表谈话么？不能的，他已经做无谓的牺牲了。金盆湾一战，我们略加抵抗，你们不是二、三千人就伤亡了么？你们摸动了西北人民解放军一根毛么？西北人民解放军看到你们已经象非洲鸵鸟一样，顾前不顾后，只为了想进延安，知道你们是想藉此在国内为自己普遍失败情绪打气，在国际上是想为尴尬的马歇尔撑撑门面；你们轻装急进，已经不能顾虑到严重的军事后果。蒋介石胡宗南以后就会吃到自己的苦果的，这种情况连美联社记者也都看得出来，他在延安老早看到两次彻底大疏散，延安任何人都公开告诉过他，解放军就不准备守延安。”文章大气磅礴地转向整个解放区战场，以具体的战斗事实，告诫蒋介石：“危机更加明显了”：在东北战场上，蒋军已被歼灭了7个师，胶济路有300余

里被我控制，津浦路方面，中央社虽然一再吹嘘攻入泰安，而蒋记国防部又不得不否认了。在华中苏北大块地区又为我恢复，苏北军区又成立了。洪泽湖四周广大地区又重行解放，鄂豫皖苏边区已有 600 万人民脱离了蒋家皇朝了。台湾自治运动发生后，蒋介石已不得不在前线抽兵了。20 个师是从徐州调走的，20 个师是从苏北抽去的。这是蒋介石捉襟见肘、挖肉补疮的窘态。蒋介石背上延安这个大礼包，他以后必然更加困难。”

1947 年 3 月 27 日，《解放日报》在史家畔出版了最后一期，完成了它的战斗使命。就在这最后一期的报纸上，所登载的消息和文章，能使人民看到胜利，看到希望，看到光明。第一版几乎全版都是来自各战场前线的鼓舞人心的好消息：辽北我军光复长岭，通化东北痛歼蒋军千余；鲁南蒋后游击队如火如荼，广大农村仍在我手；刘伯承将军麾下某部展开磨刀杀敌运动，口号是“磨好刀，多杀敌，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华东解放歼敌比例：前 4 个月毙多于俘，后 4 个月毙少俘多；鲁中大捷后济南蒋军恐慌……整个版面告诉人们：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是大局所定。特别是一版头条发表的《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谈话 卖国贼阴谋必然失败》，更把西北战场上我军对蒋军的戏弄及蒋军注定失败的局势，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节录如下：

关于西北战场蒋军动态，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昨对记者称：24 日胡宗南以 6、7 个旅约 5 万人之众，做了一次武装大游行，由延安游行到安塞，扑了个空，毫无所获。25 日留下了一部分在安塞，其余一部分游行回延安。胡宗南并派出小部，在延安附近李家渠拐岭等地做工事，延长仍在我手。现在延安及其周围，蒋军屯了 11 个旅之众，没饭吃，据俘虏称，已改吃每日两餐。蒋军纪律之坏，已达极点，所到之处，牛马鸡猪被杀尽吃光，老百姓家里的东西被抢光，妇女被强奸。为配合胡军行动，宁夏马鸿逵部 24 日侵占盐池，榆林方面亦有配合模样。傅作义部一部调至大同，

准备进攻晋西北。阎锡山自称他的宣传机关不断猜测中共中央机关哪里去了，其实有些猜测那是白费，我们早就公布过中共中央机关仍在陕北，蒋介石的宣传机关又造谣说某人被俘，某人被击毙，这也是枉费心思，其实他们是一无所获，中共中央和边区一级机关的全部人员无一例外，都是安全的。发言人说，蒋介石要来“打击”中央首脑机关，他的兵力可惜还太少了。须知陕北地区实在广大，加上晋西北就更广大，游行实在太辛苦了，饿了肚子游行已经够苦，还要遭到消灭，那就更苦，看来，反动派的命是苦定了。发言人指出：各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已经积极行动起来，蒋介石的阴谋必然失败。毫无疑义，不要几天，请大家听捷报。”

《解放日报》虽然停刊了，然而捷报还是不断传来，从《晋察冀日报》，冀鲁豫《人民日报》等各个解放区的报纸以及国统区的报纸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捷报，直至打垮蒋介石，统一全中国，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崛起。

弃暗投明的典型宣传

欢迎起义，优待俘虏，分化敌人，是解放军一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更发挥了这一政策的威力。当时蒋军内部倾轧，嫡系与非嫡系待遇悬殊，蒋介石排除异己，甚至消灭异己。而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爱国之士，对蒋介石一意孤行，屠杀人民，愤恨不满，对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正义，深感钦佩。因此在人民解放军政策的感召下，有些将领率众起义，弃暗投明。《解放日报》对他们的义举，给以充分肯定，对他们起义（被俘）后的工作、生活、思想变化等，进行宣传报道，以扩大影响。

起义较早的是国民党 11 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将军，这是《解放日报》宣传最多的一位将军。1945 年 11 月 5 日，高树勋率

领全军将士一万余人，举行起义。他拒绝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匪”命令，毅然站至中国人民方面，开入太行山下，备受太行区军民的欢迎，争相慰问。该军改称民主建国军，公举高树勋为总司令，《解放日报》11月7日在一版头条发表了高树勋总司令率全军发表通电。通电陈述：奉命北上，原为受降，在全国政治问题处理上，已觉欠妥，而中途受命，竟向8年艰苦抗战的八路军进攻，星夜进攻，刻不容缓，甚为惶惑。窃思双十协定与《剿匪手册》并行，亦悖义理，故奉命之余，痛苦万状。全军上下，被迫挥泪行军，一路怨声载道。师次豫北，再入冀南，目睹父老流涕陈情，青壮怒目相视，尤以八路军和平建国之真诚，节节退让之举动，言行一致，感人更深。谁人处此，无动于衷？树勋等歼敌余生，自不畏死，然不愿以歼敌之武器，加诸同胞，自残骨肉，贻害民族。况华东之敌，尚未放下武器，内外夹攻抗战有功之八路军，人间岂有此理？于是全军将士，转相告语，退出内战漩涡之声四起。其实此不单敝军之呼声，亦全国人民之要求也，树勋等内省天职，外察群情，大义所在，不得不对八路军言和，用意无他，旨在为国家为民族之前途，退出内战，求以和平民主之途径建国而已。

《解放日报》连续报道高树勋起义，高树勋的义举受到毛泽东主席电贺，深得解放区军民的欢迎，并影响一部分受欺骗的蒋军将士，也弃暗投明，蒋第32军、40军300余军官号召国民党进犯军罢战；40军副军长等谈此次北上被骗经过；高树勋的新8军在战场上喊话，使炮声沉寂，阵地上许多国民党兵撕毁了发给他们的《剿匪手册》……继高树勋起义不久，又有国民党冀察挺进第8司令纵队牛子龙、国民党胡宗南所属11旅旅长曹又参将军，38军55师孔从周将军、刘威诚将军，60军184师潘朔端将军、虞城等地总指挥蒋嘉宾将军……多人率部起义。《解放日报》都一一加以报道。曹又参将军在起义后对记者谈话，揭露了国民党当局以

各种手段消灭异己，排挤“杂牌军”。他说他的10旅为“杂牌军”，胡宗南命他封锁边区，是以“一箭双雕”的手法，既削弱八路军，又消灭10旅，而且加派特务，分化10旅。他识破阴谋，毅然率部起义。曹又参对记者说：8年来目睹国民党特务横行，黑暗腐败，我看不见民族的前途，十分悲观。现在来到解放区，我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叙述看见边区人民进行民主选举，称颂边区上下一致，每个人都具有坚强的意志与工作热忱。他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借外债没有外援，没有滥发钞票，但人民负担不重，这就是因为实行了民主，有事共同商量，共同努力，有错立即纠正，这才是光明灿烂的中国的榜样。”

对高树勋、曹又参等起义将士，《解放日报》不时报道他们的活动。如高树勋率部帮助群众割麦，参加群众减租减息动员大会，牛子龙部官兵生活自由愉快等等，还发表他们所写的文章，如《一年来之回顾》。特别是1946年10月30日，《解放日报》的第一版几乎是整个版面，都刊登的是纪念高树勋、曹又参起义一周年的消息、贺电和文章。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贺电是：“民主建国军的成立，证明人民独立和平民主事业必然胜利，反动派卖国内战独裁计划必然失败。今当贵军成立一周年，特电申贺，并祝进步。”朱德总司令还发表专文《祝高树勋将军起义一周年》，文中称高树勋的起义运动与解放军军民的抵抗、蒋管区人民的起义，汇合一起，形成潮流，直接造成反动派的军事失败。

1946年7月5日，《解放日报》又传来消息：刘善本驾机飞到延安。国民党中央航空第8大队35中队机长刘善本上尉，不愿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自动驾驶飞机于6月26日自蓉起飞，午后3时抵达延安机场。飞机一着陆，一位着航空服的青年军人，首先自机门跃出，并高呼：“我们是反对内战而来的！”他就是刘善本，随即有10人相继下机。他们立即受到延安卫戍司令部的热烈欢迎与招待。消息还写道：刘善本在航校学习，后去美国深造，1945

年回国，最近国民党当局积极动员内战，他深感同胞自相残杀，不是爱国男儿的本愿，决定驾机来延安。他说：我进航校，是为了报效祖国，在美国学习的目的，也是为了打日本，但想不到胜利后却被用来进行内战，屠杀同胞，受良心的谴责，决心脱离内战的罪恶生涯。我希望所有空军人员，都能觉悟，拒运军火，拒炸同胞。《解放日报》报道了延安举行晚会，欢迎刘善本等11人起义，毛主席、朱德总司令都亲临到会。朱总司令说：我们坚持和平，但我们决不害怕国民党内好战分子所燃起来的凶焰，我们有力量扑灭它！我们热忱欢迎11位先生脱离内战，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和平民主独立事业而共同奋斗！

以上只是《解放日报》宣传国民党将士起义的几例。从1946年到1947年3月《解放日报》停刊止，国民党军队中起义官兵达10万余人，他们大多数接受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接受共产党的教育，成为自卫反攻中的一支力量。当然，鱼龙混杂，也有极少数人抱着投机心理，表面上举行起义，实际上不接受改造，甚至在关键时刻，背叛人民，又向蒋军投降。郝鹏举就是突出的一例。《解放日报》对此作了报道。郝鹏举是国民党第6路军的将军，1946年1月，他表示愿意脱离国民党军队，与人民解放军合作，从而成立了民主联军。解放区军民待他很好，待遇比人民解放军还优厚。但是他拥兵万余，却从未与蒋军交战。1946年12月，人民解放军发现他与蒋军勾结，告诫他：我们主张来去自由，决不相强，但是你不能向解放区进攻，加重人民痛苦。然而在1947年1月27日，郝鹏举又投向他所痛骂过的蒋介石，在蒋军向鲁南大举进攻的时候，他充当进攻人民的先锋队。2月7日被山东人民解放军俘获，从背叛到被俘，前后仅11天，《解放日报》社论《郝鹏举事件的教训》指出：从封建军阀的旧军队，变为人民民主的军队，光换个名字、宣布起义是不行的。要经过脱胎换骨的革命过程，这个革命内容，一是打倒长官压迫士兵，实行官兵一致，二是打倒

军队压迫老百姓，实行军民一致。军队为人民服务，要贯彻在日常生活上，事事处处为老百姓服务，极其严格地实行拥政爱民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如果没有这种革命，这支队伍就没有可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就没有可能进行人民战争，就没有可能以劣势武器战胜强敌，就没有可能应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相反，没有经过这种彻底革命的军队，不管名义上叫什么，实质上仍旧是封建军队，在紧急关头，就会显出原形。这篇社论，从根本上讲清了我党我军对待起义（包括被俘人员）队伍的改造。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

郝鹏举被俘回来了，广大读者都想知道他的下场。1947年2月24日，《解放日报》发了一篇《陈毅将军赐见郝鹏举》的长篇谈话记录。陈毅将军大义讲明政策，郝鹏举丑态百出频频求饶。这里节录一部分：

背叛人民的郝鹏举于2月13日被押解至临沂附近某村，要求谒见新四军军长陈毅将军。陈将军仍以宽大态度接见他。郝见着陈军长就说：“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军长，今天能见军长一面，虽死无憾。不知军长能原谅我吗？”陈军长答：“请坐，慢慢谈。”郝此时手足无措，感愧交加，眼泪夺眶而出……陈将军态度很温和：“你讲完了你的意见，我在这里可以告诉你数点：第一，去年6月以前，我们是想以民主自觉的原则，说服你们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建军经验，把你们这一支旧式队伍改造成一支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武装。无奈百般说服劝导，你们都不能接受，到了去年6月以后，蒋介石大举进攻解放区，逆谋已露，自卫战已不可避免。我知道你们部队改造已无希望，中共中央来电，要我对你们的部队采取一贯宽大的政策，即不必用武力强迫改造。我们为了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对起义部队“来则欢迎，去则欢送”的民主自愿政策，故把你们部队由解放区中心区调到东海边境。这你

很明白，是让你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前途，假如要用武力解决你们，或者要保留你们，是毫不困难的。让你们开到边境，且于开到边境之后，各种待遇不变，无非希望你们觉悟，向服务人民方面转变，这个意思很清楚，很明白，而且非常大度优容，公正无私。到今天我看你们部队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

郝频频点头说：“无论是解放区党政军民，无论是中央和军长个人，一贯对我们是爱护的，这是事实。”

陈将军：“那么为什么你们投降蒋后，一说中共监视你们很严，又说我方无控制能力，故你们能安全投蒋，这是什么意思？”

郝：“那是中央社广播的造谣。”

陈将军：“到了去年9月，两淮失守前后，蒋、薛与你们勾结，我屡有所闻，且知道得很清楚，我又派人，又写信，又用电话屡次告诉你们：“不要丧失人格，背叛人民。我对于你们，更是万分优容，不究既往。到了今年1月中，你们擅自将部队南调，开到海州城下，我知道你们与蒋、薛的密谋又起，我又立即劝告你们站在人民方面才有出路，投蒋不过是替蒋介石增加一个独裁的殉葬品。你们仍毫不觉悟。我知道已无希望，但仍然申言，只要你们不公开投蒋，我决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意你们最后竟自寻死路，公开背叛人民，公开投降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于解放区并无什么损失，故我们并不重视你们投蒋的事。但是即使到了这时候，我仍然在最后一分钟下了一道警告给你，要你们部队迅速远离内战战场，不要向解放区进攻，但你们硬不听话。敢在2月初即参加蒋军前线进攻，我这时才率部队迎击，一昼夜，就捉你过来。我在这里明白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是料定了的，对于拖走后如敢反噬，定可迅速缉拿归案惩办，也是早料定了的。

但我又可以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时，竟捕杀我派去的联络人员，则出乎我之预料，因为我不料人之无良心竟到了这种地步！”

郝俯首点头顿足叹息作答：“对于临走捕杀军长派来的联络员一事，完全是禽兽行为，本人不知道，是部下干的。我不能控制部下，罪该万死！”

陈将军：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11天。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精神，凡投机取巧，必致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示范。这是第一。又证明了一支旧式的军阀队伍，不经过彻底改造，决不能担负伟大民主斗争任务，这是第二。又从事实上证明，从美帝国主义到蒋介石到陈诚、薛岳等人，惨败之余，转而求之于你郝鹏举去参加，你们之间的关系太丑恶了，因而力量是更腐朽了，故不堪一击。又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基于正义、爱国和自卫，故名正言顺，力量伟大，一出手你们就纷纷落马，这是第三。以上这些教训，对于任何人都有用处，恐怕对美蒋及你，作用最大。目前你既然到了此地，一切应由人民处理。能够保全，能够宽恕的地方，人民定可准予考虑，不过你做的事太坏，太对不起人民，太违反人情。再次背叛国家民族，罪恶实在太大，要看人民是否宽恕你。我立刻派人送你到后方去，听候发落好了。

陈将军谈话至此即令退。郝俯首辞出，连呼：“一切由我负责，我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中共，对不起军长……”

这一篇谈话记要，具有很强的政治威力，影响所及，甚为深远。

(王 敬)

第八章 宣传伟大的整风运动

1942年2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整风运动。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次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①

开展整风运动的历史背景是：建党以来，中国革命取得巨大胜利，也经历严重挫折，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虽然从遵义会议到六中全会，党曾批判并纠正了王明的“左”、右倾错误，但是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左”、右倾错误进行深刻的总结，党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继续给革命带来损失。因此，必须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实现党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以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解放日报》的整风宣传，紧紧配合党中央的部署，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它始终围绕思想教育这条主线宣传整风，而没有宣传错误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① 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整风运动宣传的全过程

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前，1941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宣传干部学习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了主观主义的作风，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层整风学习的动员，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错误，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会上不少同志认真展开了批评自我批评，特别是一些曾经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进行了沉痛的检讨。党的高级干部整风学习半年多以后，对一些重大理论原则和历史问题，基本取得共识，于是在1942年2月在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解放日报》的宣传，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以前，就开始发表有关理论文章和社论，1941年9月至12月，除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和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外，还发表了有关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加强调查研究等重要文章，如乔木写的《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艾思奇写的《反对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来源》、黎平写的《思想方法上的革命》、王子野写的《如何与主观主义作斗争》、匡亚明写的《论调查研究的性质》……这些社论和文章，都是从理论上讲清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为全党整风进行思想和舆论准备。

1942年2月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宣传上也是以理论文章作先导，《解放日报》全文发表了毛泽东同志在2月先后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①和《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补发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自由主义》、《反对党内几种不正确的倾向》（摘自红军

^① 即《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的《整顿党的作风》。

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等毛泽东同志过去所撰写的重要文章和演说。发表了4月3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这些指示、演说和文章,都是理论性强,说理透彻,充分论述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表现及其危害;大力倡导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阐述了整顿三风的伟大意义,说明这是一次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要用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克服错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提高全体党员的思想水平,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三”决定,对整风的目的要求、方法、步骤和学习文件(共22个)^①作了明确的具体的规定,基本上按照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三个内容分为三个小阶段依次进行,每个小阶段大致四个月左右时间。在

① 22个文件,是1942年中共中央指定的整风运动中干部、学生必读的文件,具体为:①毛泽东1942年2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中《整顿党的作风》);②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中《反对党八股》);③康生的两次报告(在两次干部会上康生先后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报告、痛斥党八股的报告);④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决定》;⑤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决定》;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决定》;⑦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决定》;⑧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毛泽东选集》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⑨毛泽东关于改造学习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中《改造我们的学习》);⑩毛泽东论反对自由主义(《毛泽东选集》中《反对自由主义》);⑪毛泽东农村调查序言二(《毛泽东选集》中《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⑫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⑬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六条;⑭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举例》、《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态度》、《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⑮陈云论《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⑯红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思想倾向(《毛泽东选集》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⑰宣传指南手册;⑱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⑲斯大林论领导与检查;⑳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㉑斯大林论平均主义;㉒季米特洛夫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

每一阶段中——特别是每阶段的开始，《解放日报》也都是以社论和理论文章作先导。在学风学习阶段，集中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陆定一写的《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张如心写的《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陶铸写的《主观主义的根源和克服的办法》等许多文章，都是对毛泽东同志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解释和发挥，充分说明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会导致理论同实践相脱离，主观同客观不相符合，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或者照搬外国的经验，其结果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失。这些文章，使全党加深理解“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①从而在思想上认识“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②在党风学习阶段，《解放日报》先后发表了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并重新发表陈云在1939年写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使党员认识如何用真正的共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进一步认识宗派主义、闹独立性等给党组织造成的危害，加深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理解。关于整顿党风阶段，《解放日报》主要刊登党员的思想检查，直接反映宗派主义的文章很少。在文风学习阶段，《解放日报》一方面在改版中从自身做起，努力废除党八股，树立新文风，另一方面也在报纸上发表关于反对党八股的文章，以打破僵化的思想和文风，倡导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和文风。

在整风各个阶段中，《解放日报》针对党员干部形形色色的思想，发表社论，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收效很好。例如在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的时候，党员中存在各种不同的不正确的认识：

①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改造我们的学习》。

②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3卷《改造我们的学习》。

有人认为文件还不是老一套，我不学也能够参加讨论；有人则认为文件都很好，很重要，但我太忙，没有时间仔细研究；有人不承认自己和自己的工作部门存在“三风”；有人认为反省是“惩罚”；有人死记硬背文件，却不认真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有人没有勇气承认并改正错误；有人只用马列主义照别人；有人不爱发言，独善其身……社论《一定要学习二十二个文件》，针对这些思想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善意的引导，同时发表彭真写的代论《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对澄清思想，端正方向，起了很好的作用。社论《学与用的统一》，是针对某些同志学与用脱离的偏向讲的，“口里说的是一套，实际干的又是一套，学与用不统一，言与行不符合，这是旧社会统治阶级压迫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法宝。但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它是需要学与用统一，言与行一致的。无产阶级不但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对于它，认识和改造，学与行，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是相互分不开的。”全篇讲得明快透彻，很有说服力。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整风运动中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也发表了多篇社论，其中有《党内民主问题》、《反对群众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等，在《发扬民主作风》的社论中，号召党员干部要深入社会各阶层，接近非党人士和群众，纠正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不健全作风，提出：“要纠正不良的作风，并不是易如反掌，而是相当艰苦的事情。光是明白为什么要改变作风，还是难于收改弦更张之效。主要还是要依靠于实践，要依靠于深入社会和群众中去，在实际工作中，检查自己，改进自己，因为实践是改变作风的一把重要钥匙，社会是一所课程最丰富的学校，群众是最有力的良师益友。”而社论《提高领导，改造作风》，则是针对边区党存在的弱点，提出党的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了解情况，掌握政策，不能代替政府工作，不能陷入日常琐事中去。这些针对当时主要问题发表的社论，都有很强的指导性。

1943年中央直属机关和延安党政军学的整风学习，已经基本上告一段落，大生产运动宣传的高潮，已经掀起，加之党内审干和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干扰，整风运动的宣传，比1942年的篇幅就少得多了。不过由于其它边区整风仍在进行，党中央也曾在4月份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并发表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补发了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23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刘少奇同志《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等重要文件和文章、讲话，还发表社论、代论及文章13篇。宣传上仍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1944年，只发表了当时《解放日报》副总编辑艾思奇写的《劳动就是整风》的文章，整风宣传基本告一段落。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综上所述，《解放日报》整风宣传的全过程，1941年是序幕，1943年9月以后是尾声，高潮则在1942年。这一年，发表社论、代论37篇，论文86篇，有关学习方法的文章34篇，新闻通讯就更多了，这数字足以反映出整风宣传的声势及其所起的作用。

整风宣传的重点

（一）反对主观主义 倡导实事求是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顿三风之首，是整风的主要任务，党八股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要彻底反对主观主义，不能不彻底反对党八股。因此，反对主观主义，倡导实事求是，是《解放日报》宣传的一个重点。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曾经一段时间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给党带来严重危害。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从实际出发，坚定而又灵活地按照客观实际办事，制订了正确

的方针政策，使中国革命迅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时党内主观主义的表现，一是教条主义，一是经验主义，主要的危险是教条主义，从20年代后期起，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不顾中国实际，生搬硬套，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因此，整风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是倡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使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说：“‘实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号召全党要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根据详细材料，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解放日报》把这一核心作为宣传重点，使这条主线贯彻始终，力图让全体党员干部从思想上认识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理，是共产党员必备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对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宣传，从内容上看，层层深入，从形式上看，多种多样。报纸上刊登的党中央有关整风的各项决议，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所作的报告和所写的文章，许多都是着重论述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是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讲得淋漓尽致，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重要性，讲得深邃透彻。同时报纸还组织文章，进一步从多方面论述必须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主观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虽然是哲学名词，是抽象的概念，但是结合实际阐述，以活生生的事实作解释，充实以血和肉，就变成了中国的、为广大党员和干部所接受的理论了。报纸反复宣传教条主义是反科学的，它把适用于一种条件的真理，生硬地搬到另一种条件下，结果并没有把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而是把理论当做了公式，使科学变成荒

谬；把适用于一般条件下的真理，原封不动地放到特殊条件下来，而不加以具体化，使科学化成了虚无。

毛泽东同志把理论与实际的关系，比喻为“矢”与“的”，倡导以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对这个生动恰当的比喻，报纸发表了谢觉哉的体会与发挥。他写道：

“试想，对于前天的中国，漆黑一团，对于昨天的、今天的中国，又若明若暗，不知靶在东在西，是红是黑，那么，箭射出去，决不会像赵子龙射桅杆索，看得清切，弓弦响处，风蓬落下；只能像孔明借箭，曹军凭空射了十五、六万支箭，日高雾散，原来都射在对方的草靶上。所以，弄到箭——学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件事；看清靶——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又是一件事；学会射——瞄准靶、手法稳——又是一件事。三件本领，都要学到家”。

关于实事求是的宣传，版面上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1942年6月20日曾发表范亨写的几首诗，言简意赅，耐人寻味，这里选录两首：

毛主席告诫同志，必须实事求是，不可哗众取宠，偶成四句，以伸其义：

不求一时乱拍手
要使将来暗点头
不求一时多鼓掌
要求将来少摇头

王阳明知行合一，今以唯物观，不如改为行知合一：

行内有知知复行
历史都是古人行
吾人要办当今事
深入民间去实行

《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中，关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宣传，1942年发表的有关文章、杂文、思想漫谈等，就达百篇之多，对于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促进思想革命，起到了应有的效果。

（二）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首次作关于整顿三风报告时就明确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这是整风运动的方针。《解放日报》在整风宣传中，把这两条宗旨作为重点之一，特别是在总结思想的反省阶段，发表有关这方面的文章最为集中。1942年4月至9月半年中专门论述这方面的文章，有35篇。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与王明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口号和作法针锋相对的。1931年至1934年，王明在党内打击和错杀了许多好党员、好干部。1942年整风，清算王明的错误，明确整风的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方法是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个人所在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逐步取得思想认识上的一致，提出努力方向。因此，《解放日报》在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就宣传如何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从动机、态度、方法等多方面加以引导，如师鲁写的《关于批评方法问题的研究》、王凯写的《批评与被批评者应取的态度》、刘代胤写的《略谈批评》等，都是强调批评一定要与人为善，实事求是。

在批评自我批评中，报纸宣传以自我批评为主，这是和反省紧密配合的。报纸上关于自我批评的文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说理性，如《自我批评从何着手》、《一定要反省自己》、《反省》等社论，以及冯文彬写的《如何反省自己》、王超成写的《关

于反省》等思想漫谈，主要是从道理上讲清自我批评的重要性的和如何进行正确的自我批评。另一类则是个人的思想检查，用自己反省的经过和结果，现身说法，既有个人特点，又有普遍教育意义。这一类的文章比较多，各行各业，各种不同人物，都各有其代表作，比重最大的是知识分子，党内的老知识分子，纷纷撰文，以个人经历和亲身体会，说明整风和增强党性的必要，吴玉章在《以思想革命来纪念抗战五周年》一文中这样写道：“我们大多数知识分子党员，常常是带了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来的，旧的引经据典的教条主义，不自觉地又应用到新的理论中来了，旧的空疏无用、只凭空想的主观主义，又侵入到新的思想来了。至于宗派主义门户之见的恶习，揣摩风气、夸夸其谈的臭八股作风，也搬到党里来，造成一种不正派的作风。”“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余毒很深。我虽从事革命40余年，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懈这一点，足以自信自慰，其它能力太缺乏了。我想职业革命家，不但要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而且必须有一专长来为社会服务，如果单是能干领导工作，而不能做实际工作、事务工作，钦差大臣满天飞，这就是官僚主义。旧政治之所以日趋腐化而不可救药，就在这里。”王若飞在他写的《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一文里，深化了对增强党性的认识。他过去认为只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便是党性。他写道：“听了毛主席报告，‘粗枝大叶是党性不纯的第一表现’使我为之一惊，开始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来省察自己的党性。”结合具体工作，他检查了自己党性不纯的六种表现。这篇文章，是王若飞的自我反省，也是对毛泽东同志提出这一问题的解释和补充。

理论战线上知识分子的文章，多数是从立场、观点、方法上

检查自己脱离实际的错误。魏东明的《从学院到实际》、邓力群的《我来照照镜子》等文章，都表达了理论工作者思想革命的认识过程。王思华的《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则总结了他从事经济学研究20年的历史经验：在读大学和在国外留学时，所研究的不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便是法国的凯内怀塞衣，不是欧洲中世纪的基尔特，便是欧洲近代的产业革命，不是福特工厂，便是雪铁龙公司，不是伦巴特街，便是摩尔根银团，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学，则不屑研究。回国后在大学所教的也是外国的，只知生吞活剥地搬运外国的东西，起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后，虽然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但把《资本论》当圣经来阅读、研究、翻译、宣传，在思想方法上还是主观主义的，只是抽象地研究，不是为着解决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到延安以后，在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下，开始注意联系实际，直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矢与的”的关系，才豁然贯通。最后他下决心：“努力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领会这个理论的精神和实质，并学会在解决革命斗争中的实际问题时来应用这个理论。”

报纸也发表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工农干部和基层干部自我批评的文章，各有特点，使人读后如见其人。曹里怀在《改造自己的作风》一文中，主要检查自己“理论和知识的修养太差”，“自己的经验不能很好地整理”，工作中凭经验办事，脑子一想，眉头一皱，马上轻易地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全篇朴实无华，把自己的主要问题，合盘托出。而曾传六在《我的学习观点的转变》一文里，则写了自己从轻视理论，凭经验办事，到重视理论、努力提高学用一致的过程。教育厅干部郭林在《从钦差大臣到小学生》一文中，写了自己两种思想作风，得到两样不同效果，对比鲜明，生动有力。这些律己的文章发表以后，在不同程度上起了教育他人的作用。

报纸上还刊登一些党外革命者和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思想革命的文章，其中以《轻骑队》编委会写的《我们的自我批评》最为引人注目。《轻骑队》是1941年在延安市出现的一个壁报，主办人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都是在业余时间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办报的初衷，是对“革命队伍里自我批评的一种形式的尝试。”他们说：“我们之所以要以这微弱的力量指摘、揭露、批评和建议，无非就是为了赶走在工作、学习、生活中不健康的成分。”在创刊的时候，他们就提出：“严肃、谨慎、诚恳。不油腔滑调，不冷嘲热讽，不作人身攻击，不戴大帽子，负责任和自由讨论。”这个延安市比较吸引人的壁报，在整风中有人对它提出意见，壁报编委会进行了自我批评，其中主要的一段是这样写的：

“没有能坚持以照顾全局的与人为善的同志的精神来进行批评，因而我们的批评就往往成为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对立的，因而也就不但不能达到我们积极的巩固团结的初衷，而且实际上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有时还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造成这种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们负担；因为我们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单凭着主观的热情与对不良现象的愤懑，而对于现实生活和实际斗争中复杂曲折的是非利害，还不能恰当的权衡轻重，明计得失；对许多原则，特别是革命队伍中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或者是还没有深刻的了解，或者只是片面的了解。”

《轻骑队》壁报编委会也提出：不是所有的文章和意见都错了，“也曾站在全局的立场提出了一些问题，指摘了一些倾向，这一方面，的确也或多或少地给了读者以反省与警惕的借鉴。”他们还提出了具体改进的办法，并且诚恳地希望：“延安各方面的同志，大家来指导和帮助我们栽培这样的批评，发展这样的批评，使延安的一切更健康，更美满！”

（三）文艺工作者的思想革命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1942年5月2日和23日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针对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行动和方向所作的重要报告，解决了当时文艺界一些争论的问题，是文艺工作者的整风指南。在整风学习中，文艺工作者除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外，还以《讲话》为武器，对照检查思想，解决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明确了文艺运动的方向，掀起了下厂、下乡、下连队的热潮、深入实际，深入群众，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解放日报》对此进行了大量宣传，不但在副刊上充分反映了文艺工作者思想革命的丰硕成果，而且在一、二版的新闻版上，也不断发表文艺工作者的革新活动。

1942年新闻版上报道了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组织与活动，如边区文委配合战时动员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晋察冀文联在敌战区工作队的收获，新诗歌会致力诗歌大众化运动，以及《枪杆与笔杆结合进来，文化人到部队中去》、《诗歌面向工农兵》……这些报道，既富有鼓动性，又发挥了报纸的组织作用。

1943年3月，为实现文艺运动的新方向，中央文委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刘少奇、陈云、凯丰等都在会上讲了话，《解放日报》宣传了这次大会，一方面发表社论《从春节宣传看文艺新方向》，报道各边区文艺界纠正艺术至上倾向、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新气象，另一方面在一、二版上总结文艺工作者一年来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成绩。10月19日报纸公开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宣传形式丰富多彩

整风宣传，虽然以社论、评论及理论文章为主，但新闻、通讯、专栏、专刊、杂文、随笔等等各种形式，互相配合，充分发挥各自特点，从各个方面启发读者思考。这是《解放日报》第一

次用这种方法在报面形成一个宣传中心。分别记述如下：

（一）新闻通讯 生动及时

整顿三风的新闻报道，在《解放日报》上所占的篇幅，比任何体裁都多。新闻通讯从内容到形式，新鲜多样，注意时效。

整风的新闻报道，在1942年2月全党整风开始的时候，曾经一度很不得力，改版以后情况迅速改变。3月还只发表12条有关整风的新闻，到4月以后，版面上关于整风的宣传就集中突出地形成了中心。仅动态消息（通讯、特写、专访不计算在内）4月至12月就发表了300多条，1943年也在130条左右。消息不但发表领导整风学习的各级学习委员会的部署和总结，更主要的是，大量地反映党员在整风学习中精读文件、小组讨论、检查工作、反省思想、改进工作等各个阶段进行的情况和问题，表扬好的，批评坏的，总结交流经验。在交通不便，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力争及时报道。

整风新闻的报道面比较广，从地区看，由延安市扩大到陕甘宁边区以及其它各个边区；从系统上看，由机关、学校、部队到工厂，既反映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改造和收获，也报道工农党员干部在运动中思想认识的提高。整风运动全貌，通过新闻报道充分反映了出来。

整风的新闻通讯，以具体事实为题材，在写法上不拘一格，力求生动活泼。1942年8月4日二版的头条消息《联系实际掌握文件精神 鲁艺全院展开热烈辩论》，写的是鲁迅艺术学院，全校师生从7月28日到31日历时4天的讨论热潮，这里节录两段：

从清晨到夜晚，饭厅里和树荫下，散步的时候，连星期天也不例外，大家语言的河流就汇集到这中心点：“鲁艺的教育方针与实施方案，在路线上有错误呢，还是执行中有错误？”

接着，消息写了“激进派”、“温和派”和“保守派”的三种态度和意见，写了学校墙报上三派不同意见如何展开辩论，还写

了学校总学委的领导，最后，消息写了经过辩论，不同意见渐趋一致：

“鲁艺的教学活动与实际脱节，教育计划和实施方案里缺乏研究现状的精神，关门提高的现象从而发生。表现在课程配备上，就是充塞着西洋古典；表现在艺术作风上，是从个人出发，不注重普及和对普及的指导。接受遗产的战斗的精神也很不够。由这产生在个人身上的影响，就是都想做专家，但对专家的概念又认识模糊，强调技巧，集体主义的发展受到障碍，个人突出。全部讨论过程中，大胆争论和尖锐批评得到了宽阔的园地，使每一同志都学习到：一方面能大胆批评别人，同时又冷静地听取别人的批评……”。

这条消息，生动具体而又富有指导性地写出了“鲁艺”的整风学习讨论，它是事实的记录，又是经验的推广。同版，还刊登了记者黄钢写的《平静早已过去了——鲁艺辩论特写》的通讯，有人物、有情节、有活动，写了文学院的戏剧、美术、文学、音乐四个部的讨论情况，生动地反映整风学习健康深入地进展。

把若干条短消息编在一起，标上一个总标题，短小精悍，主题突出。例如1942年9月6日二版上的《整风学习消息》，一共5条短消息，一条是报道平剧院结束学风学习，开会总结，阿甲作报告；反省以后，同志之间消除个人成见，许多同志安心工作，不再要求调换；检查平剧教学方法上的教条主义。第二条是报道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徐特立通知全院讨论本院的教育方针，要联系我党怎样掌握自然科学教育及科学技术问题。还有两条是分别报道绥德县、陇东县在整顿学风结束后，举行考试，表扬了成绩优良、联系实际、反省深刻的同志。另一条批评稿，是这样写的：

“清涧县近来整风学习，空气较前松懈。8月25日学委会检查了县委、抗委、公安局仓库，只三同志看整风文件，两个看报纸一个看小说，一个看大众文艺，余皆未起床。学委

会提出批评。为了立即纠正此种不良倾向，县委、抗委、公安局现已建立起学习制度，实行集体学习，公安局已具体订出工作学习纪律及时间表。”

同时，还出现一些小栏目，如《整顿三风消息一束》、《整风文件学习》、《学习文件合辑》、《学习简讯》、《整风在敌后》等等，文字精炼，能够较快地反映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

抓住重大的、有影响的事件，进行集中突出的、连续性的报道，是整风新闻报道中的又一特色。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的报道是突出的一例。

中共中央西北局从1942年10月19日起，召开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历时88天，到1943年1月14日闭幕。这是陕甘宁边区党进行整风的最重要的、最成功的一次大会，是全党开展整风运动中的一次取得重大胜利的大会，也是《解放日报》最集中突出宣传并取得成功的一次大会报道。《解放日报》是在大会闭幕的半个月以后才开始报道的，1943年1月31日，第一版整版和第二版的1/3版面，发表了一条写大会过程的长新闻。新闻用评述式的写法，既高度概括，又鲜明具体。大会的第一个月，是总结边区党的历史教训，新闻生动地写了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时的热烈情景：坚持正确路线的陕甘宁边区老党员干部，用大量事实，控诉王明左倾错误如何危害革命事业、破坏党的团结、破坏党和群众的联系；过去站在错误路线一边的已经觉悟了的党员干部，在小组会上一面进行自我批评，一面对尚未觉悟者敦促迅速觉悟。新闻充分反映出与会者通过大会如何提高觉悟、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大会第二个月是讨论当前陕甘宁边区存在的问题。新闻一开头就写道：“如果说历史问题还容易讨论，因为讨论的问题，已经时过境迁，受批评的同志已经不负重要的责任了，那么关于当前偏向的讨论，就更充分地表现出共产党人不掩藏自己错误的特点。”接着就具体地写了大会如何开展批评，纠正政策上的错误，并对党的

统一战线、加强民主、加强建设、宽大政策及整顿党的组织等问题进行讨论，写了从县团级到边区高级干部共70多人，在不同范围内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大会的第三个月是讨论决定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任务，新闻也写得十分生动具体，把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多次到会讲话，穿插在整个新闻的始终，这样写，一方面说明党中央对大会的有力领导，同时也增强了会议各个阶段的思想性。如毛泽东同志除在开幕、闭幕时作了重要讲话外，中间还用两天时间讲解了斯大林的《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并根据边区的历史和现状，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朱德同志作了关于军队生产的报告，刘少奇同志和任弼时同志每人各作三天的讲话，刘讲关于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任讲党政部门反对官僚主义的倾向。新闻还写了党外人士李鼎铭的讲话。总之，新闻成功地报道了这个开得时间长、解决问题多的重要大会，充分反映了整风运动与实际相结合的丰硕成果，不但推动了陕甘宁边区整风和生产运动的深入开展，也向其它边区提供了学习参考的重要材料。

第二天，2月1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条《大会决议已陆续变为实际》的消息。此后，不断发表边区各地委、县委传达贯彻大会的情况，在《高干会议传达在各县》栏里，更进一步报道高干会议的精神变为实际行动的动人事例。这一组报道，有声势，有内容，有始有终。

这样的报道，在《解放日报》从创刊到停刊，也是仅有的一次。

（二）专刊专栏 加强指导

1942年改版以后，《解放日报》在整风学习中，办了几个专刊和专栏，针对学习中的思想问题，发挥党报特有的指导性，战斗性和组织性。

（1）《党的生活》专栏，1942年4月1日在第二版上一出现，

就在《征稿》中明确告诉读者，它是专门刊登有关整风稿件的。一个时期里，这个专栏的特点是：反映党员、党支部以及领导作风上存在的问题，进而从现实生活中说明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如《党员工作中的不安心现象》、《三风不正的一些事实》、《县区领导上的几个问题》等文章，都是以翔实的材料和鲜明的立场，提出了党内存在的一些问题，为整风运动鸣锣开道。而《记笔记的几种方式》、《怎样精读》、《谁学得最好》等文章，则是直接引导整风学习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还有一些文章，是针对党内带有普遍性的不正之风，同党员谈心，如《什么是老一套作风》、《消灭危害党和革命的小广播》等，都是很有针对性的。罗瑞卿写的《谈谈军队党支部与非党群众的联接问题》，更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有些党支部对待非党群众的错误态度，以及如何以正确态度对待非党群众并加强同他们联系。是一篇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文章。

《党的生活》专栏在整风初期起了一定作用。但随着运动的深入，这个专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在5月13日二版上，编辑部发了《重要启事》：“今后关于整风学习的稿件，概交《学习》副刊发表，党内生活中其它问题的稿件，则仍寄《党的生活》编辑室收。”此后，一个篇幅更大、文章更多、紧密配合整风运动的专刊——《学习》随即出现。

(2)《学习》专刊，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创办的。从1942年5月13日开始，到同年11月6日止，共办了23期。创刊的第一期上发表的《本刊宗旨与投稿规约》中，阐明了这个专刊的性质、目的及其作用：“我们现在正处在最伟大的历史斗争时期，我们这次学习的规模，是党的21年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一次；我们这次学习的目的，为的是发扬优良传统，改变不正作风，团结全党，以便克服困难，迎接光明。”专刊“不但需要造成浓厚的空气，还要解释问题，解释疑难，创造条件，交换意见，赞扬好的，批评坏

的，才能把这次学习运动搞好。”专刊的编委会成员有：陆定一（当时陆定一尚未到《解放日报》工作），吴敏（杨放之），范文澜，丁玲，彭真，李克敏，肖向荣，陈正人，郭化若，莫文骅，周扬，伍修权，何思敬，王铮。这个专刊虽然是《解放日报》的一个专刊，但组织机构直属总学委会，稿件直接来自各个有关部门和各条战线。专刊紧紧配合整风学习中各个阶段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学习方法和工作作风，从而发表论文，杂文，心得，经验，质疑和解答，通过这个专刊，加强对整风运动的指导。

《学习》专刊的许多理论文章，一扫过去那种生搬硬套马克思列宁经典著作词章的弊病，而代之以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生机勃勃的文章。如陆定一写的《为什么整顿三风是党的思想革命》一文，分析了建党20年的胜利与失败、高潮与低潮、黄金时期与黑暗时期，总结历史的经验，论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从而说明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实际中去，发现中国社会的内在实情及其发展规律，确切地掌握这些特点，并依据中国的特点，发展马克思主义。文章结尾这样写道：“一定要改造和改进每一个同志的思想方法，学会自觉地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处理一切问题。这就是思想革命所要求做到的事。整顿三风，就是这样的一个思想革命。这个思想革命的成功，将是我党完成其由幼年到成年的大飞跃。”凯丰写的《民主集中制》等许多文章，也是理论联系实际，不发空洞政治噪声的好文章。后期发表的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作风的文章，更是虚实结合，发人深省。

《学习》专刊的另一个特点，是有些文章互相呼应，彼此补充，既丰富了新观点的论述，又把专刊办得生动活泼，引人爱读。《学习》第3期（5月21日），发表了艾思奇写的文章《学习观念的革新》，论述当前的学习，只是思想革命开始的一个突击，更重要的是以后的努力，应该不断地积累新的工作经验，依据新经验，重新温习文件，回味理论上的原则和原理，这样应用马克思主义的

立场和方法，正确解决一切工作问题，是学习上新的态度和新的观念。6月20日《学习》第11期上发表了续范亭写的《读艾思奇写的〈学习观念的革新〉》诗二首：

万事从来贵有恒，
理论原是照明灯，
革新积习须持久，
紧火煮完慢火蒸。
革命二十二文件，
党内党外齐学习，
今日先用紧火煮，
今后常须慢火炙。

时过三天，谢觉哉在第二版写的杂文中又呼应上了：

改造自己，把自己完全变个样，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不是件易事，要功夫深，火候到。五个月学习，是紧火煮，长期的思想教育与实践上的实践，是慢火蒸。煮的时候要受煮，不要像孙悟空入丹炉，掐着“避火诀”，你这里烈火熊熊，他那里清风习习，这是“躲风”，避开阵地是躲，在阵地里也可以躲。煮过了，并不就真熟，还得长期的熬炼，一直到而今而后，吾知勉夫！

谢老也作了两首诗，同续老唱和，公开的诗文往返，别开生面，而且不是发表在一个专刊上，令人感到报纸宣传的整体感。《学习》专刊对王中写的《牛与总务工作者》一文，也进行了连续的讨论和议论，同样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

《学习》专刊上的《信箱》后改为《问答》，是同读者紧密相连的一个栏目。这个栏目是陈学昭主持编辑的，她是延安当时仅有的一个外国（法国）留学的女学士，虽然那时她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她积极投入整风运动，努力钻研，解答读者提出的有关整风学习中的问题，如：《什么是“党八股”、“洋八股”？八

股文是什么样的文章?》《几个关于世界观的问题》等等，针对整风中的常识问题、思想认识问题、以及理论上的一些认识不清问题，给予及时回答。

《学习》专刊上发表一些个人联系思想的文章，实事求是地写出自己的真实认识过程，很受读者欢迎。何其芳写的《研究文件的时候怎样做笔记》就是一例。他写出了通过学文件做笔记提高了认识：初听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自己觉得这次整风，主要是整别人，自己犯的毛病不多。经过细心读文件，渐渐地感到自己和鲁迅艺术学院的弱点，“即使不大犯教条主义，也许犯了主观主义；‘鲁艺’即使党八股犯得少，也许洋八股犯得很多。”最后认识到：“我在‘鲁艺’文学系工作了三年多，直接看同学们的卷子，对于学的方向与创作倾向的偏颇，我是最应该负责任……”这类谈自己思想的文章，对别人也有启发作用。

《学习》专刊还发表了一些总结性的文章，李富春的《怎样总结学风学习与开始党风学习》，聂荣臻的《全面展开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匡亚明的《关于总结三月来学习经验的几点意见》等，都是结合本部门、本地区的实践写的，有实际、有理论、有成绩、有问题，虽然是在整风进行中的阶段性总结，也都闪烁着伟大整风运动的光辉。

(3)《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是刊登整风学习中重要文件的专刊，时间从1942年4月10日至20日，先后出6期，每期约占第四版的3/4至4/5的版面，党中央指定必须学习的22个文件，多数都是发表在这个专刊上，在当时纸张困难、印刷设备既少又差的条件下，这个专刊实际上是给干部发的学习材料，有些地区和部门的干部，把专刊上的文件，一字一句地抄录下来，认真学习讨论。

(三) 杂文随笔 生动深刻

《解放日报》在整风宣传中，如果说社论、文章、新闻、通讯，

多是从正面宣传，那么杂文随笔则多是从侧面引导。这样相辅相成，交相辉映，更提高了宣传效果。

有关整风的杂文和随笔，没有冷嘲热讽，更没有恶意攻击，而是侃侃而谈，循循善诱，倾注着作者与读者间的同志感情，使读者于不知不觉中受到启示。子野的《学做蜜蜂的工作》，把归纳逻辑的创始者培根的有名譬喻，作了深入浅出的解释和发挥，“理性论者好像蜘蛛一样，从它自身内吐出丝来结网；经验论者则如蚂蚁一样，只会收集和享用它所获得的现成之物。一个真正的科学家，须像蜜蜂一样，一方面从花蕊里吸取材料，而又会用一定的方法把它酿成蜂蜜。”文章由此而论及调查研究之必要，高呼：“让我们都来学蜜蜂的工作方法吧！这才是打倒主观主义的有效方法。”续范亭写的《漫谈》，则是博引群书，论及今古，风趣地讽刺古人和今人唯心主义造成的笑话，并用自己的经历和切身体会，说明只有唯物主义才是真理。这里要突出介绍的则是杂文《一得书》。

《一得书》是谢觉哉为《解放日报》第二版所写的杂文，署名焕南，取“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之意，故名《一得书》。发表的时间是1942年4月至同年11月1日，这正是全党普遍整风的高潮的时期，因此，71篇杂文中，有2/3是有关整风学习的。毛泽东同志很赞许这些杂文，曾在给谢觉哉的信中说：“我对《一得书》感到兴趣，是有益的。”

《一得书》的第一篇《把颈骨硬起来》，写作的背景是在整风初期，延安市政府的工作人员认为市政府的职权低弱，要求边区政府提高市政府的职权。谢老针对这条意见，写了一篇杂文，开头先讲了一个故事：汉朝有个刚正不阿的京兆尹，有一天把皇帝姐姐的姘头在大街上打了一顿屁股。公主哭诉于皇帝，皇帝就召京兆尹谴责他。京兆尹说：“我没有错，我是执行皇帝的法令。”皇帝说：“你虽然没有错，但是你得罪了贵人，也应该磕个头。”京

兆尹不肯磕头，硬起颈骨，几个人压也压不下。皇帝怕对不住姐姐，就说：“原来这家伙有病，颈骨硬了。”古话叫“强项病”。谢老写道：“皇帝时代，尚可‘强项’，何况乎民主的延安？”“该罚的罚，该拘的拘，任何人的威胁，不屈；任何大头子说情，不理。‘硬起颈骨来’。做得几次，威信建立了，人们的习惯也就逐渐养成了。”首篇就告诫全党要不畏强权，敢于坚持原则，发扬硬骨头的精神。

《一得书》中有许多篇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生吞活剥地照搬外国。在《读学风文件随记》中，他回忆起抗战刚开始时，在一个讨论抗战问题的会上，留学外国的博士，都能把留学所在国的理论与实际说上一套，可是一说到中国，就没有多少话了，抗战时期应该怎么做，就更说不上来了。“不是学外国的东西学坏了，而是本国的东西晓得太少，新和旧联不起来。”在《理性与感性》里，谢老认为把马列主义当成宗教教条看待，看成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是一种幼稚的蒙昧。毛泽东同志曾号召过要对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做启蒙工作，谢老就努力做这一工作，他写道：如果只记着前人所抽象出来的知识，不去证实，机械地从一种条件搬到另一种条件去，或者拿前人所抽象的作依据，而更抽象一下，离题越远，错误越多。“这样的理论，如果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匪浅。”在《读宣传手册和反党八股随记》里，他用一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理论联系实际所收到的重大效果：

“据说有一个自江西苏区出去的德国牧师，在报上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知道马克思主义很深奥，文化低的中国工农，怎能和他们讲这个？然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真妙，他不对农民说马克思的道理，而只讨论农民的生活：耕多少地？打多少粮？交地主多少租？剩下多少？够不够生活

等。告诉他们：怎样就可以有足够的饭吃，怎样就可以保障自己的生活不被剥去。农民在这样的简单宣传下，懂得共产党、信仰共产党了。这就是把决议变为广大群众所了解的东西’。

注意这个‘变’字。术语变为群众的话，理论变为具体事实，远而普遍的事实，变为听者切身的事实。面貌也许和决议全不相同，然而决议的实质已经被了解了。”

《一得书》中，对密切联系群众，有许多精辟议论。有一个派到区里工作的同志，给谢老写了一封信，说是成天有人到他那里谈问题，打官司，婚姻问题，打架，动员，摊做鞋子（给驻军），征粮纠纷等等，争争吵吵，炕上铺上，尘土烟灰……。字里行间，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谢老对这封信十分重视，特意为此写了杂文，不是批评，而是鼓励说：“‘官’的炕上，布满老乡的尘土烟灰甚至虱子，可谓‘亲民之官’了。”我们的政权工作者，“不能仅仅像古代的清官‘请问下民’就够，而要和民众打成一片。”在《语必惊人》一文中，他要求党支部要“眼睛向下”，“耳朵向下”，“眼睛望天，看不见地上的事，地上不是没有人说话，又因为耳朵向上，装做没有听见。”“支部的耳朵、眼睛不向着党员群众和非党群众，于是党与非党群众的眼睛、耳朵也不为我所用了。”批评中恳，寓意深刻，是整顿党的作风中的很好的教材。

《一得书》中谈及共产党员思想修养的杂文，也是十分深邃的。《此心光光地》一文，是从王阳明临死前说的一句名言讲起。“光光地”是说心上无毛，俗语管歪念头叫毛的根，谢老写道：“非无产阶级思想是毛的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夸夸其谈、哗众取宠……是毛的现象，必须把这些心上的毛，连根拔掉。”在《拂拭与蒸煮》一文中，用惠明和尚的名句，翻出新意，说明反省的必要：“壁镜挂久了，不大明亮，以为原来如此，偶然用鸡毛帚子一触，发现一道光明，你就知道不

去拂拭是误事的。不能主观地把自己看成‘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而应‘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至于《忆叔衡同志》、《哭凌波同志》等篇，则是从正面歌颂共产党员坚持真理、坚贞不屈的高尚品质，感染力很强，教育人至深。这方面的许多篇章，都可以作为整风的辅助材料。

《一得书》生动的文笔，独到的见解，给《解放日报》的整风宣传增添了新鲜活泼的文风，而谢老杂文的本身，就是在痛捣党八股，更何况其中还有不少篇章是专议党八股的。在《读宣传手册和反党八股随记》里，有一段颇有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党八股》的文风，全文录下：

“有一首讥讽在墙上题诗的诗：‘打屁在高墙，为何墙不倒？那边也有诗，被它撑住了’。‘撑住了’，党八股也有。比如说要严防左倾，紧接一句：‘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撑得好好地，而什么是左或是右的具体事实，却在文章上看不出来。还有，面面都不戳穿，像八字先生的‘流年’评语：‘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之类。好呢，应在后一句，不好呢，应前一句，而什么是花或柳？怎样去栽和插？不予说明。这样的文章，最好藏拙。可以给党八股还加上一条罪状：‘推来算去，像打流年’”。

总而言之，《一得书》在整风宣传中，像一付清凉剂，读后使人头脑清醒，心地明亮，而且讲古论今，博引中外，还给《解放日报》的整风宣传增添了知识性和趣味性，当时一些读者来信称赞：《一得书》是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的上乘清新小品。

贯彻“内外有别”的宣传方针

“抢救失足者运动”是在整风后期一度出现的严重错误，《解放日报》对此基本上未作宣传，避免了一次推波助澜的政治错误。

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在肯定整风运动已经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在十多天中就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党中央发现了这一严重错误，发出一系列指示和决定，进行纠正，特别是1944年1月发出的《关于对坦白分子进行甄别工作的指示》和同年5月发出的《关于在反奸斗争中纠正过左及逼供信的指示》（两指示均为内部文件），更加具体地明确了政策界限，纠正了“抢救运动”的严重错误，对受害同志进行了平反。

在那风声鹤唳、草木皆敌的“抢救运动”中，《解放日报》对此基本上没有宣传，或者说只作了极少量的报道，就嘎然而止。1943年9月21日一版头条刊登消息“延县展开防奸运动”和“绥（德）师（范）失足青年悔过”的消息，经党中央指出，此后再没有刊登有关“抢救运动”的报道。

“抢救运动”尽管在整风运动中是一个支流，但如果报纸如实报道这个错误“运动”的开展情况，可能会火上浇油，后果将更加严重。《解放日报》按中央精神，注意宣传策略，贯彻内外有别的方针，既不给敌人以攻击我党的口实，又使报道避免了一次严重错误。

（王 敬）

第九章 促进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

大生产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度过难关的伟大创举,《解放日报》在宣传中,努力贯彻“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反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成就。这是中国报刊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经济宣传。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地瘠民贫,生产落后,人口只有150万,而部队、机关、学校的人员,总数约在6万左右。为减轻人民的沉重负担,早在1939年中共中央就号召部队、机关、学校自己动手,开展生产运动。到1941年国民政府对八路军停发经费给养,日伪及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外援断绝,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以及军需弹药,完全由边区军民自己解决,形势更趋严峻。“我们曾经被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①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个波澜壮阔的大生产运动,就在这绝路求生中开展起来了。党中央决定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它事业生产,号召部队、机关、学校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提出“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毛泽东同志指出:“陕甘宁边区的财政问题,就是几万军队和工作人员的生活费和事业费供给问题,也就是抗日经费的供给问题。”^②根据战争时期农

①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

② 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

村的具体情况，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方针：各项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基础，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组织经济中，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

《解放日报》对于大生产运动的宣传，从1942年开始，到1943、1944年形成高潮，1945年转入扎扎实实、稳步前进。报纸发挥了强大的宣传鼓动和组织作用，把党的政策同群众的热情，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显示出边区广大人民和部队、机关、学校干部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克服经济困难，取得“丰衣足食”的伟大胜利，真实地记录下这一壮丽的历史画卷。

典型引路 全面开花

大生产运动的宣传，从选典型、树典型开始，典型推动一般，先进带动后进，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区县乡村各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先进典型，都有自己的劳动英雄。使人们看到了人的创造力，人的聪明才智在大生产运动中发挥出来：改造荒山，提高粮食产量，制造出过去边区从来没有制造过的许多生活用品等等。

先进人物典型和先进单位典型，发现最早、影响最大的是吴满有和南泥湾。

（一）吴满有带动了农业战线的生产运动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第一次集中突出地宣传了吴满有。一版头条新闻《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 影响群众积极生产》，新闻介绍了吴满有令人折服的突出成绩：深耕勤锄，肥多粮多，积极开荒，多养牲畜，在土地革命前他是个佃农，土地革命后分得山地一架，约40余垧，连年开荒，

使全架荒地都变成熟地，有5头牛，百余只羊。娶媳嫁女，衣暖食饱，是农民公认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不但是种庄稼的模范，还是模范公民。多交公粮公草，帮助难民开荒，他自己是抗属（弟弟当八路军），不但辞谢了公家对他的优待，还为乡上抗属代耕。同天一版上还发表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庄稼汉登上一版头条，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毛泽东同志阅报后，找采写吴满有的记者莫艾作了四个小时的谈话，着重谈了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冲破封锁，坚持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战略意图，指出宣传吴满有、奖励劳动英雄的重要性就在于此。朱德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天的发言中，指出这篇报道的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救国公粮（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的总数）^①。毛泽东同志年底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讲到财政——粮食问题时，开篇就引用了这篇新闻报道的全文。然后说：“吴满有已是一个富裕农民了，他因为过去得了苏维埃政府的利益，他已把自己的命运与共产党、八路军、边区政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②

4月30日的新闻发表后，5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吴满有为全边区的模范劳动英雄、模范抗属、模范公民。5月6日发表社论：《吴满有——模范公民》，回答了人们提出的一个问题：边区模范劳动英雄的荣誉称号为什么落在吴满有的身上。“简单讲，就是因为他能够把自己的命运跟边区群众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能够把自己的命运跟昨天的土地革命、跟今天的民族抗战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是典型的抗战中的模范公民。”此后，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各农时季节，报纸都宣传吴满有的模范带头作用。延安县集体突击开荒，大大超过计划，“主

① 见《延安记者》中莫艾《吴满有在大生产运动中》。

② 引自《毛泽东选集》1948年东北版《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

要是吴满有在群众中起了重大影响”，吴满有所在的吴家枣园计划开荒 80 垧，在吴满有的带动下，农民纷纷增加开荒垧数，结果完成 120 垧。1942 年吴满有又获丰收，吴家枣园的农民一般每垧打粮 5—6 斗，吴满有打 8 斗。1943 年 1 月 11 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全边区的农民以吴满有为榜样，争做劳动好、打粮多、开荒养畜、植棉织布的英雄模范，农业战线上新的英雄模范不断涌现，《解放日报》上也不断加以介绍、表扬。这样，英雄模范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绥德县的刘玉厚，领导群众减租斗争，组织变工队，发展妇女纺织，全乡生产完成耕三余一，不但他本人是劳动英雄，而且带动他所在的郝家桥村变成了模范村；

模范党员和劳动英雄申长林，产粮多，交公粮多，安置移民，爱惜雇工，还帮助别人发展生产；

马玉恩和马杏儿父女两人，一个是边区劳动英雄，一个是边区妇女劳动英雄，一家六口，由赤贫的难民变成自给自足的自耕农，是努力生产、改善生活的模范；

植棉英雄郭秉仁，响应边区政府的号召，学种棉花，多种棉花，产量一年比一年高，打破了陕北许多地方不能种棉的传统保守说法，促进了纺纱织布的生产；

农业畜牧英雄贺保元，发展养羊，有一整套办法，报纸专门介绍他的养羊经验；

水利英雄马海旺，学习水利技术，修沟打坝，在志丹县后仓沟试验种水稻，收成一年比一年好，还帮助别人修水田，种稻子；

创办义仓的张清益，动员群众开荒种地，把收获的粮食，积蓄起来，凡参加开义田的农户，遇到青黄不接时，可向义仓管委会借粮。这经验由乡推广到区，他所在的区共开荒 400 亩，建立 23 个义仓，很受群众欢迎；

此外，还有退伍军人的旗帜杨朝臣，边区妇女劳动英雄郭凤

英、纺纱织布的劳动英雄张芝兰……农业生产战线上，英雄辈出，各有专长，而吴满有始终是排头兵。

报纸是怎样选中并抓住吴满有这个典型人物的呢？《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这篇通讯里，写的就是记者在调查研究这一基本功上所下的功夫。记者写道：“找一个模范的、而且是为众所公认的农村劳动英雄，很不是件易事。自从春耕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就在农村中访问这样一个对象，好介绍出来，让大家向他学习，向他看齐。一两个月以来，我们走过了不少的农村，各主要城市的县上、区上、乡上，我们也都调查过，好的例子很多，可总难找出一个能叫每一个人心里都折服的劳动英雄。”后来，他听到柳林区区长介绍吴满有的事迹，就到柳林区第二乡吴家枣园访问吴满有。“翻山越岭，走向僻沟，又走向深山”，在吴满有开荒的山上访问了吴满有；在“月明之夜、万籁俱寂”的时候，访问了多位老乡。最后，他对这位劳动英雄“不禁肃然起敬”。在记者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中，经过对比与筛选，是《解放日报》选典型、抓准典型的关键所在。

（二）南泥湾精神鼓舞军队生产

在生产自给运动中，党中央规定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的空隙里，一律参加生产。还应组织专门从事生产的人员，创办农场、菜园、牧场、作坊、小工厂、运输队、合作社，或者和农民伙种粮菜，任何机关部队，都应建立起自己的家务。《解放日报》发表了朱德同志的文章《建设革命的家务》、贺龙同志写的代论《向自给自足的目标迈进》，还发表社论《建立新的劳动观念》。部队的大生产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开创了劳武结合的光辉榜样。

359 旅的南泥湾垦区，行动最迅速，经济效益最突出，是执行朱德总司令屯田政策的模范，也是《解放日报》报道最多的先进典型。

1941年春天，359旅从敌后转战归来，开到荒山野林、野兽出没的南泥湾，要在这里自己动手解决吃饭穿衣问题。旅长王震，带领在前方勇敢杀敌的八路军健儿，在这里展开了另一场战天斗地的战斗。《解放日报》上不断报道他们的活动：部队开进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大部分住在树林里、山崖上。一到就动手张罗开荒，抢时间播种。会打铁的立起了烘炉，做过木匠活的拉料开锯，简单的农具很快造了出来。他们一面开荒种地，一面解决眼前的生活问题：到七十八里外去背粮，到山沟里挖野菜，到荒梢林里打野猪黄羊；还要打窑洞，造营房，从春忙到冬，部队真正在这里安营扎寨了。头一年，因为开荒播种迟了，霜冻来的又早，打的粮食只够一个月的口粮。

第二年，他们一面种地，一面搞基本建设，山上开出一排排窑洞，山下盖起一栋栋平房，还开办了榨油厂、纺织厂、造纸厂和铁、木工厂，荒凉的南泥湾呈现出勃勃生机，各队还养起几十口猪，为1943年南泥湾的突飞猛进打下基础。这一年打的粮食够吃3个月。

1943年《解放日报》上反映的南泥湾，则是生产蓬勃增长，劳动英雄倍出的大好形势。开荒冠军战士李位，精耕细作的排长王福寿，人称“气死牛”的英雄郝树才等突出人物和事迹，都有较为详细的报道。这一年共开荒10万亩，收粮可供部队10个月吃的。1944年的《解放日报》上，对南泥湾的报道，远远超过了一般动态性的报道，而是着重总结南泥湾方方面面的经验，使南泥湾精神发扬光大。这一年，南泥湾粮食生产大幅度提高，359旅实现了全部自给，还交纳了公粮。

从1941年春到1944年冬，4年里359旅在南泥湾一共开荒耕种35.7万亩地，收获粮食3.7万石，挖盖窑洞1048孔，盖房202间，修建大小礼堂3座，还建起了织布厂、修械所、各类手工作坊……南泥湾改变了荒凉面貌，部队生活大大改善，不但伙食

中增加了油、肉、菜、面，连服装、鞋袜、毛巾、肥皂等日用品，也都是自己供给。对南泥湾大生产的节节胜利，《解放日报》以各种形式进行宣传，社论、文章、消息、特写、诗歌、木刻等等。1943年8月2日第二版上，刊登了一组诗，是朱德总司令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到南泥湾视察工作，“五老”各赋诗抒怀，朱德总司令的长诗中有这样诗句：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屯田
仅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有似江南好。”

这就是“陕北好江南”的由来。后来谱歌作曲，流传甚广。

南泥湾的精神，不仅鼓舞着部队，也鼓舞着陕北的农民，他们带着敬佩、感激的激动心情，喊出了“向军队看齐！”1943年4月5日的通讯《向军队看齐》，写出了农民的心声。通讯写的是南泥湾40里地以内的农民和劳动英雄们到这里参观军队生产，他们以崇敬的目光，看着战士们在阳光下开荒，赞叹他们的劳动成果，农民们激动地倾吐心里话：

70岁的老英雄朱老汉，拍拍屁股，站到场子中央，做起演说来：

他劈头就问大家：“队伍扎在南泥湾好不好呀？”所有的人都兴奋地答道：“好呀！”

他又说：过去野猪吃咱们的庄稼，咯吱咯吱的，把咱气得不行，出来打他一下，他跑了，可是停一会他又跑回来，真是没法子。现在队伍来了，野猪没有了；

过去土匪也是一大害，夜里听到狗叫，吓得跑呀、躲呀、逃呀，现在队伍来了，土匪没有了。

……

他说：咱从山东跑到陕北，活到70岁，还没有见过队伍种地的，咱看到这样的好队伍，心里真喜欢。

“向军队看齐”，“向朱老汉看齐”，每个人都想赶上去，每个人都想走在前头。……

都想走在前头，于是南泥湾的战士们同农业劳动英雄们展开了竞赛，《解放日报》上不断传出竞赛的动人事迹。

南泥湾精神鼓舞着军人家属，她们也投入了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不少英雄模范，其最突出的旗帜是家属劳动英雄陈敏。陈敏是团政委谭文邦的爱人，也是金盆湾鞋厂的指导员，她自己筹划经费，采购原料，供全团战士穿鞋，剩余的鞋卖出去，再购买原料。她还组织女工，利用工余时间纺纱、种地。自己尽量不领公家供给的东西，搞好家庭生活。《解放日报》多次详细地介绍她的先进事迹，并报道延安机关部队的女同志和家属掀起了“向陈敏学习”的热潮。

南泥湾精神鼓舞着各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许多处在战争环境中的部队，也是一面与敌人浴血奋战，一面开荒种地。《解放日报》对此作了不少宣传报道。其中连续报道的一个先进典型，是活跃在晋冀鲁豫太行山一带的八路军“欧团”。这个地区，是敌人的“扫荡”区，“欧团”不但英勇杀敌，连连取胜，而且在高山峻岭上开荒种地，获得丰收，被誉为“太行南泥湾”。

1943年4月12日《解放日报》一版发表了彭德怀副司令员给“欧团”全体指战员的一封信，指出了战斗和生产、教育的关系，推动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生产运动的进一步开展。这条消息是这样写的：

“18集团军彭副司令闻‘欧团’健儿在高山垦荒，特亲书一函，致‘欧团’全体指战员，勤勉生产。信的全文是：‘听说你们正在战斗准备下努力开荒，生产粮食和蔬菜，这是很好的事，使我非常高兴。我们在敌后奋斗快6年了，眼看着胜利日益接近，困难正在增加，我们应再鼓一把劲，克服胜利前的困难，争取最后胜利。我们今年有3个中心工作，即

是：一、战争，二、生产，三、教育。这三个中心工作做得好，胜利就更有保障。我们是老百姓的八路军，打仗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教育是我们经常工作，至于生产，就是保障教育、保障战争胜利的重大任务。我们都是农村来的老百姓，我们要自己生产改善生活，减轻老百姓负担，我很希望你们在生产中做出成绩来，做出军队生产的模范来。一、能解决自己的一个月粮食；二、能解决自己的教育经费，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三、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强健自己的身体，多杀死敌人，并尽可能地帮助老百姓生产，与老百姓建立亲密的关系。同志们，任务是重大的，但一定能完成的，只要有八路军不怕困难的精神，越困难越要干，有了这样的精神，那就一定能完成这个任务。并致以亲爱的同志敬礼。”

报纸发表了这封信，大大鼓舞了在敌后坚持战斗的前方战士，纷纷响应号召，展开劳武结合，既打鬼子又生产，好消息不断传来：胶东八路军生产节约，半年完成600万元，生活日益改善，每人每日4钱油一斤菜；晋西北某部队打柴20余万斤；新四军直属队收获菜蔬7万斤。太行八路军传来的消息更多，9月11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报道了“欧团”的成绩：“横跨过某某两县的高山峻岭，已为‘欧团’健儿垦成连绵百多里的大农场，并有‘太行山上的南泥湾’之称。彭副总司令的生产号召，已获得事实回答。……现在山药蛋已有拳头大，蔓菁也有碗口粗。五尺多高的谷子，遮没地皮的豆子，颗粒丰实，不日即可收割。”消息还写了“欧团”的战士们怎样在战争环境中加紧生产：五月“反扫荡”战斗展开，“五连在某岭抢种，敌人打来了，他们丢下耙，拿起枪，打退敌人，再下种。”“锄草开始了，适逢蟠武战役，全体战士血战两昼夜后，休息了一天，作了整理总结工作，第二天就全体下地，每块地都锄草2—3遍。”为了激励“太行南泥湾”创造者们，彭德怀副总司令特送给该团红旗一面，上面的题词是：“为战斗勇

士 是生产先锋”。

（三）南区合作社是边区合作社的旗帜

在大生产运动中，办好合作社是活跃经济的重要一环，是经济上组织群众的重要形式。延安南区合作社，是边区合作社的一面旗帜。合作社主任刘建章，办社办得早，办得好，他的经营思想是：为群众服务，处处要想到群众，为群众打算，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的事业发展到南区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经营消费事业，还经营供销、运输、生产、借贷等事业，是一个综合的合作社。合作社是在解决群众困难中求得发展（到1943年有总社、分社、附设工厂共13个单位，21个门市部），从合作社的壮大与发展中，进一步解决社员的困难，如便利购买，低价销货，照本供给，低利借贷临时救济，以至较高价收买土产，救济难民，推广纺纱，代运公盐，代交负担等等。他们把生产、运输同消费结合起来，群众从自己切身利益出发，自动入股，合作社按期结算，按期分红，按期召开社员代表大会，发扬民主办社。强调干部的模范作用。主任刘建章是深受社员爱戴的劳动英雄。

对于南区合作社的宣传，《解放日报》早在1942年就已经开始，海稜写的《从刘主任看南区合作社》，克俭、华奋写的《模范的延安南区合作社》，何军写的《延安南区合作社的成立与发展》以及社论《贯彻合作社民办政策》等，都是在1942年发表的，是在合作社宣传中最早报道的先进典型。到1943年以后，介绍南区合作社的文章、消息更多了，摘其要者有：南区合作社分社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南区合作社办理信用合作的经验；刘建章同志指导盐池合作社、举办羊子保险事业、发展蒙汉贸易、组织蒙古骆驼队；刘建章同志谈各地合作社改进办法：要为群众解决困难才能发展……于是一个向南区合作社看齐，向南区合作社学习的热潮，便在边区各地掀起。

合作社的另一个先进典型是张瑞合作社。它是在北岳区的沟

外游击区办起来的，周围敌伪据点林立，敌人时常出没其间。张瑞就在这样一个特殊情况下，办起合作社，他采取的方法，灵活多样，用拨工的办法，领导敌战区人民纺线、榨油、织布，破坏敌人抢棉的毒计，保护人民财产，建立和发展了人民合作社。张瑞合作社还组织群众砍敌人交通线上的电杆木，由合作社收买。这个合作社把敌占区人民的爱国心和自己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既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又打击了日伪敌寇。《解放日报》在1944年5月第一次发表了张瑞合作社的事迹，并为此先后发表了《张瑞的合作道路》和《战斗与生产结合的经验》等社论。

（四）改造二流子

《解放日报》对改造二流子的宣传，搞得有声有色，家喻户晓，树立起典型，报道了全面，有利地推动了懒汉的改造和生产的发展。

二流子，是农民对那些成天不劳动又嫖赌偷窃，搬弄是非或装神弄鬼、为非作歹的各种人的统称。在大生产运动中，这些人是一小股破坏生产的逆流，而改造好他们，又会变成生产的动力。于是对这些家里外头都管不了的二流子，采取各种方法改造他们，《解放日报》有力地配合报道，如用强制手段强迫他们劳动，动员家里父母妻子规劝他们改正，用“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新的社会风尚教育他们，用二流子转变成英雄模范的典型人物影响他们……使改造二流子这项难度很大的工作，有力地开展起来。

从1943年2月开始，报纸发表社论《改造二流子》，接着就不断报道改造二流子工作开展好的地方：固临县组织二流子生产，一年可增产细粮270石；延安市二流子参加生产，男耕女织痛改前非……

最使二流子震动的，是报纸上发表著名劳动英雄申长林的先进事迹，不少二流子决心改邪归正，要做申长林那样的英雄模范。延安县蟠龙区雷鼓川马家沟的申长林，11岁就给人家揽工，干了

14年，后来没工揽了，就沦落为二流子，当巫神、法码，还是一名赌徒。共产党来了，他分得土地，从此下决心改掉恶习，脱胎换骨，自己劳动出色，多打粮食多交公粮，还想方设法帮助别人。浪子回头金不换，他加入了共产党。1943年3月在延安县干部会议上被授予模范党员的光荣称号，《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一位新的榜样》，从4个方面论述了申长林能够当得起模范党员的称号：把党的利益摆在第一；好劳动人和生产能手；和群众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是群众的亲人；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陈正人，在病中看到报纸对申长林的介绍，立即亲笔给申长林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从报上对你的历史的简单介绍，知道你是出身无产阶级的队伍，你又曾沦为失业游民，后来你又觉悟到自己、自己的阶级需要获得解放，因而参加了革命斗争，并在斗争中，在党的领导下，获得了解放的胜利。现在你已经且早已成为边区自由的公民，已经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富裕的主人，我们边区的模范党员了，你所经历的道路，所由此获得解放的道路，已经被边区千百万人民斗争胜利所证实的道路，是中国人民最正确的道路。我们希望你继续努力，发扬你对党对人民的模范作用，积极努力生产，更加关心和帮助群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你的一切……这封信的全文发表在《解放日报》3月16日的第2版上，同时还发表了申长林给陈正人的复信，大意是说：你在养病，还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专门派人在大雪里送来，我真高兴，觉得很光荣……

申长林受到表扬和奖励的消息传出以后，不少二流子的思想开朗了，他们觉得有奔头了，申长林就是自己的榜样。《解放日报》上刊登不少动人的故事：蟠龙的二流子刘生贵，到申长林家登门拜访，沉痛忏悔，保证改邪归正。安塞县的二流子刘四有说：“别人能学好，咱就不能转变吗？”他下地生产，劳动很好，秋天已经初见成效，报上发表一篇《刘四有转变了》的通讯。

二流子转变成劳动英雄，刘生海又是一个典型人物。刘生海原来是个不劳动、好赌博，抽大烟（鸦片）的懒汉二流子，全家没吃少穿，他也不理不问。经过乡干部耐心开导，又发给他救济粮，他感动了，决心戒了大烟，借钱去赶牲口驮盐，抽空下地干活，驮盐赚了钱，还了债，还净赚8头毛驴，成了有牲口的长脚户，一家有吃有穿，生活过得挺美。1943年11月，他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大会小会他都现身说法：自己是怎样从人人讨厌的二流子变成人人尊敬的英雄模范。“学习刘生海，争当英雄模范”，转变了的二流子又出现一位榜样。报纸上不断传来转变的二流子的好消息：巫神刘玉林改过生产；延安市二流子中万才改过生产，今年收获够两年吃的；安塞二流子杨树枝已变为健壮劳动者，种地45亩，影响别人进步；梁家桥村还出现一个“二流子”变工队，9个人里有7个原来是二流子，他们10天内开荒67亩……

报纸上还及时介绍改造二流子的工作经验，如《人的改造——记绥德市二流子戒烟所》、《怎样改造二流子——延安县蟠龙区动员二流子生产的几点经验》，还有中共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写的《谈农村二流子》、韦君宜写的《警区二流子的改造》等等，都对推动二流子转变起了很好作用。

（五）赵占魁运动推动了工业生产

边区的经济成分，主要是农业，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也是以农业为主，《解放日报》的宣传，工业比重也很小，但是对赵占魁运动的宣传，却比较集中突出。

赵占魁是延安农具厂（实际是兵工厂）的一名翻砂工，他劳动好，热心助人，特别是1942年初，在一项艰巨任务面前，表现了忘我的品质：当时五省联防司令部贺龙司令员给工厂下达了一项紧急任务：在短期内造出10万颗手榴弹。这个任务一宣布，有些工人认为时间紧，任务重，提出了过高的奖励条件，否则就

“罢工”，该厂的工会主席也支持这部分工人。就在这关键时刻，平日劳动好、群众中有威信的赵占魁，站出来表示要坚决完成任务。为了打日本鬼子，不讲任何条件。他坚守岗位，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工友，得到广大工人们的支持，终于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了这项紧急任务。记者铁夫和穆青深入工厂，采访赵占魁，连续发表长篇通讯《人们在谈说着赵占魁》、《赵占魁同志》、《恭喜赵占魁》等，介绍赵占魁如何在两千度高温的炉旁长期辛苦劳动，如何改良翻砂，出色地完成任务；介绍他关心群众、为群众服务的好品德；同时发表社论《向模范工人赵占魁学习》。当总工会号召开展赵占魁运动时，赵占魁的先进思想和事迹，早已为边区的工人们所熟知了。

到1944年春，报纸先后发表两篇文章《一年来赵占魁运动总结》、《赵占魁运动的收获》，都是工业战线开展赵占魁运动总结性的文章。

陕甘宁边区开展赵占魁运动，影响所及，晋西北也开展了张秋凤运动。张秋凤是晋西北兵工厂的翻砂工，她的先进事迹《解放日报》也进行了详细报道，并且公布她同赵占魁开展竞赛、交流经验、互帮互促的来往信件，充分表达了工人为抗战胜利而努力增产的决心和行动。

（六）机关学校掀起生产热潮

“生产热潮澎湃于延安每个角落，各机关、部队、学校纷纷举行生产大会，不少机关已开始聚集肥料，划分土地；女同志则至各工厂接洽打毛衣、缝纽扣等手工生产。每日黄昏大道上，散步人群均以生产为谈论中心，‘我种50株西红柿’，‘我保证生产1000元’，此项琐语，时刻可闻。新春来临，生产热情鼓舞着每个同志，人人均以丰衣足食为今年的努力目标。”这是1943年2月15日《解放日报》第一版上一条新闻的节录，新闻内容，写的是党中央在杨家岭召开生产动员会以后，广大干部积极投入各项生

产活动。中央、军委、边区政府各直属机关，纷纷开展开荒种地、掏粪种粮、运盐烧炭、喂猪养鸡、开办粉坊、豆腐坊、做牙刷、织毛衣、制鞋、纺线、养蚕、纺毛、修路打窑……在作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许许多多机关干部、知识分子，都兴冲冲地扛着镢头上山，坐在屋里纺线，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减少人民负担，是每个人的生产动力。从中央到区县，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谁也不例外，都投入生产热潮中。

“首长负责，亲自动手”，朱德总司令在领导生产中作出了榜样，他和勤务员们组成一个生产小组，开了约3亩菜地，“每天清早起来和晚饭以后，经常看到这位60高龄的总司令，出现在菜园里。一有空他就走进自己的菜园，仔仔细细地检查每种蔬菜的下种、浇水、施肥、移苗等工作，不论哪种蔬菜，只要他发现毛病，就马上动手修整好，从不延迟。”在雷英夫写的这篇《朱总司令在生产中》的纪实文章里，描绘出朱德总司令在生产中的认真负责、细心耐心的精神，“由于朱总司令具有丰富的农业知识，所以每种蔬菜应该什么时候种，怎样种，要施何种肥，要浇多少水，要注意什么，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安排得好好的。因此，他种的菜从未发生过不出、不旺、烧死、冻死等现象，总是长得很茁壮。”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是两位高龄的领导干部，他们根据自己的工作和身体条件，实事求是地订出了既切实可行，又是高标准的生产节约计划。《解放日报》分别发表了他俩的计划。林伯渠的计划有4项：一、从农业上完成细粮2石交粮食局（用变工合作办法）；二、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三、自1944年1月25日起，戒绝吸外来纸烟；四、今年的棉衣、单衣、衬衣、鞋袜、被单、毛巾、肥皂全不用公家供给。他还写了一首诗贴在墙上：“待客开水不装烟、领得衣被用三年，淡巴菰一亩公粮交，糖萝卜二分私费贍，施肥锄草自动手，整旧如新不花钱，发动男耕和女织，广开青菜增良田，边区子弟多精壮，变工扎工唐将班。”

李鼎铭副主席说：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我准备用变工的办法种些地，其次今年的衣服被褥够用，不领了，给公家节省一点。

《谢老夫人勤俭刻苦 改善五人生活》的新闻，写得更为具体：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与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合喂一头猪，宰杀后各分一半肉腌了，春天又买一只小猪，到冬天杀了，净肉 69 斤、油 18 斤；养鸡生蛋 500 个以上；还同勤务员合伙种菜。这样增产节约，省下的钱给谢老、勤务员和自己各买皮大衣一件，还给谢老买驼毛做被子，给勤务员买毯子。不但减少了公家负担，还使五口人的生活走上丰衣足食的道路。王定国和何莲芝都是劳动模范干部。

教育厅副厅长贺连诚老先生，夫妇都已 50 多岁，但他们生产热忱很高，捻毛、纺毛、养鸡、做酱，还节省自己的乘马不骑，交给公家，并且作歌一首：“节省公粮 14 石（注：一匹马可节省 14 石粮），缓步当车不骑马，单夹皮棉都不要，还有鞋子及其它。只讲节约还不够，要把生产搞得佳，菜地 2 分耘而耕，再纺廿斤细毛纱，一半交公当土壤，一半留作醉烟霞。”

《财政厅南厅长岳母王老太太勤劳生产》，写的是财政厅南汉宸 61 岁的岳母，不依靠公家供给吃闲饭，自种的蔬菜自给有余，还养鸡养鸭做豆腐，改善全家的生活，纺纱织布，可以供缝衣用。

领导干部的榜样作用，进一步提高了广大干部投入大生产运动的积极性，来自生产线上的捷报，不断传到报社编辑部：中央党校的黄立德，种菜得法，获得丰收，第一个获得机关生产劳动英雄的称号；中管局提倡多养母猪，李老汉养猪认真负责，仔猪多，肥猪壮；中直和军直的运盐大车队，胜利归来，7 天获利 9 万元；边区政府办公厅产菜超过计划 2 万斤，制作酱菜、泡菜 73 缸；高等法院粉坊经营得法，获利达 70 万元；平剧院生产获利每人发毛衣一件，本报烧炭超过任务 2 万斤……

在生产热潮中，继黄立德之后，机关干部获得劳动英雄、模

范工作者称号的，也大有人在：机关行政管理人员佟玉新节约经费，成绩突出；种菜英雄又出现孙庆仁、吴成发；有了油、盐、菜、肉，炊事员可以大显身手，模范炊事员的事迹，也不断在报纸上出现。

（七）张思德同志的死重如泰山

1944年9月21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一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新闻，那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讲演《为人民服务》。

新闻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同志，今年才30岁，但为党为人民已战斗了12年，走过雪山草地，受过长期艰苦锻炼，也曾光荣地负过伤，是一个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不幸于今年9月5日在安塞石峡峪烧炭遇险殒命。中央警卫团团部特于9月8日开追悼会，到会者千余人，毛主席亲临讲话。主席台四周布满花圈和挽联，中悬毛主席亲笔挽联‘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几个大字，与会者无不感到死者的光荣。大会在哀乐声中开始，该团政治处张主任介绍死者的光荣历史后，毛主席即缓步登台，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死者表示敬意，继作1时半之久的讲话，对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意义，阐述至详。”

新闻主要写的是毛泽东同志的讲演内容，这就是光辉的篇章《为人民服务》，这是在报刊上第一次发表。从此，张思德成了人们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毛主席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成为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的行动指南，培育了几代共产党人。

宣传劳模运动 推动生产高潮

《解放日报》大力宣传了党中央所倡导的劳动英雄和劳动生产者的运动。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者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是生产建设的带头人，组织者，正如朱德总司令所说：“几年来我们靠着‘血和汗’坚持抗战，建设边区，获得举世称道。对这一奇迹，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劳动模范起了决定作用。”

（一）生产大竞赛

1943年，随着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劳动英雄模范不断涌现，《解放日报》开始宣传英雄模范个人之间开展的生产大竞赛，1943年春，记者海燕给退伍军人杨朝臣读报：“我50岁啦，在生产战线上，谁敢和我比赛？”杨朝臣立刻问道：“这是满有说的吗？我今年52岁了，我向他挑战！”第二天，挑战书就在报上登出来了。吴满有在应战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建设“劳动英雄庄”，“开展村与村之间的劳动竞赛”，这样一来，由英雄之间的个人竞赛扩大到村与村之间的集体竞赛，把争取个人致富与组织起来全村共同富裕挂上了钩。同时又提出了与八路军驻边区屯垦部队的劳动英雄进行军民之间的劳动英雄大竞赛，这就把劳动英雄之间的竞赛扩大到全边区的军民中去，由个体竞赛引向集体大竞赛。

在《吴满有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文章中，记者莫艾记述了这场大竞赛的发起和成果：“杨朝臣和吴满有的挑战应战书，都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朱总司令看后，立即电令边区所有部队都要积极响应吴满有生产大竞赛的挑战，指出：‘多生产一粒粮食，就是多增加一份抗日的力量’。贺龙司令员也连夜打电话给南泥湾驻军，命令他们‘迅速接受吴满有的友谊挑战’。中共中央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正副主席，也分别通知各地党委和各级政府；把吴、杨大竞赛切实、迅速地推广到群众中去。西北局特别指出这一大竞

赛，‘是党员发动群众的创作’，‘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最重要的事情’。一时英雄辈出，模范群起，劳动英雄与劳动英雄之间、村庄与村庄之间、军人与农民之间、军队与军队之间的生产竞赛，在边区迅速地、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它增进了军民之间的手足情谊，更推动了农民之间的变工、扎工、伙种等初级劳动组合的生产和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

（二）第一次劳动英雄模范大会师

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召开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者代表大会，时间是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26日，这次劳动英雄大会师，《解放日报》进行了集中、深入的宣传报告。

第一次群英会，突出宣传了劳动光荣，劳动英雄模范更光荣的思想，这在广大劳动群众中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变“劳动下贱”为“劳动光荣”，变“穷是命里注定”为“劳动能致富”。29日大会开幕的消息这样写道：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已于昨日正午2时，在3万人空前热烈的气氛中同时揭幕。除200余位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外，还有各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和民众，远从30里外的乡村闻讯赶来的农民，亦在千人以上。人们都想看一看庄稼汉中的‘状元’。山下大会场上林立着红缨枪，全体到会人员，均着崭新冬装，精神饱满，步伐整齐走入会场。国旗及红色、蓝色、白色的大旗，在耀眼的阳光中随风飘荡。主席台前排列着吴满有、申长林、黄立德、李位、冯云鹏、张振财、刘玉厚、赵占魁、郭风英、张芝兰、贺保元等劳动英雄的肖像。这些肖像，闪耀着劳动的光辉，召唤人们向劳动英雄学习。1时，200余位边区人民的优秀代表——光荣的劳动英雄们，在边府办公厅广场上，愉快地看完延安大学宣传队演出的‘向劳动英雄看齐’、‘赶骡马大会’、‘兄妹开荒’等秧歌后，即进

随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岗同志、贺龙同志、林主席、李副主席的巨大画像后面，在乐队伴送之下，向会场进发。在喧天的锣鼓声中，劳动英雄们被沿途群众不断投以羡慕、赞美的言词，认为这是自己的光荣。这队伍尚在离会场半里地时，雷动的掌声就迎接了它。一个个戴着大红花的劳动英雄，穿进会场大门时，乐队的锣鼓声更加洪亮，会场沉浸在无限欢腾里……”

在开幕式上，高岗讲话强调：今天开的这个大会，不仅中国从来没有过，也是东方各民族都没有过的事。这是拿锄头的、拿斧头的、拿鞭子、拿剪刀的人们开的劳动英雄会议。中国旧社会一向是看不起工农的，然而现在我们这里却受着空前未有的尊重。他表扬了许多劳动英雄，说有了他们才吃好穿暖，丰衣足食。他说：“劳动英雄代表们，只有你们才配被人尊敬，被爱护，你们是真真正正的人才，人人应该向你们学习。你们创造了大量财富，不仅保证了我们全边区的丰衣足食，而且能更好地援助前方抗战。”

劳动英雄光荣，劳动英雄受尊敬，成为广大劳动群众引为自豪的事。英雄们走到哪，哪里群众就列队欢迎，锣鼓喧天。英雄们在开会之余，有关领导机关，纷纷宴请，报纸上不断加以报道，更加引起劳动群众的欣羡：劳动英雄成了党中央的高贵上宾，在中央大礼堂设宴招待他们，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同他们亲切握手交谈；中共中央西北局也设宴招待英雄们，英雄们向贺龙师长献了旗，会场洋溢着拥军优属的热烈气氛。消息写道：“从群众中生长而又为群众利益艰苦奋斗了20年的贺龙师长，给劳动英雄们带来了胜利信心，每个人都知道，自从来了‘活龙’和他指挥的军队，广大西北人民、土地和牛羊，就有了铁的屏障。”“贺师长衔着烟斗，来来去去走在英雄中间，询问各地生产情况，亲热地拍拍胡大嘴的肩头，问槐树庄的情况……”

12月1日，在中共中央招待英雄大会上，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组织起来》的讲话。讲话的中心是号召人们把劳动力组织起来，组织起来的方式是合作社。报纸全文发表了这次讲话，还报道了毛主席同17位劳动英雄进行亲切交谈的情况：与冯云鹏、张兆甲谈移民问题，与张振财、刘玉厚等谈变工札工问题，与田荣贵谈合作社问题，与李位谈部队生产问题，与张清益谈义仓问题，与高仲和谈打盐问题等。劳动英雄谈他们的生产经验时，毛主席都仔细静听，并不断鼓励他们，要他们将这些经验在群众中广泛宣传，使之成为指导全边区人民合作生产的方针。

毛主席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成为劳模运动和报纸宣传的一个新的中心。吴满有说：“听了毛主席的话，大家都痛快，毛主席的号召哪一样不好呢？札工变工，丰衣足食，讲得真详细，实在好，实在对！”报纸上登出他在大会上提出的明年生产计划，掀起了劳动英雄们互相挑战应战，扩大变工、札工、组织合作社，实现模范村乡、模范连排的热潮。报纸还发表了大会通过的劳动英雄公约，全文是：

发展自己经济 帮助别人生产
领导变工札工 创立模范乡村
争取耕二余一 自己首先完成
拥护咱们军队 搞好自卫民兵
肃清汉奸特务 遵守政府法令
切忌虚伪夸张 永当劳动英雄

这公约，不仅为劳动英雄们所遵守，也流传在广大工农群众中，成为个人的奋斗目标。

（三）胜利的检阅

与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同时开幕的还有边区生产展览会。展览会 是1943年生产斗争的缩影，《解放日报》对展览会总展部分和分展部分——边区农业、部队、中央直属机关等，分别做了详细

的介绍。从报纸上可以看出：展览会展示了大生产运动的辉煌成果，是全边区生产的胜利检阅。

展览会用图表、实物和连环画来显示生产斗争的变化和成就：一百万亩荒地变良田；池滩上打出60万驮食盐；4500多二流子变为生产者；一万多名移民劳动力开到垦荒前线；大批劳动英雄模范涌现出来，创造出模范的劳动村、变工队和合作社。总展部分给人以全貌的介绍，分展部分便具体地介绍先进人物、先进事迹以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具体实现。在边区农业馆里，图表告诉人们：1943年边区开荒总数是97.6万亩，粮食总产184万石，比1942年增产细粮16万石，大部分农民家有余粮。“自种自产自织，才能丰衣足食”，1943年种棉5万亩，收棉花173万斤。许多农民参观时，看见安塞、甘泉等地也能生产洁白如雪的棉花，又惊又喜。盐产量提高很快，1942年全年产盐27万驮，1943年产盐60万驮，1942年运输合作社的牲口只有246头，1943年发展为3700头，加上个人运盐的牲口，达5万多头；畜牧业的牛、羊、驴等，也有较大发展。展览室内陈列的谷子、糜子等实物，吸引了许多参观者，光华农场的马齿玉米，吴满有的圪坦黄硬糜，杨朝臣的山地黄玉米，申长林的马鞭谷……有数十种之多，许多农民围聚在这里，纷纷议论别人之长、自己之短，还向招待员索取种子。

新闻也写出了工业展览品的喜人景象：“走进展览室，就听见两种声音，一种是划火柴的嚓嚓之声，一种是难民纺织厂自制铁织布机的响声。延安市参议员吴汉章老先生，听见划火柴的声音立刻就兴奋起来，大声说道：‘我们边区也能自制火柴了！’”纺织、服装、化学工业、造纸、印刷等产品的陈列处，都是一片欢欣赞美声。

“生产自给”是对部队、机关、学校的要求，自给程度，是衡量优次的一个重要标志。报纸介绍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和中央、边

区政府直属机关的战士和干部，在生产斗争中取得的丰硕成果：

“边区八路军留守部队，坚决执行了保卫边区的光荣任务，并且一年来艰苦卓绝地完成巨大的生产任务。‘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已成为留守兵团洪亮的口号。在荒山稍林中，这些优秀的指战员，克服了一切困难，学会了生产，成为新民主主义建设中一支巨大的力量。他们今年开垦了20.6万亩荒地，收获粮食3.1万余石，减轻了人民负担，走上了丰衣足食和逐渐全部自给的程度……”

展览会上陈列着留守部队直属队生产的大金瓜，18斤重的黄萝卜，自制的各种农具。1—10月留守部队直属系统各项费用自给60.4%，除每人发了新棉衣、单衣、衬衣各一套外，各单位还分别不同地发了毛衣、毛裤、毛袜、毛手套。伙食标准，10月份每人达到肉2斤11两，菜45斤。个人利用业余时间生产的产品，卖出后可以购买日用品。这是属于一般单位的自给情况，突出好的炮兵团的自给程度则已经达到100%。

机关生产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延安的机关生产，自给程度最好的是中央直属和军委直属系统的杨家岭，自给达到105%，边区直属系统自给程度最好的是中共中央西北局，达到76%。保育院虽然自给程度只是43%，但一看他们丰衣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发挥所长了：每人每年单鞋2双、棉鞋1双、草鞋1双，单衣1套、衬衣2套、棉衣1套，羊毛2斤8两，毛巾2条，被子用布1.2丈。

《解放日报》在介绍展览成果的同时，也以各种形式写出观众发自内心的赞叹：“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又打鬼子又种地！”“八路军能同老百姓一样生产，让老百姓减少负担！”“咱庄稼汉里出状元，‘公家人’搞生产也都不含糊，真是全靠共产党的好领导！”国民党前辈范亭老先生谈到过去有人诬蔑共产党是“三头六臂的怪物”，他说：“是的，共产党是有三头六臂，三头就是枪头、锄

头和笔头，六臂就是两只手能打仗，两只手能生产，另外两只手能写文章。……这样的三头六臂，对老百姓是好的，对中国是好的。”

《解放日报》对边区生产展览会的宣传，进一步增强了边区人民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回击了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的敌伪及国民党政府，表达了边区党政军民学为建设边区、争取抗日胜利向前迈出的坚定步伐。

（四）把劳模运动提高一步

随着劳模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解放日报》及时在报纸上提出，引起了领导和实际工作部门的注意，在1944年12月召开的劳模大会前后，许多问题得以解决，把劳模运动提高了一步。

最早提出问题的是在《三言两语》栏目里，第一篇是林康写的《真英雄与假英雄》的短文（1944年3月11日），提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应该选举，“必须非常慎重地选举，领导干部不仅审查名单，而且要调查事实，在实际与称号真符合后，才能提名单，由群众选举，这才能产生群众所爱戴的真英雄。否则，难免产生与称号不符合的假英雄。”他呼唤“真英雄越多越好，假英雄一个不能要！”

这封来自群众的呼声，引起领导的注意。党中央决定进行劳模选举。1944年9月4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选举奖励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办法》。发表社论《采用新的组织形式与工作》，社论除阐述选举和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重要意义外，特别强调这一工作“必须认真领导，发动群众，慎选好人。”

在选举过程中，《解放日报》提倡用自我批评的办法解决劳模中出现的骄傲自满，并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其中安塞县劳模进行自我批评的新闻，发表最早，写得详细，新闻从老英雄陈德发

的自我批评写起：

“他说：春上全村订有村民公约，不准乱砍树，我竟砍了人家两棵树（后来在读报组自己批评了自己）；号召大家种棉花，看苗子出的不够好，我打头把地翻了，人家说，劳动英雄能翻，咱们也翻吧，影响实在不好；我的猪吃了人家一次庄稼，群众说，劳动英雄的猪能吃庄稼，咱们的猪也能哩；秋里号召增加枣地，我同一些人估计了一下，就向上面报说全村能增加10垧，实际上可以增加这么多，但没和人家正式商量，所以都不同意。这些事都‘经验’了我，今后可得注意，一切要和大家民主商量，事才好办……当陈德发以‘希望大家给我批评，帮助我进步’而结束讲话时，博得全场敬仰的掌声。……谢鸿有老汉说：‘陈德发讲自己的缺点，我们当劳动英雄的都要反省反省，把自己认识一下。’到会英雄一致响应，展开了普遍的自我批评。老英雄杨新臣在小组会上批评自己个性太梗，为土地事和区上干部争吵，甚至说是到延安去讨论；工作方法简单，竟有命令捆绑群众的现象，引起群众不满。徐凤玉说出他今年的活动像公家人，如夏征时他出主意布置数目的作法是不对的，甚至有人反映他作的不够十分公道。李应富老汉说：‘我自己要好好批评，政府来检查工作，我说我陈家洼都组织起来了，其实只组织了一部分。’模范乡长李承统说：‘下半年来县上，边区常有人来找谈话，自以为工作差不多，把组织秋收工作就大意了。自以为别人都不如自己，便把许多事都揽在自己手里，却不能照顾周到，今年只去三政村两次，对干部有些要求过高，批评过火等偏向。’这样的热烈讨论，连新选的识字英雄闫九甫也反省说：我再不敢对人家吹我看报没问题，以后还要下功夫学习哩！”

各位英雄检讨了自己，对这次全县48%旧英雄落选表示惊讶，都以落选的人为警戒，认为这些人落选是合理的，表

示要长期当英雄、做模范，长期保持这光荣称号，就要经常检讨自己，和群众打成一片，和群众商量办事，为群众作榜样……”

当天报上还发表社论《防止骄傲自满》。社论称赞安塞县劳模会开得成功，指出劳动英雄由于得到很高的荣誉，容易产生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毛病。有极少数劳动英雄，由于自高自大、轻视群众，失掉了人民英雄的称号。社论强调不能对劳模运动只讲成绩，不讲缺点，在表扬成绩、奖励好的英雄模范的同时，必须批评缺点，纠正错误。

在选举中，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真劳模思想提高了，假劳模被揭发出来。《解放日报》对此如实进行报道。例如1944年11月30日发表的新正一区五乡移民村的张希望，就是用欺骗哄哄的手法，当上了“移民英雄”。骗取了英雄称号以后，压榨乡民，欺侮群众，动不动就说：“毛主席跟我一同吃饭，谁若在我面前胡闹，我就把他送禁闭室！”县政府接受群众要求，宣布撤销张希望的“移民英雄”称号。同日报纸还发表社论《再谈劳动英雄运动》，提出选举劳模要充分发扬民主，劳模的任务不是什么事都做都管，各级干部对劳模要帮助教育，不要把他们捧得像“神人”一样。

1944年12月22日至1945年1月14日，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代表大会，《解放日报》作了集中突出的宣传，宣传的内容，第一是劳模不要骄傲自满，应团结群众一道前进。在《群英大会侧记》（12月24日）里有一段这样写道：主席台的两边墙上，挂着巨幅的标语，是毛主席的名言。标语是这样写的：“我们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各位劳动英雄、模范工作者，你们是人民的领袖，你们是有成绩的，我希望你们也不要自满，领导人民，领导群众，把工作做得更好。”林伯渠在开幕词中号召大家要

抑制自满，力求进步；高岗要求劳模们要按照群众需要与自愿，兴利除弊，戒骄戒躁，“不要英雄一时，而要英雄一世。”

大会报道的第二个内容是劳模们在大会或小组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交流先进经验。吴满有和吴家枣园、陈德发和马家沟、刘玉厚和郝家桥、石明德和白源村、张振财和城壕村、贺保元和贺家园等劳动英雄和他们创建的模范村，部队张治国和他的模范班，都介绍了经验，并获得大会表扬。模范工程师沈鸿，设计成功全部制造炮弹的机器，改进翻砂机和化铁炉，提高效率，提高炮弹质量，老模范赵占魁在没有镍铜皮原料的情况下，找代用品用土法提炼锌，造出了子弹皮，还有模范工程师钱志道制造出氟酸钾等，在敌人对边区实行封锁的情况下，解决了军工急需，为有力打击敌人做出贡献。

会上提出要珍惜劳模的生产时间。对这一问题，《解放日报》早在1944年的4月27日就已提出，在《珍惜劳动英雄的时间》一文中，给吴满有算了一笔账：从今年正月初一到现在，两个月20天的中间，有一个月18天忙于对外应酬，具体是：参加延安各机关的座谈8天，专家及报社访问15天，与延安有些机关买送农产品及接洽问题2天，秧歌队拜年2天，拥军18天，找人代读与回答所接到的数十封信件2天，接洽买麦皮、要种子、找牲口零碎事3天，共一个月18天。连同参加县、区、乡、合作社等所召集的工作会议，区、乡所给的临时工作计算在内，用在生产以外的时间，约在2/3以上。对此，群众和劳动英雄都有意见。这次群英会上不少劳动英雄提出这个问题，大会决定采取办法进行解决。

会议一个重要的内容，是毛泽东同志在大会闭幕前做的重要讲话，题目是《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其中提出了劳模的三大作用：第一、带头作用，第二、骨干作用，第三、桥梁作用。毛泽东同志说：“你们有许多的长处，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重是应该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

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解放日报》全文刊载，并报道了劳模们和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学习讨论，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晋察冀、太行、晋冀鲁豫等各个边区，也都先后进行劳模选举，召开群英会，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讲话精神，劳模运动提高了一步，更有力地促进了生产。这些，《解放日报》也都进行了报道。

干部要学会做经济工作

在大生产运动中，干部要学会做经济工作，提到了重要日程。这是始于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号召。《解放日报》对这个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宣传，下面介绍两次最集中、最突出的报道。

（一）奖励22位领导经济工作的干部

1943年2月3日报纸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共中央西北局奖励22位领导经济工作成绩卓著的干部。一版全版都是有关的新闻和社论，第二版还占有一部分。其中有：毛泽东同志为受奖者的题词，22位受奖干部的画像、主要成绩介绍、受奖单位的成绩介绍，以及社论《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这是一次对学做经济工作的大推动。除22名个人受奖外，还对359旅、延安县委县政府及延安南区合作社3单位予以团体的奖励。

毛泽东同志为22位干部（生产英雄）的题词分别是：

姓 名	职 务	毛主席题词
王 震	（359旅旅长兼政委）	“有创造精神”
何维忠	（359旅前供给部长）	“切实朴素 大公无私”
晏福生	（前359旅某团政委）	“坚决执行屯田政策”

罗 章	(现任 359 旅供给部长)	“以身作则”
黄静波	(清涧县县长)	“坚决执行党的路线”
刘秉温	(延安县县长)	“善于领导群众”
王丕年	(中共延安县委书记)	“善于领导群众”
惠中权	(中共靖边县委书记)	“实事求是 不尚空谈”
刘建章	(南区合作社主任)	“合作社的模范”
王世泰	(边区保安司令员)	“忠实努力 不夸不骄”
杨 林	(保安司令部供给部长)	“坚持执行党的政策”
范子文	(中共西北局秘书处长)	“机关生产的模范”
胡起林	(延安市政府四科科长)	“无限忠心”
马文瑞	(陇东特委书记)	“密切联系群众”
马锡五	(陇东分区专员)	“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王维舟	(385 旅旅长)	“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
李丕福	(华池县县长)	“面向群众”
习仲勋	(关中分区书记)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文年生	(警备一旅旅长)	“生产教育两者兼顾”
任成玉	(中共赤水县委书记)	“为群众谋福利”
贺晋年	(前警一团团长)	“艰苦奋斗 不屈不挠”
罗成德	(三边分区专员)	“不怕困难”

社论《向领导经济建设受奖同志学习》，号召广大干部学习受奖者认清边区当前经济建设工作的重要性，积极领导群众和机关部队搞好生产事业。359 旅第一个最辉煌地实现了朱总司令的屯田政策；延安县领导同志积极领导经济工作，使群众财富的增长率和财政负担能力都占全边区第一位。学习他们不保守，不空谈，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创造财富的经验，惠中权调查了靖边县地近沙漠的特点，发展水利、畜牧，使靖边经济有所发展。刘建章从社会实际出发，打破办合作社的陈旧公式，为新的合作社创造了可贵的范例。学习他们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的作风。

任成玉研究出修堰地的办法，增加了粮食产量；刘秉温、王丕年、胡起林等想尽办法安置移民和难民，推广变工札工等原有民间劳动互助组织，大大提高延安开荒亩数。晏福生在开辟南泥湾劳动中，及时发现并纠正了某些连队开荒不打土坯，撒种不讲求方法等问题。这是与坐在机关写计划、发指示，而不发动群众、不教育干部、不研究具体方法，不检查、不总结的官僚主义作风恰恰相反。社论还提出学习受奖者艰苦卓绝，对党对事业的无限忠心。罗章走长路自背小米和行李，留下马从事生产；何维忠在工矿业方面领导深入，身为供给部长，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胡起林每年以一半至 2/3 的时间在区乡实际领导经济建设；王世泰尊重政策法规，1940 年把部队收获的粮食，无条件交给政府，凡党的号召和决定，如提款、向盐业公司投资等等，无不首先响应执行。王震、文年生、王维舟、习仲勋、马文瑞、马锡五、贺晋年、罗成德等，在执行政策上，在个人生活的切实朴素上，都是模范，他们不夸不骄，在群众中威信很高。

在高度评价和表扬 22 位受奖同志的同时，对于那些在经济工作中贪污腐化、化公为私的人，也给予揭露批判，在同天的报纸第二版上，公布了他们的劣迹和对他们的惩处。这样报道，是非分明，奖惩有别，“锣鼓”“警钟”一起敲，对广大干部有很深的教育意义。

各个根据地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倡导下，重视经济工作，并取得很多很好经验。1943 年 7 月 2 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邓小平（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写的《太行区的经济建设》，就是一篇总结经验的文章。文章阐述了在敌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不亚于军事战线，敌人实行了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封锁我们必需物资，吸收我们有用的物资（如粮食），每次“扫荡”时，杀人放火，毁农县、抢耕畜、烧粮食、毁青苗。在此情况下，太行区一面对敌开展经济斗争，一面在根

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文章概述了具体做法：确定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以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为生产重心。在“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下，太行生产战线上获得年复一年的胜利。军队除自己生产解决一部分军费之外，还帮助老百姓生产，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耕种收割。手工业方面，自制的香烟已够本区供应有余，部分布疋、毛巾等棉织物，还能往外运销。负担政策实行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配合，既照顾人民负担的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生产的需要。税收贸易政策，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争取出入口平衡。

文章最后谈的是经济建设的经验：一、敌后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经济建设的果实，是用血换来的。二、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四、将大批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去。

（二）表扬模范区乡干部

1945年1月9日的《解放日报》第一版上，集中表扬了模范区乡干部的优良作风，总结他们在领导基层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方面的宝贵经验。

安塞县五区区长李承统，在订农户生产计划时，邀请生产搞得好的农户座谈，嘱咐他们要按照实际状况，不可订得太高；到秋后又嘱咐他们：对照农户生产计划与收获实际数量，收多少，就报多少，不要夸大或缩小。他还调查一个养羊得法、一个养羊不得法的农户，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照起来，教育大家，提高了养羊水平。靖边二乡支部书记张玉珍，发现有一个地区苇子长得特别茂盛，他就动员群众，在那里兴修一个大草原，解决了该乡牲口草料和军草不足的问题。合水区委书记张启贤，在边境上试行变工，打破了该区一向雇麦客的惯例，为群众节省一笔不小的费用。这些干部都很受群众的爱戴。

报纸还表扬区乡模范干部的民主作风，不强迫命令，善于用具体事实说服群众，动员群众自己动手。富县太乐区区长仝万明，见本区居民饮水困难，用7个月的时间，向群众宣传打井的好处，一面打通群众的思想，一面把下山担水所费的人工，算了一笔帐，群众开始愿意打井，只是缺乏信心，提出愿意出钱出米，由区政府代打井。仝万明没有立刻拒绝，当群众把米和钱拿到区政府的时候，仝万明向大家提出了问题：“你们为什么让别人把钱赚走？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动手掏？”一句话打动了群众的心，大家高兴地自己掏井。结果，太乐区打井成功了，不但解决了多少年来本区居民缺少饮水的困难，而且给其它一些缺水地区提供了解决饮水问题的办法。仝万明区长还调查了本区盖房所需要的木料，和本区人民每年购买花椒水果等的钱数，用这些材料，说服动员群众种植果树，很受群众拥护。荣耀乡乡长朱富荣，动员妇女纺织，先让自己老婆学会，然后向妇女们宣传：“我的上衣，是婆姨自己纺织的，穿一年还是好好的，裤子是买的外来布，穿半年就烂了。”这个乡的纺织生产，在他耐心说服动员下开展起来，100多名妇女纺织，解决了全乡布疋供给的一半。

《解放日报》的宣传和表扬，为广大区乡干部树立了学习榜样，启发大家注意提高工作方法。

（三）进一步号召学会做经济工作

在1945年的劳动英雄、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又作了《学会做经济工作》的讲演，《解放日报》全文刊出。他说：“近几年中，我们开始学会了经济工作，我们在经济工作中有了很大的成绩，但这还只是开始。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分的自给，并有盈余。我们必须使农业、工业、贸易三方面比现在有更大的成绩。到了那时，才算学得更多，学得更好。如果哪一个地方的军民生活没有改善，为着反攻而准备的物质基础还不稳固，农业、工

业、贸易不是一年一年地上涨，而是停止不进，甚至下降，便证明哪个地方的党政军工作人员还是没有学会经济工作，哪个地方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他强调当前要从一个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这样的环境出发，军民生产运动，就是一个明证。他列举大生产运动的成效：机关除粮食、被服两项之外，大部自给，有些单位全部自给。另有许多单位，自给一部分粮食和被服。边区部队功劳更大，许多部队，粮食被服和其他一切，全部自给，不领政府一点东西。毛泽东同志进一步号召“除有特殊情形者外，一切部队、机关、在战斗、训练和工作间隙里，一律参加生产。”他说：“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任何地方必须从开始工作的那一年起，就计算到将来的很多年，计算到长期坚持战争，计算到反攻，计算到赶走敌人之后的建设。一面决不滥用浪费，一面努力发展生产。过去有些地方缺少长期打算，既未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未注意发展生产，吃了大亏。得了这个教训，现在必须引起注意。”《解放日报》根据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进行了广泛宣传，使学会做经济工作的号召，深入人心。

从轰轰烈烈到扎扎实实

大生产运动的持续开展，有一个发展和提高的过程，《解放日报》对于大生产运动的宣传，也有一个从轰轰烈烈到扎扎实实的过程。

（一）一封读者来信

1944年12月10日，报纸上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这封信对于改进和提高报纸关于生产运动和劳动英雄运动的报道，起了很好的作用。信是这样写的：

“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又将开幕，介绍劳动英雄的模范

事迹，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我对于介绍方法有一点意见。去年4版上刊登的《边区生产运动》中，有许多文章的确写得很好，但因为写法都一模一样，每一个劳动英雄都是从他的出身、历史说起，把关于他的一切材料，包罗并列，没有特别着重介绍个人的特出之处，因此，多看几篇，就有点使人疲劳，不大想看，结果，连其中很好的文章也被淹没了。我问了几个同志，他们都有相同的感受。今年，劳动英雄一定涌现得更多。因此，应当怎样介绍他们，怎样才能使我们的介绍在读者中真正发生作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对于这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我只觉得介绍劳动英雄，首先应当注意的是他们优良品质的特点。吴满有、申长林、田荣贵……都是具有优良品质的人物，但他们的品质又各有特点，有的表现在忠诚为党上，有的表现在急公好义上，有的表现为善于诱导群众、组织群众上，我们的介绍，应该着重用具体事实表扬这些最可注意的特点，这样才能使读者真正了解各个劳动英雄，并从而得到教益，至于那连年远载的生平历史，如果不是有特别意义的，可以略去，因为实在说来，在旧社会里穷人的遭遇，常常都不会差得很远，用不着一五一十每个人都从头说到底。其次是应该着重介绍他们在某一工作、某一业务上的独到的经验或心得，使别人学习，得到益处。过去有些文章，偏偏忽略了这点，而着重介绍的是某一英雄的生产或工作成绩。生产或工作成绩固然也应当表扬，值得表扬，但读者更需要知道的，是如何得到这些成绩的方法和经验，这才使人有所获益。至于去年英雄，今年又当选者，则应当着重介绍他们在这一年里新的进步和新的创造，去年已经介绍过的东西，今年就可以不必讲了。否则，既费了作者气力和报纸篇幅，又不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

趣，是几方面都不合算的。

.....

何伊上

12月5日

这封信，受到报社编委会的重视。不仅在内部研究改进关于劳动模范和大生产运动的宣传报道，而且将信公开发表在报纸上，以鼓励群众监督，并表示自我批评的精神，以实际行动来接受群众意见。此后，在对劳模的报道上，改变过去的陈词老套，强调宣传突出的、最新发生的、影响较大、读者欢迎的内容，力戒千篇一律。针对每个劳模的具体特点，报道他们的活动。如刘玉厚转变工作作风，组织春耕时注意说服，并且解决群众的疑难问题；任九云精耕细作多积肥，帮助群众增产粮食，砍柴、拾粪、变工、拦牛，吴满有乡冬季生产忙……对一些落选的劳模，也报道他们的改正和进步情况，如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武乡王海成再度当英雄等。

过去，对劳动英雄个人和机关部队的单位，表扬成绩多，批评缺点少，1945年以后，批评稿和总结教训稿增多了，对个别生产很不好的单位或个人，在报纸上点名批评。如1945年5月17日刊登的《一个连队去年生产失败的教训》一文，就是批评独一旅4团9连在1944年生产搞得不好的一例。这个连，没有从思想上认识生产运动的意义和方向，他们的主要力量，不是组织战士搞农业、手工业生产，而是想抓钱。结果，各班都抢着外出揽工，农闲时没人雇工，大部分人闲下来，战士生活散漫，经济上放任自流，随挣随花，结果公家与个人都是两手空空。对于上级号召纺线，连领导认为不如揽工挣钱，战士认为那是女人干的事。有个别班路子走得正没去揽工，生产成果很好。如李宝其班纺线，半个月每人就赚了一件衬衣，6班只种几分地，就打4斗糜子。事实教育了连领导和战士。这样的批评稿，对进一步明确生产方向，起

到了积极作用。

对于个别曾经获得过劳动英雄称号、又变成新恶霸的坏人，报纸上予以揭露批判。1947年3月13日醒目的标题《斐庄全乡群众集会清算新恶霸田二鸿父子》的消息中，揭露田二鸿这个1943年当选的劳动英雄，任村主任、治安主任、斐庄小学名誉会长，伙同他儿子田得有（自卫军排长），霸占土地；霸占与奸污妇女；克扣工资，虐待工伙；仗势欺压穷人。群众在大会上愤怒揭发田二鸿父子的罪行。劳动英雄变成了新恶霸，这条消息引起人们的震动，从而提出了一个如何培养、教育劳动英雄的新问题。

随着报道思想的提高，有些稿件通过具体事实，把是与非、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对比写出，给人以鲜明而深刻的感觉。

1945年5月19日发表的《两种方法、两种效果》，就是写两名干部由于不同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到两种不同的效果。事情是这样的：曲子土桥区6乡，接到区里指示，要6乡组织36个变工队，乡支部书记贺永德想：乡里人住的很分散，一下子组织这么多变工队，贪多嚼不烂，于是召开干部会研究。他先提出：普遍组织变工队，比较困难，应该先选大村组织，要自愿不要强迫。干部大多数都同意这个意见，只有乡长不同意，他说：“上级怎样指示，咱们怎样执行，要不，数字完不成，大家挨批评，我可不负责任！”大家都说：“这不用你操心！”然后分工到各村去组织。贺永德在自己村里，把15个劳动力请到家里吃饭，顺便宣传变工队的好处，大伙半信半疑，贺永德没作结论，他请大伙第二天给他帮工。大伙说说笑笑干活，上午打柴，下午还掏了粪，大伙说：“人多到底干活快！”贺永德趁机又提起变工队的事，这回大伙都愿意参加，贺永德说：“变工做活，要公平合理，不偏谁，不向谁，有事大伙商量。”这个春耕变工队成了全年变工队，团结互助，发展生产，大伙都满意。而乡长分工去的二村，用了3天时间，组织18个变工队，都是硬性摊派的，大伙不情愿，结果，根本不起

作用，只不过是形式的数目字而已。这篇通讯的收尾是这样写的：“从以上组织劳动力的两个事实可以看出，由于两种不同的工作方法，所得到的是两种显然不同的效果。更可以证明：必须根据群众自愿和需要来办事，强迫摊派的形式主义是行不通的！”

黎以宁写的《三种作风 三种效果》，写出了上、中、下三个合作社的经营作风：发扬民主、制度严格的西河口合作社；稳扎稳打的高桥合作社；走到垮台的姚店合作社。贾拓夫写的《介绍两个骡马店》，一个是华池县李家梁子骡马店，主任和副主任工作认真，吃苦耐劳，参加铡草、驮粮、做饭、打柴，和脚户关系好，打成一片，因此，生意兴隆，获利多，是个好骡马店。一个是悦来骡马店，两个主任不负责任，不管教职工，上班走象棋、打扑克，还有贪污，随便和脚户骂架，是个坏骡马店。文章写得生动具体，对比鲜明。

此外，报上的调查报告较前增加，很多是反映生产中的问题，如千峰写的《救救我们的羊子——环县畜牧业存在着急待解决的问题》，午人、瑞生写的《为群众服务要看效果——安塞路干部工作作风》等。

（二）“游击区也能够生产，也必须生产”

游击区能否开展大生产运动，这个问题，是经过实践，取得经验、经毛泽东同志倡导以后，《解放日报》才开始大规模宣传的。

1945年1月28日，《解放日报》登了张平凯写的一篇文章，题为《晋察冀游击区的生产运动》，这是一篇经验介绍，说服力很强。文章开头便说：“我们所指的游击部队活动的敌后之敌后，就是巩固区的外围，敌人的封锁沟内。在那里，我们的游击部队，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只有临时的荫蔽的居民村庄。在那样的环境开展生产，一般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敌伪据点、碉堡林立，沟墙汽车路如网，敌人利用他军事上的优势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时常对我采取袭击、包围、清剿。游击队为了应付环境，往往一日数地的

转移。但我们的部队为了发展恢复区的经济，拯救游击区成千成万在敌伪蹂躏下的同胞，以及改善我们部队本身生活，仍然需要执行毛主席所号召的开展大生产运动。”接着，文章介绍了他们许多实事求是的创造：首先解决了土地问题：平毁封锁的墙沟，平毁汽车路，在两旁种上庄稼；利用小块荒地、协助民兵，用武力掩护，月夜抢种敌人堡垒底下的荒地；与缺乏劳力的农民伙耕；利用河沿、筑堤、修滩、起沙成地；协助农民改旱地为水地；利用自己活动的村庄，到处伴种。这样，土地问题解决了，冀中6分区就获得数千亩良田。真正走了群众路线，得到当地群众拥护，实现军民两利。其次，实现了劳力与武力相结合，春耕开始时，派专门部队打击敌人，部队的战斗力也提高了，二分区4区队从2月至9月初，进行71次大小战斗，攻下敌人几个据点，毙伤敌伪165人，还缴获了不少枪枝。秋天得到了好收成，光是4分区就收获13.8万斤小米，菜也够自己吃的。第三、除农业生产外，游击区的部队也开展手工和运输业的生产，4区队开了毡帽坊，油坊和面坊等等，不仅解决了本身的困难，而且也解决了当地群众的需要，战士的毛衣、毛袜也能作到自给，这就使部队的给养大为改观。战士们每人每天能吃到5钱油、一斤菜、一个月能吃半斤肉。而且几年没用过的牙刷牙粉和识字的本子，现在也都齐全了。通过开展生产运动，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一方面用武力掩护群众生产，另一方面在劳力上直接帮助群众，群众的拥军活动开展得更加热烈，农民说：“八路军的办法真好！”“没有今年的大生产运动，我们可能挨饿受冻！”

这篇文章，发表在第三版的左下角，位置并不显著，然而却引起毛泽东同志的注意，他立即写信给博古，信中说：今天报载张平凯文，写得生动，又带原则性。接着毛泽东同志又写了一篇社论：《游击区也能够生产，也必须生产》，刊登在两天后（31日）的第一版上。社论根据晋察冀游击区的经验，有针对性地提

出几个问题：“许多人说：人稠的地方没有土地，果真没有土地吗？请看晋察冀……”“农业是可以的，手工业及其它大概不能吧？果真不能吗？请看晋察冀……”“游击区战斗那样频繁，军队从事生产，恐怕要影响作战吧？果真如此吗？请看晋察冀……”“游击区人民群众是否也可以发动大生产运动呢？那些地方也许还没有减租，或减租不彻底的，农民是否也有兴趣去增加生产呢？这一点，晋察冀那边也肯定地答复了。”社论强调：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大生产运动，从思想上认识这个“能够”和“必须”，事情就会普遍地办起来。

此后，各游击区的生产运动陆续开展起来，《解放日报》上宣传游击区战斗、生产双胜利的消息和通讯，也不断刊出。

（三）活跃市场经济 改善人民生活

在大生产运动中，各机关、部队、学校以及广大农民，所生产的产品，除一部分或大部分自给以外，还需要把多余的产品，送到市场，调剂余缺。因此，边区的商业、交通、脚户店、骡马店以及骡马大会（即集市）等，陆续发展并繁荣起来。《解放日报》的报道面随之不断扩大。人民生活的改善，也有所反映。

1943年11月延安市的骡马大会上了报纸的一版头条。消息写了骡马大会的盛况：土布、棉花、石油、骡马、粮食、柴炭、陶器、木板……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摊；写了买者和卖者的欢悦心情，还写了“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缓步会场，细心观察，关心每一商家的营业情况，频频询问，状至欢愉。”又写了高岗参加骡马市上的赛马……，这条消息，大大推动了各个根据地的贸易活动，纷纷组织骡马大会，开展集市贸易。《解放日报》不仅报道陕甘宁边区的这些活动，对其它边区组织成功的集市，也给予报道。

1944年7月31日发表的顾庸写的《从一个集市看根据地——莒南县十字路大集巡礼》，把山东根据地繁荣的市场、活跃的经济，写得跃然纸上。下面节录一部分：

“通往十字路的10条大街、8条小路上，熙熙攘攘地奔流着各式各样的人们。有骑着自行车的布商，有赶着大车的棉花商，有挑了扁担的肉贩、鱼贩、荆麻、铁器贩，有手挽担篮卖线的妇女和卖鞋的大娘，还有更多的三、五成群、背搭口袋的庄稼汉、蹦蹦跳跳的少年儿童，和步伐整齐、精神抖擞的八路军同志……”

“日出三竿，二里长、丈把宽的十字路上，已被两边的白布篷、草凉篷和戴草帽的人头遮没了。100多个布摊占满了北大街，占满整个布市。曾经充斥市场的洋布，只占了很小的一角阵地。从西巷子望去，满眼都是雪白的棉花和棉线，四旁挤满妇女，这是去年秋后才发展起来的。……布市是集市上的主要市场，它显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生产、克服困难、向着自给自足前进的标志。据集市交易所调查：现在老百姓自织的大机布、小机布、纱布，公营华祥染织厂产的条子布、色布，已占全布市80%。抗战以前只有20多家布商，现在则有百十个自织自卖的手工业商人。为何有如此变化？该镇布商孙某说：前三、四年我打算买机子买不起，前年秋天，织纺局给织户贷款，我贷了120斤棉花，500块钱，机子转动起来了。上年秋，号召发展纺织，我就狠织，今年春上说提高质量，我的一等布跟洋布不相上下，我一集四疋大布，上集就光了。……民主政府的扶植，人民购买力的提高，都刺激了纺织业的发展。棉花市也由今年3月上棉花300—500斤，增加到现在每集上市2000斤，棉线1100斤左右，这还只是拿到集上来卖的，在合作社里直接成交的没算在内。杂货摊上已买不到外来肥皂，代之而起的，是公营价廉物美的新华肥皂。在卖钢笔、铅笔、墨水的摊子旁，现在又添了村级干部、小学生、识字班妇女等一批新顾客。十字街口北是荆麻铁器市，去年30个铺店，今年增到50个，因为民主政府号召开荒，发放了农具贷款，买镢头犁耙的增多了。街口南是猪肉市和卖锅饼的，卖烧肉的，是全集市最热闹、最拥挤的地方……。“海滨书局”的白字招牌，在热闹的十字街口上空，

俯视着人群，墙上张贴着新华书店新书出版的广告，在一个宽敞光亮的瓦屋里，陈列着各种书报，有人站着有人蹲着看书，这就是海滨书局的门市部，这个书局，是去年9月以70元资本开办的，现已扩大到5万元，并发展8个分销处，每集贸易最高额是9000元。这是当地有史以来第一个书局。

随着集市的繁荣，路镇的商号也焕然一新，新设百货商店、民营纺织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各一家，供给来往商人和运盐队吃住的饭铺和旅店32家，车行5家，此外还有钟表铺、银楼……生意也都很好。有一位有经验的老商人说：真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这是一篇长通讯（以上引用是摘要），通过集市盛况，写出根据地生产的发展，商业的繁荣，人民生活的提高，以及金融、工业等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折射了根据地自给自足的经济状况。

《解放日报》对市场的报道，远不限于热闹的集市，而是注意到各种渠道，更注意到贫困落后的根据地，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提倡和表扬各种渠道积极可行的办法，尽量发挥新闻的导向作用。1944年7月9日发表的《牛爱采的货郎担子》，就是表扬吴堡任家沟区合作社主任牛爱采，担着货郎担子下乡卖货的故事。通讯写出了牛主任的货郎担子怎样受到群众的欢迎，他解决一部分农民的纺织问题，供给农民低于市价的棉花，又收买高于市价的土布，一春天就收买200疋土布，农民需要染布时，牛主任又替他们把布送到染坊，染好送回，染费也比市价低；牛主任的担子能供给农民日用必需品，省了农民的路费和时间；牛主任的担子还收集土产，实行物物交换，农民没现钱买东西，可以用鸡蛋、废铁、土布等交换。此外牛主任还优待抗属，帮助老百姓办红白婚丧事……牛爱采的货郎担子给活跃经济出了一把力。如果牛爱采隔上10来天不到哪个村，哪村的老百姓就想他：“老牛做什么还不来啦！”

在自给自足、活跃边区经济中，争取一些必需品进口（即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买进或交换边区必需物资），也是十分必要的，《解放日报》对此也有一些报道。

大生产运动改善了人民生活，《解放日报》如实反映了这种可喜的生活变化。1942年这方面的报道还是空白，从1943年起，边区人民、驻军和机关团体学校生活的提高，不断在报纸上出现。同1940年、1941年比，从没吃没穿，到有吃有穿，到能吃到细粮、油和肉。《李兴海昔日讨饭，今则食饱衣暖》，《安塞县安培德生活富余，一月吃面4次，一年穿布9疋》，“自己动手，发展生产，绥德县各机关生活改善，面、肉、蛋、豆腐已普遍能吃到……”1943年这样的报道很多。《丰衣足食话中秋》一文，形象地反映了延安市人民欢度中秋的景象：市场繁荣，肉、菜、水果、月饼生意兴隆，人民酒饭丰满，机关、学校、部队白天会餐，晚上组织晚会，尽情地唱歌跳舞，最后的收尾是这样写的：“这是一个快乐的节日，每个人都明白这是怎样得来的。”

到1944年，从报纸上看到人民生活又提高一步，仅举《群众杀猪宰羊欢度春节》中的一段调查，就足以证明。马家沟16户人家，72口人，年节食品有：麦子4.5石，猪肉226斤，羊肉225斤，酿酒用米6.9斗，荞麦3.6石，买粉条102斤，豆腐7.5斗，生豆芽用豆3.2斗，还做黄米馍、油馍、油糕……张清山家只有两口人，是移难民，刚来时一无所有，两年就发展了，今年过年杀猪一口，白面、黄米馍、油馍、酿稠酒、粉条、豆芽，应有尽有。难民樊树昌家，也是猪肉、羊肉、白面、豆腐等都很丰富，还给孩子做了两件新棉袄……难民来到边区，好好劳动一年就能翻身。记者写道：“从调查中我们看到群众丰衣足食的具体情况。”

在宣传边区人民幸福生活的同时，报纸也把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生活，向边区人民介绍。《北平发生抢米暴动》、《日寇军马吃豆麦，北平居民吃马粪》（马粪中有未消化的麦、豆）、

《国民党限价实施后，大后方物价猛涨》、《大后方公务人员生活困难》……用活生生的现实，做鲜明的对比，是最有力的宣传。

几个有关政策的宣传

（一）注意掌握政策，强调实事求是

《解放日报》在宣传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全部过程中，注意掌握政策，强调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如在制订生产计划时，强调“不仅要把信心提高，而且要真能用实事求是的精神，研究出新办法，新制度，新作风来”。（1943.1.25日）在春耕生产竞赛高潮中，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联名给各分区县市的指示，要求“竞赛的具体办法，应根据区乡具体情况制订，务求实际有效，勿求形式铺张。”一再强调要因地、因事制宜，创造多种多样的生产经营。

对于先进经验的推广，也同样要求根据本地和本单位的情况，制订具体办法。如1943年6月8日刊登的刘建章同志复赤水县总消费合作社王天泰的信《关于合作社的几个问题》，其中有这样一段：“保证合作社有盈利不亏本，应该怎样经营？”刘建章答：“我不能具体答复，不能墨守成规，一样生意有几样做法。俗话说：‘种田要早起，做生意要多算计’，现在做生意和过去不相同了，因为时局的变化，金融不稳定，商人也难具体决定。”这答复说明先进经验不是一成不变，生意的经营，要看具体的条件。

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是党中央的号召，《解放日报》在社论中也一再提出：“我们必须注意，劳动互助的组织，必须建立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防止以任何形式出现的强迫命令，或‘抄名单’的形式主义。”“绝不能不顾当地实际情况，千篇一律地去对付。”

强调实事求是，是大生产运动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报纸对大生产运动宣传的重点之一。

（二）适当宣传物质奖励

在大生产运动中，尽管强调要为建设边区、支援抗日流血流汗，但各级政府在财力物力许可的条件下，对各行各业的劳动英雄模范，也适当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解放日报》对于把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结合起来的政策，进行了宣传报道。

最初是边区政府、延安县委、县政府、抗救会等许多机关团体给吴满有授予牛、锄头、毛巾等奖品，《解放日报》发了一篇《给奖会上》的特写：“吴满有的身体周围，都置满奖品，从几十里地外赶来参加的和本地的农民，大家都围绕着吴满有，莫不钦慕异常。吴满有高兴得大声说：‘看！你们都学我，好好生产，我们竞赛！’”（1942.5.5日）边区政府奖给马丕恩、马杏儿父女锄头、镢头、犁、铧、棉衣、毛巾、肥皂，还特别奖给马杏儿一套衣料。安塞县委县政府的授奖会，在锣鼓声欢呼声中，杨朝臣和张万库每人牵着一头牛，牛角上缠着红布，喜气洋洋地走进会场。王老太太、刘桂英等十余人，也都得到锄、铧、毛巾等奖品。参加会的农民说：“女子劳动，政府都奖励，咱明年也做劳动英雄！”庆阳县万人大会，奖给植棉模范王仓、李文魁等驴、布、棉花和农具，消息写出一位老农感动的话：“我活了六十多岁，第一次看见政府奖励农民！”

对工厂建立奖励制度，报纸也进行过报道。1943年5月7日发表邓发写的代论《在公营工厂如何开展赵占魁运动》中明确提出：“把每一个参加赵占魁运动的工人所超过工厂制定生产计划标准以外的东西，按月登记起来，奖其劳动所值之一定比例（如30%至50%）发给工人，使参加赵占魁运动的工人，获得政治和物质上的奖励。”还报道过农具厂奖励赵占魁的发奖大会。

（三）在改造二流子的高潮中，各地对什么是二流子，界限不清，曾出现二流子扩大化的事

有的地方把好好生产但又跳大神的人当二流子，有人把在年

节时爱赌博的人当二流子，还有把不直接从事体力劳动只经营和指导生产者当二流子，把体弱多病不能进行体力劳动的当二流子，甚至有的把农村小贩小商，赶脚当小工的也划成二流子。这样误把好人当二流子的结果，不仅本人不满，而且二流子乘机拉拢好人、兴风作浪，扩大了二流子队伍，不利改造。针对这种情况，《解放日报》及时发表了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的文章，《谈农村二流子》，文章指出上述偏向，并对二流子作了比较正确的定义：“二流子是那些不务正业、不事生产，以烟、赌、小偷、强盗、阴阳、巫神、神官、嫖娼、土娼为生活的分子。”划分二流子的界限是：“是否有正当职业和他对生产的态度，是否劳动是主要标准，次要的是看他是否生活腐化，养不养家，做不做违法的坏事……”这样，明确了政策界限，使二流子的改造工作，减少了偏差和阻力。

（四）“吴满有是边区农民的方向吗？”

吴满有是边区广大农民所崇敬的劳动英雄模范，他的先进事迹，为大家公认，但是读者赵长远却提出了不同意见，而且是事关政策原则的问题。《解放日报》在1943年3月15日发表了《关于吴满有的方向——复赵长远同志》，同时也发表了赵长远的来信。

赵长远的信中对1943年1月11日的社论《开展吴满有运动》中关于“吴满有是边区人民的方向”有不同意见，理由是吴满有的经济是建立在自己劳动与雇用劳动的基础上，是富农。他提出：农民的方向是否可以不管其经营性质，而仅仅是他的公民品质、劳动态度与经营技术呢？如果农民的方向基本决定于其经济性质，那么能不能把富农的方向（即吴满有的方向）当作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他认为：“这两个问题不搞清楚，吴满有运动便无法开展。”

来信的时间是2月2日。《解放日报》编辑部经过一个多月的

认真调查研究，写了一封公开复信，信中明确提出吴满有的方向，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含义，经济上他是努力劳动、发展生产的模范，政治上他是拥护革命、公私兼顾的模范。要发展边区生产以支持前方抗战，并推进民主建设，就必须大大地提倡吴满有这种勤劳和革命的精神，把这种精神灌输到全边区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去。

关于吴满有的经济状况，复信中肯定了来信所说吴满有是富农，其雇佣部分是有剥削关系存在，吴满有式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的发展，“然而，这又有什么奇怪和可怕的呢？”复信说，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只是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还不能铲除一切剥削，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是今天边区应时而生的经济的一部分，今天边区的经济情况，需要产生更多的吴满有。复信还指出吴满有是新型富农，是以得到革命利益而发展起来的，他经济上是富农，政治上是共产党员。复信也谈到边区虽然提倡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但并未放松保护雇农的利益。

这封长达四千字的复信最后写道：“总而言之，这种方向，就是要全边区农民都能努力劳动，发展生产，使雇农升为贫农、贫农升为中农，中农升为富农，虽然不会有多数农民升为富农，但会比现在有更多的农民上升却是无问题的，是必然的，必要的，对边区经济发展与革命发展是有利无害的。”

这封复信的发表，进一步阐明发展农村经济的政策，澄清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的是非模糊不清问题，使边区农民的方向更加明确。

（五）地主张永泰的道路

1946年12月8日，《解放日报》一版上发了一条消息，还配有社论《张永泰的道路》。这是一篇有关对待地主的政策性的社论。

消息采用的是张永泰在新华广播电台的口语广播稿，大致说：

“我今年 67 岁，祖籍延安，前清秀才，有地 3000 亩，60 多头牛，600 多只羊。对国民党的暴政不满，共产党不打人我满意，但分了土地牲口，开始我也不满。后来看见公家人和士兵都在开荒种地，号召我们栽树、织布、纺棉花，我们全家也参加了生产。公家开了几处医院，儿媳妇在医院生娃娃，儿子住院治肺病，医生护士待他都好，吃药还不要钱。我看见各级政府都是人民选出来的，我也有投票权。现在自己种地 30 亩，有果园，有菜地，除全家吃用，每年还可剩 2、3 百元，我被选为植树英雄。我过去的佃户吴满有这些人，现在都和我一样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我心里满意了。8 月 15 日那天，我和孙儿大忠，带一点我自己种下的果子，去给毛主席拜节，感谢他给我们人民带来的好处。一见面，他就亲热地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请我吃了饭，在那里整整拉了一天家常，临走还送我几包过节的礼物。前天我又带了自己种下的葡萄，给朱总司令拜 60 大寿，总司令和毛主席又留我吃饭、看戏、讲时事、谈家常，真像亲人一样。我明白了共产党和劳动人民的关系，自己做了劳动者，才懂得劳动人民光荣。”

社论《张永泰的道路》指出：张永泰从不劳动到劳动，从一个被人咒骂的封建剥削者变为一个最体面、最快乐的靠自己劳动丰衣足食的人，这是今天解放区从旧日地主转变过来的人的典型，也是地主们应走的道路。社论论述了土改的意义：是为了使农民从封建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自由地发展生产力，普遍改善人民生活，取消封建压迫与剥削，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社论强调对地主个人，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方针，帮助他们摆脱寄生生活，转向劳动生产，与各阶层人民一齐过丰衣足食的生活。社论还特别提出涟水的地主陈清舫等，土改后积极参加生产，以前的佃户帮他们耕田，教他们掌犁，互助组长替他们代耕土地，这是解放区人与人之间的新关系，不是主奴关系，不是封建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而是平等互助的关系。

这一组报道，生动具体地说明了在大生产运动中，地主应该走什么道路，干部和群众应该怎样对待参加劳动的地主，充分阐述了党和政府的政策。

(六) 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已作了明确的规定和说明，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一政策，《解放日报》一再发表新闻报道和社论。

1944年7月9日，报道了靳体元先生创办元华工厂，扩大运输，发展畜牧的消息，用具体事例说明：对地主经营的工商业采取保护并发展的政策。1945年6月21日发表社论《关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在阐述了“有利于国民生计、而不是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是我们所要发展的，可能发展的，而且必须发展的”后，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对于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主张，综合起来就是：我们是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要在不操纵国民生计的条件下，并且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同时，也要发展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在这样的基础上，扩大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是对各阶层人民都有利的，除了这条道路以外，再也没有其它道路。”

在日本投降前后，这方面的报道量较前增加，说明这一政策不止在边区，而且要面对即将解放的各个地区。1945年8月31日发表的《在边区政府扶植下，民生纸厂迅速发展》的新闻，就是具体叙述民生纸厂的发展过程：这个纸厂是米脂县士绅艾斌卿先生所创办，自1939年从几千元的资本、两个工人办起，至今已拥有5万多银元的资金，股东300余户，职工84人，是边区最好的纸厂之一，艾斌卿告诉记者：工厂能够发展，得益于新政府对民营工业的扶植，财政厅曾给予很大帮助。这个厂经营得法，改良工具，改善工人生活，纸的质量和数量都在不断提高。

日本投降以后，对新解放区贯彻落实党的关于工商业的政策，

报道较多，如 1945 年 12 月 4 日在第一版上刊登煤矿的消息：民主政府积极扶助新解放区工矿业发展，太原县煤矿采用三种经营方式，工人生活与矿方利润均获保障；公营新华公司执行民办公助的方针，扶植与恢复当地土窑生产；10 月 16 日刊登的《邢台千余皮坊即将复业，40 万失业工人获得就业机会》；1946 年 10 月 18 日发表一篇人物通讯，题目是《民族工业家的道路——王膺固先生和永生化学工厂》，还配了短评《王膺固先生的道路》。写的是王膺固同民族资本家史立和、崔之成三人创办化工厂的经过：他两次在甘肃创建制碱厂，都因国民党官僚资本垄断的排挤而失败。1945 年他来到晋察冀解放区，经过艰苦创业，建立了永生化工厂，实现了他的希望，开辟民族工业发展的道路。通讯和短评在称赞王膺固所走的道路中，阐明了党对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

（王 敬）

第十章 宣传边区民主政权建设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共产党领导下的各个抗日根据地，逐步建立起新的民主政权。民主新政权的建立，关系着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壮大人民队伍、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事，也是关系自卫反击战胜利的大事，因此，《解放日报》以相当多的篇幅，宣传民主新政权建立中各项重要政策的贯彻实施。宣传的效果，不但有利于政权工作的建立和开展，而且使广大读者（包括国统区和沦陷区的读者）深切感到边区的新政权建设，利国利民，特别是走在前面的陕甘宁边区，更闪耀着建设新中国的曙光。

宣传的主要内容

一、“三三制”、区乡选举和参议会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重要政策之一，是团结一切抗日人民的组织保证。政权的组织成员，具体分配是：共产党员（代表工人阶级和贫农）、左派进步分子（代表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代表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大体上各占1/3。（在最下级的政权中，人员分配比例，根据情况，稍有伸缩，以防豪绅地主把持政权）。这一政策的贯彻实行，既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对政权的领导，又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团结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日，对

汉奸和反动派实行专政。广大干部和群众，对这一政策的重要性，有一个认识过程，实施中遇到一些思想阻力，《解放日报》对此发表了多篇社论，小言论、新闻通讯和调查报告，推动“三三制”的彻底实行。

陕甘宁边区是全中国第一个实行民主选举的地区，这是一场动员全边区各阶层人民都来参加的民主运动。《解放日报》在1941年6月1日的社论《边区目前的选举运动》中，说明了陕甘宁边区开展的选举运动，不同于民国以来中国官僚军阀所把持的选举运动，也不同于边区在苏维埃时代与抗战后所进行的选举运动。“这次的选举运动，是为了选举出人民的优秀代表来参加政权的管理，为了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来保卫边区，为了提高人民监督政府与拥护政府的热忱，为了在实际行动中教育干部与人民运用民主，更重要的是要经过选举运动具体地来执行共产党的‘三三制’的政策，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给全国树立民主政治的光辉榜样。”1945年的选举，是在抗战胜利以后，全国人民希望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进行自上而下普选的地区（通过选举，产生边区、县、乡三级政府和参议会），对于全国的政治民主化和地方自治的推行，将产生很有益的影响。《解放日报》对这次选举，十分重视，报道广泛、全面，深入。正如10月15日发表的社论《要在全国人民前面做出更好的榜样——陕甘宁边区选举运动开始》中提出的“这次普选，不仅是边区人民的一件大事，而且对全国民主运动与和平建设，也有极重大的意义。”

敌后根据地的参议会，是经过民主选举（开始有极少数人聘任）、具有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机关。它通过“三三制”的组织形式，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对边区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进行战斗动员，密切军民关系，支持长期抗战；加强边区经济建设，提高文化教育，改善人民生活，巩固战争的物质基础；发扬人民的

参政热忱，监督与批评政府，健全各级民意机关，使人民力量经过政府表现出来，成为战胜敌人的武器。《解放日报》对陕甘宁边区及其它各边区的历次历届会议，都有很多报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第一次第二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这是陕甘宁边区首次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参议会，并首次由参议会改选新的政府委员和新政府；因此，报纸对参议会的任务、参议员的责任以及民主作风等，都作了比较详尽的报道。

二、精兵简政

精兵简政，是1941年第一次第二届参议会上由当时参议员李鼎铭先生提出的，陕甘宁边区政府通过，把它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贯彻执行，《解放日报》仅社论就发表了15篇，毛泽东同志亲自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

在社论和文章中，反复详尽地分析当时的敌我形势，教育广大干部认清精兵简政的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当时的形势，从军事上看，在敌后，敌我斗争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敌寇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方式，主要已经从“一口鲸吞”或“一举粉碎”而变为分割封锁、逐渐蚕食的政策；扫荡的目标，已经不只是我军的军事力量和政权组织，而是进而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栉蓖梳头一样来搜索、摧残我深入民间的抗日组织和抗日力量，实行所谓抢、烧、杀的“三光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军编制上，就不能不使正规军与地方军有恰当的比例：一方面使正规部队更能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更广泛地建立地方军与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以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以反对敌对我之蚕食政策。而我们的政治机构，便不能不更加精干机动，就是说：在敌后方，我们的兵，不能不精，我们的政，不能不简。”（社论：《精兵简政》）

从根据地的军民关系和人民经济负担来看，精兵简政的政策，是当时度过难关必须坚决实行的政策。“不这样做，陕甘宁边区敌后各根据地将发生极大的困难。因为抗战还需要作长期的打算，可

是由于敌人对我们根据地进行极残酷的破坏与更严密的封锁，加之5年来的消耗，各根据地现在都有水少鱼大之感，这是相当严重的问题，如不及早注意，一定会遇到水源涸竭的危险。”

《解放日报》大张旗鼓地宣传精兵简政，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

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革命历史阶段中，始终把农民问题摆在重要地位，1942年至1945年，在根据地主要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政策，这是巩固和扩大新政权、保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政策之一。

1942年3月6日，《解放日报》在第一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心问题是保障农民与地主双方的合法权益，团结全国各阶级举行战略反攻。12月30日，又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土地租赁条例草案，调整租赁关系，发展农业生产。于是一个声势较大的减租减息宣传，便在《解放日报》上展开。

社论《减租交租法令必须贯彻实行》指出：实行减租，使农民能生活下去，农民的抗战热情与生产热忱，更能提高；实行交租，使地主能够得到应有的利益。这种政策，完全合乎抗战需要，适合地主农民的要求。实行这个法令的结果，足以增强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团结，共同努力边区的各种建设，支持长期抗战，这是全边区的公事，决不是主、佃两家的私事，不是两家愿意不愿意所解决的。

抗战胜利后，解放区农民在深入开展清算汉奸、恶霸和减租减息的斗争中，迫切要求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改变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指出：我党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保护工商业。于是，全国各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广大农民积极性空前高涨，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解放日报》尽管在当时将进入末期，而且大形势下以军事宣传为主，但对土地改革运动还是有所报道。1946年11月14日发表社论《争取春耕前完成土地改革》，提出：土地改革是一件有空前伟大意义的大事，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将80%以上的农民，从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的血腥剥削中解放出来，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回到农民手里，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土地“回了家”，农民取得“命根子”、“饭碗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高涨，大量事实证明：哪里土改搞得好，哪里群众参加爱国自卫战争就越加坚决，胜仗打的也多。

四、拥政爱民 拥军优属

“拥军优抗（属）、拥政爱民”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起来，然后扩展到全国各个根据地。《解放日报》不断发表社论、讲话、新闻、通讯，推动“双拥”运动的开展。

1943年1月，在阴历新年前，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拥护军队》的决议，八路军司令部政治部和留守兵团发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指示。《解放日报》从此开始了“双拥”宣传。在1月16日发表的林伯渠写的《造成拥军热潮 加强拥军工作》，和2月1日发表贺龙写的《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就是各自从政府和军队的角度，说明开展这一运动的必要性。林伯渠文章里说：边区的巩固和建设，是八路军流血牺牲换来的。八路军保卫了边区，保卫了人民民主民生，近年来又生产自给，大大减轻了政府和人民的负担，拥护他们是政府和人民的责任与义务。贺龙写道：边区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八路军必须坚决执行政府的一切法令和决定。军队打仗为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应该尽力帮助人民，只有军民团结，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更好地建设边区。

“双拥”运动从此在各个根据地开展起来。《解放日报》除每年新年的拥政爱民月形成宣传高潮外，日常的宣传，也逐步深入，从多方面反映军民鱼水情，军队和政府互相帮助。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拥政爱民模范冯文才，吉岷村驻军暴雨中救出居民，太行部队捐钱物慰问军火工人……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和人物，在报纸上不断出现。

宣传的特点

一、针对群众中对政权建设中主要政策的模糊认识，多方面进行宣传解释。这里只举“三三制”的贯彻实施为例。开始有少些共产党员对“三三制”不理解，认为“三三制”只是拉拢党外人士的一种“手段”，因而藉口“找不到好人”而拒绝与党外人士实行合作。1941年12月29日发表的社论《反对政权建设中的关门主义》，尖锐地批评这些党员不懂得必须团结全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联合作战，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有些党员认为共产党在政权中只占1/3，不能起领导作用。社论说这些人误解了“领导”意义。领导不是仗势欺人，而是靠思想上合乎科学，政策上主张正确，行动上令人佩服。反之，只是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在官衙门里多抢位置，作威作福，那不是什么领导，那是把持。是包办。社论提出：共产党只占1/3能不能起领导作用呢？回答是：“能，而且只有占1/3时，才能更高度地发挥领导作用。”有的同志耽心：县以下一般党员，大多是工农分子，文化程度、办事能力、世故经验，大都比地主绅士差，万一有个别坏分子在区乡间布置党羽，造成个人势力，欺压当地群众，怎么办呢？社论指出：“我们是一个有着正确政策的伟大的政党，而政治生活决定的力量是群众自身的力量，违反群众意志的坏分子，是不会得到群众信任的，纵或蒙蔽欺骗于一时，终究会被群众识破。如果党外

人士主张高明、办事能干、勤苦奋发而得到群众的拥护，那有什么不好呢？我们所要求的，中国所需要的，不正是这样的人吗？”社论《充实县级“三三制”》（1942年3月4日）批评陕甘宁边区县以下的共产党员，存在着相当浓厚的关门主义思想，指出：“边区的民意机关和政府里办事的共产党员占绝对多数，把党的决定，当做政府的法令，党外人士不敢放胆讲话、做事，形成党、政、参议会‘三位一体’”。“我们需要的是民主，而不是‘替天行道’的‘明主’”，“一切抗日人民代表，都一定要享有在议会里讲话，在政府里办事的机会和权利。”在社论《实行“三三制”——贯彻党的领导》（1942年3月14日）中，强调党政分开，转变作风，指出只有在议会里、政府里当真有了2/3以上党外人士时，才容易实现这一转变。社论大声疾呼：“关着的门，必须打开，别人的意见，必须倾听，强迫命令，必须取消，一意孤行，也要此路不通！”

各党各派和无党派群众对“三三制”的认识，也有种种不完全、不正确的看法，《解放日报》从各个方面进行宣传解释，下面就是一例：

1942年7月12日，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李鼎铭副主席与晋西北士绅代表团的谈话，他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回答了士绅们提出的：“从政感想及‘三三制’有何困难”的问题。李鼎铭说：“共产党是进步的政党，余今年60岁，决心和共产党患难与共，休戚相关。以精兵简政一案为例，当我提此案时，曾犹豫，但在边参会上，目睹共产党对于民主合作，完全出于至诚，乃毅然提出。结果，不但未经反对，而且受到热烈赞助，经大会接受。从政以来，该案已由政府认真执行，因做的不够彻底，在第二次政府委员会上，又详细讨论，现已开始二次整编。处理问题时，一为人民着想，二为政府着想，三为共产党着想。例如边区负担问题，不能说不重，但在抗战时期，也不能算重，看到干部今天粗衣淡食，更不忍说重。”在延安参观了两个月的晋西北士绅们，听后十分感动。

经过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对“三三制”的重要意义认识了，思想阻力逐渐减少，实际工作的推行也比较顺利，各级政府和民意机关，逐步实行了“三三制”。不仅在陕甘宁边区普遍推行，其他各个边区也在政权机构里推行了“三三制”。

二、注意报道人民群众思想和活动，体现了民主新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权，是政府和参议会，是人民自己的政府和参议会。报纸宣传无论是选举、参议会、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精兵简政，都注意从人民群众的角度，进行宣传报道，把许多感人的事实，用群众的语言写了出来，生动活泼，很受群众欢迎。例如在改选区乡干部的时候，发动群众给原来的干部提意见，庙湾二乡的农民牛仁德说：“政府叫群众讲意见，真是把大家当看病先生一样请去。”他一个人就提了7条意见。柳林区吴满有乡的张治福，在村民大会上动员大家提意见，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今天的会，是掌柜的和伙计算帐的会，看一看你们的伙计办事办得好不好。刚才村长和干部们把今年为大家办下的事都讲过了，此刻村长、村主任都下了工，大家看看，他们能听大家的话，事情办得好，就再雇佣上他们，不好就不雇了。”多么精辟的语言啊。

有一篇通讯，题目是《诚恳认错，耐心说服》，文中写了几段事情，其中有一段是村主任马德良向农民齐兴科认错的事情。选举前，马德良曾派齐兴科送公粮，原说送1.5石，因齐兴科死了一头驴，改送1石，这是马德良同意的。可是后来马德良硬说没同意，还让齐兴科再送走5斗。齐兴科见马不认帐，还要态度，执意不送，两人吵了起来，5斗粮还是没送出。下面节录这件事的处理结果：

“现在是乡选的时候了，马德良在乡上参加干部会，听了指导员、乡长反省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感动了，把动

员齐兴科送粮所犯下的错误，也反省出来：‘我回去保险向他承认错误。’

‘你又来叫我送粮来啦？’齐兴科见村主任来，就很不耐烦地说。

‘嘿！我迹刻是精勾子赶狼——胆大不羞，是向你认错来啦！’马德良说。‘我那时实实儿向你说过只送1石粮嘛！临后，为什么又叫你多送5斗呢？一看村上的粮都送完了，就剩下5斗没人送，我怕受批评，又找不着人送，我想，就向齐兴科耍一回黑皮，固着叫你送，你如果和我嚷，我就老牛顶墙，硬要你去。好老齐，这都是怪我这糊脑啦，是我有错误，向你认错来啦！’

‘那还算错误？你要给我说明白，我明儿就把5斗粮送去！’齐兴科高兴地说。

‘那还能再叫你送？’村主任抢着说。

‘你都向我认错，我为什不送粮？’

‘不能，不能……’村主任摆着两只手。

‘这都是为公家的事嘛，送5斗粮算个甚！’

第二天，齐兴科高兴地赶着牲口送那5斗粮去了。”

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宣传中，《解放日报》一方面批判某些干部中存在的“恩赐”观点，动员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另方面更多地刊登发生在群众中的那些教育人、感动人的典型事例。济沧写的《三千农民愤恨平鹰坟》，是土改中远近传诵的通讯。通讯写的是恶霸地主脏闫王的鹰抓了农民魏老头的鸡，被魏老头打死，脏闫王把魏老头绑在树上鞭打并逼着魏老头卖了仅有的三亩地，扎许多纸鸡纸兔，买上棺材，雇8个吹鼓手，给鹰出殡，还强迫魏老头披麻带孝哭“鹰爹”，魏老头的老娘活活气死，魏老头被打得皮烂骨痛，没过多少日子也含冤死去。临死前对老婆儿子说：“到了讲理的那天，你娘俩要替我伸冤！”土改中斗争脏闫王，农

民把几十年不敢说的冤枉事说出来了，魏老头的儿子喊着“要父亲”，3000群众齐声要求替魏老头报仇，三声土炮响，大家你一镢、我一铲，不到两分钟就把鹰坟平了，高呼“俺穷人翻身了。”编者特地加了按语：“平鹰坟！这是山东人民翻身斗争活生生的典型，它不仅使山东莒县大店区数千人民从这次斗争中翻了身，而且鼓舞了山东千百万人民的斗争勇气。在山东已把它编成了大鼓书，永远在人民中流传着。我们把这典型记录下来，让大家认识在农村中一些恶霸的面目。”

三、宣传中强调高举民主大旗，建设和巩固新政权。边区的政权建设，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进行的，其特点是要从整个民族抗战事业出发，照顾全体人民的利益，善于团结一切抗战的力量，建设和扩大边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方面，关于参议会的宣传最为突出。正如朱德总司令在参议会上所说：救国的方法，只有“民主”二字。我们在敌后建立的根据地，天天壮大，就是因为讲民主，依靠各阶层人民亲密团结，共患难，同甘苦，在所有解放区中，只有陕甘宁边区处于后方环境，它的民主建设，比其它解放区更形完备。我们整个中国都需要这样的民主。

在1941年11月参议会开会之前，《解放日报》发表了非党参议员柳提写的《写在大会之前》，坦诚地写了一个非党参议员的责任感，他说：“我们做了参议员，就是一面要替人民说话，一面要替政府解决问题。”有人问他：一个非共产党员的参议员，在参议会里说些什么呢？他回答：与无党无派、有党有派的同仁，肩并肩讨论政府的、人民的一切提案，说我要说的话。我以为要这次大会开得成功，就是大家踊跃说话。不要说话，就是不民主，自己不说话，就是自己放弃自己的权利，对人民不忠。《解放日报》还发表了许多参议会、参议员监督和检查政府工作的新闻和通讯。如1945年9月刊登的甘泉县参议会参议员反映群众意见，批评政府的新闻：群众认为司法部门的裁判员解决问题不公平，随便押

人罚款；公家分配下来的事太多太紧，公债没完又征粮，征粮没完又驮盐，老百姓没办法；军队种地，有时占了老百姓的土地；农贷要检查是否用在农业上；民主还不彻底，去年征粮时，有的干部不让老百姓在村民大会上讲话，在会上一通过就算了，这是公家的民主，少数人的民主；去年城关动员做鞋 5000 双，至今还有 4000 双没给钱……通过《解放日报》的宣传，看出边区的政权是民主的，群众对民主权利的运用，也形成了习惯。

四、注意宣传新政权建设中的全过程，特别是实施后的效果。《解放日报》对政权建设中主要政策的宣传，都是有始有终，报道实施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也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特别是对施实后的效果，报道尤为显著。如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掀起了参军热潮；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做到军民亲如一家，同心协力打鬼子……，都进行了大量报道。这里只举精兵简政一例，报纸曾大量报道精兵简政的效果和新气象，其中影响最大、反映最好的是 1942 年 8 月 19 日发表的题为《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文章，这篇文章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作者毛铎。

文章第一段就写出了精简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可喜成果：边区坚决紧缩军政民的组织机构，注意精干，使之更适合于敌后日益残酷的环境，并认真爱护兵力，节省民力。总部直属队在紧缩后，只留下原有人员 4%，其余 96%，一部分用以充实下面，一部分真正裁去。边区政府本身在紧缩后，也裁减人员 48%，节省经费 46%。预计 7 个月全太行区，可节约粮食 49156 石，经费 426612 元。

文章概述了采取的步骤，然后详细写如何简政和如何精兵。简政的方针，在于紧缩机构，健全工作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减轻人民负担，规定干部及杂务人员不得超过居民人数的 1%。紧缩机构，主要是裁减合并，克服头重脚轻，达到组织短小精干，适合

敌后游击战争环境。边区政府减下的人员马匹，归到农场等生产部门；有的两县并一，如邢东邢西合并为邢台县。在调整干部方面，多减上层，少减下层，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但不妨碍“三三制”的实行，对民选干部，仍以民主方式改选彻换，不以行政方式由上而下地乱调。在健全工作制度、提高工作效率方面，主要是反对官僚主义作风，政令由繁而简，并规定一套新的具体的领导方法。精兵方针是提高部队质量，加强战斗实力，巩固内部力量，脱离生产的武装部队，不得超过居民人数的2%，同时发展民兵，培养民兵战斗力，以坚持敌后战斗。精兵的办法是：调整编制，缩减合并某些单位，充实连队战斗力；有计划地抽调一批能力较强的地方干部，到地方部队及民兵中，以强化地方武装建设，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紧缩后方机关，减少人员马匹，规定战斗部队团以上战斗员与直属队人员应为7：1，团以下则为5：1。大量减少的人员和牲口，转入生产部门；利用空隙时间，集中整训，加强部队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经营生产事业，以安排老弱战士及荣军。

在爱护民力和培养民力方面，文章较详细地叙述了如何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以及如何节约物力。

这篇长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强烈的反响，一致认为这是精兵简政中的范例。于是，8月24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社论《精兵简政的模范》。社论指出“这是一篇值得着重介绍的文件。今春以来，各抗日根据地，根据我党中央指示，实行精兵简政，晋冀鲁豫边区的军政机关，在敌后战争的环境下，认真、周密、彻底地执行了中央这个指示，在工作上创造了不少成绩。所以这篇精兵简政在晋冀鲁豫的经验总结，不仅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去细心研究，而且足供各抗日根据地借镜与效法。”

（王 敬）

第十一章 对苏德战争宣传 报道的重要贡献

世界反法西斯舆论的先导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凌晨四时,德国军队闪击苏联,5时30分,德国宣布对苏战争,国际时局发生重大变化。战事急如星火,许多重大国际事件接踵而至。《解放日报》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纵览全局,高屋建瓴,不但及时报道了苏联红军英勇抗击侵略者的战况,而且迅速作出反应,多次发表社论阐明苏德战争爆发后大战的性质,适时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成为当时世界反法西斯舆论的先导。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39年9月。在大战初期,是德、意帝国主义集团和英、法帝国主义集团为争夺殖民地和重新瓜分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掠夺性战争^①。当时摆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决反对、彻底揭露战争双方的帝国主义性质。可是,

^① 关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性质的看法尚存分歧意见。有一种看法认为,大战一开始,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争霸斗争同法西斯帝国主义侵略殖民地和弱小国家与这些被侵略国家的反侵略斗争交织在一起,因此大战一开始就具有强大民族解放的因素,存在着侵略国与非侵略国两大阵线。本篇关于这个问题的阐述以当时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有关文件的论述为依据。详见毛泽东《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1939年9月1日)、《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1939年9月28日),载《毛泽东选集》第569—575页和第538—591页。

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站到了苏联一边，战争的态势发生了变化。苏联抵抗德军入侵的自卫战争的正义性是十分清楚的，而英、美这时的对德战争还是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我们对英、美帝国主义集团应取何种态度？苏德战争的前途怎样？这关系到用什么思想武装全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是在中国战场上担负着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世界进步舆论当时并没有对这些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提供明确的答案。

在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6月23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写了对党内的指示，其中对苏德战争爆发后的新形势作出了这样的判断：

德国法西斯统治者已于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联。此种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也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的。苏联抵抗法西斯侵略的神圣战争，不仅是保卫苏联的，而且也是保卫正在进行反对法西斯奴役的解放斗争的一切民族的。

在这个指示中，尤为重要的，是提出了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

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保卫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在目前时期，一切力量须集中于反对法西斯奴役。

指示还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全中国的任务之一是“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根据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解放日报》连续发表社论，阐释世界已进入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阵线斗争的新历史时期的基本观点，回答了国内外普遍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

6月25日，在题为《为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斗争》的社

论中，公布了6月23日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舆论上提出建立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主张。

6月26日，在题为《世界政治的新时期》社论中，集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苏德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形势，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时期。社论指出：

苏德战争是世界政治的新的转折点。以前世界政治的旧面貌，因苏德战争而终结；以后的世界政治的新面貌，取决于苏德战争。

苏德战争已经改变了欧洲战争的性质。

在苏德战争以前，欧洲还基本上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霸权、争夺殖民地和市场的战争……今天战争的本质已经是一方革命、正义，他方反革命、非正义；一方保卫自由、保卫人类，他方绞杀自由、奴役全人类的你死我活的决斗。

在世界反法西斯舆论中，仅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的四日之内，就迅速、集中地对世界形势作出科学论断并最早明确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是《解放日报》。

当德军进犯苏联时，德国通过其驻苏大使舒伦堡向苏联政府递交了一份声明，宣布因苏联未履行苏德条约^①的义务，采取越来越反德的外交政策并准备进攻德国，德国才被迫抢在苏联之前发动攻击。显然，这是希特勒耍弄的恶人先告状的伎俩，是豺狼吞噬山羊前编造出来的堂皇理由。当时，各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都把注意力放在揭露德国所谓对苏联进行预防性战争的欺骗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政府的委托，于6月22日中午12时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强烈谴责德国的背信弃义行径。次日苏联《真理报》在报道苏联领导人的讲话中，批驳了希特勒6月22日晨向德国人民发表的宣言和里宾特

^① 即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协定。

洛甫的备忘录，是试图“指控苏联违反苏德条约的捏造材料”^①。

英国是与德国对立的帝国主义集团中对苏德战争表态最早的国家。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9时，首相邱吉尔在广播演说中宣布：“我们将要对俄国和俄国人民进行我们能够给予的一切援助”^②。6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也表示了类似意见。次日的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罗斯福的讲话。《纽约时报》还针对美国国内一些人公开反对援助苏联的论调，于26日在表达美国正视现实的政治家观点时写道：“德国对在俄国取得迅速全面的胜利，对美、英两国来说将是最大的灾难，对于这一点不应再有任何的误解”^③。苏联由于忙于组织抵抗德军的突然大规模入侵，斯大林到7月3日才发表首次广播讲演，号召全国人民卫国，同时表达了苏联与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力量联合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愿望。斯大林说：“在这一伟大的战争中，我们将有欧洲、美洲、亚洲的一切人民为同盟军，其中包括被希特勒暴君所奴役的德国人民，我们为自由的祖国而进行的战争与民主国家为独立自由的斗争汇合起来了”^④。

总之，在国际局势发生重大转折的历史关头，《解放日报》在党中央领导下，以特有的政治敏感和对风云变幻形势的深刻理解，对苏德战争爆发后大战的性质和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两个牵动全局的问题，提出了详细周密的论证和明确具体的对策，为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斗争指出了明确的方向，这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贡献。

党中央对苏德战争爆发后世界形势的基本估计和提出的战胜

① 转引自〔苏〕H·T·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译本）第4卷第45页。

② 温斯顿·邱吉尔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第568页。

③ 转引自〔苏〕H·T·安德罗尼科夫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4卷第50页。

④ 1941年7月4日《解放日报》第一版载：《斯大林同志演说全文》。

法西斯的根本方法，并没有被全党所有的同志完全了解。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书记处于7月12日发出《以是否反对法西斯为我对一切国内外势力联合或反对的标准》的指示。其要点为：

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斗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对于中国各党派各阶层的态度亦以此为标准，对于一切抗日反德、意与援助苏联者均欢迎之，对亲日亲德、意及反苏分子均反对之。

一位同志在给报社的来信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苏德战争开始了世界政治的新时期，这是不错的。今天战争的本质已经是一方面革命、正义，他方面反革命、非正义。这对苏德战争本身来说是对的，正确的。可是对于英德战争说来是否也是这样呢？英国的对德战争是否已经改变了性质呢？若然那么英国工人阶级应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

这封来信提出的疑问有一定的代表性，报社十分重视，不但在一版显著位置刊登，而且于7月15日、16日分上、下两篇发表题为《一切为着希特勒主义之死亡——论当前战争性质与行动口号》的社论，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7月12日的指示，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从世界总体联系来考察英德战争，解惑释疑。社论明确回答说：

（英德战争）没有和苏德战争联系起来的条件下，单独地拿来看，是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在今天的具体环境和具体联系中，这个战争已经是保卫英国的独立自由的斗争，是毁灭万恶的希特勒主义的正义战争的一部分、一支流，因而目

前的英国对德战争已经变了质，已经是正义的民族战争了！

这篇社论再次强调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态度鲜明地拥护英国国会中唯一一名共产党议员提出的使英国在战争中获胜的措施，支持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关于动员党员缓和罢工的政策。

社论最后阐明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苏德战争改变了世界局势，可是它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当前的基本任务——粉碎法西斯日本强盗的侵略；反而更使这个任务在整个国际局势中加重了它的重要的作用与意义。……抗日的的基本任务依旧，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不但仍须继续坚持，而且更需要它的巩固和扩大。

这篇社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初期的一篇比较完整的重要历史文献。它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上，以无可辩驳的力量，精辟论述了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的策略思想和行动准则。战争形势的发展，正为《解放日报》所论述的那样，到了八、九月间，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初步形成了由苏、英、美和被压迫的弱小国家组成的统一战线，到1942年1月，参加反法西斯战线的国家增加到26个，并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宣言》，规定签署国要保证运用自己的全部经济、军事力量与法西斯作战，不得单独与敌国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终于形成。

对初期苏德战场的分析与报道

《解放日报》对苏德战场的分析，表现了其特有的准确性和科学的预见性。与及时报道前线战况的同时，又发表社论评述战局，给读者以完整深刻的印象。从1941年6月27日到12月2日，发表了从政治、经济、战略、战术方面直接评述苏德战场的社论16

篇^①。

战争刚进行了一星期，即6月29日，报纸就发表题为《苏必胜，德必败》的社论，从四个方面论述这一论断：第一，德国师出无名，无法进行精神动员；第二，德国实力在量上是有限的，在质上已经暴露；第三，德对苏作战遇到许多重大的技术上的困难；第四，德国内不稳而外孤立，苏联内坚强而多助，这乃是决定这场战争胜败的关键。

战争进行到第十天，即7月2日，报纸又发表题为《德国闪击战计划破产》的社论，分析了希特勒在进攻波兰、法国、南斯拉夫和希腊等国所采取的四个战术原则，在侵略苏联的旬日之内受挫的情况，进一步论述了“苏必胜，德必败”的道理。可是这个时候的德军统帅部却正沉醉于初期所取得的胜利中，狂妄地吹嘘说，“对俄战争将在十四天内取胜，那将毫不夸口”^②。

战争进行到一个月，7月22日，发表社论《苏德大战第一个月》，社论从分析两则战报入手，即德军在进攻苏联的一、二周内，每天进程平均23公里，到第三、四周则锐减为8公里，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希特勒闪击战计划的破产。

十月初，希特勒为了破坏莫斯科苏、英、美三国会议决定的英、美援苏政策，抢在冬季到来之前攻下莫斯科，在中路战线调集70多个师的兵力和6000架飞机及大批坦克，大举进攻莫斯科，

① 《苏联红军——不可战胜的军队》（6月27日）、《苏必胜，德必败》（6月29日）、《德国闪击战计划破产》（7月2日）、《希特勒底崩溃是不可避免的》（7月9日）、《苏德大战第一个月》（7月22日）、《人民是正义战争胜利的源泉》（7月26日）、《游击战在苏德战争中的作用》（8月10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8月11日）、《希特勒战略计划失败》（8月13日）、《基辅撤退与苏德战争》（9月24日）、《保卫莫斯科》（10月19日）、《希特勒的最大攻势失败》（10月30日）、《苏联经济国防》（11月1日）、《莫斯科前线大战》（11月27日）、《红军收复罗斯托夫》（12月2日）、《苏德实力之比较》（7月23日）。

② 哈尔德：《战时日记》，转引自〔苏〕谢·帕·伊万诺夫主编《战争初期》第349页。

开始了希特勒称之为“本年最后一次和最大规模的决战”。德军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做着直捣莫斯科的美梦。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指示德国各报于10月12日空下一版头条，以便发表攻下莫斯科的消息。

莫斯科会战还未及一个月，当首都外围战尚处于胶着状态时，《解放日报》于10月25日发表《希特勒败局已成》的社论，断言莫斯科会战苏方必胜。社论对战局作了如下的分析：四个月来形势发展充分证明了希特勒败局已定，历史的方向已无法挽回。“一切战争的任务，都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一城一地之得失，不能决定胜负。如果不能消灭敌军主力，而且让它有生长发扬的可能，则占领地区愈大，其危险也愈甚。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拿破仑征俄是如此。”社论最后对莫斯科会战的结局作出这样的论断：

大军深入，屯兵于坚城之下。雨雪交飞，朔风砭骨，进已不能，退亦不得，此情此景，危乎其殆。不管希特勒如何夸口，可是综观大势，对于他败局已定，难逃拿破仑覆辙。

战局的发展，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预言的那样，到12月初，红军已阻止了德军的进攻并开始反攻，莫斯科岿然屹立。到1942年1月22日，德军失去在莫斯科城下的最后一个阵地乌瓦罗沃，莫斯科会战胜利了！苏联军民浴血搏斗，彻底粉碎了希特勒分子梦想的要在10月内在红场举行入城典礼的神话。莫斯科会战的胜利是苏德战争转折的起点，是德国闪击战第一次遭到的完全失败。

苏德战争的前五个月，是苏联卫国战争最困难的时期。还在苏联红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阶段，《解放日报》就透过浓重的战争乌云，科学预见到希特勒必然失败的命运，这不但是对苏联人民的巨大声援，也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斗志。

《解放日报》初期的国际新闻报道是以苏德战争为中心的。由

于条件的限制，报社能够得到的国际资料很少。但有关这方面重大国际问题的评论和动态消息，却能准确、及时见报，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主要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时局正确判断的结果。除了在苏德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毛泽东及时发出关于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提出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外，7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指示，提出“以是否反法西斯为我对一切国内外势力联合或反对的标准”。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指导报纸的言论，起了关键的作用。

对苏德战场的战况报道和评论，《解放日报》所以能表现出它特有的准确性和科学的预见性，是和报社领导、国际版编辑重视对时局的分析分不开的。博古十分强调研究动向，钻研业务。他经常在编委会和编辑部会议上作国际形势报告，分析新情况，通报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反应。余光生、吴文焘、曹若茗等同志也常在报社会议上作专题时事报告，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动大家学习国际问题的兴趣。到1941年底，报社还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室，下分时事组、苏联组和欧美组。当时的国际版编辑虽然只有吴冷西、王揖、黄操良、邓垦四人，但报社注重研究战局的浓厚氛围，使他们的业务素质提高很快，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尽收眼底，为他们及时捕捉信息，撰写评论，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当时在延安办报的物质条件很差，为了准确报道战况，无论如何离不开地图。当时报社只有一本俄文苏联地图，一本英文地图和一张法文的世界挂图。编辑们因陋就简，根据这些外文地图，凭着简单的工具，绘制了一张张放大的工作用图，贴在墙上，收到战报后确定译名和路线，在图上标出。战局的进程，一目了然。为了统一译名，新华社译稿的地名只写原文，由编辑填写中文译名。这样，《解放日报》的国际报道保证了译名自始至终的统一，避免了译名上的混乱。而当时国统区的许多报纸都没有做到，译名前后不一，一个地名的几种音译同时出现的现象屡见不鲜。

制版工人为了制作精确的地图配合新闻在报上刊出，也想了种种办法，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登报纸上的地图最初用木刻，但因外国特别是苏联的有些地名音节较长刻字很难，后来国际版的编辑和工人商量出一个办法，在本版刻出铁路、河流和城市后，再凿出小孔，用铅字嵌进去标出名字，大大加快了制图速度，印出来也清晰醒目。

总之，《解放日报》关于苏德战争的宣传报道忠实贯彻了中共中央的意图，报社全体同志克服种种困难，发挥了主动性和创造性，成功地报道了这一重大突发性的国际事件，并围绕当时这个焦点，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原则立场和卓越见解。这不但是对苏联人民的巨大舆论支持，也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斗志。

评述苏德战争的转折点

德军在莫斯科战役失败后，利用英、美两国迟迟不在西欧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之机，于1942年7月中旬，投入13个师约27万人的兵力，3000门火炮和迫击炮，约500辆坦克和约1200架作战飞机，企图迅速攻下斯大林格勒后向莫斯科、巴库挺进。

斯大林格勒是苏联欧洲部分军事、经济战略要地和南北交通枢纽的重镇。苏联最高统帅部也调集大军来保卫这座城市。以铁木辛哥元帅为司令员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初辖12个师约16万人，2200门火炮和迫击炮，约400辆坦克，454架飞机，另有150至200架轰炸机和60架歼击机。苏、德双方军队在伏尔加河畔展开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苦战。

在毛泽东同志指导下，《解放日报》以极大的注意力注视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进程。

希特勒一心想快速攻下斯大林格勒，几乎将其在全欧洲的力量调来参战，并从北非调集了一部分飞机和坦克。德国的军事力

量为此发生了新的变化，这就为英、美在西欧建立第二战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如能趁机建立第二战场，可以重创德军，使希特勒腹背受敌。因此，开辟真正的第二战场已刻不容缓。

8月6日，《解放日报》在“半月国际述评”栏内呼吁立即开辟第二战场。“述评”指出：“目前由于苏联南线的剧战，驻西欧的德军纷纷东调，沿大西洋被占领国家的防务已大大减弱。这正是英美同盟军登陆作战的良机。今天摆在英美前面的问题，已不是有无决心的问题，而是抓紧时机，迅速行动，和苏联红军夹击德寇，实现年内击败希特勒的问题了。”

斯大林格勒会战已进行月余，但第二战场迟迟未能开辟。9月25日，《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报道斯大林格勒进行激烈巷战消息的同时，刊载题为《是开辟第二战场的时候了！》的社论。社论指出：斯城争夺战已进入决定阶段，苏联军民的英勇抵抗吸引着希特勒统治下的全欧力量。英、美两国应抓住目前不可多得的时机，立即建立第二战场。

《解放日报》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伊始，就着重宣传开辟第二战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到10月4日，斯大林也就此问题答美国记者问，强调开辟第二战场“在苏联对于目前局势的估计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当记者问到同盟国对苏联援助的作用及如何改善时，斯大林回答说：“苏联对同盟国的援助，乃是将法西斯主要兵力吸引到自己身上，若以此比较，则同盟国对苏联的援助，至今仍效力甚微。要扩大和改进这种援助，只需做一件事，即同盟国充分并即时履行其义务。”

10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布“炉边谈话”，声称关于开辟第二条战线“已有若干重要决定”，并同意“向德、日发动新进攻”。英共中央机关报《工人日报》也发表评论，要求政府“以行动代替建立第二条战线的言论”。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拖到1944年5月，英美军队才开进西欧，并于6月6日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正式开辟第二战场。《解放日报》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伊始，就着重宣传开辟第二战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是很有远见的。

当德军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时，战争的形势十分险恶。世界反法西斯阵线有不少人被德军的凶焰所迷惑，对苏联军队能否守住斯城抱着悲观的态度。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从10月12日至16日，连续为《解放日报》写了三篇社论，以其分析的深刻性、论断的准确性和预见的科学性，为该报的苏德战争宣传报道又增添了耀目的光彩。

10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同志撰写的著名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①。社论对已进行了48天的“人类历史上无以伦比的空前苦战”作了总结，预见到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开始到来了。社论写道：“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社论把苏德战争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作了分析，认为“今年冬季开始的第四个阶段，将是希特勒走向死亡的阶段”。社论对希特勒的命运作出了历史性的判决：

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社论最后得出结论：“一切对世界形势作悲观观察的人们，应将自己的观点改变过来。”

值得注意的是，社论还对第二战场迟迟不能开辟的原因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在西线，即使英美还采取着观望和拖延的政策，但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时候，第二条战线总是要建立的。”事实正

^① 此文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是如此。当德国败局已定，在战争接近尾声时，1944年6月6日，英美联军才在诺曼底登陆，正式开辟第二战场。

10月14日，报纸发表题为《历史教训》的社论。社论将苏联保卫斯大林格勒之战划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七、八月之交开始的顿河河曲的战斗，这是保卫斯城之战的前哨战。红军采用战略退却的方针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至8月23日才放弃顿河东岸克拉赤一带阵地。社论指出，“如果德军没有河曲23天的阻碍与极大的消耗，则斯城的直接保卫战将是困难的。”第二段是从8月23日到9月15日，红军在顿河与斯大林格勒之间纵深50至60公里地带消磨了敌军23天。社论指出，“没有这第二个23天的消磨，斯城的保卫也是困难的。”第三段是从9月15日至10月9日，红军与德军进行了24天巷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同志对正在进行的斯城之战分成三个阶段作了分析，指出希特勒必然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他的实力和他的野心之间的矛盾，揭示了这三段战役与斯城之战的总体联系，雄辩地向读者展现了红军必胜的前景。与上一篇社论相衔接，这篇社论也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苏德战争已经证明：只要人们不对法西斯讲慈悲，就是说，多一点勇气，法西斯就会失败的，这就是历史的教训。”

10月16日，毛泽东又撰写题为《评柏林声明》的社论。柏林发言人于12日发表声明，称“德军已由攻势转入守势”，并吹嘘“这种守势不应被看作将来的作战计划”，“此不过表示德国及其盟友在作战三年以后业已赢得一个不易被攻的地位”。社论评述了德国自1941年太平洋战争以来所采取的政策，彻底揭破了柏林声明中的上述谎言，指出德国的进攻实力已经完结。社论最后说：“法西斯的命运是决定了，只有十分怯懦的人们还在害怕法西斯。”

这三篇社论发表后，10月19日，在陆定一主持召开的编委会会议上，博古讲了时局。他说，毛主席写的三篇社论是中央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指示，报社要学习、讨论。国际局势已到了转变

的关头，纳粹在攻不下斯城而精疲力竭的情况下，由战略攻势转到战略守势，所以德国不会再有像样的攻势了，这是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我们要用很大力量改变一些悲观人们的观点。德、日、意法西斯已失去主动地位，国际形势对我们是有利的。

毛泽东同志在上述三篇社论中的论断，一个月后即被开始证实。11月19日和20日，苏军以100万兵力、13,500门大炮、约900辆坦克、1400架飞机的强大战斗力，向德军展开了大反攻，仅用数天时间，就把以鲍卢斯上将为首的德国第六集团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城下。11月24日，斯城解围。1943年元旦过后，苏军开始了歼灭德军的战斗，到2月2日，斯大林格勒会战以苏军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刚刚被希特勒授予“元帅”军衔的德军总司令鲍卢斯和23名将军成了苏军的俘虏。德军损兵折将总数达150万人，占其在苏德战场作战总兵力的1/4。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中，斯大林格勒会战具有重大的意义。苏军的胜利，是战争主动权转入反法西斯阵营的主要标志。当德国法西斯气焰嚣张的时候，《解放日报》对斯城之战和整个形势作出的深刻分析，坚定了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国家人民的必胜信念。

（王凤超）

第十二章 副刊的宣传

在我党报史上,《红色中华报》的《红角》专栏,是党中央机关报副刊的雏型,后来该报的《赤焰》虽然可称为党中央机关报的第一个副刊,但是《赤焰》无论从内容和容量来看,都难以与《解放日报》的副刊相比。《解放日报》的副刊,是在当时全国报纸中发表文艺作品最多、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文艺阵地。无论就其形式,还是就其内容,也无论就其地位,还是就其作用,都是中国党报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

副刊上刊登了许多作家的处女作和成名作。副刊的编辑们通过辛勤的劳动和强烈的责任感发现、培养了一个中青年作家群,他们在民主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都成为我党文艺战线的骨干与中坚。副刊上刊登的文章与作品,都有着深远影响,在政治、党建、宣传、思想、理论等各个领域内,副刊所刊载的极为丰富的文艺作品,影响广泛,流传至今。

纵观《解放日报》史,副刊版面的变化与其它版面的变化,既有紧密联系的一面,又有相对独立的一面。就副刊的演变,若以内容和形式相对稳定而分,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41年9月16日至1942年3月31日改版前的“文艺栏”——即“八大专栏”阶段。这一阶段可称为副刊的奠基阶段。八大专栏内容广泛,势态纷呈,尚不稳定,没有形成《解放日报》副刊的主体特征。

这一时期,丁玲任“文艺栏”主编,编辑有陈企霞,1942年

初黎辛任文艺栏秘书，人手不足，工作繁重。他们以开创性的工作精神和辛勤的劳动奠定了《解放日报》副刊的根基。丁玲成为党报文艺副刊的创始人和奠基人。

第二阶段是从1942年4月1日改版之日到1946年11月19日报社大部分人员撤离延安时止，为《解放日报》综合性副刊阶段，刊登的文字由文艺栏时期的每期6000字，增至12000字，刊登的内容由文艺栏时的仅仅是文艺作品而扩充为文艺作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文稿，版面占第四版全版。改版后的副刊逐渐成熟，内容充实，版式统一而稳定，是副刊最辉煌的时期。

这一时期就编辑力量而言，1941年3月15日舒群从文抗调入报社，接替丁玲，继续为文艺栏主编。编辑人员仍为陈企霞和黎辛。在改版过程中，毛泽东主席十分关心副刊的建设，一方面鼓励舒群大胆工作，边工作边学习，另一方面亲自为副刊组稿，组织副刊的写作力量。同时他还亲自为副刊修改文稿，撰写按语，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投入了光辉的思想和智慧，使副刊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为了把副刊办得更好，1943年初，又加强副刊的编辑力量。担任中央文委秘书长（仍兼任）、文艺科长的艾思奇调入报社。此后，又陆续调来编辑工作的还有陈学昭、白朗、林默涵、温济泽、庄栋等同志，文艺栏正式改为副刊部，艾思奇任部主任，舒群任副主任。以张謇为科长的美术科也划归副刊部领导，副刊的阵容壮大了。1943年春夏之交，舒群调离，1943年末周立波调来报刊任副刊部副主任，直至1945年6月调离。

艾思奇1910年生，云南腾冲人，曾为《申报》、《读书生活》等著名报刊撰稿，著有《大众哲学》，1935年入党，1937年到延安，先在中宣部工作，1943年初调《解放日报》任副刊部主任，1945年5月任副总编辑。

1945年5月机构改组，艾思奇任副总编辑、报纸编辑室主任，

温济泽为副刊部主任，编辑有冯牧、庄栋、陈铁耕、黎辛。1945年6月温济泽由副刊部调往口语广播部任主任。杨思仲接替温济泽为副刊部主任，直至报纸终刊。

第三阶段是从1946年11月20日至1947年3月10日，为“星期日增刊”阶段。当时，党中央已从延安撤离，军情紧急，战火弥漫。《解放日报》由四版改为两版，副刊由独立的第四版合并于第二版。回归为创刊初期的副刊性文字，不成其为副刊。为了弥补缺少副刊的不足，《解放日报》开辟“星期日增刊”，只在星期日辟为四版，在增刊内刊登副刊文章，呈现出《解放日报》副刊的尾声。

改版前后的副刊

（一）初期的副刊

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之日起到1941年9月15日止，《解放日报》只有对开两版，没有独立的副刊。丁玲是主编副刊的最早负责人，据她回忆说：“博古主张文艺稿件不辟专栏，好的文艺作品可以放在报纸的第二版、三版，甚至头版。按照这个意见，发表的文艺稿件都不辟专栏。”这一时期刊载了一些译文、诗歌等副刊性文字。为创刊号及该报最初出刊的三天就连载了戈宝权译的爱伦堡的通讯《另一个法国》。通讯以文艺的笔法真实地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德寇蹂躏的法国惨状，文笔十分动人。

《解放日报》从创刊时起便十分重视并竭力搜集副刊性文字的稿件，在创刊号的报眼处醒目地刊登了如下启事：“本报竭诚欢迎一切政论、译著、文艺作品、诗歌、短篇小说……等等之稿件，一经掲載，当奉薄酬。”

副刊性文字呈现了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文艺作品的重点是小说和通讯，这对丰富版面起到了良

好的作用；不足是译文太多太长，连载2至3天的译文比较普遍，这对于工作、学习、战斗生活十分紧张的读者来说，是很不适应的。

二是副刊性文字的内容较为单一，基本上是政治和军事的内容，只有一篇是有关医疗卫生的。另外，题材比较空泛，没有紧密联系我国抗日战争的现实。

三是文字比较生涩，深奥难懂，很不通俗，超过了广大工农兵读者的阅读水平。即使是党政机关干部，若不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阅读起来也是十分吃力的。

总之，这一时期的副刊性文字，只是一种试验性的探索。在创刊之初，在通讯网尚未健全，文艺稿件十分匮乏的情况下，编辑人员编辑了这样的副刊性的文字，也是很有成绩的。

（二）文艺栏——“八大专刊”的诞生

1941年9月16日，《解放日报》改为对开四版。从这一天起，第四版开辟了半个版面的《文艺》专刊，独立的副刊正式诞生。首期的《文艺》专栏刊登了署名温馨的小说《凤仙花》、丁玲的文章《战斗是享受》和原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给中国友人的来信》。刊登《征稿启事》说：“我们欢迎文艺上各种形式的作品，不过希望以短小精悍、二三千字为宜，稍长之小说稿，也可。但诗歌最多只能刊载130行，更长则不适合了……”说明此前文章过长的缺点已经开始得到注意。

9月21日，诞生了《青年之页》专刊。首期刊登了冯文彬的文章《为反法西斯主义的青年团结与统一而斗争》、朱德的文章《十年来的东北青年》、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莱士（后译为多列士）的文章《向法兰西青年召唤》。

9月24日《中国工人》专刊创刊，发表了希文的文章《国际工人阶级反法西斯运动》、龙彦的通讯《太原魔窟下的工人》。

9月27日创刊了《敌情》专刊。发表了《敌情半月谈》，傅弭

的专论《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派别》等。

9月28日《中国妇女》专刊创刊，发表了梦觉的文章《怎样在妇女运动中展开调查研究工作》、吕璫的文章《好婆姨？还是坏婆姨？》等。

10月4日《科学园地》专刊创刊，发表了徐特立撰写的发刊词《祝科学园地的诞生》，发刊词说：“科学园地！在文化落后的西北，而且是当此世界大战时期，你的诞生是很艰难的；而今你竟是呱呱堕地了，无论将来成长的情形如何，只要能够诞生，总是破天荒的一次。”刊登了林山有关土壤的文章《边区的黄土》，白华的科普文章《从所谓硫磺弹说起》、孙宇写的通俗讲座《物质不灭定律》。

10月29日《军事》专刊创刊，朱德撰写的发刊词说：“现在全世界人类正处在一个大战争中，这个战争就是反法西斯的战争。法西斯的侵略，已迫得所有的人，不论男女老幼，不分党派宗教，不分民族种族，不得不参加到这一战争中，以求生存，以谋自卫……在这样的时代，军事知识，不但是军人所必需，而且是人人所必需的常识了……有了这张副刊，写的人好好的写，看的人好好的看，看了以后好好的做，好好的练，就会有不可战胜的民兵产生出来。这就是我的希望。”本期还刊登了一月军事动态，战术问答——破袭战，曾涌泉写的军事术语解释和苏联红军用敌坦克毁敌飞机的故事。

11月24日，由中央总卫生处负责撰稿的《卫生》专刊创刊。李富春撰写的发刊词说：“‘康健之精神，寓于康健之身体’……今天，在延安，在全中国讲求卫生，发展卫生运动，使新中国的新人活泼泼地精神焕发，心身喜悦，坚持抗战必胜信心，有着严重的政治意义……今天，在延安，在全中国讲求卫生发展卫生运动，使新中国的新人不仅具有铁的意志，而且具有坚韧不拔的体魄……这有着严重的军事意义……减少疾病，不仅解除治疗和休

养的痛苦，而且节省巨额治疗医药费用，这又有着积极的经济意义。”本期还发表了何穆、李庸的文章《延安伤寒流行的教训》、金茂岳、刘允中的卫生讲座——《伤寒》、元晖《关于伤寒病传染的两个故事》。

上述八大专刊的问世，丰富了《解放日报》的版面和内容。并促进了《解放日报》“开门办报”。因为副刊编辑人手少，仅靠编辑部的编辑力量难以支撑稿件的需求，这样，专刊便与相应的组织发生了密切的关系。如《文艺》专刊与“文抗”、“鲁艺”，《青年之页》专刊与中国青年社，《中国工人》专刊与中国工人社，《中国妇女》专刊与中央妇委，《卫生》专刊与中央总卫生处，《科学园地》专刊与延安科学研究院，《敌情》专刊与中央军委等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八大专刊并没有全部保存下去。在改版以后，副刊改为第四版整版篇幅。《中国工人》、《青年之页》和《中国妇女》三个专刊接受读者意见停刊，《卫生》、《敌情》、《军事》、《科学园地》仍旧得到保留，不定期出刊，原来的《文艺》专刊，改为综合副刊。

（三）《文艺》专刊的百期回顾

八大专刊中占的篇幅最大，刊登内容最丰富的首推《文艺》专刊。在繁荣的时候，它几乎每隔一两天甚至连续几天每日一期。在边区文艺刊物少、文艺创作园地小的情势下，《文艺》专刊担负着重要的任务。这就是团结边区所有成名作家，尽量提携培养青年作家，反映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及八路军、新四军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起了繁荣文艺创作，活跃文化生活的作用。

到1942年3月11日，《文艺》专刊共出了100期。为了迎接《文艺》百期，《文艺》专刊出版了三期《百期特刊》。

在三期《百期特刊》中，对《文艺》专刊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同时也指出了它的不足，促进了文艺副刊的发展。

在《百期特刊》中，发表了刘白羽的文章《新的气息》，欧阳

山的文章《祝‘文艺’的百尺竿头》、丁玲的文章《编者的话》、舒群的文章《为编者写的》、艾青的文章《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奚如的文章《一点意见》。

《文艺》百期获得的成绩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文艺”的发刊是1941年延安文艺界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正如欧阳山在文章中所指出的：“不只文艺界本身庆幸它的诞生，拥护它，珍爱它；也不只是它实现了‘五一施政纲领’对于艺术的预约，表现了我们的党对于文艺的重视和提倡。实际上，它本身还做了许许多多非常有益的工作。它对革命，对艺术，有了一样多的贡献。它扩大了文艺运动及其影响，广泛地提高了咱们边区的文化水平，充实了边区人民的精神生活。”

第二，明确了《文艺》专刊的任务，培养了一批文艺创作新人，发表了一批好作品。丁玲在《编者的话》中，对《文艺》百期做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总结。

《文艺》专刊占着《解放日报》1/8的版面，这在边区出现还是第一次。它担负着以下四项任务：一、团结边区所有成名作家。二、尽量培养提拔青年作家。三、反映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生活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斗。四、提高边区文艺水平。

《文艺》培养了三十几位文艺新人，其中有不少具有写作才能，同时发表了一批文艺佳作。如灼石的《二不浪夫妇》、葛洛的《我的主家》、邢立斌的《回家》、叶克的《猎人的故事》和《科长病了》、温馨的《凤仙花》、平若的《温情》、鸿迅的《厂长追猪去了》。

第三，《文艺》百期共收到了大约500万字的投稿，发现了几十位创作新人，初步形成了一批比较稳定的作者队伍，《文艺》专刊成为活跃边区和各解放区文艺创作的重要阵地。

百期《文艺》专刊，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归纳起来也有以下三点。

第一，通过一些作品暴露了文艺思想的混乱，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许多文艺工作者还没有真正认识和掌握文艺与生活关系的唯物主义文艺观。如《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一文说：“作家不是百灵鸟，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他的竭尽心血的作品，是通过他的心的搏动而完成的。它不能欺骗他的感情去写一篇东西，他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在他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于他的情感，因为不这样，他的作品就成了虚伪的，没有生命的。”

第二，内容过于单调，稿件篇幅过长。对此及形成的原因，丁玲在《编者的话》中进行了阐述：“编者本人对副刊更不愿采取报屁股，消闲，小玩艺，吃甜点心的办法，所以文艺栏，及改版后初期的‘文艺’都使人感到不活泼、文章较长的缺点。当然，其中也的确有种种不易克服的困难。譬如在延安的作家几乎全是杂志的作家（写长文章的），不适合为报纸写作。而短小的报告速写之类又因交通的关系，收不到很多稿子。在有限的篇幅中，不愿使其太单调，不能不登载两篇以上的作品，以致常常一篇小说连载两天或三天。这种不活泼，不能提高读者兴趣的缺点是常常使编者不安的。于是在极力求其合乎读者的需要上，我们设法改正，并且愿意使‘文艺’减少些‘持重’的态度，而稍具泼辣之风。同时，小说占的篇幅过多，而戏剧、美术、音乐方面的作品极少。”

第三，由于文学理论上的混乱，表现在作品和作者之中，缺乏团结气氛和生动活泼的政治气氛。正如奚如在《一点意见》中所说的：“延安文艺界表面上似乎是天下太平的，但彼此在背地里，朋友间，都常常像村姑似的互相诽谤，互相攻击，各以为是，刻骨相轻。显然的，这里存在着许多待决的问题，如对文学理论的见解，作品的看法，以及作家之间正常的关系等等。”奚如的意见是中肯的，《文艺》专刊缺乏活跃的文艺评论和正确的文艺批评。

因此《文艺》专刊需要进一步改进，文艺界需要全面整风。

（四）读者献计

八大专刊虽然在丰富副刊内容，在活跃版面方面确实做出了新的尝试，编辑们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是，总的来看，这些专刊未能紧密联系边区和各解放区革命斗争的实际，并存在着党八股的文风，因此读者不甚欢迎。另外，在这一时期，也发表过如王实味《野百合花》和丁玲《三八节有感》一类有缺点和错误的文章。关注副刊的广大读者纷纷给报社写信，就如何改进副刊，提出了十分有益的建议。

1942年3月28日《信箱》专栏发表了署名为枣园一读者的来信，题目是《建立“党八股”病院》，信中说：“在贵报发刊的‘中国妇女’、‘青年之页’、‘中国工人’（甚至有几期‘军事’也在内）内容相当贫乏，水平甚低。贵报不应对它们采取放任态度，应积极帮助这个副刊的改进。

顺便我提供几个反党八股的具体办法：

（一）多收集读者意见，有些文章甚至可以号召读者投票公布，党八股所得的票数必然是最少的……

（二）仿照以前中学生的‘文章病院’办法，设立‘党八股病院’于贵报屁股上，专门分析与医治延安所能发现的党八股文章。这就需要与广大读者密切合作。

（三）中党八股毒最深的某些刊物编者应该休息一下。一个人的文章的作风、风格，决不是听几个报告就可以转变的……”

延安纬华毛织厂染色部工人来希说：“解放日报太深奥了。‘中国工人’不感到亲切，好像和我们没有多大关系。”新市场治兴炉铁匠李洪范对副刊提出的意见是：“一、‘中国工人’要介绍模范工人，予以奖励，生产不积极的，给以批评。二、有系统的介绍战况和边区情况。三、文艺栏登点剧本。”延安大学女生张健说：“看了‘中国妇女’总觉得不能得到很多东西。”她认为下列

的材料应该放到里面去：一、全国妇运动态。二、边区妇女、卫生、婚姻、教育等问题。三、妇女参加生产问题。四、要纠正不好的倾向，刺激向上。

诗人艾青认为文艺版的另一个任务，是发挥组织作用，但他感到联络不够。

作家肖军认为表现方式弹性一些，增加点社会新闻。

剧作家塞克说，戏剧的消息和文章太少了，特别是关于戏剧批评的文章。

轻骑队代表人童大林希望多登杂文。

读者罗李王提出的建议：“把‘文艺’、‘中国妇女’、‘中国工人’、‘青年之页’、‘军事’五副刊合并为一个综合性质的副刊，使它成为一个反映实际生活、解决实际问题的刊物，使它在我们这个充满了斗争的社会生活中成为一个褒贬建设的旗帜，把它的篇幅扩大，使之占第四版的三分之二，以公诸大众。”

（五）副刊的改版

《解放日报》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改版前夕，毛主席曾不点名地批评了《解放日报》刊登《野百合花》，其中的观点是错误的。

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副刊由过去二分之一版变为第四版的一个整版，撤销了八大专刊中的五个专刊，变成了综合性副刊，只保留了《敌情》、《卫生》和《科学园地》三个专刊，内容和形式均面目一新。

副刊改版后，出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可喜变化。

第一，政治方向明确，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从1942年4月3日起，中央机关开始整风，副刊为配合整风运动，开辟了《整顿三风讨论资料特辑》，在《特辑》里，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章。

第二，内容更加综合，体裁更加多样。在改版后的副刊里，有

专论、文艺评论、杂文、小说、漫画、来信、诗歌、译文、歌曲等，一改过去大多为小说和诗文的单调体裁。又不同于八大专刊时期，本来综合的内容被人为的专刊所割裂。

第三，副刊改版后，保留了八大专刊中的《卫生》、《敌情》和《科学园地》三个专刊。在改版指导思想的要求下，对保留的专刊加以改造，确定了新的宗旨，以崭新的面貌呈现于读者。

1942年4月19日，《卫生》专刊出了第7期，也是改版后的第一期。在这一期上发表了《致读者》，其中检讨了过去五个月的工作，认为虽然我们曾尽了一些灌输一般卫生知识的力量，但有些文字缺少更切合边区实际情况，内容多是把书上的东西抄下来就算完事，没有根据中央指示与决定担负起建设并组织边区新卫生事业的责任。内容也欠有组织系统的更通俗更切合大众需要的文字，对边区一般医务卫生人员及机关各种工作的批判表扬均不够，文字欠通俗，排版不活跃。编委会认为改版后本刊除了应该起扩大卫生宣传的作用，并应有系统地帮助医务卫生机关的技术与非技术人员的业务学习，同时对一般干部的卫生保健知识，应有系统的教材，其次应帮助边区各卫生机关多做改进卫生行政、交流工作经验的桥梁。

《科学园地》在改版后确定了新的宗旨。1942年5月3日改版后出刊的第一期刊登了《编者启事》，其中说道：“本刊今后以介绍及反映与边区有关之自然科学及技术工作为中心，同时亦顾及到系统地帮助一部分同志在科学方面的学习……我们切望本刊成为科学技术讨论的园地和科学技术界团结的中心。”

第四，为了使副刊更紧密地联系现实生活，提高宣传的针对性，改版后的副刊增加了特刊的版面。这些特刊版面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出刊。一是为了纪念重要的纪念日和节日，如4月4日《儿童节特刊》、《五一劳动节特刊》、《纪念五四特刊》、《七一特刊》、《卫生节特刊》、《高尔基逝世六周年特刊》、《双十国庆纪念

特刊》。对于这些重要的日子，特刊都紧紧围绕中心主题，紧密联系边区和解放区的实际，形成鲜明的特色，产生较强的宣传效果。如1942年5月12日出版的《护士节特刊》，这一期刊登了毛主席“尊重护士、爱护护士”和朱德总司令“救护抗日伤病战士，完成抗战胜利”的题词，此外还有一批专文，如元晖的《中华护士学会延安分会一年来的工作总结》、竹眉的《加强护士的业务学习》、景致的《南丁格尔传略》、中央印刷厂工人病员唐永康的《祝护士节》等。二是就当前突发的一些特殊事件，本报及时运用特刊，达到宣传目的。如《九一扩大运动会特刊》、《延安评剧院成立特刊》、《追悼朝鲜义勇军牺牲同志特刊》、《征粮特刊》等。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指引副刊健康发展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延安文艺界的作家和艺术工作者大都从大后方而来。由于没有系统地进行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没有经过长期艰苦的实际考验，在思想上存在着许多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这些错误的认识曾经反映在作品和平时的行动中。为了抗日战争获取胜利，必须整顿这支文化军队，在中央机关大规模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为了准备这次会议，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分别找文艺界的许多同志个别谈话，搜集问题。座谈会从1942年5月2日开始，5月23日结束，共开过三次大会。大会由中宣部部长何凯丰主持，引导大家畅所欲言。毛泽东同志于5月2日发表了《引言》，启发大家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民族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主席就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提出问题，引导大家深入讨论。

副刊为了配合文艺座谈会，也专门开辟版面进行宣传。为此，1942年5月14日，编者刊登了《告读者》。其中说：“最近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报决定将与此次会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这样，刊登了列宁的论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作家肖军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艾青的发言《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严文井的发言《论好作品》，刘白羽的发言《与现实斗争生活结合》。

延安文艺座谈会促进了边区文艺工作者思想的活跃。一些文艺团体和组织纷纷举行活动呼应文艺座谈会。如5月13日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戏剧工作委员会召集40多位戏剧家、名导演、名演员、戏剧评论家和戏剧运动工作者就戏剧的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问题展开了一天的座谈。副刊在5月19日发表了唯木的文章《当前的戏运方向和戏剧界的团结》一文，对这次座谈会主要论点进行了纪要。同时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发表了《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列宁论文学》、《拉法格论作家与生活》，重新刊登鲁迅的名文《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在为时近一个月的文艺座谈会上，党内外文艺工作者几十人进行了热烈的发言和讨论，5月23日毛泽东同志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他的发言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第二部分是讲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如何解决好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第三部分讲了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关系问题，即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第四部分讲了文艺界的主要斗争方法之一——文艺批评的问题，提出了文艺评论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批判了“人性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

“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等一系列错误思想。副刊改版前所刊登的文章，不难发现，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批判的错误思想，有许多都是在副刊所刊登文章中的观点。说明毛主席对副刊的关注，有的放矢地针对延安文艺工作者思想上的混乱，对症下药，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辉典范。第五部分讲了文艺界需要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全面系统地解决了边区文艺运动中一些根本的方向性的重大问题，是指导当代文艺运动正确方向的光辉灯塔。

副刊不失时机地刊登了一些作家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体会和心得，推动了文艺界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

关于《野百合花》与批判王实味的斗争

1942年春，延安和边区革命根据地遭受日伪反动派层层包围和经济封锁，我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从大后方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对艰苦的生活条件缺乏思想准备，加上思想意志没有得到长期的磨练，极端民主化的政治幻想和绝对平均主义的物质要求导致了一些错误思想在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中蔓延。1942年整风之前，在延安一些刊物上出现一系列的有这种思想倾向的作品。如1942年2月17日延安文艺刊物《谷雨》发表的王实味的文章《政治家、艺术家》，1942年3月9日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的王实味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以及3月13日和23日《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的王实味的《野百合花》，3月12日发表的罗烽的文章《还是杂文时代》等等。其中以王实味的《政

治家、艺术家》和《野百合花》的影响最大，波及最广，发展的结局最曲折，引出的教训最深刻。

署名实味的以《野百合花》为总题的杂文，在副刊连载两期。第一篇是刊登于1942年3月13日副刊的《文艺》专刊里，包括《前记》、《一、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二、碰“碰壁”》。第二篇是刊登在1942年3月23日《文艺》专刊上，内容是《三、“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四、平均主义与等级主义》总共四篇相对独立的杂文。

王实味在《前记》中，从回忆最敬爱的平生第一个朋友——李芬入笔，（李芬1926年入党，1928年被亲舅父出卖，被反动派杀害），到“使我决心写一些杂文”。他说：“在这歌喉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罢，每一分钟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我们生活里缺少什么？”作者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通过夜路两个女友的牢骚对话，反映了“大头子”、“小头子”官僚主义，对下级漠不关心，“到处乌鸦一般黑”，“对别人没有一点爱。”

关于《碰“碰壁”》是作者从读本报《青年之页》专刊第12期登载的《碰壁》一文，有感而发，作者认为延安的青年在碰壁后所发的牢骚要引起重视，“听听一般下层青年的‘牢骚’，这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

关于《“必然性”“天塌不下来”与“小事情”》，这一篇是以讽刺的口吻抨击所谓“大师”认为“我们的阵营存在于黑暗的旧社会”，因此必然存在黑暗，对于这些“黑暗”的事物，“大师”“大人物”常常冠以“天塌不下来”，是“小事情”。作者认为“在延安，大概不会出什么叛党叛国的大事情的……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们心里或是唤起温暖，或是引起寂寞。”

关于《平均主义与等级制度》，作者认为延安实际存在等级制度，他说“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说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王实味从极端民主、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用夸大事实、以偏概全、冷嘲热讽的语言把某些机关节日组织的文娱晚会，说成是“歌嘯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与“当前现实”“不太合谐”，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为三色，食分五等”，说成有个“干部服小厨房阶层”，把偶然发生的事情说成是“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延安生活里缺少“人对人的同情心”。他还把政治家和艺术家对立起来，说什么艺术家的主要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王实味的这些错误思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不少同情，引起了思想混乱。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的发表，时值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之际。在报纸改版前夕，毛主席及本报社长博古召开了一个延安各部门党内外负责同志及作家的座谈会，搜集对本报改版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将结束时，毛主席不点名地批判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毛主席说，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人要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

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说到批评态度时，毛主席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毛主席这番讲话，全面鲜明地指出了王实味错误的性质和要害，对于《野百合花》观点的批评是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

1942年5月19日报纸发表了杨维哲的文章《从〈政治家、艺术家〉说到文艺——与王实味同志商榷》。这是第一篇批评王实味的文章。文章论述了革命艺术家必须通过创造艺术形象来服务于政治，服从于真理，批评了王实味提出的“艺术家要改造政治家的灵魂”的观点，文章结尾时说：“现在，只看到‘意外地’‘偶然地’事实的暴露，应该收拾起来了！只找到‘现象地’而忽略了‘本质地’的冷嘲也应该束之高阁了吧！只抓着外面的皮相的批评也该一同葬之于高山流水之间了吧？！”

为了全面地历史地了解“野百合花事件”，这里披露一些历史资料，以使读者能了解这一现象发生的缘由和契机，更全面地认识这一现象的来龙去脉，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现象所导致的悲剧式结局，更清醒地反思历史的教训。

王实味，河南潢川人，父亲是前清举人，在家办乡学，生活十分清苦。王实味是家中第三个儿子，本名叔翰，1930年开始用“实味”的名字投稿，还用过诗薇、石巍等笔名。1923年中学毕业，考上河南留美预备学校，一年后该校停办。为了升学，他在邮局工作一年。1926年后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入了党，陈清晨是他的介绍人，后来陈成了托派，被开除出党。

1926年秋，他认识了李芬烈士和后来成为发妻的刘莹。起先，王实味追求李芬，李芬对王实味评价不错，但她从18岁起嫁给表兄，二人感情甚笃，后因丈夫中暑离世，又遭公婆当作“克夫星”相待，她立志终生不再结婚。面对王实味的苦苦追求，李芬

求助于自己的同乡支部书记段纯，段纯对王实味的做法过于粗糙，在支部大会严厉批评，并声言要开除他的党籍，王实味为此离开了党组织，并由此结下了情结。1930年与刘莹结婚，婚后他在上海靠翻译为生，此间与王凡西相识，1937年10月他与刘莹相约打算一同奔向延安，因刘莹怀了孕，王实味等不及，便同几名女学生先去了延安，与刘莹相约在延安相见。

王实味来到延安，开始在鲁艺任教，不久调到马列学院编译室。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成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调到该院中国文艺研究室，他被任命为特别研究员，当时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是欧阳山。

1942年3月18日，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全院整风动员大会。王实味认为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要割大尾巴”，主张院整风和检查工作委员会的全体委员都应民主产生。反对院务会议关于各研究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决定，还写了《我对罗迈（李维汉）同志在整风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二则》等短文，贴在中央研究院为整风创办的墙报《矢与的》头两期上，他提出“绝对民主”，鼓动大家“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要检查自己“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还提出“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王实味这些错误言论，在中央研究院引起很大反响，特别是有很多青年研究人员表示同情。《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在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

为了纠正王实味造成的影响，中央研究院从1942年5月27日起召开全院座谈会，主题是“党的民主与纪律”，目的是纠正极端民主化偏向，把整风引向正轨，座谈会到6月11日结束，一共开了16天，其间开了14次大会。

整风开始，康生担任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主任。康生是上级直接的领导人。在当时的形势下，座谈会很快就变成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后来又把王实味打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之一，1942年10月31日，王实味的问题正式定性，罪名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1943年4月1日晚上，康生令中央社会部将王实味逮捕。

据当时派往中央研究院进行整风工作的宣传干部温济泽同志所写的《斗争日记——中央研究院座谈会日记》提供的线索，可以了解这场斗争逐步升级的脉络。这个座谈会可分为四个阶段：

从5月27日开始至5月30日止为第一阶段。座谈会共开了两天半。主要围绕“党的民主与纪律”问题，发言者基本上是反省在整风运动开始时表现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在发言中一些人提到了王实味问题，认为王实味“在组织上是我们的同志，在思想上是我们的敌人。”王实味同志的错误，“不单是思想上的错误，还是政治上的错误。”说明开始时，座谈会还是本着实事求是态度的。

从5月31日至6月1日为第二阶段。座谈会由围绕“党的民主与纪律”的主题，调转矛头直接对准王实味。座谈会联系到王实味历史上与托派分子有联系，把王实味的文艺思想批判为托派理论，使王实味问题的性质成为敌我问题。当然在第二阶段仍有部分同志认为“王实味同志立场是错误的，但动机是纯洁的。”

从6月2日至6月7日为第三阶段。中央研究院布置学习有关文件和联共党史，斯大林选集中关于粉碎反对派阴谋的经验教训的论述。6月2日王实味向党委提出退党的要求。这一阶段的批判称王实味的立场是站在小资产阶级最反动的立场，是反动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6月3日晚几位同志仍找王实味谈心，希望他不要退党，6月4日上午王实味出席了座谈会，听取了大家的批判，王实味表示收回退党的要求。有的与会者质问他与托派的联

系，把王说成是托派分子。

从6月8日到6月11日为第四阶段。6月8日的座谈会，延安地区70个机关1千多人参加。会上陈伯达的批判定性最高，言辞最激烈。他说：“王实味的思想是包含一个反民众的、反民族的、反革命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替统治阶级服务的、替日本帝国主义和国际法西斯服务的托洛茨基主义。”“所有人类最肮脏的东西的成分，在他那里都可以找到各种某些不同的表现。”

丁玲在6月11日也曾做了发言。在发言中，她对于本人主编《文艺》专刊时发表《野百合花》做了自我批评。她说：“《野百合花》是发表在党报的文艺栏，而那时的文艺栏的主编却是我，我并非一个青年或新党员。马马虎虎的发表了这样的反党文章在党报的副刊上，是我最大的耻辱和罪恶。我永远不忘记这错误，我要时时记住做为自己的警惕。但这错误不只是由于我一时的粗心，而是与那时的编辑方针有关的。文艺栏曾因需要短小精悍、甚至有只要能引起论争，哪怕是理论不成熟的文章，哪怕是反面文章，都可以登载的简单的想法，而且许多作者都以选稿太严相告的当儿，所以在读了《野百合花》原稿之后，曾感到有些过分（只看到过分），态度欠妥（只看到态度欠妥）而压了几天，却终因缺稿又寄到报馆去发表了（那时我住在文抗医治关节炎）。这一个说明并不是掩饰我的过错，而是更说明我只站在一个普通的编者的立场（非党报或党员）去决定稿件的取舍，而对于自由论争的理解不够，和政治的幼稚”。接着她又对自己撰写的《三八节有感》做了自我批评。她说“这是一篇坏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所以得到一部分人的拥护和更多的责难。这对党是毫无益处且有阻碍的。”

在最后一天的座谈会上，罗迈发言中对王实味还是留有余地的，并对他进行了最后的挽救，他说：“王实味还有最后的机会从反革命的茅坑里爬出来。”

康生并没有就此罢手。在反对王实味的斗争会结束后，他要“继续扩大战果”，“使斗争深入”。七八月间，他用“打迂回”的办法，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发动了一场斗争，追查成全（陈传纲）和王里（王汝琪）夫妇和王实味的关系。成全是中央政治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王里在妇委工作，他们一起到中央研究室来看望过潘芳和宗铮夫妇（王里和宗铮原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王实味住在潘芳和宗铮隔壁的窑洞，他们又一起看望过王实味（王里曾与王实味在河南相识）此后，他们有过几次来往，在一起吃过饭。经过七斗八斗，就把他们5人的关系说成“托派关系”，把他们之间的接触和来往说成“托派组织活动”，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五人集团”。

中共中央研究室党委会在1942年10月23日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第二天，王实味到中组部哭诉自己没有参加过托派，要求不要开除他的党籍。他于10月26日又交给党组织一个书面检查，说明他“1930—1936年与托派某些人的关系，已于1941年向党作过详细报告”，他“确实未参加托派组织”。他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的严重的，“在实际上是破坏党的错误”。他检讨自己犯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症”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且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他要求把开除党籍处分改为“停止党籍半年”，“保证今后一定会改造自己成为一个较好的党员”，也希望组织上帮助他“能够早日恢复党籍”。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视“托匪和敌特、日特为一体”，至1942年底，康生下令将他逮捕。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到1946年再次强行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中央机关人员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王实味被

错误地处决*。

王实味的错误言论应当成为整风运动思想批判的对象，在批判的初期也确实如此。《解放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和中央研究院座谈会的第一阶段就是这样的态度。但是后来由于康生的插手和群众性的批判出现了偏激，思想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思想上的斗争变成了肉体上的消灭，多方面的因素把正确的批评引向了错误的结局。

以《野百合花》为代表的文艺作品暴露了在延安文艺队伍中存在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文艺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倾向比较严重。这些倾向都围绕着“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毛泽东同志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成为马列主义的经典文献。《讲话》制定了党领导的文艺工作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国文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思想和理论基石，它不仅是解决文艺观、文化观、美学观，而且是解决人生观、世界观、方法论的教科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巨大发展。《讲话》为文艺工作者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经李维汉、温济泽等老同志向中组部作了说明和申请，经有关部门反复调查，最后由公安部为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冤案平反昭雪。公安部在1991年2月7日作出的《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中说：“经复查，王实味同志1930年在沪期间与原北大同学王凡西、陈清晨（均系托派分子）的来往中，接受和同情他们的某些托派观点，帮助翻译过托派文章。在现有王实味的交代材料中，王对参加托派组织一事反反复复。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同志参加托派的材料。因此，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详情可见温济泽等著《王实味案平反纪实》，群众出版社1993年出版。

综合性副刊的发展与繁荣

(一) 毛主席关心副刊改革

毛主席十分关心《解放日报》的副刊改革，亲自帮助并指导副刊工作。1942年9月15日，他在给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凯丰同志的信中曾写道：“解放^①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的冯文彬，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当天，毛主席亲拟《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确定陈荒煤、江丰、张庚、柯仲平、范文澜、邓发、彭真、王震之、冯文彬、艾思奇、陈伯达、周扬、吕骥、蔡畅、董纯才、吴玉章这16人负责征稿，提出征稿字数要求。并亲自在枣园设便宴招待征稿人。席间，毛主席指出：党报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部分，办好党报是全党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全党的事要全党来办。进一步确定了全党办报的思想。

在副刊编辑的具体工作中，毛主席有时也亲自予以指导。如建议在副刊刊登徐悲鸿的文章《全国木刻展》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1944年3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著名史论著作。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领袖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

^① 解放是指《解放日报》。艾，指艾思奇，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范，指范文澜，当时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孙雪苇，又名刘雪苇，当时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冯文彬，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1944年11月21日《解放日报》发表毛主席致郭沫若的信，其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年10月公开发表。经过10个月的整风，延安文艺界面貌焕然一新。文艺版做为综合性副刊，内容更加广泛，体裁形式多样。在刊载的作品中，有速写、报告、诗歌、小说、漫画、木刻、剧本、歌曲和翻译作品。在理论作品中有学术论文、包括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文艺评论。此外还有读书札记、书评、杂文等等。还有工农兵的写作及一些通俗启蒙性的著述。这些作品与工农兵火热生活紧密结合。与此同时工农兵的文艺活动也蓬勃发展起来。

在此仅举一例。1942年9月27日副刊登载了程海洲的文章《我们文艺小组的诞生》。真实地报道了延安印刷厂工人文艺小组的活动情况，他们从1938年成立以来共出版了八本小册子（其中有两本在四万字以上），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艺作品20多篇，还出了名为《萌芽》的墙报。副刊主编舒群为此写了一篇短评《工人文艺小组》。他说：“我做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愿趁这个机会再说说，我们一切的文艺小组复活起来。特别是在毛泽东、凯丰同志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以后和整风学习的现在，我们的文艺小组的复活，将更有意义，所说文艺大众化，文艺和大众结合等，从理论到实践，将从这里得到进一步的事实的解释。”

（二）文艺下乡运动在副刊上大放光彩

整风运动推动了艺术教育的改造，推动了延安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运动的发展。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文艺工作者人才荟萃的地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在参加的一百零几人当中，鲁艺与会者超过半数，广大的文艺骨干都亲耳聆听了毛主席的教诲。特别是在文艺座谈会结束仅一周后的5月30日那天，

毛泽东同志亲自来到了桥儿沟，在鲁艺院内的篮球场上对全体师生做了一次重要讲话，他以生动具体的事例阐述了文学艺术的创作与生活，提高与普及，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努力改造自己的重大问题。特别提醒鲁艺的同志们只在自己这个“小鲁艺”学习是不够的，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群众的生活斗争，广大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毛泽东同志这些话，又一次推动了鲁艺的整风学习。全院展开了空前热烈的大讨论。每个人都认真思考整个鲁艺的教育、研究、创作等工作。周扬同志对此作了总结，在1942年9月9日的副刊发表了长篇文章《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对鲁艺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明确的任务，并确定了今后工作的重点。要研究当前文学与艺术，特别是部队与地方文艺运动的现状、经验和特殊问题，与延安及各根据地的兄弟艺术团体、与地方广大工农兵建立密切的联系，定期出外实习，并把实习成为联络提高与普及的重要手段，而不是单纯地去采风，毕业生必须毫无例外地去做实际工作。

1943年春节前后，延安掀起了大闹秧歌的热潮。鲁艺秧歌队，在当时热火朝天的秧歌运动中大显身手，这是鲁艺文艺运动的一个飞跃。他们创作和演出的秧歌剧在延安人民当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应，群众称之为“鲁艺家”的“斗争秧歌”，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由王大化、李波、路由集体编剧，安波配曲，由王大化、李波扮演的街头新秧歌剧《兄妹开荒》。延安的群众人山人海观看这些新的节目。1943年4月24日和26日副刊刊登了这个剧本。4月24日的副刊版还发表了《正确的艺术方向》一文，文章是由延安县委宣传部某团政工人员写给鲁艺秧歌队的信，信中说，他们看了《兄妹开荒》和《改造二流子》之后受到很大教育，一个二流子说：“不相信，今年干个样子叫他们看！”并在一天内砍了三背柴，好劳力一天也就砍二背到三背柴。战士巩耀青在看了这个剧后表示转变疲疲塌塌的作风，第二天就开荒八分半。看完秧歌剧后的第

二天，三连四班开荒，平均每人一亩四分，九连二班每一人一亩三分，创造了开荒中的最高纪录。1943年4月26日副刊发表了演员王大化的文章《从“兄妹开荒”的演出谈起》，他详尽地介绍了创作的历程和思想上的收获。

1943年3月10日，中央文委召开了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凯丰、陈云、刘少奇等同志到会讲话，号召文艺工作者到农村去，成为群众一分子，紧密地与群众相结合。本副刊在3月13日进行了报道。3月28日副刊又登载了凯丰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他讲了四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下乡，怎样下乡；二是下乡的困难；三是下去应该注意什么；四是对下乡文艺工作者的希望。3月29日在副刊刊登了陈云同志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指出文艺工作者要防止特殊化和自高自大两个倾向，虚心向工农兵学习。以后又发表了舒群的文章《必须改造自己》、周立波的文章《后悔与前瞻》，都结合自己思想实际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在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议之后，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立即响应会议的号召，浩浩荡荡奔向农村。鲁艺先后组织学员下乡、下部队，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并用较长的时间与群众共同生活或参加区乡工作。如葛洛、古元、陈叔亮、李焕之、刘炽等，在文学、音乐、绘画和木刻创作上，都有不少的收获。有的同志下乡采风，搜集民歌、窗花剪纸和民间文学资料。当1943年10月19日副刊正式发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艺工作者又一次掀起学习的热潮。

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接着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开会议，决定延安各文艺团体和学校都要立即下乡，并指定鲁艺去陕甘宁边区绥德专区开展工作。这样，鲁艺组成一个有42位各类专业人员参加的“鲁艺工作团”，由张庚带队去绥德地区进行宣传 and 文艺活动，历时四个多

月，于1944年5月返回延安。在这期间，他们进行了很多创作，多次演出和社会调查，收集了大量民间艺术、歌曲和剧本。特别是采取当地素材集体创作的小歌剧《惯匪周子山》颇得群众赞赏。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年画、新窗花也在美术创作中出现了。1944年3月15日副刊刊登了《鲁艺工作团经验》一文，详细地记述了鲁艺工作团下乡的历程。工作团在12月初下乡，仅50天内共演出25次，观众达5万人，他们编“斗争秧歌”，向农民学“道情”，组织起来写剧本，向群众艺术家请教，共创作了7个新剧本，6个演唱，还修改了两个剧本。军法处秧歌队根据现实真人真事，将二流子钟万财转变成劳动模范的事迹编成街头报道剧《钟万财起家》，钟万财是榆林人，夫妇俩都是二流子，经过政府的教育，戒了大烟，开了7垧地，打了6石粮，纺了8斤线，做了60套军衣，成了好庄稼人。在编剧和演出的过程中，夫妇俩成了指导，通过这一对二流子的转变，教育了一大片。钟万财激动地说：“公家这样抬举咱，咱要好好干。”

1944年3月6日副刊刊登了一篇报道《平剧院宣传队在乡下》，详细报道了平剧院下乡的收获。在安塞，宣传队演出《回头是岸》之后，一个失足的铁匠郑鸿斌马上向党坦白了。在子长县，几十名二流子看了《刘二起家》之后，纷纷向政府表示决心，一定学习刘二，改邪归正，好好生产。在延川，群众冒着大雪观看演出，观众成千上万，填街塞巷，空前热闹，他们说：“秧歌队闹红火了。”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演出期间切身深刻地领会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下乡是自己能否接触工农兵的考验。

文艺下乡运动不仅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思想得到了改造，而且使文艺创作获得了大丰收。1944年5月，由周巍峙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从华北前线返回延安。带回许多直接反映前方战斗生活的优秀剧目。由陈荒煤、姚时晓、张水华集体创作反映太行

山区沁源战斗为题材的四幕话剧《粮食》，由王滨、张水华导演，于9月间正式演出。在演出时部分角色使用方言，在舞台上作出一种新的尝试。接着他们在总结秧歌运动的基础上，采用邵子南从前方带回的河北民间传说为题材，组织并发动从事戏剧、音乐和文学创作的人员共同努力，由贺敬之、丁毅执笔编剧，马可、张鲁、瞿维、李焕之等作曲，王大化、舒强、张水华导演的大型新歌剧《白毛女》，1945年1月，在延安首次演出，作为对党的“七大”献礼，成为我国新歌剧史上一个里程碑。

由于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他们从生动丰富的现实生活和斗争中挖掘题材，创作出许多文艺杰作，这些优秀作品在我国革命文艺史上熠熠生辉。如1946年9月22—24日副刊发表的李季的长诗《王贵与李香香——三边民间革命历史故事》，这个新诗作汲取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以王贵、李香香一对边区受苦青年恋爱故事为线索，反映了三边革命斗争的历程，诗句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这篇长诗是编辑黎辛编发的。

在小说方面，副刊于1946年9月12—13日摘录刊登了西戎、马烽合著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这部小说以吕梁山人民为主角，展示了革命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历史画卷。

此外，像赵树理创作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也都发表在副刊上。这些作品脍炙人口，不径而走，广泛流传，甚至流传到沦陷区和国统区。1946年8月25日副刊刊登了郭沫若的一篇文章《向北方的朋友们致意》，表达了郭老阅读这些优秀作品的欣喜之情和对这些优秀作品的高度评价。在文中，郭老写道：“我费了一天功夫，一口气把《解放区短篇创作选》第一辑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读了一遍。这是我平生的一大快事。本人不大欢喜读小说，这一次是破例，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记。这样可歌可泣的事实，在解放区必然很丰富。我希望

有笔在手的朋友们尽力把它们记录下来。即使是素材，已经就是杰作。将来集结成钜制时，便是划时代的伟大作品。我恨我自己陷在另一个天地里，和光明离得太远，但愿在光明中生活的人，不要忘记应该把光明分布到四方。周扬兄明天便要回光明的乡土去了，他要我把对于上列二书读后的印象写出，草草写此，向北方的朋友们致人民的敬礼。”

美术工作者通过下乡，广泛接触基层，从丰富的现实生活中汲取了美术创作的宝贵营养，创作了不少佳作，使副刊的美术作品十分繁荣。当时没有影印设备，大量的美术作品都以版画形式刊载。像华君武、古元、张謨、李少言、夏风等人在副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版画作品，这些作品揭露了敌伪的卑劣和残暴，表现了边区军民的生产斗争和社会生活。在此仅举两幅作品为例：

一幅是1943年11月16日副刊头条刊登的古元的大幅佳作《南泥湾驻军秋收图》，版画描写了359旅指战员打场的场面，战友们通过辛勤的劳动，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22个人物错落有致，各具神态，充分表现了359旅喜获丰收的动人情景。同版配合了张锋的通讯《南泥湾驻军帮助群众秋收》，通讯与版画相得益彰，图文并茂，更显风采。

另一幅是1944年10月9日副刊在显要位置刊登的古元的版画《马锡五同志调解诉讼》。木刻旁边作了如下的说明：华池县温台区四乡封家围子居民封彦贵，有个女儿名叫捧儿。民国十七年许与张金才次子张柏儿为妻，尚未过门。42年5月，封彦贵见现时聘礼大增，企图赖婚，将女另嫁城壕川南源芝张宪之之子为妻，后酿成一起抢亲案。马锡五赴华池巡视，经过反复调查使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就是后来编为平剧广泛流传的《刘巧儿》的故事。版画的画面总共刻画了29人，马锡五居中，他躬着腰，和藹地对当事人进行调解，乡亲们在四周仔细聆听，脸上表情各具神态，栩栩如生，确实是一幅紧密表现解放区群众社区生活的一件力作。

（三）大生产运动的英雄红花在副刊上竞相开放

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物质封锁，克服军民生活中严重的困难，坚持抗战又不过于加重人民的负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副刊在宣传大生产运动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概括地说，副刊宣传大生产运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1）积极宣传党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方针政策。

1943年1月13日副刊版刊登了李富春在中直军直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报告《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1月23日刊登西北局边区研究室撰写的《边区的土地租佃形式》调查材料，同时发表石毅的文章，深入浅出地解释《什么是“变工”和“札工”》阐释党的方针政策。

（2）注意发现劳动英雄的典型事迹，运用典型报道的手法。

配合新闻版的宣传，副刊也刊登了孔厥的长篇通讯《吴满有的故事》，详细报道了吴满有的事迹。

（3）对重大事件组织强有力的报道，形成宣传的气势。

在1943年11月26日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及生产展览会开幕，《解放日报》在27日进行了重要的报道。

在“两会”期间，副刊开辟了《展览会集锦》专栏，介绍边区的农副产品，如棉花、染料、火柴、水车、石油、蜡等等。

军队、政府机关和学校发展自治经济，这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中的伟大创造和重大举措。副刊紧密配合，开辟《展览会集锦》专栏，介绍边区农副产品。还刊登了长篇报道《人民与军队共庆丰收》，以整版篇幅报道了延属分区展览会上展出的一年来的成就，重点介绍了359旅的事迹。

（4）开辟专栏，进行系统的报道。

从1944年元旦开始，副刊对大生产运动的宣传报道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开辟了《边区生产运动专栏》，每天都有一篇专文，

形成了强劲的宣传声势。

第一篇是《吴满有和吴家枣园》，之后几乎每日一篇。它们是《张振财和模范的城壕村》、《难民劳动英雄陈长安》、《妇女农业劳动英雄郭风英》、《杨朝臣是退伍军人的旗帜》、《纺织女英雄刘桂英怎样发展妇纺》、《李文焕高仲和创造了打盐奇迹》、《袁广发如何管理工厂生产》、《磨坊起家的王科》、《张清益创办义仓》、《六十岁劳动英雄孙万福》、《刘生海从二流子变成劳动英雄》、《水利英雄马海旺》、《机关节约模范佟玉新》、《安置移难民创办合作社英雄田云贵》、《女工劳动英雄李凤莲》、《青工劳动英雄曹国兴》、《马蹄沟炭工领袖蔡自举》、《模范的革命军人张治国》、《双重英雄武生华》、《气死牛的英雄郝树才》、《劳动英雄、模范班长李位》、《家属劳动英雄陈敏同志》、《建设槐树庄的英雄胡青山》、《好劳动好班长赵占魁》、《刘玉厚与郝家桥》……

1944年3月22日副刊又开辟了《英雄与模范专栏》，专栏的编者按说：“近来接到描写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稿子非常多，不能全登，也不忍割爱，只得加工压缩，摘录英雄们的一些重要的言行而删去其他。”这个专栏报道的第一位劳动模范是绥德县委提供的吉镇区委书记高光华。

为了配合大生产运动，传播生产知识，副刊又开辟了《生产知识》专栏，介绍诸如《用羊硒种糜谷的好处》、《怎样栽桑树》、《洋芋》等等。

(5) 及时总结生产经验，对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创造进行提炼和提高加以推广。

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起来》的著名讲演中，把延安南区合作社称为群众创造的四种合作社之一，即综合合作社。早在1942年12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就亲自总结了南区合作社的经验，指出“南区合作社式的道路，就是边区合作社事业的道路，发展南区合作社式的合作运动，就是发展边区人民经济的重要工

作之一。”其主任刘建章被评为劳动英雄。边区高干会议后，仅一年半的时间，边区就发展了 425 个，经营单位将近 1 千个，社员发展到 25 万人，股金达 21 万万元。

副刊对南区合作社的好经验多次进行报道。如 1944 年 1 月 17 日副刊刊登了在延安县联社代表大会上，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发出号召，提出“组织起来就是合作起来”的口号，全县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参加了合作社。1944 年 7 月在边区合作社联席会议上，毛主席亲切接见了南区合作社代表刘建章和王耀明，他二人被评为边区特等合作英雄。1946 年元宵节，毛主席视察了南区合作社，同年夏天毛主席又视察了南区合作社职业学校。

(6) 为配合大生产运动，副刊首次出现广告。

1944 年 4 月 22 日，副刊第一次出现介绍边区产品的广告。被冠以《边产联合广告》，例如该日刊登了本报文化供应部设计的《丰足牌》黑头火柴，还有《曙光牌》香烟。一位老农叨着香烟，烟云缕缕，口中还说“包你满意”。还刊登了延安新华烟草工厂出品的《生产牌》上等香烟，对香烟的特点，出厂厂家和价格均有介绍。此后，不定期地刊登商品广告，对促进商品流通、销售，促进大生产的发展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抽出时间参加大生产运动，毛泽东、朱德同志种的菜、周恩来同志纺的线都是有口皆碑的。1944 年 5 月 3 日，副刊发表了雷英夫一篇文章，《朱总司令在生产中》，文章记叙了朱总司令种菜的“战果”：菠菜一分多地，葫芦 80 棵，南瓜 80 棵，水萝卜近二分地，芦笋半分地，葱一分地，芫荽三畦地，白菜半分地，茼蒿三畦地，芥菜三畦地，生菜二畦地，黄瓜近二分地。王家坪有个二流子叫魏喜，看到总司令这样努力生产，深受感动，从此他向总司令学习，改邪归正，终于成为二等劳动英雄，还得了奖。

1944年6月30日副刊刊登了丁玲写的通讯《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毛主席在7月1日致函丁玲和欧阳山，高度赞扬他们的文章，同时充分表现了毛主席对大生产运动和合作社运动的关心。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丁玲所写的田保霖，是陕甘宁边区靖边县新城区王乡民办公社主任。是一位既普通又传奇的人物。田保霖早年流浪，后作小买卖。闹土匪的时候逃到外县，红军来到家乡，农民翻身后，他又回到故乡，开了六七十垧地（一垧合15亩），开了小油坊，只想好好过日子，不愿管闲事。大生产运动开展以后，农民拥护他，县委书记惠中权和他交上朋友，鼓励他为农民办合作社。诚实勤奋、善于经营的田保霖大显身手地办起了合作社，他请人教妇女纺线，办起牲口运输队，出口食盐，办义仓，办药铺，办油坊，九个月中，使老百姓入的股份获得百分之九百的红利，被农民选为县参议的常驻议员，成了远近闻名的合作社模范。欧阳山所写的《活在新社会里》的主人公就是田保霖所请的曾经讨过饭的纺织能手邹老太婆，她是蒲城人，听说边区好，就讨着饭讨到边区来了，流落到了田保霖这个乡时，简直是“一半活着一半死的人”。田保霖接济她，给她安排了住处，并安置了她带来的儿子和孙子，发挥她会纺线的一技之长，组织她给乡里的妇女教纺线，邹老太婆说：“描云绣花不算能，纺线织布不受穷。”她不辞辛劳，翻山越岭，一个庄子一个庄子的教妇女纺线。她成了有名的劳动模范后，田保霖为她起了名字叫邹兰英。旧社会的邹老太婆变成了新社会的邹兰英。两篇通讯文笔质朴，论述动人。

（四）深入了解敌情 注意研究军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谋攻篇》中的一句著名论断。毛泽东同志对此曾给予高度的评价。在《论持久战》一文中称其为“孙子的规律”，“是科学的真理”。综合性副刊从一开始就保持了《敌情》专栏，《军事》、《敌情》专栏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敌情》专栏紧紧围绕“敌情”这个基本内容，尽量做到兼收并蓄。

“一月敌情”，把一个月来的敌情重大事件加以综述，使每月的专栏都有新的内容，并保持栏目的相对稳定，为分析敌情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敌区动态”，对于敌占区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走势作准确的报道，为我军各级指挥员进行战略、战术的研究提供背景材料。“敌伪问题讲话”，是以漫谈的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敌伪当前的热点问题，不仅披露问题的现状，而且揭露问题的实质，对深刻认识敌伪起到望远镜和显微镜的作用。“战时日本社会”，主要反映敌国日本本土政治、经济、社会的重大事件，对于正确分析日本占领军在我国动态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敌酋介绍”，主要是较为系统地介绍日本党、政、军要员的履历和发迹简史，对于深入了解敌情，了解敌酋实施战略、方针，提供更全面的参考素材。此外还有“资料”小栏目。

在重大事件或纪念日来临之际，《敌情》专刊有时还出版《特刊》。如1943年9月27日出版了“东北沦陷十二周年纪念特刊”等。

(2)《军事》专刊，及时宣传党中央在军事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和领导同志的指示。

如1943年8月18日《军事》专刊发表了朱德的文章《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文章强调，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把旺盛的士气与掌握技术结合起来，对于军事技术的掌握，要从现有技术出发，务使每个战士在现有条件下，既能在部队中集中作

战，又能在分散时各自为战。学习军事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从低到高，由浅入深。切不可潦草从事，求数量而不重质量。

《军事》专刊为了提高部队的技术学习，还大力宣传军事体育运动，有计划地宣传军事模范的典型，使之起到榜样的作用。如开展“神枪手”、“贺龙投弹手”运动，使部队养成尚武竞技之风。在宣传中注意克服军事技术方面重训不重练的偏向，注重演兵场建设和训练设备的更新问题。

《军事》专刊，还非常注意对重要战例的分析和探讨，注意对苏联红军战略战术的研究。例如1943年10月27日，发表了贺龙撰写的《论甄家庄的歼灭战》，分析了这场歼灭战的宝贵经验。同日还发表了钟人方的文章《提高技术，学习苏联红军》。

（3）密切与读者的关系，开门办报。

《解放日报》的主要读者群是延安的广大军政人员，在战争的环境下，主要是各级指战员，这些以军事为主要工作中心的读者，不仅阅读《军事》专刊，而且可以参与《军事》专刊的写作。为此，《军事》专刊比较重视读者的参与。1943年11月20日《军事》专刊刊登了读者郭戈奇对办好《军事》专刊的建议，一是希望刊登重要的扼要的文章，二是增加翻译的文章，三是多登实战的战例，四是多刊登一些战斗故事。编者同时作了注白，希望读者踊跃投稿，尤其是抗战经验总结，教育问题，抗战故事，苏联军事译文，国际军事知识，进一步丰富宣传的内容。

（4）对重大的敌情动态和军事行动进行重点报道。

例如1944年夏，日本在军事方面连连失利，政治上内外交困，于是酿成东条英机内阁的瓦解，天皇下令小矶陆军大将重新组阁。《敌情》对此在1944年7月25日发表了时评《敌国的政变和小矶内阁的出现》，全面分析了这个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揭示了日本法西斯统治摇摇欲坠的必然结局。围绕这一重大事件进行了重点报道，发表了《敌新阁幕后的势力》、《一朝天子一朝臣——小矶

组阁后的人事变动》，并在资料中逐一介绍了《敌寇小矶内阁的班底》。

《敌情》专刊一直没有停刊，而《军事》专刊在1942年4月整风开始后，由于配合理论学习版面太挤暂时停刊一年，1943年4月1日复刊。朱德总司令为此发表了《军事副刊复刊词》。复刊词说：“军事副刊不和大家见面已经整整一年了，这一年是我党我军热烈进行整风学习的一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更加激烈、残酷而更加接近胜利的一年。因此在我们面前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军事副刊应该复刊，以适应战争与适应广大人民了解战争、学习军事的要求。（二）军事副刊必须贯穿着整风的精神，来检讨自己过去的编辑，与进行今后的工作！”“为了今后的军事副刊能编得更好，能更适合客观的需要，应该配合军事整风来进行，应该比较有系统的反映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应该广泛地介绍研究古今中外军事上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确定以反映解决自己的问题为中心的原则。因此应该重视抗日战争的经验，特别是五年来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在建军作战教育上许多宝贵经验，实行前方与后方的交流。为此我特别希望前方的许多同志尤其是回到延安的军事干部，应该多多的写稿，把军事副刊作为自己介绍经验、总结经验与学习的园地！”同期便刊登了陶铸撰写的《如何运用辩证历史唯物论于军事领域》、钟人方撰写的《敌后部队的军事教育》、戈宝权同志翻译的译文《崔可夫将军访问记》。《军事》复刊后每半月出版一期。其特点是：一、紧密联系我军实际，联系抗日战争的实际，从理论的高度总结军事的经验。如陶铸写的《论目前敌后战争的特点》、朱德写的《革命军队管理的原则》。二、重视敌我双方的军事动向，重视敌后与前方的军事交流。如雷英夫撰写的《从敌人向我一二九师学习说起》、《深入敌后之敌后》、钟人方撰写的《敌后战争的新形势》、张文华撰写的《冀南敌春季扫荡的特点》。三、注重宣传我军的典型战例的英雄模范

事迹，鼓舞全军的士气。如《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四、重视宣传苏联红军在反对德国法西斯战争中的经验。如苏联元帅朱可夫的文章《红军的新训练》、周秋野编写的《红军敌前架桥的奇迹》等。

（五）培养工农兵通讯员，鼓励群众业余创作

为了培养广大工农兵的通讯员，在1942年10月报纸就曾发表过《提倡工农同志写文章》的代论，从1943年开始专辟《大众习作》专栏。1943年8月23日副刊刊登了邹文清的文章《从文盲到能写作》，文章报道了某部教导员钱治安，是个石匠出身的老干部，响应工农同志学习写作的号召，从文盲到认识三千多字，后来又发表了处女作《吴家沟的伏击》，在半年内，他投稿8篇，刊出4篇，该旅政治部授予他通讯员一等奖。钱治安同志就是千百位通讯员中的典型。

为了繁荣广大群众的业余写作，掀起创作的热潮，副刊采取了以下的方法：

一是大力鼓励广大群众业余写作。1943年9月14日，副刊在头条显著位置刊登了署名任老婆的打油诗，题目是《顽固分子起奸心，边区老小一个心》，编者为此篇“打油诗”加了编者按：“这篇东西是位没读过书的五十多岁老婆婆，因激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进攻边区的义愤而写的。像她那样高龄的人，还有那样大的学习热忱和政治热情是值得人钦佩的——大热天，不睡午觉，用心伏在一个方凳上写、读，就是在纺纱缠线时也不休息，常看到她在呐呐的背诵难念的生字。在一年多的努力中，竟能看懂《群众报》，并且能写出这样一篇东西来，我们把她这篇东西发表，一方面可以表现边区的民主政治和丰衣足食的生活是怎样改造和提高了人民，边区人民又是怎样爱护我们这新民主的地区，另一方面可以表示工农分子学文化并不是了不得的难事，只要有决心，像这样五十多岁的老婆婆可以获得很快的进步，年轻人更应该有信

心了。这篇文章除了两三个别字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修改，可以说完全是本来面目，这实在是很难得的。”

第二，对于群众业余创作的优秀者给予介绍，如1944年3月14日副刊介绍了劳动英雄、民间诗人孙万福。周扬、孔厥都曾专门撰文介绍过孙万福。孔厥还把他随口讲的诗整理刊登在副刊上。

1944年3月11日副刊在头条位置刊登了陈伯林的文章《移民歌手》，介绍了风靡全国妇孺皆知的著名歌曲《东方红》的作者，陕北葭县城关三乡移民大队副队长李增正和他的叔叔李有源。他们叔侄俩都擅长编秧歌。他们在人民政府移民政策的指导下，翻身过上了好日子，便利用当地“骑白马挂洋枪”的民歌调填写了新词，在延安地区广为流传，歌曲共分五段，第一段的原词是这样的：“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他是人民大救星。”

第三，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努力培养工农兵创作员。1944年10月14日边区县文教大会开幕，历时一个月，大会对艺术、教育、卫生、报纸四项工作多次讨论研究，在群众文教运动的促进下，培养并发现了一大批群众业余创作员和民间艺人。如李卜、韩起祥等老艺人，一生创作颇丰，作品在边区影响甚广。陇东庆阳县卅里铺农民集体创作了《减租》、《二流子偷鸡》、《黑牛耕地》、《新顶灯》等剧目。

（六）以毛主席《讲话》为指针繁荣文艺评论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这两种标准的统一是繁荣文艺评论的正确指针。艾思奇主持副刊工作以后，更加重视文艺评论的工作，同时亲自撰写了许多文艺评论的文章。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平剧的改造大加赞赏。1944年初，当时延安中央党校研究员杨绍萱和党校教务处文教科科长齐燕铭对传统平剧（京剧）《逼上梁山》进行了改编和导

演，毛主席在中央党校俱乐部看了这个戏，非常高兴，写了一封信，请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同志转交编者。这封信的原文如下：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①

1944年1月8日副刊发表了艾思奇（署名崇基）的文章《逼上梁山》，对中央党校新编平剧进行了评论。他指出，该剧穿插了许多新的政治内容，暴露了反动统治者的荒淫无耻，写出了有民族良心的英雄典型林冲，林冲的艰苦卓绝使观众精神振奋，平剧以甘畅淋漓的艺术手法表现了鲁智深的爽直豪勇，疾恶如仇，最后还充分表现了普通群众对统治阶级的抗争。作者深刻分析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的创新手法和艺术特色，1月9日副刊发表了杨定舟对“战卫”部上演的平剧的评论。在新年文艺活动中，“战卫”部上演的《战北原》、《史可法》、《恶虎村》三出平剧。杨

^① “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信曾在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上发表，当时这封信被说成是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被删掉。1982年5月23日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发表了此信的全文。

定舟的文章对三出平剧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深入的评论。

文艺评论还涉及了话剧领域。在延安和各解放区，都有一些剧社，他们编演了一大批真实反映抗日军民战斗生活的话剧，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1942年冬，八路军120师政治部战斗剧社在延安演出了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话剧《晋察冀的乡村》、《荒村之夜》、《虎列拉》、《自家人认自家人》、《求雨》等。该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副社长朱丹和剧社政治指导员成荫曾给毛主席写信汇报战斗剧社的演出情况。1942年11月23日毛主席欣然回信。信中说：“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的戏。”

在话剧舞台上，前苏联剧作家科尔内楚克编剧、肖三译的话剧《前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延安曾上演此剧。副刊从1944年5月19日至5月26日连续刊载《前线》剧本。1944年6月1日还在一版发表了社论《我们从科尔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些什么？》

这是一个自我批评的剧本，描写红军高级将领戈尔洛夫居功自傲，不爱学习，只爱听阿谀奉承之辞，固步自封，与一些拍马屁，会钻营的人结成一气，打击欧格厄夫的正确路线，最后被上级撤职。剧中一个战地记者名叫客里空，不深入前线，惯于弄虚作假，吹牛拍马，想当然地做失实的报道，从此“客里空”成为夸夸其谈不深入实际、写失实文章人的代名词^①。关于《前线》的评论文章集中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像戈尔洛夫这样的军事将领，有功劳，有忠心，如果继续努力学习，那么他是不可限量的。但

^① 俄文“крикун”原意是空喊家，中文音译为“客里空”。新闻界借用它泛指新闻报道中的虚构、浮夸的作风。1947年在各解放区新闻工作者当中掀起了一场反对“客里空”的运动。

是只要固步自封，不求进取，就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对革命有害，终究被时代所淘汰。《前线》这个话剧，意义重大，它会像一面镜子照出我们的缺点，教育出更多的德才兼备、智勇双全的干部，提高军事指挥的水平，实现抗战建国的胜利。

在文艺下乡运动的促进下，民间艺术有了蓬勃的发展。副刊对陕北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如秧歌、道情、影子戏、说书等进行了深入的评论。1943年和1944年元旦春节前后，延安的秧歌剧达到鼎盛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新的秧歌剧，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为了总结群众性的新秧歌运动，副刊刊登了一大批评论秧歌剧的论文。如林默涵的文章《保安处的秧歌》、汶沙（温济泽）的文章《清凉山秧歌队的演出》、罗琪辉的文章《庆阳农民的新“社火”》、林山的《改造说书》和付克的《记说书人韩起祥》等评论文章。

在评论新秧歌剧的论文中，影响最大的要推1944年6月28日副刊发表的艾青的文章《秧歌剧的形式》。这篇长文系统地论述了七个问题：一、群众的新歌舞剧，二、秧歌剧的表现手法，三、音乐、歌曲、唱词，四、舞蹈，五、化妆、服装、道具，六、大型剧、小型剧，七、群众的喜剧。在此文发表前毛主席曾审阅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在1944年5月27日致信胡乔木。信中说：“乔木，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3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小说创作一直是文艺评论关注的热点，在副刊也不例外。正确的创作思想，促进了小说创作的繁荣。一大批小说佳作如雨后春笋，相继涌现，如西戎、马烽的《吕梁英雄传》、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影响很广。1946年9月24日副刊刊登了一篇通讯《“李有才板话”和“时事传”在邓家沟》。“时事传”是韩起祥和王宗元以说书形式编的时事讲话，表现了抗日战

争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历程。在延安邓家沟读报组诵读了《时事传》和《李有才板话》，农民很喜欢听，每读完“板人”编的歌，满窑的人就哈哈大笑。吕二有说：“都有事实根据，满编的咱们的事情。”书中的插图大家争着传看，称赞刻画的“满像样”。1946年9月7日刊登的“时事传”，在农民读报中大受欢迎。他们称赞韩起祥的“好肚才”，评论他编的书“好解下，容易记，前前后后有根据，时事说的完全。”1946年8月26日副刊登载了周扬的评论《论赵树理的创作》，评论以《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为中心，系统地论述了赵树理的创作思想、手法和艺术特色。1946年11月2日副刊刊登了茅盾的评论《关于“李有才板话”》。1946年8月5日吴文遴的文章，联系思想和工作评论这篇小说。他的文章题为《大家看看李有才板话——反省和检讨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他说：“文中生动活泼的写出解放区农民翻身的曲折斗争和细致的描画了干部的两种不同的工作作风，这对于我们领导减租、查租以及将来解决土地问题都有最直接的教育意义。感到乡村政权和农会的建设，应该重视李有才那样的精干有力的农村宣传家的培养，不要只想出名和存在骄傲心理。”

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上演之后，引起极大的反响。这一部力作无论从政治上，还是艺术上都是完美的艺术瑰宝。为了总结歌剧创作的经验，副刊在1945年7月17日开辟了《书面座谈》的栏目，连续多期讨论歌剧《白毛女》，发表了十几篇评论，认为它不是对旧戏的照抄，也不是西洋歌剧的模仿，它和秧歌剧有唱有白有情节相似，有着浓厚的话剧成分。评论还评价了《北风吹》的唱段是改造了北方民歌《小白菜》、揉进了河北梆子和大鼓的调子，歌词也带有浓郁的民间风味。在伴奏上将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相结合，是十分有益的尝试。

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是一条战线上两个休戚相关的战场。副刊对不畏强暴坚持斗争的国统区文艺运动给予

了热情的评论与讴歌，有力地配合了国统区文艺运动的发展。《大后方文艺活动短讯》介绍《诗歌下乡》，戴爱莲、吴晓邦的舞蹈表演会，重庆文艺刊物《文哨》刊登郭沫若《向人民大众学习》和夏衍的《笔的方向》。还刊登了重庆文化界庆祝茅盾先生五十寿辰，并发表了王若飞的文章《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辰》，为纪念邹韬奋先生逝世一周年，黄炎培、张仲实、艾思奇写的一组文章。刊登了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拍成了纪录影片的消息，以及抗战胜利后，梅兰芳重新从事戏剧活动的消息，《延安生活艺术展览在重庆》等等。

副刊的文艺评论不仅报道了国统区的文艺动态，而且涉及了国统区文艺的论争。1945年围绕茅盾的《清明前后》与夏衍的《芳草天涯》，国统区的文艺界展开了论争。论争对《芳草天涯》的艺术成就予以肯定，对提倡和宣扬资产阶级的“容忍”作了批评。副刊及时地发表了评论文章，对这一文艺论争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这对于文艺运动沿《讲话》所指引的方向继续发展有很大意义。

（七）普及科学知识 传播卫生常识

《解放日报》副刊一向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重视卫生常识的传播。早在“八大专刊”时期就出刊了《科学园地》和《卫生》，变成综合性副刊后《科学园地》也保持到1943年初，而《卫生》基本上一以贯之。

《科学园地》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如《谈谈边区食物营养问题》，《边区的雨量》等等，但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缺乏深入浅出。即使是冠以《通俗讲座》专栏的文章也并不通俗，专业术语多，很难适应广大工农兵读者的阅读理解水平。二是书卷气太浓。由于在办此刊初期稿源不足，便从现成的书本上摘录过多，生吞活剥。如第9期刊登的《碱土的改良方法》，使用了很多英文术语，夹杂着大量英文的原文，没有进行很好的解释和变译。三是缺乏系统性，没有相对稳定的专栏，带有浓厚的随机性，

给读者一种鸡零狗碎的感觉。

改版之后，《科学园地》基本上每月一期，每期一个整版。注意宣传的系统性，从第12期开始，开辟了《自然界》专栏，较系统地介绍天文知识。但是仍旧存在稿件过长，版面不活泼的缺点。

1943年1月30日刊登了李富春同志给《科学园地》副刊并转自然科学会全体同志的一封信，提出了边区自然科学工作方向和自然科学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

李富春同志的来信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要求边区自然科学界的同志以整风精神与科学的方法，都来参加边区经济建设的战斗任务，把自然科学应用在边区的生产实践上去，来响应毛泽东同志边区丰衣足食的号召，响应中央与西北局边区生产建设第一的任务。这方面的工作，需要自然科学的帮助与提高是很多很多的，诸凡农业、畜牧、工业、运输、盐业及改善生活等等。其中几百件几千件的事业，无不需自然科学的指导，无不需技术来恰当的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实际问题。”

他指出，边区生产实践中遇到许多实际的需待科学解决的问题，如饮水不洁引起地方病，如何对付牛瘟和羊瘟，干旱地区如何植棉，如何解决煤外层包石的问题，如何科学地总结吴满有生产经验并推广给边区广大农民等等。一方面这些问题未能解决，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会、自然科学院并未研究这些问题，《科学园地》中也很少解说这些问题，却以很大的篇幅去解说地球、宇宙等问题，他希望自然科学界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第二，他提出边区生产和生活中实际存在的8个问题，需要科学予以解答。这8个问题是：如何使川地尽可能变成水地，解决蔬菜产量提高，如何指导对不同的蔬菜施用不同的肥料，如何使老熟地进一步挖掘肥力，如何对种子进行科学的使用，妇女用的手纺车如何改良，有关部门编写的喂猪法、种菜法、做豆腐法如何加以审定，机关学校如何配餐才能加强营养，如何进餐才能

符合科学等问题。

1943年3月2日,《科学园地》开始回答了李富春同志提出的这些实际问题,如在《问答栏》中回答了老熟地怎样利用,山地怎样种菜,哪些县份能种棉,种菜用哪一种肥料好等问题。此外,该期还刊登了《种菜法》、《剥去煤炭上的石皮》、《怎样种棉花》的文章,使《科学园地》展现出紧密联系实际、直接为生产服务的新气象。

自1943年3月2日《科学园地》出版24期之后,改变了编辑方针,取消了整版的《科学园地》专刊,变成在综合性副刊中刊登科普文章。

1943年2月1日陆定一同志曾主持召开编委会会议,陆定一同志在会上强调,现在主要解决改善报纸的质量。要把第四版办成帮助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登载史地、自然科学知识和文艺作品的阵地。

从1943年起至1946年11月20日胡宗南进犯延安止,副刊一直登载科学技术和各类专业知识,出现许多专栏,择要如下:

《常识讲话》,曾连载吕振羽同志撰写的中国古代史。同时也刊登一些其它学科的常识。如《十月革命的故事》和《陕北为什么少雨》等。

《世界知识》,主要刊登世界各国的简介,如《希腊》、《黎巴嫩》等。

《地理知识》,主要介绍国外和国内的地理知识,如《西西里》、《直布罗陀》、《大连》、《旅顺》、《秦皇岛》、《山海关》等。这些知识的刊登也并非突兀其来,而是配合国际和国内的重大事件,与国内外发生的热点事件相配合,有益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

《名词解释》,根据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有针对性地对疑难名词加以解释。如《第一国际》、《第五纵队》等。

《历史知识》,如《九七国耻故事》等。

《人物介绍》，如《戴高乐》、《太平洋盟军三将领——蒙特·巴顿、麦克阿瑟、尼米兹》等。

《展览会集锦》，如《自己制造的丹宁（鞣酸）》、《咱们自己制造的玻璃》等。

《边区古迹》，如《杜甫川》、《清凉山》、《万佛洞》、《秦长城》、《扶苏墓》、《甘泉宫》、《延安城》、《卧龙寺》、《昆明池》等等。

《科学与发明》，如《V-2 火箭》、《新式的直升机》、《新式自行车》等等。这些科技的专栏形式活泼，内容广泛，对普及科技知识，帮助广大读者掌握科技知识起到了很大作用，深受读者欢迎。

1946 年 10 月 23 日，副刊创办较为综合的栏目《读者服务》，内容集中在传播各种科技知识方面。如在《读者服务》第一期中则有《小辞典》、《小常识》、《卫生问答》等栏目，介绍了什么是“特使”、“大使”、“公使”、“备忘录”、“什么是子宫外孕，道理何在？”、“开水的好处”、“一个文字工作者的卫生法”等等。

在《读者服务》栏目中，传播了许多有益的知识，如什么叫“麻雀战”、“金元外交”、“山姆大叔”、“华尔街”、“绥靖主义”、“关于牛瘟”等等。

副刊在普及科技知识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传播卫生常识，提高广大读者的健康水平。为此，在副刊创始之初，就专门出版了《卫生》专刊。副刊改为综合性副刊后，《卫生》专刊依然保留下来，基本上每月一期，每期一整版。

《卫生》专刊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军事卫生知识，如刊载了《战地急救法》、《出血急救法》、《急救常识》、《怎样搬运伤员》、《军事外科的几个问题》等。其中一些文章配有详细的插图，图文并茂，有效地起到传播军事卫生知识的作用。

二、传播如何治疗地方病和预防流行病。这也是《卫生》专刊经常刊登的内容。如《关于柳拐子病（大骨节病）》、《肺癆病的治疗法》、《加紧春季防疫》、《怎样减少并预防夏季病》、《秋天来了，快预防伤寒痢疾》、《麻疹的治疗及其预防》等。

三、传播妇幼保健知识。如《预防小儿消化不良症》、《怎样预防小儿的伤风及咳嗽》、《产后一月间育儿法》、《种痘须知》等。

四、传播适合边区卫生条件的常识。如《简易消毒法》、《灭蛆——当前灭蝇的主要方法》、《大蒜的抗药作用》等。

五、反映边区广大工农兵的卫生工作经验。如《金盆湾驻军在开荒中的卫生工作》、《怎样进行冬季连队卫生工作》、《延安市半年来的群众卫生工作》、《杨家湾小学怎样协助群众推动卫生工作》等。

六、国际卫生工作的经验。如《苏德战争中军医工作的新成就》、《国际友人马海德同志》等。

1945年1月20日《卫生》专刊改为《卫生》专栏，由过去一个月一整版改为十天左右出三分之一版。其原因在编者按中进行了说明：“在去年文教大会的时候，有些代表向我们说：‘卫生’副刊很好，我们很需要看，但是每次出一大版，我们在乡下工作忙的同志，实在难看得完。我们和‘卫生’编委的负责同志考虑了这个意见，觉得很对，与其集中在一起，不如缩小版面，分散辟为专栏。”于是，《卫生》专刊在出版了62期之后，变成《卫生》专栏。到1945年下半年，《卫生》专栏又改为几个小栏目。

（八）评介外国文艺作品，适度发表古体旧诗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解放日报》副刊十分注重发表外国的文艺作品，并对重要的作品和作家进行评介，这不仅大大地丰富了版面的内容，同时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也有有益的借鉴。

简要地归纳副刊发表的外国作品，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量反映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这是与我国抗日战争紧密相关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战场，关系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命运，因此文艺栏较多地发表了苏联卫国战争的报告文学作品。如爱伦堡的《莫索里尼的本领》（岳鸿译）、《列宁格勒永远是我们的》（林宁译）、阿·托尔斯泰的《希特勒军队的真面目》（识者译）和《伏尔加在为战争工作》（山屋译）、肖洛霍夫的《在顿河上》（魏伯译）等等。还发表了英国、美国及苏联其他作家的反法西斯的报告文学。

二是介绍外国现代和古典文学作品。如曹葆华译的左琴科的《列宁和哨兵》、《电灯匠》、肖三译的拉甫涅夫的《人小心大》、纪坚法译的古典犹太作家白里茨的《母亲》等。还发表了吴伯箫、天蓝等的惠特曼的诗歌、英国古典小说家菲尔丁的《创作漫谈》等。贾芝和葛陵还合作翻译了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磨房书简》的精采篇章。

三是在介绍外国作品时十分注重体裁的广泛。尤其是在副刊改版之后，文艺栏在介绍外国作品时除介绍小说和报告文学外，还介绍了诗歌、戏剧、长篇小说等。仅苏联的长篇小说，就介绍过华西列夫斯卡娅的《虹》、西蒙诺夫的《日与夜》、苏波列夫的《水手的灵魂》、巴夫林科的《复仇的火焰》、果尔巴托夫的《不可征服的》、彼尔文采夫的《考验》、格罗斯曼的《生命》和《人民是不朽的》、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爱伦堡的《巴黎的陷落》等。在发表的外国剧本中，肖三同志翻译的苏联剧作家柯尔内楚克的《前线》影响最大。美国史坦培克的《愤怒的葡萄》和《人鼠之间》刚在重庆出版，《解放日报》就分别发表王康和解清（黎辛）的文章予以评价。

四是介绍了一些著名的外国文艺评论的论文。当时介绍最多的是高尔基的文艺评论。如高尔基的《论文学》、《青年的文学和

任务》与新发现的高尔基在世时未发表过的《回忆·琐记》中的一篇《克里西亚》（均为曹葆华译）、陈适五译的《论绦虫》、江帆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底产生》等研究托尔斯泰文学创作的评论。此外，副刊还发表了周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序，介绍车尔尼雪夫斯基文艺理论的论文。周扬在《中苏英美文化交流》一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向世界文学学习。

五是发表了根据地学者研究外国文学和艺术的著作。如胡蛮写的《纪念巴黎公社的艺术家戈尔培》和《列宾的艺术》，黄照的《莫里哀的〈怪客人〉》，杨思仲（陈涌）的《关于果戈里》和魏东明的《果戈里的悲剧》等。

总之，副刊的编辑们在当年国民党文化封锁的艰苦环境中，千方百计搜集文稿，吸收外国进步文学的宝贵营养，为繁荣革命文艺的园地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副刊一般不发表旧体诗。其他版面也只是在重大纪念日或特殊情况时才发表领导人或党外著名人士的旧体诗。这是请示过毛主席的。毛主席说旧体诗不好懂，容易束缚思想，不提倡写旧体诗，但有些老人不会写新诗，只会写旧诗，发表一些也是可以的。

与副刊发表旧体诗相联系的，在延安还有一段诗坛逸事值得记载。1941年9月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在延安交际处宴请民间诗人墨客，赴会的多是边区参议员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其中秀才15人，拔贡1人，多喜诗词歌赋。大家济济一堂，畅谈国事。会上林老发起组织一个诗社，本着“老者安之，少者怀之”的宗旨，定名为“怀安诗社”。请法院院长李木庵主持诗社，荟集诗词佳作结集为“延水雅集”。

诗社的成立，不仅团结了广大爱国进步的仁人志士，而且繁荣了延安的诗坛。1941年10月1日谢觉哉以“焕南”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发表以《从“怀安诗社”谈起》为题的短文，他说诗

社反映了边区敬老慈幼政策的实际，他满怀热情地希望“各级政府卫生机关应提倡养老特别是怀少的事，各级参议会要把保育儿童、减少儿童死亡率，看成自己重要的任务之一，要有人，要有好后代，社会才能繁荣起来。”

10月16日副刊《文艺》第22期，以《怀安诗选》为专栏标题，发表林伯渠、谢觉哉、朱婴、李木庵的诗词六首。1942年2月21日，《文艺》第91期，又以《怀安诗选》专栏标题，发表续范亭、林伯渠、张曙时、李木庵和李健侯的诗词七首。《怀安诗选》是副刊文艺栏最早发表的旧体诗词。

《怀安诗社》是我党以诗会友，通过文艺创作活动团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爱国民主力量的成功尝试，它是一种松散的民间文艺社团，没有章程，爱好诗词与喜欢唱和的人士都可以参加，爱国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在延安时间不长，也参加了诗社活动，充分体现了我党包容九州，心怀天下的伟大胸怀，体现延安为抗战民主中心，如日中天，万民拥戴的伟大精神。^①

副刊的尾声

（一）副刊最后的变化

1946年11月20日头版头条刊登了一条本报讯《边区周围发生前哨战》，消息说：南线蒋军13日起向我关中地区进攻……西线马鸿逵部进犯三边地区，陕甘宁保卫战开始了。从这一天起，报纸由对开四个版变成两个版。头版为要闻版，二版为国内和国际版，在第二版也刊登一些副刊性文字或副刊性的栏目《社会服务》、《读者服务》。这一阶段是从1946年11月20日起到1947年

^① 这一部分参阅了黎辛所著《丁玲和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一文，引用了其中不少资料和观点。（原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

2月1日止。这一阶段副刊性的文字有以下内容：

一、刊登诗歌和故事。这些诗歌和故事都是紧紧针对着边区自卫反击战的形势，用诗歌故事反映边区人民同仇敌忾，奋勇反击蒋军，表现进犯边区蒋军的残暴、消沉和失败的困境，起到长我军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的作用。如1946年11月25日刊登的戈壁舟的诗《打伞兵歌》、《八阵图歌》、《哨》、《一颗手榴弹》、《伤兵医院》、《讨吃的》、《羊肉直放坏》。11月27日刊登的故事《蒋军的团长哭了一鼻子》、12月5日刊登街头宣传诗《看我们这些自卫军》、12月15日刊登故事《团长老汉和枣红马》。

二、关于《社会服务》和《读者服务》专栏。1946年11月26日出版了唯一的一期《社会服务》，刊登了为反击蒋军进攻对边区服务的文章。如《怎样对付飞机轰炸》、《有关行军的几件小事》、《怎么使炒面没有疙瘩》、《衣服染上血迹如何清洗》等，充分表现了编者对广大战斗中的军民的关切之情。

这一个时期，《读者服务》专栏共出版了8期，这8期专栏的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反击蒋军的指战员读者服务，如《简单止血法》、《什么样的雷壳好》、《保卫边区的大馍馍——抛石雷》、《熬硝土的简便方法》等。

二是为土改服务，如《怎样划分地主、富农和中农》等。

三是为新年和春节的宣传服务，如《介绍年画》、《对联选》等。

为搞好新年春节的宣传刊登秧歌剧、唱词和快板。1947年1月7日编者发表了如下的按语：“为了迎接今年春节宣传活动，从今天起，我们开始在报上发表几个秧歌、快板和唱词。希望各地方剧团根据自己的情况抓紧时间选择一两个排练……。”于是，本报连载了如下一些剧本如陕北小调剧《送公粮》、秧歌剧《张老汉参军》、唱词《王塞塬官逼民反闹自治》。

(二)《新年增刊》、《星期增刊》和《特刊》

1947年是《解放日报》终刊的一年，也是开始两个中国两种命运决战的第一年。新年伊始，为了弥补本报没有副刊之不足，在元旦之日三版四版辟为《新年增刊》之一和之二。在新年增刊里刊登了如下一些年终专稿：其中有于光远撰写的《一年来的解放区土地改革》，丁树奇撰写的《一年来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廖盖隆撰写的《一年来美国在华干了些什么》，刊登了陈翰生撰写的论文《中国的独占事业与内战》，以及柯柏年译的密勒比评论报1946年12月21日的社论《美国式的中立》。著名专家学者的论文，从多侧面概括地论述了1946年解放区和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成就，抨击了美国占领者在华犯下的滔天罪行，对读者来说，在岁末年初读到这样的论文，对宏观政治形势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从1947年2月2日至3月2日，一个月内共出了五期《星期增刊》，即每逢星期日的报纸比平日多增两版，刊登副刊性文章。这五期《星期增刊》刊登的内容如下：一是有关苏联和国际动向的论文，如联共中央宣传部长亚历山大洛夫撰写的论文《以新的奋斗纪念列宁》，日丹诺夫的论文《论苏联文艺倾向》、《一九四六年苏联的经济复兴》和季米特洛夫1946年6月27日在保加利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关于党的政策与干部问题》。二是边区和解放区的文章和通讯。如摘自建设厅《边区农业参考资料》的文章，陆定一给徐老的信《学习南区合作社职业学校》和薛民锋撰写的通讯《南区合作职业学校怎样办成功的》。三是文艺作品和文艺评论。如王琳写的剧本《模范妯娌》、《“兰花花”笔谈》、木刻版画《到处都是练兵场》、《英雄带了花》。

这个期间，还举办了三期特刊，这就是1946年11月30日举办的《庆祝朱总司令六十大寿特刊》。上面醒目地刊登了毛泽东同志的题词“人民的光荣”，刘少奇同志的题词“朱总司令万岁”，林伯渠同志的题词《朱德同志六十生辰，中国人民事业伟大胜利的标帜》，以及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东北局

的祝词。陆定一、习仲勋同志还写了专文表示祝贺。

第二个特刊是在1947年1月10日举办的，为庆祝徐特立同志七十大寿举办的特刊，上面刊登了毛主席的题词“坚强的老战士，祝特立同志七十寿辰”，朱德同志的题词“徐老七旬大寿，当今一圣人。”此外，还有一些专文表示祝贺。

第三个特刊，也是1947年3月8日编辑的《三八特刊》，由解放区妇联筹委会供稿。其中有朱霞撰写的《打开封建的枷锁——中国解放区妇女在土地改革斗争中》、阿青撰写的《一年来蒋管区之妇女运动概况》、旦华撰写的《解放区妇女在爱国自卫战线上》。通讯《马老太太与蔡畅同志谈斗争经过》，资料《介绍三个国际妇女会》等。

本报副刊性文字的最后一篇是1947年3月10日在第二版刊登的戈壁舟写的四首诗。诗句充分反映了边区军民摩拳擦掌战胜敌人的决心，预示着陕北自卫反击战终将胜利的前途。为副刊落下帷幕时发出的嘹亮的尾声。

（岳颂东）

后 记

延安，是抗日的灯塔，革命的圣地，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耳目喉舌，是伟大延安精神的体现者，在艰苦的条件下，它团结人民，教育并激励人民；在尖锐的斗争中，它揭露敌人，打击并消灭敌人。它有力地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点燃了真理之光，照亮了中国前进的道路。

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它的办报经验，为以后的党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弘扬延安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特别是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我们撰写了这部《延安〈解放日报〉史》。

本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以反映延安《解放日报》的发展历程为主，记述其办报方针，办报思想，编辑风格，办报人的活动，以及新闻理论、新闻机构的形成和发展。下编则以反映报面宣传及其背景为主，记述延安《解放日报》从创刊到停刊（1941.5.16——1947.3.27）的宣传重点及特点，折射出这一历史时期的矛盾与斗争，从而显示出这张具有鲜明党性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战斗力量。

我们（作者王敬、岳颂东、王凤超）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坚持忠于史实，努力做好史料的收集、剖析、考证和选用。感谢中央档案馆、中共陕西省委和延安各革命纪念馆供给我们大量有关资料，既有直接与《解放日报》有关的材料，如党中央、中共中央西北局对《解放日报》的决定，报社各种会议记录等，还有

大批背景材料，如毛泽东同志的有关手稿、党中央对重大政策的讨论决定、电报等，都十分珍贵。

我们收集了近700万字的有关文字史料。然而研究起来，仍感不足。原因是在战争年代，有些事情缺乏文字记载，或当时有记载，后来又失落，在此情况下，请当时办报人口述材料，就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非常感谢延安解放日报社的老同志们，他们热情而认真地回忆并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有些老同志还亲自整理成文字材料交付我们。几年来，我们访问了许多位“老解放”，从总编辑陆定一、副总编辑陈克寒、党总支部书记陈坦、秘书长徐健生，到编辑、记者、行政人员、总务人员、工人……共约50余位。其中编辑部的老同志访问的较多，有吴冷西、张映吾、廖海楼、高扬文、莫艾、胡绩伟、王揖、黄钢、温济泽、穆青、李千峰、丁济沧、张铁夫、田方、曹艾秋、黎辛、徐方略、林间、张潮、公木、邓垦、赵棟生、李德辉、廖冰、陈学昭、午人、冯牧、冯森令、古元、张诤等约30余位。在我们召开的《解放日报》史座谈会上，陆定一等许多编辑部的老同志，都做了有准备的发言。他们是《解放日报》的创办者、经历者、见证人，他们提供的材料，不但可以做文字材料的补充——有时甚至是补白，而且可以把死材料变活，使之有事有人，有血有肉。老工人刘汉义带领我们登上清凉山，边走边讲，详细介绍当年解放日报社各个部门的地址和工作情况，著名劳动英雄郝树才为我们描述当年大生产运动的情况，使我们如临其境。在走访史家畔、冯家窑等地时，老同志向我们介绍报社从延安撤退后的战斗历程，使我们深受教育。我们还沿着解放日报社从延安撤退后的转战路线考察探访，当地农民也提供许多有价值的史料。此外，还要感谢杨尚昆、习仲勋、马文瑞等当时在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工作的同志，还有当时《解放日报》的部分通讯员和读者，著名的劳动英雄等，他们提供的材料，不但丰富了我们掌握的史料，而且使我们从多方面、多

层次地了解《解放日报》的办报方针及其所起的作用。

这里，特别应该提出的是：在《解放日报》社工作过的新闻界前辈吴冷西同志为本书题写了书名；穆青同志写了序言；温济泽同志作为本书顾问，审阅了全部书稿；张映吾、缪海陵同志审阅了重点章节；黎辛同志为副刊一章提供了很珍贵的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李斯颐、金耀云、闵大洪等同志也给了很多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王 敬

1996. 10.